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广府文化/陈泽泓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4（岭南文库）ISBN978-7-218-05366-0Ⅰ.广...Ⅱ.陈…Ⅲ.文化史-研究-广东省Ⅳ.K296.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0370号责任编辑赵殿红封面设计吴德灏责任技编周杰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广东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印张18.75插页1字数406千版次2007年4月第1版2007年4月第1次印刷印数1-3000册书号ISBN978-7-218-05366-0定价48.00元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编辑部电话：020-83791753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直销）】东汉后期陶船模南越王墓操蛇人铜托座南海神庙牌坊佛山祖庙“褒宠”牌坊江门陈白沙祠花都资政大夫祠南海康有为故居番禺屈大均像翠享村孙中山故居广州镇海楼仁威庙屋脊陶塑粤中四大名园之一番禺余荫山房集岭南建筑装饰艺术大成的陈氏书院玻璃画清十三行商馆西关趟门骑楼街沙湾三稔厅五仙观红线女与马师曾合演《关汉卿》关山月作品《报春图》佛山陶艺“回娘家”清八仙贺寿牙雕龙船乞巧公仔舞狮龙舟比赛广东凉茶铺除夕迎春花市岭南文库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幼军卢钟鹤叶选平刘斯奋李兰芳陈越平杨资元杨应彬林若钟阳胜黄华华黄浩萧如川蔡东士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名誉主编：朱小丹主编：林雄岑桑（执行）副主编：曾宪志陈海烈（执行）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卞恩才卢子辉冯伯秋庄昭刘扳盛朱仲南李权时李达强李锦全岑桑辛朝毅张磊陈泽泓陈俊年陈海烈林雄金炳亮赵殿红洪志军胡守为饶芃子梁钊梁渭雄黄尚立曾牧野曾宪志曾昭璇廖晓勉颜泽贤“岭南文库”前言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元旦序邱捷今年夏初，泽泓先生完成新著《广府文化》，以书稿见示，我一直是他的热心读者，自然以先睹为快。大概因为我是“广府人”，而且在广州的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泽泓先生又要我读后发表一些意见及提出批评，因为书还没有出版，所以，我也就尽自己所知，对书稿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供他定稿时参考。但读后感却拖了几个月，想了很久也写不出多少有深度、有见解的话。不过，一则作为最早读者之一，多少有些义务；二则把自己学习的心得贡献，或许可以引起更多讨论，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把以下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我的祖上在清朝道光年间从福建宦游来粤，从此在广州城定居，到我已经是第六代；家母姓梁，以往世居榨粉街，梁鼎芬就出自这个家族。至少在明代，这支梁氏已在广州定居。如今我年过耳顺，唯一能讲得标准的语言就是广州话。这样说来，我今天大概可以自称地地道道的“广府人”了。但我是快到而立之年，与一位客家女子结婚后，才知道自己属于“广府人”。在我幼年和青年时期，邱、梁两家的长辈，无论是有科举功名及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只会说“我们广州人”，我从未从他们口中听到过“我们是广府人”的说法。我请教过一些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新会的朋友，他们也有与我相同的感觉，就是幼年时长辈会说自己是“广东人”以及“佛山人”、“东莞人”、“中山人”、“新会人”，却不会说自己是“广府人”。所以，我颇怀疑“广府人”是一种“他称”而不是一种“自称”。我请教过多位讲石岐白话的中山人：在讲闽语系方言的南蓢人、隆都人和讲客家话的五桂山人以及讲白话的东莞人之间，你们觉得对什么人更有认同感？他们无一例外的回答是，对前者会认为是中山小同乡，但对后者只有“广东同乡”的认同，并无“广府同乡”的认同。当然，我和我的朋友的经验未必有代表性，居住在珠江三角洲、说广州白话的人是否有“广府人”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何时产生、影响何如等，是必须做广泛细致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方可得出结论的问题。但是，我和我的朋友的经验，至少可以说明目前“广府”认同，较之“客家”认同与“潮汕”认同要淡薄得多。如果按照时下的说法，岭南有“客家”、“潮汕”、“广府”三大民系，那么，应该承认，对广府文化的综合研究，无论从成果数量还是社会关注程度，都不如客家研究和潮汕研究。“广府”认同没有经历过像“客家”、“潮汕”民系那样的由知名学者号召，历数十年的包括学者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建构过程。当然，对广府文化的一些具体内容，如广州地区的历史、广州话乃至粤剧、粤菜等，前人都有过不少成果，有些学术水平还相当高。但是，以往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广东历史文化”或“岭南历史文化”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因为在秦汉以来，广州一带就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近代以来的多数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地区，研究者无形中就把“广府”与“广东”或“岭南”等同了，例如提到“粤语”，就是专指广州话，并不包括客家话、潮汕话和其他广东方言。以至于不少地地道道的“广府人”，对自己属于这个民系没有多少感觉，对“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对“广府文化”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广东民系文化的异同，更是关注、研究不多。近年，随着岭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客家”、“潮汕”文化研究的兴盛，也陆续出版、发表了一批“广府文化”研究的成果，但因为这项研究开展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我觉得尚有很多待拓展的空间，很多问题并没有讲清楚。所以，我得知泽泓先生有志写一本关于广府文化的书，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同时，我也觉得他是写这本书非常合适的人选。泽泓先生长期在广州生活，又长期在广州的方志部门工作，对广州地区历史了如指掌。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方志学家，而且在民族、人类、文化、语言、文艺、民俗等领域也有丰富知识。所以，遇到有学生和其他人士问我广州历史的问题时，我如果无法解答，首先就会想到让他们转而向泽泓先生请教。读完泽泓先生的书稿，我认为，这是一部谨严的、有创见的、有助于引起进一步讨论的高水平的著作。这本书的第一个优点是思路清晰。如前所述，以往在珠江三角洲讲广州白话的人很大程度上自以为代表了广东，所以，今天一说广府文化，就很容易把它与岭南文化混为一谈。泽泓先生在书中对“广府”、“广府文化”作了界定，不仅从语言，而且考虑到地域，更注意到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等方面。他强调广府文化不等于岭南的整体文化，也不能代表其他分支文化，更代表不了其他分支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广府文化的核心区与亚文化区，广府文化区与其他文化区交错、交融的问题，他也提出自己的讨论和解决思路。因为他对“广府文化”有比较明确的概念，所以，研究起来就不会顾此失彼，也不会眉目不清。本书的第二个优点是写得很“实”。泽泓先生治学谨严，历来反对空话、废话，在这本书所作的结论可说“无一字无来历”，而且对资料、史实的考证、选择，也可反映其见识与学术水平。他注意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注意考古新发现，了解现实变化，而且，泽泓先生的文风也是以平实畅晓见长，绝不作故弄玄虚之语，所以，他这部书，既可促进广东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对当前广东文化建设有现实意义。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而又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人士，在这本书中一定可以获得不少新知识。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评价客观。泽泓先生本身不是广府人，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又对广府的历史文化毫无隔膜，所以，研究起来就容易得心应手。他既对广府文化及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又没有一以概之，将其等同于岭南文化。泽泓先生对广府文化的优点作了很好的总结，但也注意恰如其分，他论及广府文化的特征时，既看到其在中华各地域文化中后来居上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优势，也看到其先天的不足。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很值得一些只顾强调某个民系“最优秀”、有意无意贬低其他民系和其他文化的研究者学习。广府文化研究目前可说方兴未艾，泽泓先生这本书，只是诸多研究成果中的一种。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从来愿意同他人讨论，从来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对这本书的若干观点，可能会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对一位学者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可以引起讨论。我相信，这也是泽泓先生所希望的。2006年9月于中山大学叙言一、广府文化的定义和特征岭南文化中包含汉族三大民系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在20世纪已经分别建立对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潮学”、“客家学”之说。而对广府文化的研究却只在分散的、表象的层面上，这与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对象之不确定则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广府文化界定一个比较严谨的、明确的概念，圈定一定的研究范围，是系统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基础性、前提性的课题。岭南文化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成分组合而成的地域文化，其组成成分包括以不同语言为特征的多元民系文化。“民系”一词，即使像《辞海》这样全面而又权威的词汇工具书中也未收入，但在20世纪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著作中已广泛使用。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使用共同的话语，必须放弃不规范的‘民系’、‘支系’说，而采用国际人类学界惯用的‘族群’说。”“族群是一个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要对他‘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1〕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1）1996年9月16日在厦门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指出：“要具体解释族性，应先区分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英文nation是指有state或government机构的一个族群，含有国家和民族两层意识。而族群本身并不一定含有state或government的意义，它只是有意识、有认同的群体的一种。”〔2〕显然，使用“族群”的概念要比“民系”有更为明确的严谨的科学范畴，但为顺应约定俗成的用法，本书仍沿用“民系”一词，而在这一词汇的内涵定义上，则采用上述关于“族群”的诠释。广府文化是广府民系的文化。所谓广府民系，通常指的是使用粤语方言地区的汉族族群。按照这一说法，广府人的分布地域相当广大。有学者认为：“广府人是华南汉族的主要族群之一。广府人分布在粤中、粤西南、粤北，以及桂东南一带，人口约有5100万，其中广东约有3800万，广西约有1300万。”〔3〕（笔者按：此统计数字应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数字。）李权时主编的《岭南文化》一书圈出的广府民系地区，大体也是这个范围：“大致包括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一带（含今香港、澳门），整个粤中和粤西、粤西南部、湛江地区和广西南部地区。”〔4〕也有学者提出“广府风俗文化群落”这一命题，并指出其可再分为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粤西谷台地和粤北山地丘陵风俗文化群落。〔5〕但是，在这么大的范围中生活着的居民，是否有可能同属于一个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的社会实体，或者说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一个族群呢？《岭南文化》列出广府文化特征主要的六个方面是：农业的多层次耕作技术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这是广府文化所有内涵的基础；广府地区是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物质生活实用性是广府文化异常突出的特征；开放性和兼容性；强烈变革的意识和心理；平民性和市民意识。显然，这些特征并非在上述所谓广府民系地区都表现得很突出。例如，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称得上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而粤西、桂南就说不上最活跃地区了。笔者不赞同笼统地将在岭南使用粤方言的居民划分为一个民系，因为他们除了使用同一方言之外，在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等方面并不显示出有“自觉为我”或者相当接近“自觉为我”的文化特征。《岭南文化》一书所列举的广府文化之“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门类和现象”是粤曲、粤剧、佛山及广州工艺、广州建筑艺术、广州菜及带有奇异风情的广府民俗，这些文化现象无论如何只能作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特征，而不能代表上述划定的范围要大得多的粤语覆盖地区的文化特征。广府文化的界定与广府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广府”是一个历史地名，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名称有关。“府”在岭南之设置，最早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梁、陈两朝均设有广州都督府。南朝的都督府设于各军事要冲之地，管辖若干州县的军政、民政，但不算是一级行政区划，并没有在全国普遍设置。隋代在州、郡之上设有军政合一的总管府，唐代沿之，不久改为都督府，以都督充任节度使。广州都督除了充任岭南道节度使，还兼统领桂州、容州、邕州、安南四府经略使。宋代广州上属广南东路，下辖南海、番禺、增城、清远、东莞、香山、怀集、信安、新会九县。元代设广州路，辖番禺、南海、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广州录事司。明代开始设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设定有划时代的意义。明以前，广州作为州或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辖境历朝变化盈缩不一，但范围都是比较大的，隋代的广州（南海郡）境域就包括粤中、粤北以及粤西的部分地区。明代广州府由元代之广州路、桂阳州、连州合成，辖番禺、南海、顺德、东莞、新安（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清远、香山、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13县以及连州及连州所领阳山、连山二县。顺德、新安、三水、新宁、从化都是明代新设立的县。广州府较宋代的广州略有收缩（析出怀集）。连州所辖属二县在元代为桂阳州、连州各自仅有的属县，较广州府其他直辖县与广州府的关系要疏远一些。到了清代，仍设广州府，但连州及属县又从广州府分出。清代广州府的辖县，加上新设的花县共14县，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元之广州路为基本范围，只是由于人口、经济的发展，明代在这一地域范围内新辟了4县，清代新辟1县，因此，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700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对其民风民俗的融合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臻于成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元代不设府，存在时间又短暂，因此，本书将“广府”理解为源自明代始设的广州府；所谓广府民系指的大体是这一地区的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杂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还有客家人、疍家人，少数民族有回族和满族）。二、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一提到岭南文化的表现，许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喝早茶、看粤剧、讲粤语，这些属于广府文化的表现，当然也算是岭南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但不是岭南地域的普遍现象，更不等于全部的岭南文化。在岭南这一地域上，今时的分支文化，不仅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文化，有着港澳文化、特区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而且还有着三大民系文化不能全部包容代表的汉族的雷州文化、桂东文化、琼州文化等，甚至在讲粤语的江门地区也有着不甘俯就为广府文化一部分的五邑文化。就拿三大民系来说，潮汕人、客家人讲的不是粤语，欣赏的不是粤剧，喝早茶的习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潮汕与客家地区推广，但也未能像广府地区那样蔚成习俗。总之，广府文化只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岭南文化。说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代表，是说广府文化的特征在岭南文化的诸分支文化中最为引人瞩目，地位最为突出。这种地位，与广州地区长期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有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有关，与广府地区在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得风气之先的区域优势地位有关。不妨对比一下，客家文化其实不限于岭南，在江西、福建，一样很成气候；潮汕文化与闽南文化有着亲缘的关系及不少类似的表现。只有广府文化是“纯岭南”的。岭南文化的总体特征，如背靠南岭面向大海而长期养成的向北相对封闭向南极为开放的特征，在广府文化中确实表现最为突出。在接受海外文化融为自己的特色的开放性上，广府文化有较强的能量。粤语中融入外来词的现象就比坚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祖训的客家话要突出。在饮食上粤菜与同样有名的潮菜相比，粤菜的善变与潮菜的求精表现出不同的长处和特色。潮汕人在工夫茶上表现出那种全神贯注的茶道，与广府人在茶市中表现出来的商业性全方位的发挥，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与内地相比，地处岭南最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地区，在江海交织的水网中形成的水文化特征相当突出。由于通向外海以及长时间一口通商的影响，这种水文化是开拓型而不是保守型的。从整个岭南地区来说，各地在总体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岭南文化基本特征的强弱并不一样，客家民系的水文化特征与广府民系相比就更为弱化。广府文化由于特定的政治中心、地理区位与特殊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适时善变、注重实际的文化特征，使之在岭南文化的诸分支文化中占有强势地位、中心地位。因此，外来的人一提到岭南文化，首先想到的就是广府文化的表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广府文化不等于岭南的整体文化，也不能代表其他分支文化，更代表不了其他分支文化的发展方向。粤语可以扩张向其他地区，但不能代表或代替潮汕话、客家话及少数民族语言。粤剧、潮剧、汉剧是各具特色的地方戏剧。潮菜、东江菜与粤菜是不同菜系，就连工艺美术，也要分潮绣与广绣、潮瓷与广瓷、潮州木雕与广式木雕。因此，我们在研究广府文化时，对于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要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评，既肯定其地位的突出，也不要过分夸大其地位，更不要一以概之，将其等同于岭南文化。当然，文化的分区不是一刀切，文化现象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同处于岭南地域的广府文化及其他诸文化之间的联系及区别，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占主流的地区，其后逐渐演化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杂存的地区，现时则广府文化的表现明显比客家文化突出。香港有着百年殖民地历史，深圳是新时代崛起的经济特区，两地的文化特征不同，与广府文化也不同，但因为地缘、血缘等关系，两地的文化中都反映出广府文化深深的影响。在香港还更多表现出旧时广府民俗文化的烙印，又有老上海和西方文化的种种痕迹。三、广府文化的主要特征广府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开放、务实、善变。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开放是民系的环境特征，务实是民系的本质特征，善变是民系的表现特征。广府民系的开放，不仅有其自然环境条件，还因为其历史环境条件。作为自然条件，便利的江海交汇，面向大海的水路交通，以及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广州持有长期的、合法的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优越地位，与开放的经济交流俱来的是广泛的文化交流。作为历史条件，岭南文化起步迟于中原，岭南是大一统封建国家中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基层。因此，无论从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有过短暂时期的封建割据的南越、南汉王朝，但这些王朝的政治模式、文化原动力其实都来自中原。因此，岭南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自觉地接受着外来先进文化的滋润和影响，而且感受到这种滋润和影响给岭南进步带来的推动力。作为岭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广府地区，这种开放与接受带来的进步更为明显。在广府历史重大发展的每一时期，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吸取外来文化的动力。最早入粤的任嚣、赵佗带入的秦文化，使岭南首郡南海郡治番禺县（其范围大概相等于后来之广府）首先得到封建文明的开发，进入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历程。六朝时期，广州以开放的姿态容纳了来自江南的易学大师虞翻和道教启蒙大师葛洪，也接纳了来自西域后来被奉为中国禅宗祖师的达摩，吸收着各种文明的精粹，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隋唐宋元时期，以宋璟、李勉、程师孟、蒋之奇为代表的入粤官员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即使在岭南文化已经发育丰满的清代，阮元、张之洞、林则徐等人物对粤地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洋务、实业的发展，仍然发挥了引领近代化潮流的作用。近代的西学东渐，使广府人睁开双眼看世界，冲破封建思想樊笼，吸收西方科技文化，赋予了广府文化充满生机活力的别开生面的地方文化特色。正因为如此，广府人对于外来文化的进入从容相待，有一种较为自觉的拿来主义的适应性。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都是以广州作为桥头堡，这些宗教在广州登陆及存在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活动方式也不同，但显然为广府人开辟了新的文化交流渠道，推动了广府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康有为寻求救国新径，是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和上海租界受到了重要启发。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与他在檀香山、香港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毗邻澳门的香山唐家湾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任的民国总理、清华学堂的第一位校长、由买办转化而成的近代大工商业家唐绍仪。从得风气之先到领风气之先，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质，渗透广府文化的各个领域。这种开放，受岭南发展的需要以及中外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影响，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广交会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实际上也是沟通外部世界的桥梁。新时期的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城市的市场价格改革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都是首先在广府地区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务实，是广府民系生存条件所造成的。广府人没有那种位居政治中心的可以居高临下发表高深理论的优越地位，也不可能有太多闲暇去从事高深理论的研究，这里必须经常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交锋，更是一处商者云集的商战之地，身在其地的佼佼者主要精力只能聚焦于经济利益，无暇顾及一举一动及各种事物的正名。即使被视为明代划时代的思想家的陈白沙及与王阳明理论可以抗衡的湛若水，他们的著述并不多，他们倡导的是以心领会。被列为大儒的朱次琦临终之前干脆将自己生平著述付之一炬。贯穿着广府学术文化的一条主线是经世致用，于是在广府学术文化高峰期出了陈澧、邹伯奇这样的学识丰富、精通百科的学者。广府的意识形态中，渗透着远儒重商之意识，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早在明万历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改革之前，嘉靖时任浙江巡按的南海人庞尚鹏就已经在浙江全省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尝试，此后他还在福建、两广任上继续推行此法，在管理盐务、屯田上多所建树。广府人的务实作风，表现在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讲实惠上。这种风气，在改革开放之初，借以打破根深蒂固的思想禁锢就显得十分有力和必要。有人说广府人会生仔不会起名，是不善于高级思维的表现。其实，这种行动方式与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和不争论姓“社”姓“资”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这也正是广府地区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本原因。尽管近年来正名、取名甚至名在实先、以名饰实的“沽名”风气也悄悄地沾染了广府地区，使广府地区的务实之风受到侵蚀消磨，但是广府民间务实之风依然是主流，成为广府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务实在生活习俗上表现得甚为突出，衣食住行中，广府人向来把食排在首位，穿排在末位。穿只求舒适随意，而食却颇有讲究。有一种说法，广州人忙于上茶楼，上海人忙于买屋供楼（今时也有广州人热衷于买屋供楼，可依然是上茶楼与买屋供楼两不误）。广州人不但敢吃，而且会吃，上桌的菜式，要一件一件上，一件一件吃，最好是吃得精光，倘有剩余，还要打包带走，家财百万者也不例外，所谓吃好不浪费。不像北方盛行的讲究叠盘叠碗，以示好客，吃不完才显得够气派。广府人在事业上有一种拼命精神，日常生活则偏爱舒适，穿着拖鞋、睡衣上市，一度司空见惯。赏花品茶，本是何等斯文优雅之事，而到了广府，一样的赏花品茶，却能酿成轰轰烈烈的花市、食客如云的茶市，一样不失其人情味，又带来无限商机。以趋利为核心的务实精神，表现为平民意识和享乐文化的形态。也正因为务实，就不在乎符合什么规则理论，而在乎实际目的。改革开放之初，不受陈规掣肘，又需认真对待，广东人提出了“见到红灯绕道走”和用尽政策的策略。这个道理内地人未必不懂，但只有在广府才做得到。还应该说，这与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或把政策变了样执行的做法是两码事，绕道走的目的还是为了向前走，用尽政策是为了使政策发挥其最佳效应而不是用来束缚自己。善变，是开放与务实的必然结果和表现，有一个从被动到自觉的过程。因为是开放的，在不断接纳融会各种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使自身发生变化，从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态势。以致有人在评点全国一些大城市的文化面貌时，将广州说成一个说不清的城市。但是这种变化的基本立足点是务实，换言之，是以利益为最终的驱动力的，这就制约着其变化的方向。对于一些事物，追求变化未必不是好事，比如饮食，粤菜是善于吸纳和变化的，其变化的原则，就是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创新中获利，而使食客有了口福，让粤菜得到丰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文化在创新时还需要有深度，这就不是只凭变化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粤剧，观众队伍的流失是剧种生存的致命威胁，行内人注重变化的一个着眼点就是看重票房，较为注重表演手段的新奇。追求新奇不择手段，百无禁忌，不怕四不像。电影问世时，粤剧把电影搬上舞台背景，又将粤剧率先拍成电影。粤剧自己创造不出什么著名曲调，但可以将东方的西方的以至流行歌曲的调子入戏。因此，粤剧的面目变化在各剧种中可谓最快，其平民性、娱乐性的骨子里是商业性。在民国时期这种做法曾经为粤剧取得一时的轰动效应。至于这种变化的努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为其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下结论还需要待以时日。不可否认过多地追求噱头的负面效应，必然会削弱表演艺术的高雅性。善变赋予广府文化与时俱进的能力，也给予广府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善变的动力在于开放与务实，广府文化的活力，是在将外来的东西化为己有而又不留痕迹。有人将广州方言与上海话作一比较，这两种方言都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沪语收缩而粤语长红，粤语表现出超稳定、超范围的流行。“搞掂”、“揾食”、“T恤”、“炒更”、“买单”、“无厘头”、“擦鞋”等等新词，不少是从外来语言中直接音译过来的，却带有浓郁的粤味，迅速走向全国。固守阵地的上海话，即使在上海重新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今时，却仍然是一种圈子里的语言。在建筑方面，广府人将传统的干阑式建筑与西方的建筑风格结合起来，产生了蔚为特色景观的骑楼，不光是标新立异的外观，更主要的是骑楼的实用功能，符合商业性、平民性的规则。正是这种商业性的特征，使广府文化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更显示出在文化、经济领域中独有的引领时尚潮流的突出态势。这些态势其实有不少是外来文化时尚、经济模式的传播。然而也因此得一时之先，却不在乎其“知识产权”之争了。有心者看到的是这么一种现象，“高第街革命了，喇叭裤在那条狭窄街道一喇叭，通过一个个红白相间的编织袋（广州人俗称偷鸡袋）拖的拖拽的拽，以迅猛之势，全国喇叭了；毛宁张口一首‘蓝蓝的月亮’，东南西北也月亮蓝蓝了，于是乎，涛声依旧和弯弯的小桥，如甜甜的清亮亮的泉水，也灌溉了饥渴的乐坛，引出了潮流。在北头还‘凡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时候，首家合资的中国大酒店率先打开大门，让富人、穷人可以同入厅堂，或观赏酒店的华丽，或享受五星服务；珠三角一带发家致富的农民伯伯，田埂边盖起了小洋楼，一色的小拍条磁砖，贴高兴了连公厕也贴，一时间，厕所砖也贴满了大江南北；听说酒吧之风尚也源于广州……然而革命的、流行的，以及发源于此的林林总总，却舒服呆了，没脾气、没邀请的广州蹲不住了，纷纷北上寻觅文化与经济的落差之快感，随便捞点银子去了，留下的广州却是有姿势没实际的，图有文化名城虚名的，没精神内容的大排档一条街。”〔6〕我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道地的广州人，然而在这位作者眼中的广州，应当代表了外地人对广州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论及广府文化的特征，既要看到其在中华各地域文化中后来居上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优势，也要看到其先天的不足。广府文化是开放的，但同时也有封闭的一面；是务实的，同时也有不理性的直观短视的一面；是善变的，同时也有不能经过积淀而成大器的一面。这些不足也是岭南文化之不足。开放使广府文化吸收了许多营养，但以实利为动机的内在自我，却使人对开放之后的吸收有所选择和限制。在近代史上，广州人可以允许在一口通商中与洋人往来以获得城市商贸之利，而一旦认定洋人入城会损及既得利益，在实际上是商绅领导下的反洋人入城斗争的坚韧性与持久性，就远在各口岸开放城市之上。鸦片战争时期，洋人占领了广州，“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7〕。当然，此时在城外成立了反抗侵略的团练，但是广州城内的这一段历史，却是当代的本地人感到难堪和不愿述及的。平民性与商业性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各行各业中，最为开放和吸收融化最快的，就数饮食业。时装行业，捷足先登的是内衣和牛仔布服装，在南海、增城有着销量占全国出口比例甚大的产地，却产生不了国际大师级的时装设计师。在广州有着引领国内服装市场的服装制作与批发的集散大市场，广州人自身却不在乎穿什么，尤其不会把时间和金钱大把地花在穿着的趋时与名贵上。务实使广府之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热腾腾的商机，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赤裸裸的商机，旺气十足，但往往缺少远见，没有在内涵上下足工夫。比如建筑一座楼，重视其建造速度，注重其高度效应，标榜其招标名家及标新立异的外观，却忽视了或者说判断不了这一“标志性建筑”到底有多大的标志性文化内涵。打造教育事业，在校舍设施上颇下工夫，有骄人的表现，而在提高师资水平与优势学科上的表现就缺少震撼力。有了这些问题，让广府人在许多内地人心目中的文化品位总要低一些，在不得不承认广东取得经济成就的事实的同时，还纠缠于“广东有没有文化”这样的命题上。如何正视广府文化的这种本原的缺陷，自觉地扬长避短，是研究民系文化的发展方向所应当着重注意的。四、广府文化特征的渐变性广府文化特征呈现由中心向周边渐变的状态。区域文化的中心是珠江三角洲，处于三角洲北部边缘的清远、龙门，西部的台山、新会等县份，其风俗文化分别受粤北、粤西民风民俗的影响而呈现出与珠三角有所区别的过渡状态。在西部边缘形成了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文化（后加上鹤山，又称为五邑文化）。清远、龙门等地则呈现出与珠江三角洲北部接壤的粤北山地丘陵风俗文化影响的特征。位于珠江口的香港沦于英国殖民统治以及澳门为葡萄牙侵占之后，其社会形态、生活习俗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因为当地居民主要使用粤语及其与珠江三角洲各邑有着地缘、血缘、亲缘的密切关系，其风俗文化形态可以视为广府风俗文化在中西文化强烈碰撞、渗透、融合情况下的一种边缘过渡状态。这样，在广府文化珠江三角洲核心区的西、北、南面，就分别出现了五邑、粤北、港澳等三个过渡型的广府文化亚文化区。那么，核心区东面的风俗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呢？珠江三角洲东邻的东江流域惠州地区流行的是惠州话，在判断惠州话归属何种语系上，着实让语言学家们颇费心思，他们称之为“粤、客难分的惠州话”，“是一种归属未定的方言”〔8〕。这种语言现象，反映了地处广府地区与客属地区之间的惠州地区粤客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这种交流活动的载体是东江。实际上在东江下游流域的东莞、宝安、香港地区都有这种广府、客家民系频繁交流的情况，只不过这些地区更为靠近广府文化核心地区，广府文化的成分逐渐占了主流。惠州地区离广府文化中心地带较远，而且在行政区域上，从隋代开始就与广州并立，受广府文化的影响明显减弱，因此在这一地区出现了粤客文化界限模糊、融化的情况。至于雷州半岛徐（闻）海（康）地区的地域文化则自称为雷州文化，说不上与广府文化有什么归属联系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语言既是形成民系文化的基本条件，又是民系文化的重要特征。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方言，在广东的覆盖面甚广，语言面貌差别也比较大，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反映了同是流行粤方言的各地，在文化特征上也有较大的差异。在粤中以及粤北和粤西南的部分地区，按照语言学家的划分就有广府片、高（州）廉（江）片、罗（定）广（宁）片和四邑片之分。〔9〕广府民系文化中心区大体与广府片相符，其余各片只能算是广府文化亚文化区，广府民系的文化特征，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由核心区向周边渐变的状况，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广府民系文化核心地区，离核心区越远，其民系文化特征就越呈现出一种过渡变化越大的状态。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表述广府文化时，当然是聚焦在以广佛地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总而言之，广府文化是以使用粤方言为语言特征，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珠江三角洲周边的粤西、北部分地区的民系文化。

注释：〔1〕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17、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中国人类学会通讯》第196期，转引自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第6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第2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孙冕：《虚拟的文明》，载《南方航空》2005年第7期。〔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4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8〕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5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26、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篇第一章南岭屏障与五岭通道一、南岭山地人类的活动离不开生存的自然环境，时代越久远，人类的生产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低下，受制于自然的程度就越大。时至今日，自然环境仍然制约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天时地利，仍旧是人类社会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广府民系所处的岭南地理环境，对广府民系的经济、文化活动及民系特征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广府民系的形成与演变，与岭南的地理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岭南诸地理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南岭与珠江。南岭又称五岭，横亘粤北和湘、赣之间以及广西东北部，岭南指的就是南岭以南的区域。岭南大地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方，全境地形大势北高南低，西陡东缓。北倚云贵高原和南岭山地，中亘两广丘陵，南为河谷与三角洲平原，再往南临浩瀚的南海。山地、丘陵约占广东全省陆地面积的62%，台地、平原约占37%。〔1〕北高南低的地形大势，显示出北背五岭之高峻。地理学家认为：南岭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片长江、珠江分水高地。其上耸起五座标志性的山即越城、萌渚、都庞、骑田、大庾五座，山前即南北大路所在，故名。前三座在湘、桂之间，骑田在湖南，广东只有大庾一座与赣省共有。近人徐俊鸣认为都庞应在连县北南风坳处，裴渊《广州记》称五岭一名揭阳岭，亦贛南入粤大道所经。故粤北山地最多只占三岭，也即三条大道南下山地名称。〔2〕南岭山地东西绵延1600多公里，其高峻虽不及我国西北、西南山地，但在古代交通极端落后的状态下，无异是难以跨越的屏障，对南北交通有明显的阻隔作用。海拔仅有1000米左右的大庾岭，山体为花岗岩断块山地，古人称为“江险闻瞿塘，山险最庾岭”。因而，唐代以前，中原对岭南知之甚少，到了唐代，刘恂撰《岭表录异》，所载也不乏中原人眼中的异象、异物、异俗。岭南人同样很难跨越五岭进入中原。南岭山地的存在，对岭南人特别是广府人文化素质、民性特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文明起步的初期，岭南与岭北的中原等地文化差异甚大。旧志谓岭南是“《禹贡》之南境”、“《禹贡》扬州之域”，〔3〕新方志多沿用此说，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禹贡》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政治区划，将全国分为九州，分述九个区划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以及交通道路等。后人考证《禹贡》是战国时人之作，代表的是战国之地理观念。《禹贡》所谓“淮海惟扬州”，当指今淮水以南的苏、皖等处，是今中国之东南。《禹贡》说的南方，是今湖北荆州。《禹贡》所述的“扬州”，与岭南之间还隔了一个荆州。唐《通典》指出，将岭南指认为扬州之南的说法乃“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之境”〔4〕。正因为如此，明黄佐《广东通志》就说广东在“唐虞三代时在扬州之外境，大越之南裔”〔5〕。先秦时期，岭南不属设置行政区域之地，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岭是阻遏北方政治势力扩张的一道不易逾越的地理障碍。“岭南”一词，最早见于《史记》：“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6〕司马迁将“领（岭）南”与“沙北”联系在一起，沙北为漠北，《汉书》也每每出现将南越与匈奴并提，可见即使在秦汉时期岭南已设置了郡县，中原人心目中仍将岭南看成化外之地，将岭南人看成另类异族。二、五岭通道南岭的一些山口和分水岭在古代成了沟通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的重要交通孔道。南岭古称五岭，与这些孔道有关。“五岭”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疲敝。”〔7〕然而，《史记》没有说明何为五岭。至晋邓德明《南康记》才指出五岭由东而西分别为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司马迁所说“五岭”引释为：“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后人考证，始安岭即越城岭，临贺岭即萌渚岭，桂阳岭即骑田岭，而揭阳岭则各家说法不一，迄今未有定论。〔8〕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另辟一说，认为五岭并非山岭之名，而是入岭之通道：“五岭之说，旧以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通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今桂林市），五也。”实际上，南岭山地地形复杂，并列山脉多，入岭之途决非仅此五路，故而，五岭是否就是周去非所指说的这五条通道，有不同看法。五岭为南岭历史上的五条重要通道的论点，被不少学者接受。有学者提出这五条交通要道自东向西分别是：越城岭道，跨湘水与漓水的分水岭，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其上有秦代修筑的灵渠以沟通湘、漓二水。萌渚岭道，跨湖南潇水与广西贺江的分水岭。古都庞岭道，古都庞岭是在广东连县与湖南蓝山县交界之大全罗岭，是湘江支流春陵水与北江支流连江上源东陂河之分水岭。（今地图上所标绘都庞岭位于湖南省江永县西，又称永明岭，跨湘水上源灌江与广西桂江支流平乐水的分水岭。至于揭阳岭，一说在粤东莲花山地，为梅江与榕江的分水岭。）骑田岭道，又称摺岭道，跨武水与来水之分水岭——摺岭（在湖南境内），岭上有摺岭关。大庾岭道，又称梅岭道，跨粤、赣两省边界浈水与章水的分水岭——梅岭，岭上有梅关。〔9〕上述五条岭道，横列于两广北部与赣、湘交界之处，它们都是岭南、岭北水系之分水岭。从大的水系说，是湘江、赣江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分水岭通道是连接不同水系交通来往的要道。五岭分水岭对于以珠江三角洲为活动区域的广府民系、广府文化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平南越，越城岭之灵渠是军需动脉，在岭南早期开发中，这是中原文化南来以及南北交流主要的通道。由此而决定了西江支流贺江及西江汇合处的广信（今广西梧州、广东封开一带）成为这一时期岭南的文化中心。秦以后，大庾岭通道的重要性日益体现。《南康记》谓“秦始皇略定杨越，谪戍五万南守五岭，第一塞上岭，即南康大庾岭是。”〔10〕赵佗为防止北方战乱殃及岭南，所作的重要决策是“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谷”，“急绝道聚兵自守”。〔11〕此三关地处北江（古称溱水）上游，都是扼水之关：阳山关扼北江上游支流连江（古称湟水），地处古都庞岭通道下连江往广州之要地；横浦关扼北江上游支流浈江，地处大庾岭通道下浈江往广州之要地；湟溪关则是连江、浈水之汇合处。三关是大庾岭道、古都庞岭道的第二防线。这也说明了古都庞岭通道与大庾岭通道在秦平南越之后，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早期的大庾岭通道可能位于广东南雄乌径与江西信丰之间，跨北江上源浈江与赣江支流桃江之间的分水岭。南雄旧志载：“乌径路通江西信丰，陆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赣州大河，庾岭未开为南北通衢。”〔12〕但这条路要跨越数百米山地，崎岖难行。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说到：“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13〕所说“岭东废路”，当指大庚旧道。唐开元四年（716），时任左拾遗的曲江人张九龄秩满归养，组织人力在梅岭开凿了大庾新道，路宽近17米，交通大为改观，从此大庾岭通道逐渐成为五岭诸通道中交通最为繁忙者，后人誉为“古代之京广线”。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通道是最快捷最便当的通衢。宋人余靖谓：“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14〕宋代高峰期每天竟有万人经过梅岭古道，出现了“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户摩踵接行人担”的繁荣景象。大庾岭道路的通畅，使粤北得到开发而成为岭南较为先进的地区，西江上游地区的广信则相对地衰落了。从总体上说，岭南接受中原文化以及经济交流的步伐加快了。正如明代著名学者丘濬撰的《广文献张公开大庾路碑阴记》指出的：“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数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三、南岭对岭南社会发展的影响五岭对岭北政治势力扩张的阻遏作用，有古籍文献为证。《史记》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5〕旧志所载，舜陵在九疑山女英峰下，一名永陵；至琯岩下，有舜祠。《史记》记载，战国楚悼王时，吴起相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16〕。此处说的“百越”，是长江中下游以南一带。《后汉书》具体记述为“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7〕。所说苍梧，即“舜崩于苍梧之野”的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由此折东“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18〕秦始皇巡狩意在体现其对据有疆域的统治，秦始皇东临所望的“南海”，并非今之南海，而是东海。距此次巡狩十年前，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之前，岭南已为秦所征服并置郡县，然而秦始皇只到了岭北临界的湖广零陵就止步不前了，这说明越岭之不易。西汉吕后专政时代曾派周灶南征南越，由于一岭之隔，地势险阻，加上气候水土骤变，汉军相持年余不得过岭，终于在吕后驾崩后罢兵。这场战事在《史记》中有简要的记述：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19〕西汉元封五年（前106），是西汉平定南越，在岭南恢复了中央政权设郡县局面的六年后，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南巡，也是“望祀虞舜于九嶷”而返，〔20〕南岭之峻隔险阻，仍是汉家天子不过岭的主要原因。南岭对岭南的屏障作用，并不完全是一种阻隔岭北进步文明南来的消极作用，在北方逐鹿争鼎的分裂混战时期，它又起了一种保护岭南得到局部苟安的积极作用。秦末，南海郡尉任嚣临终前嘱咐龙川令赵佗曰：“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叛）秦拥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21〕正是由于岭南的屏障作用，使秦末汉初中原鏖战的烽烟没有燃到岭南。赵佗负山险阻、绝道待变的结果，使南越国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岭南得以休养生息。对这段历史时期岭南的开发进程，专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它的建立和聚兵自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证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岭南免受战乱之苦。”〔22〕从而使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的来自中原的征服者有可能进行开发岭南的事业。五岭关隘在军事上对启闭南岭举足轻重。赵佗“闭关绝道”、刘岩“闭关自擅”，是封建割据的首着军事行动。隋高祖即位之后，隋行军总管韦洸南下岭峤，遭陈朝豫章太守徐璒所拒，只能驻师大庾岭逡巡不前，后来还是坐镇岭南的冼夫人顾全大局，派遣孙子冯魂往迎韦洸入岭，岭南才得尽平。唐季，藩镇割据情况日益严重，先后任清海军节度使的刘隐、刘岩兄弟苦心经营岭南，拼力削除在岭南的异己势力。刘氏南汉国占据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今广西之大部和广东全境为南汉所有。借助于南岭这道天然屏障，南汉国“坐拥百粤，闭关自擅”〔23〕，“五十年来，岭表无事”〔24〕。在五代时期的十国中，存在的时间之长，仅稍次于钱氏吴国。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南汉国经济保持增长，国力在十国之首。南岭的屏障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渐而消失。先秦至唐代以前，中原经历了战乱纷扰的时期，岭南得南岭之障护，相对安定。因此，出现了晋末南北朝时期北方入粤的移民潮。广州出土的晋砖刻有“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永嘉世，九州凶，余广州，平且丰”的铭文，〔25〕反映了岭南、岭北治乱之鲜明对比。随后的南北朝时期，陈霸先以岭南为基地积聚力量，集义兵于南海，竟能北伐出击江南，建立陈朝。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推进，交通的改善，南岭已阻隔不了烽烟之蔓延，岭南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往往成了最后的军事舞台。难民南流、战乱纷繁，较量愈演愈烈。南宋、南明（在岭南甚至有两个南明皇帝对峙）小王朝对抗新兴封建王朝的最后挣扎，震撼着岭南大地。太平天国起义在此酝酿揭幕，经过一番震动全国轰轰烈烈的风潮，最终又在岭南降下帷幕。这里还是国民党政治核心撤离大陆的最后据点。南岭的屏障作用一旦减弱、消失，被视为避难所的岭南，便成了鏖战激烈之战场。南岭作为岭南北障，使岭南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对岭南的社会演变、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人口流迁都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这当然也包括对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特质的形成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远古时代的文化萌生到秦汉之前，是岭南文化的原生型态产生、发展和成型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地理环境的险恶，这个发展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其水平是相对低下的。”“长期孤悬南隅，文化相对封闭，使岭南的早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中，保持着这样一种方式：它只选择和吸收实际的、对己有直接利用价值的物质文化，却并不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和生存文化。”〔26〕由于南岭的阻隔，影响了中原先进文化向岭南的传播速度，岭南上古社会的历史进程落后于中原。随着社会进步和五岭的开拓，岭南的开发加快了步伐，直至明中叶以后，岭南社会的文化、经济才有了迅猛的发展。岭南社会的发展与五岭通道密切相关。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地形图上标示的地名，有桂阳（今连县）、南平，在今连县西北隘口南风坳附近还标有名叫龁道的县城。沿古都庞岭道不到80公里距离，竟设置了三个县城，这在人口稀少、县份不多的汉代岭南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见古都庞岭道在政治疆域中的重要地位。根据这一线索，也不难理解两汉时期苍梧郡的文化就已跻身全国先进地区之列的原因。在唐代，粤北通道逐渐成为主要的南北通道，张九龄就出生在粤北地区，他极力主张拓修大庾岭梅岭通道，并亲自指挥了这一工程。拓修后的大庾岭成为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地处大庾岭道的南雄珠玑巷成了流民入粤的中转站，广府人的珠玑巷情结，折射着对中原的恋根性。横亘东西的南岭，造成了岭南负山临海，北向闭塞南向开放的地理格局。南岭以南独特气候环境的影响，使岭南带有相对独立的地域特征。“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27〕以岭为界的南北民情风俗、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心理趋向、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南北交流的困难。历史上岭南曾经被岭北视为“蛮夷荒服”的“化外之地”、“瘴疠之乡”而另眼相看。尽管后来岭南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南北差异并没有随着南北交流的扩大而彻底消除，岭南文化的特异个性以及异质依然存在。且不说其与中原、齐鲁、巴蜀等文化的差异，就是一岭之隔的湘、赣文化，与粤地文化也有明显的差异。时至今日，仍旧不排除将岭南文化视为另类的一些歧视意识。横亘在人文之间的南岭，在时间隧道中绵延至今。注释：〔1〕《广东历史地图集》第97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2〕曾昭璇、黄伟峰主编：《广东自然地理》第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明天顺（大明一统志》卷79。〔4〕唐杜佑：（通典》卷172（州郡二》：“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之境。”〔5〕黄佐（广东通志》卷第一《图经上·广东总图经》。〔6〕《史记》卷129《货殖列传》。〔7〕《史记》卷89《张耳陈馀列传》。〔8〕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154页，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版。〔9〕梁国昭：《五岭与古代交通》，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12月。〔10〕《南康记》，引自《太平御览》卷五十四。〔11〕《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12〕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10《山川路》。〔13〕《张九龄诗文选》第2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余靖：《武溪集·韶州新修望京楼记》。〔15〕《史记》卷2《五帝本纪》。〔16〕《史记》卷65《吴起列传》。〔17〕《后汉书》卷16《南蛮列传》。〔1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19〕《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20〕《汉书》卷6《武帝纪》。〔21〕《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22〕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3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3〕王夫之：《宋论》卷1。〔24〕路振：《九国志》卷9《邵廷琄传》。〔25〕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载《广东文物》第656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26〕李勤德：《试论岭南文化的原生型态》，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第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27〕白居易：《白孔六帖》卷99。第二章珠江水系与珠江三角洲一、珠江水系广府民系分布在广东境内的珠江流域地区。珠江诞生至今已近2亿年，远古时代即有人类在珠江流域活动。作为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中国最大的热带、亚热带型河流，珠江是哺育岭南人的母亲河，又是网络岭南大地通向海洋的交通大动脉，跳动着广府民系的文化生命脉搏。珠江之名，始于宋代，原指流溪河至广州白鹅潭再至虎门共长70多公里的河段。古代珠江亦称粤江。明黄佐《广东通志》记载：“粤江之水，源于三江，合流于城南，中有海珠石，是谓珠江，一名沉珠浦。”〔1〕至清代仍沿此说。清康熙《番禺县志》记载：“粤故海国也，支流为多，而皆源于三江。西、北二江合流于城南为珠江。又分流过沥滘，东达于岘江，汇于南海庙前波罗，与东江合，出虎门入海。”〔2〕直至20世纪初，珠江、西江、北江、东江一直被视为4条河流；珠江三角洲亦称广州三角洲。1914年，在广州设立直隶中央政府的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及广东治河委员会，开始对珠江流域主要河流勘测研究，治理河道。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珠江与西、北、东江三江水情交错联系，难以分割；发展水利事业也必须将这几条河流联系起来研究，因而形成了当今的珠江流域和珠江水系概念。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水政，建立珠江水利局，在全国水利系统内明确了珠江流域的涵义。1947年珠江水利局向水利部申请了珠江正式命名的立法手续，〔3〕珠江流域这一地理名称获得官方的正式确认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采用。珠江水系是一个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组成的复合水系。珠江流域位于北纬21°31′～26°49′、东经102°14′～115°53′之间，北以南岭与长江流域分界；南至云雾、云开、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山脉与两广沿海诸河分界；东以莲花山与韩江流域为界；西南以乌濛山山脉与红河流域的元江和长江流域的牛栏江为界。整个水系跨滇、黔、桂、粤、湘、赣六省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二级支流左江上游在越南境内。流域面积45.37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国内部分为44.21万平方公里。珠江的长度和流域面积均居全国第四位；年径流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珠江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流域分水岭最高点为乌山，海拔2853米；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94.4%。珠江流域在广东省境内面积11.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52.48%。珠江三角洲平原面积为8601.1平方公里，〔4〕是华南最大的三角洲，也是全国第三大三角洲。珠江水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支流众多，河网密度较大。集水面积在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8条；1万平方公里以下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9条；1000平方公里以下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331条。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主要水道有34条，河网密度达0.81条/平方公里以上。水系的干支流总长3.6万公里，常年可通航里程1.4万公里，约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1/8。西江是珠江的主干流，东西走向，全长2200多公里。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东北麓，干流流经滇、黔、桂、粤四省区。自广西梧州东流进入广东境内，至三水县思贤滘与南下之北江相会，主流在珠江三角洲由磨刀门注入南海。西江最主要的支流有发源于广西富川县黄沙岭的贺江，在广东境内的封开县江口镇入注西江。贺江全长352公里，集水面积11536平方公里，在广东境内河段长104公里，集水面积2086平方公里。北江集水面积52068平方公里，干流全长573公里，南北走向。发源于江西信丰县石碣大茅山，至广东韶关沙尾洲以上为上游段，称浈江。本河段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发源于广东始兴县棉地坑顶的墨江、发源于江西崇义县竹洞凹的锦江以及发源于湖南临武县三峰岭的武江（也称武水）。自韶关沙尾洲以下至清远飞来峡为中游，飞来峡至三水思贤滘为下游段。重要支流连江，发源于连县三姐妹峰，东南流向，在英德连江口镇江口咀村汇入北江，长562公里，集水面积10061平方公里。东江发源于江西寻邬县桠髻钵。自东北流向西南，上游称寻邬水，入广东龙川县与安远水汇合始称东江，经惠州至东莞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于增城禺东联围东南汇入狮子洋，由虎门入海。二、珠江三角洲北、西、东江汇流于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由古海湾冲填而成的复合三角洲。三江之水挟带着大量泥沙，到了古海湾头，摆脱了山丘的约束，自由漫溢，势分流缓，又受到海潮的顶托，于是淤落沙沉，海滩渐广，陆地日伸。三江和南海，合力造就了珠江三角洲这片新平原。所谓复合三角洲，就是多条直接入海的河流所形成的大小三角洲，相互穿插，相互连结，构成形状不规则的三角洲。由于形状不规则，也由于形成过程的渐变，造成三角洲边缘存在过渡地带，故而对珠江三角洲的范围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狭义的珠江三角洲东起东莞石龙，西至三水思贤滘，南抵东莞虎门，广州是它的北部顶端，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广义的珠江三角洲，东含东江下游的惠阳盆地和流溪河下游的广花平原，西达西江下游的肇庆盆地，北至北江下游的清远盆地，总面积约2.67万平方公里。现在常说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或称“大珠江三角洲”，即为广义的珠江三角洲范围。〔5〕本书所述广府民系活动地域的珠江三角洲，指的也是广义的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除具有一般三角洲的江海之会、河汊交错、地势低平、土层深厚的共同特征之外，由于华南自然条件的特殊，还具有显著的个性特征。其一是拓展速度快。珠江流量特别大，挟大量的泥沙，同时受到珠江口海潮的反作用，使三角洲下方堆积沙田不断向南推进，三角洲面积不断扩大。珠江三角洲曾经是个大海湾，这个大海湾主要是因地盘断裂陷落而成，湾内散布着许多岛屿。第四纪晚更新世即距今3.2万年以后，该河口湾接受了三江来沙和海相泥沙堆积而成，堆积层厚度大部分小于30米，最大厚度为63米。在2000多年前，堆积层逐渐露出水面成为平原，原来湾中的岛屿突起平原之上，成为山丘及台地。三角洲仍不断向海中推进，三角洲东侧的珠江口，是尚未被泥沙填塞的溺谷湾，每年接受河流带来的3389万吨沙，淤积速率为1.6～2.4厘米/年。因此，珠江三角洲的成长和形成是数千年内之事。具体时间“有人认为不过一、二千年，有人则认为至少有三、四千年。”〔6〕近百年间的发展速度，在东江南部为20～30米/年，在北江出口的万顷沙一带为110米/年，在西江出口的灯笼沙一带为174米/年。〔7〕现代珠江三角洲仍在不断地向南海推进。其二是形状不规则。珠江三角洲是古海湾口内的复合三角洲，西、东、北三江以及多条河流从不同方向注入海湾，三江之外，好些较小的河流也各有其小三角洲，这些大大小小的三角洲互相连接、穿插，因此，三角洲有许多顶点，形成形状不规则的湾内复合三角洲。三角洲内河网稠密，方向莫辨。其三是地形复杂。典型的三角洲是平原坦荡，而珠江三角洲除了沙田地区，许多地方却是山丘错落，有的山峰突兀高耸，高达数百米，著名者如西樵山、罗浮山。这些山峰本是海中孤岛，被冲积平原所包围，因此，珠江三角洲陆地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向海岸顺序推进，而是环绕岛丘各部分逐渐扩大，呈镶嵌式拼凑发展。山丘外围常有红色砂页岩或花岗岩被剥蚀而成的台地，这是某一地质时代地盘上升的遗迹。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形成，越族先民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一般所称的珠江三角洲过去并非都是大海，珠江口古代大海湾的最北古海岸线位置，大约仅及黄埔—市桥—大良—江门一线附近，此线以北的地区是一个较老的陆地平原（距今五千年以前即已形成），属河流冲积平原性质，此线以南的平原才是真正的现代三角洲平原，它们主要是近一、二千年内在海中淤浮长出的。〔8〕由于珠江三角洲中存在不少山丘和台地，因而这里有一般的三角洲罕见的峡谷和险滩，著名的峡谷有三水境内的马口峡、广州北郊的石门和顺德境内的甘竹滩。其四是出海口门众多，且每有山丘束水。不同于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的出海口那样集中，珠江三角洲共有8处出海口，自东而西依次为东莞、番禺之间的虎门，番禺境内的蕉门，介于番禺、中山之间的洪奇沥，中山境内的横门，中山、斗门之间的磨刀门，斗门境内的泥湾门和鸡啼门，斗门、新会之间的虎跳门，新会境内之厓门。8口除洪奇沥之外，均有山丘束水，形势险要，成为军事要地。虎门为珠江口重要江防要地，厓门是南宋行朝与元军最后决战的战场。这种地形特点，也有利于沿河建成聚居、屯货之村镇。概而言之，珠江三角洲具有扩展迅速、地貌复杂、三水汇一、八门出海的特殊地形特点。三、文化交流的走廊珠江水系北有南岭横亘，南临大海，形成了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总的地理格局，既利于保持本土文化特质的延续，又利于纳海外风气之先。五岭间的水陆通道则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南北文化、中外文化以水为渠道，得以在岭南交流、整合、融会，使岭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区域文化。水文化的特点在广府文化中得到尤为鲜明的表现。珠江水系纳百川以归大海，在水系网络的末梢通过分水岭与汀湘江水系、红河水系、赣江水系连接起来，在古代是岭南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途径，在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的远古至先秦时期，岭南与岭外的交流，最主要的途径是水道。《汉书》上就有岭南通过珠江（古称牁江）而与西南有贸易乃至“役属”关系的记载：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9〕唐宋时期，中原与岭南来往，仍然主要靠的是水路。北宋余靖指出：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10〕在岭南文明开发之初，内地的中原文化、楚文化等先进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渠道，都是沿江而入，决定了岭南文化的开发由西而东、由北而南间歇式组团式移动态势。汉、唐时期，西江流域的粤西封开、北江流域之粤北南雄、曲江，各领风骚。唐以后，广东文明的中心才完全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五岭通道都和水系有直接联系，或者说都是水路之间的陆上连线。这是内陆文化传入岭南的渠道，是对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军事斗争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交通命脉。在整条交通线中，水路占了主要的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苏秉琦还指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11〕岭南属于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系。江西的鄱阳湖北与长江相连，南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相隔上千公里，这两个区域之间如何连结起来？将两地连成一轴的媒介就是水道。由南向北是赣江与沅章水，由北向南是珠江水系之北江。这两个水系之间，正是南岭山地的蔚岭、大庾岭山地区，山地中低矮的分水岭便成了连接长江—赣江—珠江水系南来北往的通道。从秦代开始，连接南北水系的岭道就成了移民南下、兵家往来之要道。而在军事行动之后，入粤统治者沿江河设置郡县、修筑城堡、屯垦戍兵、安置移民，使这些地区成为岭南地区开发最早、接受汉文化最早的地区。历史上，秦并岭南、汉平南越、宋平南汉，无不以水路为主攻路线。西汉吕后执政时期，汉越关系紧张，南越国与长沙国边境处于战争戒备状态。长沙马王堆的长沙国第二代王轪侯利苍墓中出土有军事用地图，尤其重视河流，共绘有长沙国与南越国境内大小河流三十多条。这是因为南越国与长沙国交界是南岭山地，“限于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军队和各种军事物资只能通过水道运送。“柁舟而入水，行数百里”，而南越军队“习于水斗，便于用舟”。〔12〕汉越之间两军对垒便集中在对水道的警戒上。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所绘的西汉长沙国境内，正好集中了湟水（今连江，又名小北江）、潇封、湘漓三条重要的古水道或水陆联运交通线。反映了西汉从长沙国向东南、正南和西南三个方向射出的三支强弩，其中潇水、封水线位居中央，与其他两线可联结呼应。此线到广西贺县以后，可以折向东走，接上湟水线，绕开险峻崎岖的骑田岭，形成通向番禺（今广州）的一条捷径。西汉讨南越，汉军分五路水军从北江、郁江挺进，“咸会番禺”〔13〕宋朝潘美攻打南汉，是一次从潇水、封水线转上湟水线的成功的军事行动。明末黄萧养起义、晚清珠江三角洲的洪兵起义，也都是以水路行动为主。至于近代史上岭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主战场更是珠江的出海口，至今遗留下一批作为历史见证物的炮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临海一带。四、广府文化的温床人类文明离不开江河湖海之孕育。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起源与黄河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考古学界越来越认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说，多源说与多条河流水系有关。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珠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区域。珠江流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珠江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岭南居民的这一特点，早为先人所注意，《淮南子》就说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14〕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形成，对广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一）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城镇圩市商品流通网络。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岭南最大的平原，沙田的推进和利用，为来自农业生产力先进地区的移民提供了有潜质的处女地，并得到不断的开发，沙田开垦成肥美的农田、鱼塘、桑基、葵基，成为岭南地区最富饶肥沃，也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吸引着南下移民在此聚族而居，加速形成封建宗族社会，出现圩市、乡村乃至城镇。明清时期发展尤为迅猛。富饶的农业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形成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商品流通网和以肇庆为中心的粤西西江流域商品流通网，带动了农村圩市的兴起以及专业性圩市的形成，使珠江流域的商品市场初具规模。明嘉靖年间，广东各地有圩市439个，广州府占了136个，肇庆府占49个。至清道光年间，珠江三角洲有的县已有圩市100多个，如南海县就达到126个。专业性的圩市多设在农作物专业区，如南海的九江丝圩、竹圩、瓜菜圩、布圩、猪仔圩、桑市、蚕市、官窑圩，番禺的花市，顺德的龙江圩、丝圩，高要专售柑橘秧苗的广利圩。〔15〕圩市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顺德龙山大圩，明万历九年（1581）以前，只搭简陋的廊肆作为“聚货”交易之所，食肆也只是张伞招客，“席地而饮”，没有固定的酒店。到了清代，已是“百物辐辏商贾常满”的大圩了。〔16〕中山小榄，明万历年间只有林步一圩。天启时，在数里之地之外增设多一圩。清乾隆年间，已经联成一体，“林步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17〕南海九江大圩，光绪年间，“万货丛集，百工填委”，街弄26条，行市7个，铺肆达到一千五百余家。〔18〕至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更是与江海之地利有直接的关系。所谓“五岭以南，广州为一都会，三江汇其前，巨海环其外。气象开豁。天下省会，语雄壮者，金陵而外，无所复让”。〔19〕（二）开发三角洲的历程，培养了广府人务实、开拓、重商的民系特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是河沙淤积填塞的作用，而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开发，则是人们与江海较量，争夺土地，改造自然的结果。据史籍所载，从汉代起，珠江流域已有垦殖的记载。珠江河段短，水量大，三角洲平原低于洪水位，容易洪水泛滥，涝水难排，近海地区如罗格围、桑园围等则有大潮顶托等问题。自宋代以来，三角洲居民沿河汊修筑堤防，以确保农业生产和居民点的安全，逐步发展为联围筑闸，加强防洪能力。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建堤与建村是同步进行的。冼氏入迁南海初时，“是时沿水而居，几同泽国。我族訚堂公与同里通判区公，合力提倡兴筑（罗格围）基堤，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至今赖之。”〔20〕东莞石冈里王氏南来第二代王世表“率乡人捐金，大造（福隆堤）堤防，延袤三十余里，创立桥梁，以通潮汐，众赖长城，始得奠枕。”〔21〕明代，随着人口的增长及水利经验的积累，珠江三角洲堤围的建设，已从着重捍卫已成之沙，不与水争地，发展到积极扩筑新成之沙，与水争地。由于低洼地调节水位困难大些，人们索性浚深为塘养鱼，取土填成基围，在基上种植果、桑、葵、蔗等经济作物。人工堤围和基地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人工地貌，称为“基水地”。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与开发过程中，无论是维护既得地盘，还是修堤筑围，都需要合力，因此形成了广府人聚族而居、强化宗族社会的俗尚，持续坚韧地改造自然环境的意志以及率先发展商品农业并促进商品经济繁荣的行为，培养了广府人务实的应变能力、强烈的开拓精神和自觉的商品意识。（三）江海相汇的地理环境，使广府文化具有强烈的海洋文化色彩。广东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为开展海上贸易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珠江三角洲面向外洋，文化色彩罩上浓烈的海洋文化特色：中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来往频繁；居民具有面向海洋的眼界和向海外拓展求生的意识；华侨众多而且联系十分密切；强烈的商品意识；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的社会风气。在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先后形成了广州、香港、澳门以及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同海洋都有密切的关系。广州是长盛不衰的海港城市，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良港，澳门是西方国家最早从海上登陆中国并经营的城市，依靠特殊政策发展起来的深圳，其可与香港相匹的地理优势就是拥有海运发达的深圳港。珠江三角洲八门出海，具有多处内河出海的途径，扇形江流网络与南海的交通联络更为发达，因而，形成了一批沿江河分布的商业性质的重镇。珠江三角洲扩展过程，原来分布在浅海的一些岛屿成了夹江的丘陵台地，不仅使出海河流航道受到钳制固定，同时，沿江的丘陵台地又成为集散货物、聚居人口的好地方，形成了佛山、肇庆、新会、石岐、石龙等一批扼江而设的商业重镇。处于珠江三角洲外沿的香港、澳门，更是成为西方人入据的开放商埠与据点。特殊的地理区域环境，使广府文化深深打上海洋文化的烙印，形成了与本质上是内陆文化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有着明显不同的独特风格。注释：〔1〕明嘉靖《广东通志》卷十三《舆地志一·广州府》。〔2〕清康熙《番禺县志》卷一《舆地·山水附》。〔3〕《珠江水利》1947年复刊版第1期。〔4〕《广东省志·地理志》第1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司徒尚纪：《珠江传》第5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李春初、杨干然：《珠江三角洲的河网特征及其演变》，载《华南地理文献选集》第181页，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5年版。〔7〕徐俊鸣：〈珠江三角洲》第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8〕《广东省志·地理志》第1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9〕《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10〕（武溪集·韶州真水馆记〉卷五。〔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35、36、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12〕《汉书·严助传》。〔13〕《汉书·武帝纪》。〔14〕《淮南子·原道训》。〔15〕清道光《高要县志》卷四《舆地略》。〔16〕嘉庆《龙山乡志》卷二《杂著·圩市》。〔17〕何大佐：《榄屑》。〔18〕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四《建置略·墟市》。〔19〕梁佩兰著，吕永光校点补辑：《六莹堂集》第42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佚文·金花庙前新筑地基碑记》。〔20〕宣统二年《岭南冼氏宗谱》。〔21〕《琴轩集·宝安翟公寿藏志》。第三章珠江流域的原始先民一、远古人类东移南下研究珠江三角洲的远古先民，离不开对珠江流域原始先民的了解。史学界传统的观点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始祖来自北方，而华南地区尤其是岭南地区在远古时期是没有人类活动的蛮荒之地。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动摇了上述观点。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使考古学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多源说的论断，进而认识到“珠江流域是我国境内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原始文化也比较发达，是我国文明发祥的四大区域之一。”〔1〕远古时代的珠江流域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植物繁茂、动物众多，适于人类生息。在珠江发源地云南高原，与珠江源头同一纬度的元谋县，出土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2〕这是华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珠江流域的云南、广西、广东地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在此之后的人类活动遗迹。2002年在珠江上游干流之一的右江流域百色盆地百渡村，距离右江1.5公里的山包上，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遗址年代早于80万年。在西江流域粤西封开县，发现了自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批洞穴遗存。1978年在封开垌中岩发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以及一些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据铀系法测定，与垌中岩人牙化石共存动物群的年代距今14.8±1.3万年。〔3〕1958年在北江流域的曲江马坝狮子山岩洞中发现的马坝人头盖骨化石，距今12.9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4〕垌中岩人和马坝人是迄今为止岭南发现的最早人类，具有黄种人的一些重要特征，分别是黄色人种的原祖之一。〔5〕1996年，在北江中游的英德县牛栏洞遗址，发掘获得一批打制石器，出土人类遗骸的形态特征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6〕在英德宝晶宫溶洞发现10余件打制石器，〔7〕在沙口清溪小狗山河岸发现以河卵石为原料的砾石制品。其年代可能在距今10万年以前，属旧石器时代中期，与马坝人化石同期或更早。〔8〕1992年，在封开县罗沙岩发现旧石器遗址，是在广东首次清理出有连续地层堆积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掘出4颗人牙化石和一批石制品，人牙化石分别出土于遗址的第二、第四层，据铀系法测定，距今2.24±0.16万年和7.9±1.5万年。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乃至整个岭南地区从距今2万年到10万年间史前文化的空白，树立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系列。罗沙岩遗址的这套砾石器，被国内不少学者认同为华南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特色的代表。其类型分布可扩展到整个东南亚，与距今1万多年的东南亚地区权威文化和平文化属于同一类型，这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类型文化是由岭南向东南亚地区传播的。〔9〕1964年封开黄岩洞发现了距今11930±200年的两个人颅骨化石和上千件石制品。在封开发现时代连贯而又为数众多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为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所提出的“两广地带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的推论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迄今为止，在北江与西江中游发现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证实了远古人类的东移路线正是沿着珠江一线进行的。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长期以来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但不能就此断定旧石器时代这里人迹不至。贾兰坡曾经提议，广东的旧石器除了要在石灰岩洞穴调查外，还应到古河流阶地去寻找。20世纪90年代，曾祥旺在粤中、粤东的古河流阶地进行了大范围的踏查，发表文章称在广州东部的黄埔、番禺、增城以及深圳、三水、从化、河源、龙川等地发现了一批旧石器制品，并据此提出：“早在距今28—55万年，广东境内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和流溪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了。到距今15—22万年，古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及部分沿海地区。”〔10〕对这一研究成果，目前还有不同认识。〔11〕旧石器时期已有人类在粤北、粤西地区生息活动，其遗址都分布在珠江中游流域，而华南地区原始人的迁移路线又是沿着珠江东来、南下，原始先民的流动性很大，因此，不排除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的可能性。香港黄地峒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一推论。2006年1月，由香港考古学会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宣布了考古队从2004年底以来在香港西贡黄地峒进行考古发掘的发现。这个遗址是一个距今3.5～3.9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制造场，面积达8000平方米，迄今已出土了6000多件器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智新在现场考察之后认为，这个旧石器时代加工场的石器密度之高、种类之丰富及加工技术之全面实属罕见。从黄地峒附近的航空图，还发现附近存在着数个有可能是采石场的地方。生产出来的大量的石器，还有可能通过交易活动散播到整个广东地区。这一发现，不仅把香港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3万多年，而且这一地点的发现不可能是孤立的，由此可证，珠江三角洲的人类活动，完全有可能开始于旧石器时代。二、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4000～10000年前，晚期智人发展为现代人，社会分工扩大，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12〕岭南考古发现同样印证了这一论断。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1982年广东省文物普查中复查和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点达五六百处，包括分布在石灰岩地区的洞穴遗址、河流两岸的山岗遗址、台地遗址、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及海滨、岛屿上的贝丘、沙丘（沙堤）遗址等。广东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按文化特征划分为六个区域：粤北地区、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粤东韩江流域地区、粤中低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地区即西江中游地区、粤西南和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13〕除了韩江流域地区及粤西南、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地区之外，有四个区域属于珠江流域。这些地区的划分，反映了其地理环境、物质文化传统和经济生活类型的区别，反映了当时广东境内存在着若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粤北地区多山岗遗址，曲江县石峡遗址是典型。遗址位于“马坝人”洞穴遗址所在的峡地。其文化层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中层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下层墓葬有氏族公共墓地，流行迁葬。从随葬品可以明显看出贫富分化现象，石制生产工具及陶器有地方特色，并有一定数量的石琮、石臂环等精致石制装饰品。还出土了华南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之一，距今5500～6000年。在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的至少是12000年前的水稻硅质体，是岭南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址。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以岗丘遗址为主，龙川县佗城坑子里是这一地区的重要遗址。龙川属于秦在岭南首批设置的少数县份之一，而且是以入粤秦军主要将领赵佗为县令，可知这一带有一定的开发基础。粤西地区即西江流域中游地区以岗丘遗址为多，也有贝丘遗址，既与珠三角地区大体相同，又与西江上游的广西地区有着密切关系。两广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发现于西江流域的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更多了。这一地区对远古文明所担负的传播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粤中低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有山岗、台地、沙丘（沙堤）和贝丘。其中以贝丘遗址为多，也最具特色，集中于佛山、东莞一带。沙丘遗址以中山、珠海、香港为多。山岗遗址则以广州、佛山、中山密集。在广州市区东北的飞鹅岭，北面的新市葵涌及从化，南面的番禺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有双肩石斧、有段石锛、石箭镞、石网坠等石器和几何印纹陶器。飞鹅岭文化遗址显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聚居范围从飞鹅岭往东延伸至龙洞一带约十多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上，出土的双肩石器占有相当大比重，也有极丰富的陶器，反映出先民原始的锄耕农业。葵涌遗址发现大量蚬、蚌、螺、蚶等贝壳，反映了这里的先民以渔猎为主。增城金兰寺遗址发现了陶祖，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已经确立的表现。在南海西樵山发现了23处采石制器遗址，制作的是细石器和双肩石器，其年代距今五六千年。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可以与木柄、骨柄嵌合成切割、渔猎工具。仅据西樵山佛子庙第七层（此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遗址出土石器作保守估计，这一层向先民提供的石器有76800件。〔14〕西樵山石器制作遗址被确认为华南新石器时代以制作双肩石器为主的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中真正成品及通体磨光的完整双肩石器不多。在西江流域的高要、肇庆、封开及东江流域的增城、博罗、东莞以至香港，广西的南宁、合浦、钦州、灵山等地也发现了西樵山石器，推断西樵山石场的初成品多通过交换的方式被带到珠江三角洲各地以至更遥远的地区。〔15〕表明手工业已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和原始部落联盟之间交流的加强，并且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华南地区的人类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活动中体现出一定的中心作用了。1977年在佛山河宕发现了一处贝丘遗址，有成片达三五十平方米的红烧土硬面，大量的水产动物以及陆栖动物遗骨，部分猪、狗颚骨（初步观察属家养），磨光精细的石器，陶质坚硬的陶器，几何形印纹陶印纹清晰，种类繁多，组合纹盛行，有少量的彩陶、白陶、黑皮陶和浅土黄色陶。还有陶纺轮，骨、角、牙、蚌、蚝质料制成的工具和装饰品。发现29副人骨架，男女分开单葬，其中10个成年男女有拔牙的现象，一男青年头顶上随葬一对薄如蛋壳的象牙饰物。反映了先民的生产、居住、拔牙习俗以及制陶和纺织等手工业、畜牧业发展情况。2003年在东莞蚝岗新石器遗址，首次完整地出土5000年前的珠江三角洲人，发掘出一批彩陶、石器、骨器和大量的贝类外壳。居住区的排水沟、墓葬、活动面乃至垃圾堆放处等各种人类定居的要素保存完好。遗址年代在4500年至5000年前，是目前广东发现年代最早的原始人定居村落，被誉称为“珠三角第一村”。出土彩陶也是广东贝丘遗址出土年代最早的彩陶，与同时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有明显区别。出土文物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印证了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起源。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包括深圳、珠海、香港在内的环珠江口沿岸及岛屿发现多处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沙丘遗址。以香港南丫岛大湾一期遗存为代表命名的“大湾文化”，〔16〕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器型、纹饰有其特色，以彩陶圈足盘最具特色；石器有磨制石斧、锛和打制的尖嘴斧、砾石锤及砥石，以槽石拍最具特色；有定居村落及房屋遗迹，其经济生活为渔猎采集经济。大湾文化遗址已发现20多处，如香港舂坎湾、大湾，深圳小梅沙、大黄沙、咸头岭，珠海后沙湾，增城金兰寺等，广泛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沿海岛屿、海湾沿岸以及珠江水系的沙丘和台地上，表明了距今6000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自珠江口一带至粤东海岸以及珠江口外星罗棋布的小岛，都是大湾文化的分布范围。大湾文化分布范围清楚反映出距今五、六千年前环珠江口一带水上交通网络的范围，令人惊奇的是其规模足与现今珠江口一带水路交通范围媲美。〔17〕2003年，由珠海市博物馆主持的《南海沙丘遗址文化与生态研究》课题首次系统揭示了南海岛民创造的沙丘文化。研究成果指出，分布在珠、澳、港一带的珠江口及岛屿的400多处沙丘遗址，是3000至6000多年前先人留下的文化遗址，共同的特征是：建造的房子有竹木立柱，也有石块围起来的；出土大量的石器、玉器、水晶器、陶器等，陶器为砂陶，其中不少是彩陶，等等。遗址里还留下了网坠及挖洞用的工具。每个遗址是由100多人至1000多人组成的部落，长期生活在海岛沙湾里。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地居民已经掌握了水上停船技术，是捕鱼高手。从沙丘遗址研究可知，6000年前的人们便选择了海湾沙丘栖息，直至3000年前才逐步离开沙丘另移他处谋生。〔18〕深圳龙岗区大鹏叠福村咸头岭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有20多处，是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文化特征明显的典型遗址，出土器物是6000至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岭南人的杰作。李伯谦等人认为，从出土文物看来，遗址是环珠江口彩陶、白陶的发源地。并命名“咸头岭文化”〔19〕将珠江三角洲文明的诞生推至6000至7000年前。三、地区文化特色及融会交流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显示出珠江流域文化自身发展的地区特色，体现在以考古发现遗址命名的“石峡文化”、“西樵山文化”、“大湾文化”、“咸头岭文化”上，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直至今天，岭南地区在生产方式、民族民俗、语言和人类群体体质特征等各个方面，仍然表现出某些有别于北方文化的特征，这种区别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在珠江三角洲文化区，存在着以彩陶、白陶、夹砂陶、大量打制石器共存为特征和以几何印纹陶、双肩石器、有段石锛共存为特征的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前者以增城金兰寺下层，高要蚬壳洲，中山龙穴，珠海后沙湾下层，深圳大黄沙、咸头岭，香港大湾、舂坎湾、深湾和澳门黑沙等为代表；后者是从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香港深湾，深圳赤湾村、鹤地山，佛山河宕，南海灶岗，鱿鱼岗，增城金兰寺中层，高要茅岗，东莞村头，三水银洲等为代表。〔20〕这些文化又表现出了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融会。如石峡文化与江西的攀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见于这一时期的佛山河宕、增城金兰寺尸骨的拔牙风俗，与山东大汶口、兖州王因、邹县野店、荏平岗庄、胶县三里河、江苏邳县大墩子、常州圩墩、上海崧泽、河南淅川、福建昙石山、台湾屏东鹅鼻、湖北房县七里河等新石器时代的风俗相同。这种风俗可能起源于山东，又扩大到黄河、长江流域和岭南。珠江三角洲文化既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对外辐射。印纹陶文化是考古学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特征因素，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存在于东南数省，出现在几个不同的考古文化区系。以鄱阳湖—赣江—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一线，是几何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共存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有肩石器及平底鼎、豆、盘。〔21〕珠江三角洲成为几何印纹陶和双肩石器的制作、使用和输出中心，并向北、西、东南亚地区拓展。本区双肩文化，向北影响石峡、大溪、屈家岭等文化，向西影响广西大石铲文化，向东影响我国台湾与菲律宾，向南入东南亚国家，成青铜器（斧、锛、钺）的原始模式。成为我国原始文化深入南海海洋文化区，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支。〔22〕在文化上的联系交往密切，显示了在族源上也可能有联系。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广东南部与北部区域文化的差异。由于西樵山文化与石峡文化分别地处粤地南北，自然环境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从而使其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文化特征同中有异。进入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粤北山地与环珠江口地区已经形成了文化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古学区域，呈现出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南北格局。在石器方面，主要是手工工具比较接近，如都有双肩或有段的斧、锛、凿等，只是比例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别。至于石峡文化的专门农具如石等，在西樵山文化中根本不见；西樵山文化中一些专门用于渔捞的工具也不见于石峡文化。在陶器方面，二者都有较发达的圈足器和圜底器，但石峡文化多三足器而西樵山文化不见三足器。西樵山文化早期是没有几何形印纹陶的，到晚期则大为流行，很可能是受石峡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埋葬习俗上，二者都流行单人葬，长方形竖穴，东西向。但石峡文化特有的二次葬风俗不见于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的大墓与小墓已有明显分化，西樵山文化中目前只发现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23〕这种区别表明了珠江三角洲文化开始具有自身特色的表现。广东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了远古时期古人类的迁移及文化流向大体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地进行。考察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存，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10000～6000年，北江西部与西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范畴。自距今6000年以降湖南地区的彩陶上湘水，再从桂北入西江，经广东高要蚬壳洲、东莞万福庵、深圳大黄沙，直至香港大湾，这个时期湘系考古学文化的影响终结了桂系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东进；距今5000年以后，江西清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又影响到粤北山地，其路径应是清江至赣江由南雄进广东，但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下，环珠江口地区的岛屿始终有一支考古文化遗存独树一帜，这就是香港东湾和珠海宝镜湾遗址的部分遗存。〔24〕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珠江三角洲，已经逐渐呈现出以下的文化特征：首先，从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到地处江海之汇的番禺是珠江三角洲聚居人口最为密集的居住中心，这里应该有这一带最为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可能在先秦时期发展为方国，长期的经营基础，为南越国在此建都奠定了基础。其次，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先民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往来，他们既通过珠江流域往北与长江中下游的先民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更通过海洋向南与印支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先民文化有着更多的交往联系，相比之下，与粤东韩江流域先民的往来似乎更少些，这种关系呈现在其文化面貌上。最后，珠江三角洲居民的生产方式是以渔猎、渔捞为主，与处于同一流域的中上游的以狩猎、采集乃至开始种植生产方式的粤北先民，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已经区别开来，反映出地理环境对先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必将对其习俗、观念也产生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垌中岩人、马坝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了早在十几万年以前，珠江流域的北江、西江中游地区就已有人类在此生息活动。至迟在进入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就已有古人类生存。严文明提出，“华南这块地方太重要了，过去苏（秉琦）先生讲石峡文化是一个窗口，从整个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来讲它也是一个窗口。华南又是一个独立的大文化区，在生态环境上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文化发展上也有它的特点”。还说到“探索广东文明的起源也不能从南越国那个时候起算，前面还有很长一个阶段”。〔25〕探索广府文化的源头也应该从远古时代珠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开始，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活动在珠江流域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的岭南先民，创造着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释：〔1〕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第22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肇庆文物志》第23页，广东省新闻出版局1996年版。〔4〕1985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用釉系法测定为距今12.9万年（正1.1万年、负1.0万年）。〔5〕黄象洪：《马坝人的种族特征——试谈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第14～1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6〕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第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邱立诚、张镇洪：《英德宝晶宫旧石器地点》，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第20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8〕张镇洪、邱立诚：《英德沙口清溪小狗山旧石器地点》，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第20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9〕《广东旧石器时代考古有新突破》，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0日。〔10〕曾祥旺：《广东珠江流域古河流阶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1996年出版的《广东通史》采用了这一研究成果，称：“1991年以来，广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广州、深圳、佛山、河源及其所属的若干县（市），发现了20～30处旧石器地点，采集到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和石制品一批，有的地点还有薄刃斧、大尖状器和手斧。这些石器的年代估计在30万年前至10万年前之间。”对此论断，广东考古界也有一些学者未予认同。王璧在《深圳考古二年琐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深圳文博》第1页）中称：“通过多年考古发掘，我们在深圳及周边尚未发现新石器早期遗址。最早年限则在新石器中期遗址。”2000年出版的《广州文物志》（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市文物考古所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说：“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从事捕鱼、农业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广州地区的原始文化。”〔1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第3期。〔1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32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14〕冯孟钦、卢筱洪：《从佛子庙的发掘谈西樵山双肩石器的若干问题》，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第32页。〔15〕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60～61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6〕关于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1991年“南中国海及邻近地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提出“咸头岭文化”，此外还有别的学者有其他命名的提议。安志敏在《香港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载《考古》1997年第6期）上称：“如果从考古学史上来着眼，以1933年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其为‘大湾文化’可能是比较恰当的。”〔17〕邓聪：（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载《炎黄世界》1995年第四期。〔18〕《六千年前岛民已会建房捕鱼——南海400多处沙丘遗址文物考古见证珠江口海岛居民创造成了史前海洋文化》，载《广州日报》2003年10月15日。〔19〕《咸头岭陶器将珠三角文明推前——最新考古发现深圳有六千至七千年文化历史》，载《羊城晚报》2004年9月13日。〔20〕龙家有：《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南方文化系统》，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第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8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22〕曾昭璇等著：《人类学概论》第255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23〕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4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4〕齐晓光：《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与分期》，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月24日。〔25〕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三题》，载《广东文物》2001年第一期，第17页。第四章百越中的南越先民一、百越民族群先秦时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及南部，具体地说，在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生息着人数众多的百越民族群。越族最早活动范围在中原，以后才往东南方向流播。越人之得称，是一种他称而不是自称，较多的学者认为是因为越人首先发明和普遍使用了“戊”或“钺”这种工具和武器，因此，中原人以“越”名其族。有学者认为，岭南地名、人名多保存古越人语音，“百”与“布”、“白”、“鄱”、“卜”、“泊”等汉字同音或近似语音，意为“人”；“越”和“依”、“禺”、“于”等字语音相近。今之“布依”族亦为该族自称之词，亦古音为“越人”之意。所谓“百越”，按越语倒装语法，即为汉语“越人”之意。〔1〕从史籍上可以察见，春秋战国以前，无所谓“百越”之称。直至战国之末，随着中原各国政治势力的消长延伸，才形成“百越”这一概念。《史记·五帝纪》言及黄帝之孙颛顼接黄帝之任，四出祭祀，“南至于交趾”。颛顼即位在公元前2279年，彼时中原对岭南地方未必了解，但这是已经知道的最早指称岭南的地名，却不是民族之名。《尚书·大传》、《韩非子》皆称“帝尧之地，南至交趾”。因地在南方，又称“南交”。《尚书·尧典》曰：“申命义叔宅南交。”《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载商朝之正南面有瓯邓、桂国、损子、九菌等方国，尚未见“越”之称。《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朝之东南方，有东越、越瓯、于越、姑妹等。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有关东南越人的最早的文献之一。《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40）“于越来宾”，《公羊传·定公五年》载“于越入吴”，可作为这一时期东南越族出现的佐证。据考，“于越”这一方国初始在河南西部的嵩县境内。〔2〕至于春秋时期建于东南之越国，未有初始确切年代，具体纪年始于越王允常之子越王勾践元年（公元前496），这比《竹书纪年》所载的“于越”要迟500多年。而南越国建国则在勾践之后近300年。“百越”一词，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有“杨汉之南，百越之际”的说法。〔3〕史学界对“百越”之定义并未确定。有说百越是“我国东南和南方的各个民族的共同体”，“岭南的先秦居民属于百越中的南越族”。〔4〕有称“越人是我国东南部古代若干人们共同体的概称。由于这些人们共同体数目众多，地区广阔，所以又称百越”。〔5〕还有将百越说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6〕以上数说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各民族之间并未有什么结盟形式，也不可能有任何体现共同利益的“自觉为我”的意识或在某一行为上采取共同的行动，无法体现为“共同体”。其次，说百越是“若干人们共同体的概称”，过于笼统。再次，既将百越称为一个民族，又说其中各部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百越各族文明的开发时间相距很大。迁到浙江的于越，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600年就建立了越国，而且一度成为国势强盛的诸侯霸主。而地处岭南的西瓯、南越在秦统一岭南时，还处于部落联盟或充其量是一些方国的社会状态。因此，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都是各自为一个民族，百越是这一民族群的概称。这些民族都生活在沿海地带，固然有着一些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特征（双肩石器、几何形印纹陶文化）以及生产和生活习俗（比如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剪发文身），但他们之间各自分立，互不相属，从未成为一个结构上或行动上的共同体。“‘百越’并非来源单一的古民族，而是一个组合复杂而来源众多的大区域的民族群体。他们虽归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语族，但由于来源成分复杂，其风俗习惯和语言、体型亦迥然不同。”〔7〕将分布在广阔地域上的不同民族合称为百越的主要原因，其一在于历来认为这些民族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二则是受中原中心论的传统观点所制约，将中原之外的东南沿海及南方视为一族，甚至于统称为南蛮，正如古代中国习惯于将外国人统称为番、夷而对他们不加区别一样。先秦时期生活在岭南境内的已有南越、骆越、西瓯等民族。有考古学者提出“南越人聚居于今广东境内，瓯越在今广西的中、北部，骆越在广西南部和越南的北部”。〔8〕从考古发现分析，将广东全境划为南越一族的活动地区过大，广东境内也有西瓯、骆越族。骆越生活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地区和越南北部；西瓯在今广东西部及其以西的广西东北部地区；今海南亦为瓯、骆居地；粤东的潮、梅地区，是南越与闽越犬牙错居的地带，闽越的影响是主要的；南越族的分布地区，则在今广东中部和北部，大体与后来的广府民系分布地区相符。据人类学家研究和测定，四五千年前岭南的土著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和中原人有一定的区别。岭南土著主要特征是身材较矮，面部较狭小，眼晴较大而鼻梁较低，颅骨较突出，皮肤较黑。今天的黎、壮、水族等仍保留了不少古代越人的特征。二、南越溯源“南越”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何乐，其死何葬。”建德是立德行，庄子所描述的建德之国，似乎是一个理想之国，前人视为乌托邦。苏轼诗慨叹：“建德有遗民，道远我无车。”〔9〕康有为则说：“庄子建德之国，列子儋甗版之山，凡至人之所思，固不可测矣，而况孔子乎？”〔10〕然而，撇开建德之名，可以见到庄子揭示的是一幅原始社会的图景：作而不藏，是生产力低下，未有剩余产品；与而不求报，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道德风尚。这个南越之邑，倒是切近原始社会状态的岭南。如果说这条记载只是庄子对当时的岭南社会有所听闻，那么，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战国时期已有“南越”之称。为什么称南越？罗香林认为：“以其地为扬越南部，故称为南越。”〔11〕在《史记》中，通称为“南越”，《汉书》称为“南粤”。广东省之简称“粤”由此而来。关于南越人的起源，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外来说，另一种是土著说。外来说是传统的说法，基本论点是将越族视为一族，所谓“越为禹后”。《史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子即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公元前323年，越国为楚国所灭，勾践的子孙南迁又转向西南，遂成百越。《东越列传》、《汉书·地理志》均持此说。今人也有持此说的。何光岳称：“越人于夏、商时，分批逐渐南迁至长江中下游，武丁时多次征讨越方，逼使更多的越人大批南移，形成了部落歧纷而互不统属的“百越”。〔12〕“越人来源于黄河上中游之西羌，与华夏集团的炎帝族、黄帝族有亲缘关系，其中一支于越为夏禹之后。”“越人的一部分在夏商时已加入华夏族，另一些越人则逐渐向长江中下游迁徙，他们既同化了南方的土著部族，又同化了马来人和矮黑人。也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迁入东南沿海及江南的原始越人，加入了第二批北来的越人集团里。以后，不断有北来的部落、方国，和越人群体杂居，通婚，融合，到商周时形成了‘百越’中的各个不同的支系。”〔13〕这种说法虽然不同于将百越都视为禹后，承认北方的越人在南迁过程中与土著的融合，但使用了“同化”的说法，即肯定了外来民族的主体作用，从本质上还是外来说。20世纪80年代，在福建武夷山发现了据认为属夏商时代之船棺，有学者据此提出越人之祖在闽说：“越国开始建立政权的时期大概是在她们原始社会末期，相当于夏朝的中晚期。第一个建立政权的人就是越国开国‘无余君’，这个名字后来被写作‘武夷君’。”“岭西越人是从岭东迁来的，岭西部落的首领和世系也应追溯到无余君”。〔14〕除此之外，外来说还有太平洋人种说、海洋蒙古利亚说、马来人种说。但是，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百越民族群体的各族是以东南和南方各地区的土著为主体而发展形成的，有着各自发展形成的历程。岭南先秦居民的主体应是岭南的土著居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时期的岭南先民，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马坝人和垌中岩人遗址，说明早在10万年甚至更早之前岭南大地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劳作。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址，包括以英德青塘遗址为代表的山区采集和狩猎类型和以南海西樵山为代表的平原地区采集和原始农业类型。中期文化遗址，以增城金兰寺第一文化层、新会罗山咀贝丘遗址为代表，说明人类已逐渐迁离石灰岩地区，到海滨河岸平坦的平原谷地生活。晚期文化遗址，遍及广东的河畔、海滨。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是在继承广东地区新石器中期文化及吸收闽、赣、浙、桂地区同时期文化因素中发展起来。形成粤北地区、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粤东韩江流域地区、粤中低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地区即西江中游地区、粤西南和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等六个不同的文化特征群体，从而呈现出粤地多民族的文化状态。南越国王赵佗和辑的“百越”，指的就是岭南境内不同特征的各民族部落，其中中部和西北部的民族是南越族。蒋炳钊认为：“南越族的来源不是战国晚期南迁的遗民，也不可能是从福建省迁过来的。”“南越族同样是百越中一支古老的民族，来源主要是由当地土著居民发展形成的，应是广东最早的民族。”〔15〕这个结论当更符合实际。综上所述，百越民族群的主体是东南和岭南的土著，而不是由外地区迁入。同时，其文化发展进程受到外来文化的不断影响。中原文化对百越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化影响尤为重大。由于中原统治集团之间的角力，夏代发祥于伊洛之间原属于中原文化范畴的于越国，经历了自西向东、自北而南的迁移扩展演变过程，其影响也向此方向传播。在东南、岭南出现的“百越”，开始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概念，直到后来才演变为东南及岭南各族的概念。“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16〕说的正是这种扩展演变的结果。正因为南越族的族源主体是土著，这也决定了广府文化的文化特征之一是原生型文化，而不是外来型文化。关于南越族的特征，学者所言大体相同：新石器时代分别有以稻作农业为主及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部落，到了青铜时代，一般都以稻作农业为主或农业与渔猎捕捞并重，家庭纺织业也发展起来了。生产工具盛行双肩石器和有段石器。生活用具普遍使用几何形印纹陶器。习于水性，善于用舟；有断发、文身、拔牙和椎髻之俗。喜食蛇蚌贝类；干栏式巢居；有猎、食人之风。有信鬼、鸡卜之俗，有一次葬、二次葬、屈肢葬等葬俗葬式。〔17〕这些特征，与居住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水平。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特征并非南越族特有，而是越人甚至更广范围的远古时期的人类普遍具有的。食贝类、习水性、巢居，是地理条件使然：而葬式、生产工具以及体饰之俗，则是与外地文化交流的表现，当然，也有吸收改造的。双肩石器在黄河流域的使用历史悠久，特别是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双肩石器。在华北、东北以及长江流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双肩石器。龙山文化时期，双肩石器不但数量增加，制作更加考究。使用双肩石器的传统在中原地区延续到了铜器时代。〔18〕有段石锛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系统中也是属于外来的器物。它最早产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然后通过江西等地传入华南沿海。由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中没有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所有有段石锛传播到该文化后，根据其功能需要，进行了改造，使其变小。这说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对外来文化因素的选择过程中是有目的性的。〔19〕拔牙之俗最早见于山东大汶口，在山东、江苏、上海、福建、河南、湖北、广东等地均有所见。这种拔牙风俗可能首先起源于山东地区，后来扩展到黄河、长江流域和岭南。干栏式巢居分布范围不仅在岭南，还遍及西南、长江流域下游等地水乡或山区丘陵地带。湖北圻春毛家咀发现西周的干栏实例，云贵川一带以及广西贵县汉墓亦发现不少干栏式陶屋，与广州汉墓出土陶屋雷同。〔20〕一些习俗则似乎只是瓯骆之俗。如鸡卜之俗，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仍广泛流行于海南的黎区，专家认为此俗源于西汉瓯骆越人之俗。〔21〕海南岛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两广地区的骆越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骆越是黎族先民，〔22〕因此，卜鸡之术，应属骆越民俗，南越族是否采用此占卜术，还不能肯定。至于这一时期的二次葬、屈肢葬式，只能是瓯骆族的习俗，而不是南越族的习俗。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南越国的墓葬葬式，都是采用仰身直肢一次葬，即人死后，用棺椁装殓，直接埋入土中，死者仰面朝天，四肢平放。这是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葬式。汉族民族在葬式上是相同的。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南越墓葬用二次葬或屈肢葬。〔23〕三、南越青铜文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广东的古代青铜器很少得到发现，30年代曾经在香港和粤东发现青铜器，但未引起考古界的重视。学术界对于先秦时期的南越社会是否有过青铜文化表示怀疑，对岭南有没有经历青铜文化时期的问题，有过探讨和争论。〔24〕此后几十年中，在广东发现多处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至20世纪80年代，发现青铜器的地区已扩展到粤中、粤北和粤西。出土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达788件。〔25〕由此证明了广东在石器时代之后确曾有过一个独立的青铜器时代。约在商代中晚期，广东地区开始有了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但早期青铜器的数量很少，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较多，南越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今发现的青铜器，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墓葬的随葬品，主要出土于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也包括佛山、广州和香港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以信宜县出土的盉时代最早，约在西周时期。青铜器出土量最丰富的是西江流域怀集、四会、罗定、德庆、郁南、广宁及肇庆市区的战国时期墓葬。肇庆西郊松山战国墓规模最大，出土器物139件，其中青铜器108件，包括编钟、人首柱形器、各种炊器、容器、兵器和工具等，较为珍贵的有铜甬钟、错银铜罍、铜提梁壶、三足盘、铜附耳筒等。松山战国墓规模之大，棺椁装饰之精美，随葬品之丰富，即使与秦汉时期长沙、广州等地的大型贵族墓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四会、罗定、德庆和广宁出土的一些青铜斧、矛、蔑刀上，铸有类似双钧“王”字的符号，很可能是这一带各自称王的奴隶主的器物符号。〔26〕在广东发现的青铜器，从造型、纹饰特征分析，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少数器物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形相同；二是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与长江流域地区出土的楚国同类器物相似；三是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越式青铜器。广西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最早的属商代晚期，与广东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岭北与岭南的文化交流中，西江流域是主要的渠道。由于先进的中原文化、楚文化沿江而入，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比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发达。事实上，直到西汉初期，西江流域仍是岭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先秦遗存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也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在广州东北郊萝冈镇暹岗发现青铜戈、短剑、刀以及方筒卷角形铜饰，遗址年代为春秋时期；在从化吕田吕新村高顶湾出土战国时期铜钺；在增城镇龙汤村、石滩岗贝村天麻山出土战国铜钟，西瓜岭出土战国青铜刻刀。环珠江口地区青铜器发现更多一些。在深圳出土战国中期以前的青铜器共14件，主要是兵器，其中戈1件、镞1件、矛3件、钺2件、矛形器（又称篾刀）5件、短剑2件。这些青铜器都具有地方特色。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1932年就发现了青铜器。此后，在大屿山的蟹地湾、万角嘴、东湾、过路湾、省螺湾，南丫的深湾、沙埔村等地都发现了青铜器，有斧、戈、短工剑、镞、刮刀、鱼钩等。更为可贵的是，集中于环珠江口发现了一些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据不完全统计，香港9处、珠海6处、中山1处，此外，惠阳、揭西、乐昌各1处。铸器种类有斧、钺、铲、凿、钩、镞等。香港的一些遗址还发现了铜渣等铸铜遗迹。〔27〕1999年在增城石滩镇围岭遗址出土有铸铜石范，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表明珠江三角洲先民至少在商代中晚期就开始学习铸造青铜器，这为岭南青铜器时期的肇始阶段提供了新的佐证。〔28〕广州暹岗出土人面弓形格剑，与香港大屿山石壁出土剑相同。深圳追树岭及大梅沙出土的扁茎无格剑，与香港大屿山石壁出土物相同。广州暹岗出土的短胡四穿戈，与深圳大梅沙和香港发现的铜戈相似。增城西瓜岭、深圳大梅沙出土的刮刀，在香港有更多发现。由此可知，当时广东各地特别是环珠江口地区已开始出现了青铜铸造业。广泛吸收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因素，已经超越了单纯模仿的初期阶段，其铸造水平及装饰工艺都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形成了相同的青铜器类型和铸造技术，有独特的地方风格。表明了珠江三角洲是先民重要的聚居中心以及地区内部的密切联系。青铜时代的广东已进入奴隶社会。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仅显示出地位及财产悬殊的社会状态，而且中原奴隶社会用以维持等级社会秩序的礼器，特别是鼎、钟、牙璋等重要礼器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已不鲜见。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人首柱形器，也是一种礼器。在清远、罗定、肇庆、四会发掘的五座颇具规模的春秋战国青铜器墓，共出土青铜器360件，并有一些金玉器。其中1座墓用五鼎，3座墓用三鼎，4座墓出土编钟和人首柱形器，兵器多达218件。鼎是祭祀的礼器，又是国之宝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29〕青铜编钟和鼎一样也是一种表示身份等级的仪仗礼器。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列鼎之制已明显被打破了，但能够以铜鼎和编钟随葬的，其身份也是特别显贵的了。这些墓主很可能是在广东各地建立起“君侯小国”的越人统治者。大量的青铜兵器随葬，当然也是墓主身份与权力的标志。墓葬随葬品中兵器比重之大，反映了这一时期珠江流域军事活动的频繁。见于清远、四会、怀集、罗定、肇庆先秦墓中的青铜人首柱形器，是粤地较有特色的器具之一。清远属于北江流域，距西江流域也近，其他各处均属西江流域。至于人首柱形器的用途，有考古人员认为，“这种器物乃是象征奴隶主权力和身份的仪仗，用以祭祀、出巡、征战显示权威。乃广东所仅见，地方色彩最为鲜明。属春秋时器”。〔30〕其实人首柱形器并非广东所仅见，在浙江与江苏就曾发现有春秋时期类似权杖的人首青铜器。2003年浙江德清县博物馆征集到的一件“人首青铜杖”，上下端各塑有一相同姿态的俑。专家考证是越国部落族长或首领的实用礼器，是权力的象征物。〔31〕青铜俑的两耳铸成大孔，表明了其“黥首贯耳”奴隶身份，这与广东出土人首柱形器的人形十分相似。在湖南长沙树木岭1号墓出土了人形柄铜匕首，是由骆越地区传入长沙的。〔32〕人首柱形器与人形柄匕首同为身份之标志，其出土地点在西江上中游地区，珠江三角洲未发现此类形制器物，正反映了骆越族与南越族文化特征是有所区别的。粤中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物，石器占主要的地位，大多数的发掘中，甚至只见石器而不见青铜器。1993年为配合广深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东莞村头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在广东首次发现大面积的青铜时代居住遗存。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几类，石器中有石戚、石戈、石镞、牙璋等兵器和礼器，却未发现青铜器。1999年为配合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的建筑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在广州萝岗镇萝岗村马窿、龟岗和锥林岗都发现有南越国以前重要的聚居地点，出土不少陶器、石器，但未见有青铜器。2001年在广州番禺南沙鹿颈村发现距今3000年前相当于中原商代时期的遗存，出土大量陶器残片，还有以石、骨、蚌等质料制作的生产工具与装饰品近三百件，墓葬以4件陶器随葬。同年在增城石滩镇围岭发掘出相当于中原春秋时期的遗址，出土物中陶器占多数，还有一些石器和骨器。岭南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是岭北的中原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向岭南渐次推进的结果。从遗址分布及出土文物情况表明，青铜文化传入岭南，至少有两条途径：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中原礼制在葬式上的突出表现，集中于西江流域，这是途径之一；环珠江口外的青铜器遗址以及所出土的铸铜石范，反映了青铜器文化传入的另一途径，青铜文化在商中期传入粤东，粤东的海丰距深圳只有100公里，海上往来更有可能。原本有着较为发达的石器文化的粤中地区，在青铜文化传入的前期，接受青铜文明的反应显得滞后，直至南越国时期，粤中地区的青铜铸造业才得到较大发展。就目前所见到的粤中遗址的情况，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四、南越古国苏秉琦在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有了对中国文明起源多元化的新认识，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是文明起源的三历程，“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还指出：“秦汉设郡的地方大都是古国的所在”，“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是秦统一的基础。南越国不是后来产生的，秦汉设郡以前是古国和方国”。“东江、西江都有设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春秋战国看到的国家都很早，包括秦汉设郡的地方。印度支那半岛也一样。”〔33〕考古发现印证着这一论断，使我们对南越国前的南越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过去一些以传说形式出现的历史，有了新的审视角度。考古发现说明，南越国之前，在岭南的东江、西江流域甚至于韩江流域都存在着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先秦时期在岭南大地确实存在过一些聚居人口密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断进步，文明程度较高，有相当权力集中的社会集团。见于史籍的越人系统的扬越、于越、瓯越、闽越、东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可能是古国之名。《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说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糜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34〕指的是一些部落联盟或古国。楚威王兴兵伐越，杀越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35〕因此就有一批百越之君、王，入岭南打起越的旗号，他们不可能同化当地原先的部落先民，即使后来立国南越称王的赵佗也只能和辑百越，何况这些作鸟兽散的“诸族子”，但他们将岭北的先进文化包括政权组织形式传播到岭南，却是完全可能的。还有来自别的方向的文化迁移。通过五岭通道入粤的楚文化的传播，就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南越族居住的珠江三角洲周边，已经出现了一些高于部落以上的政治实体。在岭南发现的先秦青铜器墓，随葬物超过100件的大墓只有3座：1座在肇庆，2座在罗定。肇庆松山战国墓的规模最大，随葬品级别最高。此墓与罗定南门垌战国墓都出土成套编钟，显示出墓主人地位较高。西江中下游发现近百座春秋战国墓，其分布之密集及出土礼乐器和兵器之多，都表明了当时在西江中下游流域存在着社会形态较原始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集团。在粤东的浮滨文化，青铜器和施釉陶的制作，刻划符号在器物上的出现，以及石质牙璋的发现，显示着浮滨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饶宗颐指出：“最特别的是现藏于广东博物馆的浮滨巨型彩釉的大口尊，上刻王字，同样标记又有三件，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36〕在博罗横岭山发掘了近300座先秦古墓，是广东已发现的最大的先秦墓葬群。这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石器、铁器等，并在广东的春秋时期墓葬中第一次发掘出土了铜甬钟。在附近发掘的还有博罗园洲春秋龙窑、银岗春秋战国窖场以及增城西瓜岭战国窖址。银岗窑场是迄今所发现的广东先秦最大的陶器生产基地，还出土了目前广东所发现的最早的两件瓦当。所发现的以方格纹为主要纹饰的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与广州发现的绳纹瓦当不同，非普通建筑物所能使用，估计与古城、古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大量陶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结合在东江北岸发掘的3处以龙窑烧造陶器的大型窑场，有学者提出，东江流域可能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37〕大规模的文化遗址，更加证明缚娄古国存在的可能性。2002年在深圳屋背岭发现3500年前的商代古墓群，目前已探明有遗址存在的点达18处，它们散落在20万平方米范围的丘陵上，大面积范围内密集的墓葬群，说明附近必定至少有一个相当兴旺的人群聚居地存在。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认为：屋背岭商代遗址的发掘，既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共性，又有岭南文化的特性，但是特性是主要的，共性是次要的，说明广东从商时期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文化。〔38〕南越族在商代不仅与中原文化有交流，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有了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基地，这就说明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南越，完全有可能存在古国。注释：〔1〕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载《岭南文史》2004年第3期。〔2〕黄伟城：《古越地望刍议》，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4〕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15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侯哲安、张亚英：《百越简析》，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白寿彝、高敏、安作敏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第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7〕何光岳：《百越源流史》第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8〕麦英豪：《广州地区的两汉文明——广州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广东文物（千年特刊）》第65页，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出版。〔9〕苏轼：《和陶诗·和<读山海经>》。〔10〕康有为：《<礼远注>叙》。〔11〕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第114页，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12〕何光岳：《百越源流史》第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3〕何光岳：《百越源流史》第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4〕石钟健：《试证越与骆越出自同源），载《百越民族史论集》第185页。〔15〕蒋炳钊：《百越族属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兼论南越及其来源》，载《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6〕《汉书·地理志》卷二八《地理志下》臣瓒注。〔17〕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第63～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160～16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8〕王仁湘：《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双肩石器的几个问题》，载《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辑。〔19〕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16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广州汉墓》第48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21〕吴永章：《黎族史》第4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2〕王学萍：《源远流长的黎族——序<黎族史>》第2页，载《黎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3〕黄淼章：《南越王国的丧葬习俗》，载《广东文物（千年特刊）》第65页，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出版。〔24〕敬直：《广东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考古学工作者各抒己见》，载《羊城晚报》1963年3月22日。〔25〕莫稚：《广东青铜时代述略》，载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第一辑（1981年）。〔26〕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载《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27〕邱立诚：《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第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8〕广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第2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29〕《公羊传·恒公二年》何休注。〔30〕莫稚：（广东青铜器时代述略》，载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第一辑（1981年）。〔31〕孙荣华：《珍贵的越国文化青铜礼器——“权杖”》，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8日。〔32〕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第39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1、1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34〕《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35〕《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36〕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第77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7〕李岩：《广惠高速公路博罗段考古发掘的收获与意义》，载《广东文物（千年特刊））第6页，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出版。〔38〕《连绵商代古墓群惊现深圳屋背岭），载《羊城晚报》2002年4月24日。第五章南越国前之番禺据文献传载，广州城曾有过番禺城、楚庭、南武城等各种称法。明嘉靖《广东通志·舆地志》称楚亭郢在番禺”，“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后任嚣、赵佗增筑之，在郡东，周十里。”万历《广东通志》载“开楚庭，曰南武”。南越国定都番禺，广州城诸称，只有番禺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关于南越国前的番禺，有数种传说，但都不能确定。然而对于广州城各别称中蕴含的历史内涵，却值得深察。一、南武城说南武城说是广州建城最早的说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下引注：“旧图经：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吴越春秋》：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入始兴，令师隅修吴南武城是也。”〔1〕始兴是三国孙吴甘露元年（265）置郡，治所在曲江县（今韶关市）。春秋战国时期尚未有始兴地名，此处“避入始兴”作南下入粤解。然《吴越春秋》为东汉赵煜所撰，《后汉书》载赵煜所著《吴越春秋》曾为蔡邕所读，蔡邕卒年为东汉初平三年（192），时尚未有吴国，更未有始兴郡。今见《吴越春秋》为元大德十年（1306）刊本，这段记述当是后人所添加的，添改时间至迟在元代，这条信息还是比较早的。据称在广州筑南武城者为越人公师隅。《古书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越王使公孙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今本竹书纪年》也有类似内容。万历郭《通志》将公孙隅与公师隅视为同一人。此人为越之重臣，越亡后，入粤流寓，建岭南之南武城。以往考古界据考古所见及对岭南社会文明进程的分析，推论说秦平岭南之前，广州未有建城。但以近年在深圳屋背岭发现商代较大规模墓地和在博罗横岭山发现的先秦（相当于两周早、中期）大规模墓地分析，秦平岭南之前，在岭南完全有可能出现方国、古城。“南武城”原来是吴王筑建来监督越人的，其址在浙江娄县。从地名学理论上说，公师隅移用越地旧称为岭南新城命名，也未尝不可。正如钱穆所说的“古人迁居不常，由此及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挟故乡之旧名以肇锡兹新土”，〔2〕则南武城说也不能断然否定。南武城之命名还有一说。《读史方舆纪要》“秦置南海郡，后赵佗据其地”下注：“图经云：尉佗谮据，改南海为南武，自称南武王。”〔3〕赵佗改南海（郡）为南武（郡）之说，未见于他处。赵佗在南越国国内仿汉政制实行郡国并行制，但郡一级建制并非悉依秦制。如《史记·南越列传》称：“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此即废象郡分置交趾、九真二郡，说明南越国在郡县的设置上有所革新。赵佗初时自号南越武王，又曾自尊号南越武帝，有可能将南海郡改称南武郡，郡城就可能得称南武城。综上所述，广州始建城称南武城，原因有二说：一是避入南粤的越人之后，以越地旧称命名新城；一是因赵佗自称南越武王、武帝，将南海郡改称南武郡，他扩建的南海郡治番禺城（即史籍所谓“赵佗城”，这个名称肯定是后人所指称，当时是不可能这么称法的），亦随郡名改称南武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秦平南越之前已筑有南武城，赵佗入主之后增筑之，仍袭用旧名，并以之易郡名。明黄佐《广东通志》据旧志参修罗弘传，称汉元封五年（前106）交州刺史罗弘行部至番禺，“番禺都内，尉佗有南武城。其北越王山路井陌连磴，相传为弘所辞云”。〔4〕元封五年（前106）距汉平南越只有数年时间，其时知番禺都内尉佗有南武城，则可证“南武城说”之成立。二、楚庭说明郭棐《广东通志》称“粤服楚，有楚庭，即今郡城”。〔5〕楚庭说具体有三种说法：一是西周说。《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周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6〕距今约2800余年。二是春秋说。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宫室始于楚庭”，“筑庭以朝楚”。〔7〕距今约2600多年。三是战国说。裴渊《广州记》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8〕距今约2300余年。熊渠伐杨越、熊恽镇夷越，事皆见于《史记》。《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说明熊渠这次伐庸、扬粤的行动仅限于长江中游地区，此处之扬越不是岭南。熊恽镇夷越时，“楚地千里”，此时楚国交战的对象仍在长江以北。楚庭、高固二人名均不见于《史记》。而且，高固既为楚相，那么，五羊衔谷的楚庭，究竞是在楚在越，也有不同看法。以上三说均无法得到确证，楚庭之说始终是一个悬谜。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楚是一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商代时曾是商之同盟国。然而，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还常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楚所在的江汉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战国时期楚国的经济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西周时，逐步强盛的楚与周不断冲突，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一再提到周人“伐楚荆”、“伐反荆”之事。楚子熊渠势力向南扩张已到两湖。楚成王熊恽一方面受命拱服南卫，“南卷沅湘”〔9〕，一方面与中原群雄争霸。从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所制青铜“鄂君启节”铭文，知鄂君乘舟南达洮阳（今广西全州县境），则战国后期楚南境地已达今广西北部。《后汉书·南蛮列传》具体记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0〕此苍梧与洞庭相对，当指今湖南宁远县南之苍梧山。不断扩张的楚国疆域，既已占有湖南，对岭南的政治军事势力影响会不断加深，与岭南的文化交流当然日趋密切。“考古发现的材料与文献记载楚国势力向南发展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湖南省尚未发现春秋早期的楚墓，已发现中期楚墓一百多座，主要集中于长沙，南部的衡阳亦有发现。战国时期楚墓的发现总数在二千座以上，绝大部分仍在长沙地区，但南部也不少。湖南楚墓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楚国势力逐步向南进展的历史事实，春秋中晩期楚国之势力和影响确实已经达到湖南南部及广东地区”。〔11〕再看看广东的先秦考古发现情况。在广东的清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冈、龙川、罗定、龙门、揭阳、博罗、湛江、曲江、揭西、惠来、深圳、珠海以及香港等地发现不少青铜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部分有本地特色，少部分与广西、云南等地有关，较大部分来自楚地或与楚国影响有关。广东春秋时期大型墓葬，流行随葬成套铜钟，显然是接受了楚文化重视礼制的影响。这表明岭南受楚文化的影响，不只在民间层面的日常生活、生产用具及文化交流。因此，徐恒彬表示赞同楚庭说，并提出楚庭的建立不迟于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公元前387年，楚令尹吴起率师南平百越，已进入战国中期，楚国势力强大，南越臣服于楚，建‘楚庭’以‘朝楚’是颇有可能的。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禺都市的出现，是广东进入青铜时代，出现阶级之后，政治、经济、交通、贸易发展的结果，进而也促进我国南海地区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使番禺成为珠、玑、犀、象、银、铜、果布的著名都会。因为南海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楚王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楚国当时的这些珍贵物产，有不少是来自广东。”〔12〕楚庭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南越臣服于楚的象征性建筑。从历史文献分析，楚人始终未直接统治岭南腹地，南越与楚的关系，是“事楚”、“臣服于楚”、“属楚”的关系，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属国关系。南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是中央政权与属国的关系，汉朝并未派出军队或官员管理南越或监国，唯使者来往而已。南越国为了表明臣服于汉而建了座朝汉台，对此史学界已无异议，对楚庭似可作同解。还有一个佐证，倭国（今日本）自西汉之初即与汉朝往来频繁，后向东汉朝贺奉贡，汉皇帝赐以“汉倭奴国王”金印，这种臣服关系，一样不是汉军队、官员直接治理。因此，南越与楚的关系，不能认为一定要楚直接统治南越才是臣属。但南越与楚国之间，宗主国与臣属国的来往是频繁和畅通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秦在灭楚之后平岭南，战争开初就已有一军驻番禺之都，也就可以理解了。三、五羊城说五羊城或羊城之称，缘于五羊传说。《寰宇记》：“周时南海有五仙人，衣五色衣，骑五色羊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闤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城因以名，故又曰仙城、穂城，皆以此也。”五羊传说生动美妙，表达了祈盼广州“永无荒饥”的良好愿望，因而得以流传，并使羊城成为广州人最通用的别称。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神话中积淀的史实。今见五羊传说最早文献是晋裴渊《广州记》，有“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五羊衔谷于楚庭”的记载。揭开这一记载的神话面纱，可以得到这些历史信息：一是五羊传说与楚国有关。羊图腾是姜姓炎帝族的图腾，是楚人一支之图腾，而楚所在的两湖地区，是炎帝神农的传说流传最广的地区。楚姓芈，“此以羊为图腾也。”〔13〕西江一带古代传说七羊奉女娲之命驱七星自昆仑沿西江向东走，后被烂布衣用计将两羊与七星留在西江的肇庆一带，而将五羊放到南海。〔14〕这个传说背后包含了楚文化的传播沿西江而入的意义。二是五羊衔穗有深意。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水稻最早遗迹在湖南、江西以及粤北的英德一带，稻作农业是循西江南下番禺的。五羊传说可以视为先民的生产方式从渔猎转向农耕的象征。作五谷囊随五羊像悬之，是最早祭谷神之一种形式。据何光岳考证，五羊传说与扬越人的南迁有关，北来的扬人与湖北江汉之间部分越人结合而成扬越部落，至春秋末年，扬越部落有转徙南迁至岭南的。故《史记·货殖列传》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15〕《读史方舆纪要》载：“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16〕何光岳联系到番禺昔有楚庭之称，“羊与扬通，五羊或系五个扬越部落南迁于南海”。“证明楚人招抚了高固，因他是中原之人，不是越王之裔，所以大胆放心地继任他为相，带着相国的头衔到南海老家去坐镇强悍而散漫的五个扬越部落。他建立的楚庭，正象征着楚国在南海扬越人地区牢牢地确立了统治权。”〔17〕此说对“扬越”的诠释未尽合理，而且赵佗增筑任嚣城之后才达到城周十里，高固的“南海人”身份也值得考证。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五羊传说虽然早就见于记载，但五羊神之祀最早见于唐代。唐代诗人高适《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有“海对羊城阔”句，此为“羊城”一词之首见。李群玉《登蒲涧寺后二岩》诗有“五仙骑五羊，何以降斯乡”句，却未有关坛庙的记述。然而唐代广州城煌庙中有祀羊城使者，〔18〕当时是把五羊神作为城市保护神崇祀的。至于专祀五羊神的广州五仙观，一直到了宋代才见于文字。宋人古成之诗句有“拨破红尘入紫烟，五羊坛上访神仙”，已体会不到五羊传说之本色，浑然是道家者言。北宋的蒋之奇、郭祥正皆有诗以五仙观为主题，说明五仙观是城中一处胜境。五羊五仙之祀始于宋代，与宋代民间崇拜风气日盛，北宋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有很大关系。四、番禺城说古代广州诸称中，有较为可靠的史迹和文献可证的，当推番禺城。“番禺”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徭梁，徭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此处“番禺”一词，有人名、部族名二解。《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桂林八树在贲禺东”，《山海经·南山经》载“南禺之山”，“贲禺”、“南昌”何解，学者有即番禺与非番禺二说。据《水经注·泿水》：“泿水东别径番禺，《山海经》谓之贲隅者也”。古书用字常用同音假借，故说贲禺即番禺，这也说明“番禺”是个古词。古谚有云：“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盩厔（音'周至'，陕西土语，山曲曰盩，水曲曰厔）”，“番禺”还是南方土语的古词。番禺作地名，最早出现于《淮南子·人间训》，秦平南越，分兵五路，“一军处番禺之都”。但“番禺之都”是否就是处于岭南腹地之番禺城，学术界未取得共识。秦平南越后，在岭南置郡县，设番禺县，为南海郡治，这是载入《史记》的史实。在广州的秦、南越国考古发现，多次出现番禺字样，“番”字写作“蕃”。在广州西村石头岗出土一号秦墓漆盒上烙有“蕃禺”二字，〔19〕南越王墓中有一鼎盖刻划“蕃禺，少内”字样，鼎腹刻划“蕃，少内”字样。一鼎沿上刻划“少内，蕃”字样，〔20〕南越国宫苑水池壁石刻“蕃”字。广州番禺屏山东汉墓出土有刻着“番禺”、“番禺都亭长陈涌”字样的砖，〔21〕香港东汉后期墓砖上有“番禺”铭文。〔22〕可见蕃”到了东汉时才去草头。秦设南海郡治于番禺县，县城因得名番禺城。番禺地名何解，众说纷纭。一是“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23〕古代广州城内究竟有没有番、禺二山，学者有不同看法。然而这一说法早已有之。《大清一统志·广州府·番山》称：“《后汉书·地理志》：‘番禺县以有番山、禺山得名。'”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条，是则《大清一统志》所引当为范晔之前的谢承《后汉书》。二是“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当谓番山之禺也。”〔24〕三是据《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说“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及尹知章注《管子·侈靡》所说“禺犹区也”，因释番禺为“岭外蕃国蛮夷之地”。〔25〕四是考番禺为南方古语，按壮语可译为“越人的村”，按古越语如《越绝书》所记古音可译为“咸村”，即盐水或咸水到达的村落。〔26〕五是据《吕氏春秋·恃君览》“扬越之南，百越之际，蔽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这些无君之国或许就是一些部落军事联盟。有称驩兜即为《山海经·海外南经》之驩头，或曰護朱国，“護朱即番禺异语，疑即番禺国。”〔27〕此因土著语言异译所致，即百越中已有番禺国。以上各说，莫衷一是，但从秦在岭南设初郡时即选定此处立番禺县，定为南海郡治，并设东南一尉治此以统辖岭南三郡看来，番禺在秦兵入粤之前应当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部落聚居地，有可能是古国。《淮南子·人间训》谓秦始皇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征越，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此说引起的争议较多，突出的问题是“番禺之都”应作何解，秦军在战争之初是否可能处岭南腹地。《简明广东史》谓：“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国60万军队攻灭楚国，驻军湘桂競边界，‘因南征百越之君'”。经过几年的作战，“一路过萌渚岭，下贺江，终于开抵目的地番禺（今广州市）。”〔28〕秦始皇二十四年，秦将王翦率60万秦兵攻楚，此时楚国都城已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王翦攻入寿春，虏楚王负刍，楚亡。秦灭楚，以其地置楚郡（郡治陈，今河南淮阳），又建九江郡（郡治寿春，今寿春县）和长沙郡（郡治湘，今湖南长沙），紧接着就因南征百越之君”。〔29〕但是这场“征百越之君”的战役，方向其实不是向岭南，而是向东南沿海的江南一带。楚都在安徽，秦军主力与统帅在楚国政治中心的淮河流域，远离岭南，王翦灭楚之后乘胜所征之百越，是长江流域之越，此为楚江南地。《史记·秦始皇纪》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郡治吴，即今江苏苏州。与此同时，王翦之子王贲与李信引兵北上，“破定燕齐地”。征楚秦军何暇顾及岭南？因此，秦军发兵进攻岭南的不可能是王翦指挥的这场战役。而《简明广东史》说的秦军“分别由任嚣、赵佗统领”更没有任何根据，从入粤后封职看，赵佗在军中的地位在任嚣之下自不待言。而经过几年作战秦军才抵达番禺的说法，也只是一种推测。现在，我们还是分析《淮南子》有关秦军征打岭南这场战役的记载，再来看看番禺是怎么回事：“（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30〕《淮南子》没有说到这场战争的结局，因为文章的本意不在于记述这段历史始末。这段记载肯定有夸大之词，毕竟因为这一阶段的史事的文献记载极少，后来就被许多史家所经常引用和拼接。此段记载不会全部凭空想像，还是应该留下了历史的痕迹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说战争伊始，秦军四路还在岭北临界处，就已有一军处番禺之都。岭南与北方有地理阻隔，当时的岭南又未形成统一的政权，对秦王朝不存在挑战或威胁，秦发兵岭南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而番禺正是一个犀角、象齿、翡翠、珠玑集散地。番禺是《史记·货殖列传》历数西汉时全国知名的19个商业都会之一，与战国时已是大国之都的邯郸、燕、寿春、吴、临淄同列，可见其繁华程度。这19个都会中，河南占7个，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各2个，陕西、湖北、江苏、广东各1个。商业都会分布情况，既反映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商品集散网络，也反映了番禺作为岭南与内地商业联系的都会的重要地位。其定点及地位的形成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在南越国前的番禺，有可能是一处古城甚至古国的聚居中心。曾昭璇推论：“先秦番禺之都是由楚亭发展而来，楚亭扩大为吴南武城，再建十里的越南武城，才真正成为番禺城，即由秦军建筑的越城。”〔31〕番禺城发展过程的名称和状态可以进一步论证，但在南越番禺城之前当有一个古城发展过程。番禺同内地原已有较便利来往的商路，又是最具开化条件的聚居点，存在着秦军从一开战就将其作为战略要地并顺利占领的可能性。再看秦平南越之后所设之博罗、四会、龙川、揭阳等县，都是史前遗物出土较为丰富的地方，有古城或古国的基础。秦选定番禺为岭南首郡南海郡郡治，说明番禺之基础当优于上述数地，番禺在先秦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淮南子》记载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就是秦兵在征服岭南的战争中，中路虽然顺利地进入了番禺，西路却遭受到激烈的狙击，说明西瓯族与南越族具有不同的军事活动能力，其背景是因为西瓯与南越社会组织的不同。在西路的西瓯人不仅得山丘河流的地形之利，而且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西瓯君被秦军所杀，西瓯人并不就此崩解，而是很快产生出统帅，“相置桀骏以为将”，继续顽抗斗争，散入丛林，利用夜幕，类似现代之以游击战术对付长驱深入的侵略者，“敌疲我扰”，致敌重创。这说明瓯人的社会组织是部落军事联盟。而以番禺为中心的南越族地区的抵抗不大，说明南越人汉化的程度更大些，在番禺存在一个有更高形态的社会组织，秦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占据番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南越统治岭南近百年之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桂林郡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32〕说明此时与汉化程度已经很大的南越族相比，瓯、骆族仍保留着独立的社会组织。注释：〔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州城》。〔2〕钱穆：《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3〕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卷101《广州府》。〔4〕明嘉靖《广东通志》卷44《罗弘传》。〔5〕明万历《广东通志》卷3。〔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州城）。〔7〕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8〕晋裴渊：《广州记》。〔9〕《淮南子·兵略训》。〔10〕《后汉书·南蛮列传》。〔11〕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7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2〕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76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3〕姜亮夫：《楚文明点谪钩沉》，载《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14〕刘伟铿、吴咏平：《肇庆历史风貌》第50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15〕《史记·货殖列传》〔1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州府》。〔17〕何光岳：《百越源流》第8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8〕《太平广记》卷34，“崔炜”条。〔19〕广州博物馆编：《广州历史文化图册》第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0〕广州市文管会、中科院考古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基》第27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21〕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第169页，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22〕屈志仁：《李郑屋汉墓》，香港1970年版。〔23〕《初学记》引《南海志》。〔24〕《水经注·泿水》。〔25〕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载《镇海楼论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6〕〔27〕曾昭璇：《番禺地名考》，载（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8〕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第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9〕《史记·白起王翦列传》。〔30〕《淮南子·人间训》。〔31〕曾昭璇、曾宪珊：《“番禺”与“番禺城”古地名考释》，载《羊城今古》1992年第3期。〔32〕《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章秦汉时期中原文化的融入与粤地汉化一、中原文化的融入在封建社会初期，岭南社会由于地域封闭和生活资源比较贫乏，生产水平提高不快，社会发展显然滞后于中原。这一时期，岭南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是吸收来自岭北的先进文化。吸收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通过封建政权推行礼制教化；另一方面是通过大规模移民以推动粤地的汉化。向来学者较少提及或不提及前一途径，这是不够全面的。大规模移民对粤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应予肯定，采用政治手段推行礼制教化在粤地汉化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不能低估，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是起主导作用的。对古代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起重大影响的外来人口因素，还包括南来任官与致仕入籍、谪宦等，其中不少人为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秦平南越以及南越立国，是启动粤地全面汉化进程的开端。秦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分置南海、桂林、象等三郡。南海郡西北抵广西贺县，南濒南海，北连南岭，东入今福建南境。南海郡属县，可以肯定的有番禺、博罗、龙川等县〔1〕，在今粤境的四会县，时属桂林郡。〔2〕龙川、博罗县治设在东江边，四会县治设在北江与西江诸支流“四方来会”之处〔3〕，番禺县治同时也是南海郡治，设在江海交汇处。这说明珠江流域的这些地区，在秦军入粤之前已是相当规模的聚居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因而成为秦军巩固在岭南统治的战略据点，率先接受中原文化的传播。南海部不设郡守而由统军之郡尉主政，而且还赋予其对岭南三郡的最高指挥权，所谓“东南一尉”。〔4〕这说明秦朝在岭南的统治主要靠军事据点驻军来维持，还说明当时番禺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秦统一岭南及在岭南首置郡县的政治意义，首先是将岭南收归在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之下，为岭南文化从政治领域与思想领域上接受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创造了先决条件。岭南郡县的主要行政、军事长官是秦朝所派遣的，主持南海郡、龙川县政务的任嚣、赵佗就是南下秦军的将领。秦朝短祚，但在推行封建制度的凌厉势头和维护大一统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上却是颇有成效的，秦始皇先后采取过许多重要措施，包括置郡县、颁布通行全国的法律、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并规定“车同轨”。即使在归并入秦朝版图最迟的岭南也不例外。

以修驰道为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统一岭南，次年即遣罪徒到岭南筑路，旨在与已修到岭北的驰道沟通，所修之路，史称“新道”。秦代所修新道有4条：一是从今江西大余南逾大庾岭入今广东南雄；二是从今湖南郴州越岭入广东连县；三是从今湖南道县越桂岭入今广西贺县；四是从今湖南零陵入今广西全州一带。〔5〕道路之通，对岭南北之文化、物质交流带来方便。史载南越王赵佗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由番禺至长安约2700多公里，如此遥远的路途，必须将荔枝及时送到，显示了粤中、与粤北水陆干道畅通，沿线还设有简易的驿传机构。南越国建立之后，沿袭了秦在岭南实施的政治制度，还吸收了当时刚建立的汉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接受其文化影响，包括实行郡国并行制、户籍制、军事制度、预立太子制度、尊老政策、仿汉实行纪年，以及礼仪葬制的汉化，〔6〕体现了吸收汉文化的主动性和融化能力，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原因就因为南越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自中原以及具有明显先进性的中原制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传播势能。诚然，这些制度推行的程度在岭南各地有很大差异，但是，岭南置于秦王朝及南越国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这种文化融合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尤其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南海郡番禺县，汉化的程度明显高于岭南其他地区。番禺这个地名在秦代和南越国时期写成“蕃禺”，简写为“蕃”，汉平南越以后才写成番禺。这个地名在秦汉考古中已出现7次：广州秦墓出土漆盒有“蕃禺”烙印；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中，有9件刻写或漆书“蕃禺”或“蕃”字的；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南越墓铜鼎刻有“蕃”字；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石板上刻有“蕃”字；广州东汉墓墓砖有“番禺丞”铭文；香港九龙东汉墓发现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铭文砖；番禺钟村东汉墓，出土刻划文字砖有4块刻“番禺”字样。“在秦汉考古中‘番禺'地名出现频率之高，覆盖范围之广，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实为罕见，这也是它在秦汉的400年中人文鼎盛的一个重要反映”。〔7〕中原文化诸因素的融入中，对于岭南文化的发展变化影响尤其明显的，一是语言文字，二是教化礼仪。古越语与古汉语原来并不相通，秦统一岭南后必然推行书同文。郡县设置以后的公文来往、颁行法令以及大批中原人进入粤地，使推行汉语言文字更具紧迫性。赵佗立国之后，“以诗书化国俗，以仁义团结人心”，〔8〕使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弘”。〔9〕秦汉时期的文献主要是简书，近几十年来，在湖南、湖北等地发现了不少秦汉简书，而在岭南却难寻其踪，其原因是岭南的气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不利于竹简的保存。南越王墓理应出土简书，但由于墓中经过多次的干湿更替，漆、木、竹、丝、皮革等有机物随葬器物几乎朽坏殆尽。该墓出土带有文字的随葬器仍有93件，一类是玺印、封泥、陶瓷、戳印文字，另一类是在铜、银等金属器物上的铭文和陶器上的墨书。唯存一件竹签，出自西耳室铜提壶内，上有墨书“金縢一□”。縢袋作盛装图书的囊袋解。金縢，可以理解为盛装图书的囊袋的封口。〔10〕幸存的这一竹签，很可能是挂在盛装简书的縢袋上的竹签。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南越国宫苑遗址的一口水井内，出土了100多枚南越国木简，已经确证是赵佗执政前期的遗物，全部出土的木简文字总数逾千，且比《史记》撰成年代还要早80余年。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南越国史有重大历史价值。〔11〕

二、赵佗“和辑百越”

对于秦代乃至南越国时期岭南受中原文化影响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当时中原文化的传播主要赖于秦政权和秦军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而秦军所驻之点毕竟是有限的。《淮南子》称进军岭南的秦军有50万之多，这个数字的可靠性值得怀疑。首先，秦国当时所能动用的军力有限，不可能调动50万军队来岭南；其次，汉代广东境内人口才有25.6万人〔12〕，秦兵南下时岭南更是地广人稀，何须动用50万大军作战？再次，50万秦军深入岭南腹地，即使后来凿灵渠以通粮道，也难以满足供应这支庞大的军队的军需粮草。就算上述问题一概忽略，同书又称秦军入岭南后遇上瓯人夜袭而“伏尸数十万”，那还能剩下多少人马？此后再称50万秦人，就更没有什么可信度了。乐昌城南“万人城”、龙川的佗城，据传为任嚣、赵佗率兵驻处〔13〕，规模都不大。秦军入粤人数，先后当不会超过十万之数。秦与后来的南越国地方政权只能集中兵力扼守于河流附近的要道据点，周围陷于土著人的部落联盟的包围之中。在蛮荒初开的岭南，秦军乃至南越国政权在传播中原文化方面的作用上颇受限制。南越国王陵、宫苑发掘出来的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一些南越国高级官员、贵族墓出土的器物，与岭南地区广大地域的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水平显然十分悬殊。秦、南越国的统治效能，受到实际社会条件很大的制约。秦制郡设守、尉、监，以使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然而岭南三郡中，首郡南海只设郡尉，既称“东南一尉”，其他两郡情况固然不详，也可以肯定不会比南海郡配官更健全，说明了在岭南尚未能依照内地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而需要以军事管制为手段实行统治。任嚣传位赵佗，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交替，应是取决于赵佗掌握了南下秦军的主力。秦在岭南设立三郡，大致依南越、西瓯、骆三族活动地域分别设立南海、桂林、象郡。这说明当时的划郡是依据实际情况，经过认真考虑的。选择南海郡作为岭南首郡，除了其地理位置上的交通之便，重要的理由是南越族在政治层面上接受中原文明比西瓯、骆更有基础些。西瓯、骆的军事联盟氏族制度十分顽固。秦军入岭，遭遇西瓯人顽抗。西江流域出土的战国墓也反映了骆族军事氏族社会组织颇具规模。因此，秦王朝选择了南越族人聚居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为首郡南海之郡治，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基于越人的强大势力，秦王朝、南越国都不能采用秦灭六国之后歼灭地方势力削弱地方各种割据因素的强硬手段。赵佗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对越人原有部落联盟采取承认现状与调和的态度，同时还吸收一些越人高层人士进入南越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入粤中原人也入乡随俗地受到越人生活习俗的浸润和同化。赵佗以“蛮夷大长”自居，接见陆贾时，装束打份是魋结箕踞，与中原的束发戴冠、跪式坐姿大相径庭，说明南越国的习俗是以越俗为主的。

“和辑百越”的政策，既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决策，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赵佗在武力震慑的同时对原有岭南社会的势力格局采取妥协的政策。“因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14〕他在发兵攻占桂林郡之后，立西瓯君之后裔为西吁王，承认西瓯人的自治。对于骆，赵佗亲自率军征服安阳王，其后也只能允其自治。可见南越王朝能够比较牢固地经营统治的，也就是南越族活动区域的南海郡。

在南海郡，中原文化的影响要比其他两郡更大一些，但是南越人的势力仍不小，南越国政权不得不吸收越人上层分子执政。号称“越人之雄”的吕嘉，“因越人之所服”而被拜为相，执掌军政大权，历南越五朝，“其居国中甚重，粤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15〕其弟为将军，吕氏家族中许多人都得以担任官职。吕氏掌权，“南越以治”。〔16〕赵氏统治集团鼓励和带头实行汉越通婚，吕嘉“相三王，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17〕王室如此，来自中原的赵氏集团中下级官员及兵卒谪戍〔18〕与越族通婚就更为普遍了。这种通婚在政治上有助于巩固赵氏政权，也促进了南海郡的汉化，对融入中原的礼俗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赵佗实行“和辑百越”政策的结果，得到汉高祖刘邦的肯定，称赞其“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19〕即是说，入粤的中原人能得以保存力量，而越人原来强悍互斗的风气逐渐收敛。这个评价恰如其分。赵佗执政时期在南越国汉越融合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和条件，但越汉之间的融合程度是有限的。赵佗死后，就控制不了局面，出现了瓯骆相攻、南越图反的情况。总的看来，上层社会与中下层社会的文化有不同的融合表现，上层社会的汉化程度更高一些。在葬俗方面，汉化程度更高些。由考古发现可知，南越时期的墓葬，其形制是以土坑墓、土坑木椁墓为主，随葬品中往往配有一套效法中原的陶制礼器，如鼎、钫、壶、盒等，据《广州汉墓》一书统计，这种效法中原葬制组合的墓葬，竟占已发掘的南越国时期墓葬的70%，反映了上层社会崇尚中原礼仪文化的风气，与南越社会普遍保留土著习俗及原来受楚文化影响的日常衣饰起居风俗习惯不同。西汉中期墓葬中的礼制器物显著减少，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一些器形如瓿、三足罐、三足盒等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拥有财富象征的屋、仓、囷、井、灶等模型器，比西汉前期有较多的发现。〔20〕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墓主由居住在广州的南越王朝达官贵族变为汉朝的地方官员、地主阶级，也反映出经过南越国汉越杂处阶段之后，广州地区在岭南率先表现出汉越文化的高度融合。三、粤地推进汉化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平南越，重新划分郡县。此后，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加快了汉文化向岭南新一轮的推进。“如果把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南部地区居民向岭南的迁徙所造成的文化影响看作对南越地区的第一次文化冲击波，那么，第二次更为强劲的文化冲击波则来自秦代的黄河流域。”“以大量移民为主要表现的中原较为成熟的文明对南越地区的第三次文化冲击，发生在汉代。”〔21〕秦代中原人赴越地，“见行，如往弃市”，“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22〕西汉时期，南方越地仍为迁徙流放罪人之所，当地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仍然不太紧密。两汉之际，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北人南迁，岭南人口成倍增长，广东境内西汉时共约4.9万户，25.6万人。到了东汉，有10.7万户，63.3万人，户数和口数分别比西汉增加2.5倍和1.5倍。〔23〕户数增长超过口数增长的比例，体现出移民是实现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一次大规模南下，开启了南越地区文化进步的一个纪元。“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24〕西汉中、后期岭南的文化中心，在苍梧郡而不在南海郡。汉武帝统一岭南后，西汉时的苍梧郡，公私积极办学，民俗日益汉化，学术活动频繁，各类人才空前涌现。〔25〕苍梧郡的文化盛极一时，超过了南海郡。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汉王朝有意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置于岭南的西南一带，汉武帝平南越后，在岭南设置9郡。元封五年（前106）在岭南设交趾刺史部，刺史驻苍梧郡治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广东封开一带），每年由苍梧郡出发巡行部内各郡。至东汉建安八年（203）改交趾部为交州，州治仍在苍梧郡。〔26〕直至东汉建安十五年（210），才由交州刺史步骘将州治迁往南海郡治番禺县城。二是中原移民沿西江走廊入粤首先会聚于苍梧。西汉平南越时，苍梧郡人口已多于南海郡，此后增长速度又明显高于南海郡。迁入苍梧的人员中，有一批当时的知名学者，对提升当地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汉重设9郡，其中有南海郡。南海部辖番禺、中宿（今清远）、四会、博罗、龙川、揭阳6县，番禺仍是南海郡治。番禺城在汉平南越时遭到战火的毀损，汉平南越之后的南海郡治番禺城在何处迄今未考定，一说是否他迁，尚待研究；〔27〕一说在今顺德乐从；〔28〕一说番禺钟村镇屏山村东汉墓出土有4块“番禺”刻字砖及“番禺都亭长陈诵”刻字砖与番禺城变迁有关。〔29〕对于汉代番禺县（大致是后来之广府文化区域范围）乃至南海郡在南越国后这一时期的历史，史载极少，故而已出版的《广州简史》对这段时间越过不提。但是这段历史不是空白，尽管南海郡在这一时期不是岭南的政治中心，学术文化也不如苍梧郡活跃，但在经济上、文化上也都有重大发展。经济上，在农业生产方面，牛耕技术大约在南越国时期传入番禺一带，从东汉起已采用一年二熟的农作制度，逐步实行精耕细作，使用铁犁牛耕。家庭饲养业日趋兴旺。番禺西汉中后期墓出土明器的井、灶、屋、仓、囷和鸡、鸭、鹅、牛、羊、猪、狗等以及人物俑、马车、船、城堡、畜圈和水田等模型，如实地再现了两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生活状况。从出土陶明器可以知道，当时的广州地区普遍使用牛耕和利用厩肥，普通家养牛羊鸡鸭鹅猪等。农业生产兴旺，只是较之中原仍然落后一步。如谷物加工，中原等地从西汉武帝以后的汉墓就经常发现圆形转式磨盘与踏碓明器，而直至东汉晚期，广州陶屋明器内的谷物加工场景，仍限于持杵对臼而舂、扬箕以簸的繁重劳动。

尽管番禺在汉初就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都会，但货币使用在东汉时期才发展起来。中原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就通用铜钱，南越文王墓却没有出土铜钱，广州西汉前期和中期墓平均每墓出土铜钱不到1枚，其后出土铜钱数剧增，西汉后期的32座汉墓有379枚铜钱，东汉前期39座汉墓有399枚，东汉后期79座汉墓有975枚。〔30〕1984年在清远江口区发现窖藏钱币1万多枚，除少量西汉半两、货泉之外，绝大部分是东汉五铢钱。〔31〕这些现象说明，南越国基本上是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西汉后期至东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使用铜币才日益成为交换的重要方式。文化上，岭南人开始从政和移风易俗，番禺较为突出。2002年10月中旬，在广州市先烈路与永福路交界处东侧工地发掘新莽墓，出土有铜鸠杖首。赐鸠杖是汉代尊敬长者的一种典礼。《续汉书·礼仪志》明确记述：“年即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在广州新莽墓发现的王杖鸠首，说明汉代礼制在番禺的实行。了解汉代广州地区封建礼教的推广，旧志立传人物是一个具代表性的侧面。清道光《广东通志》载广州地区汉代人物，立传15人，其中西汉时期7人，除了张买是惠帝时人外，余皆汉武帝时人。除邓宓是举茂才出身之外，任南海郡丞转日南太守，此外6人皆列侯。此6人中，有5人是武帝平越时以越人归汉而立功封侯（《百越先贤传》提及南越国将官归汉封侯的还有7个名字），只有张买是特殊的个例。其父以越骑将军从汉高祖定三秦有功，张买从小“善射知书”，侍游惠帝时又能“为越讴，时切规讽”，是越人中的文化素质较高者，这与他早入中原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有关。分析这些人的情况，可知西汉时期进入政坛的粤中越人，主要表现是在汉平岭南中立了军功。西汉文帝时已初步建立察举选官制，直至东汉时期粤地才正式有资格举贡。西汉时期粤人举茂才的只有粤中的邓宓和粤北的何丹。东汉时期察举出身的粤人共11人，其中号中6人，粤地其他地方加起来也只有5人（其中包括合浦在内粤西4人，粤东1人）。东汉时期粤中志书立传的有8人，其中以举贤良对策、举茂才、举孝廉出身的6人。另外2人中，疏源是因“性廉洁”，“家贫饷宴不至”而知名，罗威更是以“事母至孝”而闻名，很可能也在察举之列，只是没有载明。杨孚是汉代唯一举贤良对策出身的粤人，他劝止和帝不对匈奴用兵，主张“创业用武，守业尚文”。汉朝国策“以孝治天下”，和帝永元十二年（99）荒旱，廷议政令得失，杨孚提出“宜诏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将守丧定制推向全国。他著作了《南裔异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地方风物志。后来任临海太守时，又撰有《临海水土志》。汉代举孝廉重品行，各郡国举孝康各1人，入选不易。南海人陈临出任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民以孝”。董正“讲诗书，陈礼法，远近多从之游”，甚至于远在中原的南阳隐士也慕名来投。唐颂任布山县令，布山号称难治，唐颂“挫强扶柔，民感其仁，无梗化者”。黄豪通《论语》、《毛诗》，诣交趾刺史部举茂才，留寓广信教授生徒，后出任外黄县（今河南民权县）令，“一县称平”，“阖境大治”。他们都被立为封建礼教之典范。陈临原来“家居海岛，奋志不同蛮俗”，罗威是一位“力耕自给，非其力不食也”的平民，是见当时推行礼教的社会层面之扩大。陈临在苍梧导孝，董正以诗书礼法授中原之徒，黄豪留寓广信授《论语》、《毛诗》，治中原之县，这些都显示了广州人文化素质大有提高，少数佼佼者已名扬全国。西汉时期，岭南虽设了郡县，大部分地区面貌仍相当落后。东汉派出一些良吏出镇岭南，从他们的业绩可以分析当时各地开发的进度。旧志所载，东汉初期的文化开发，更多的是在原来属于桂林郡、象郡的九真、交趾郡一带。〔32〕在接受中原封建文化的发展上以及社会进程中，岭南各地差别很大，当粤北北江沿线致力于交通和农业发展时，粤西西江沿线的骆族还处于母系社会婚姻模式，需要官方使用行政手段推广封建婚姻制。史志关于这一时期关于地方官员这类开化之功，并没有提及粤中，这是因为粤中的封建文明开化程度已非粤北与粤西所能相提并论。南海郡为秦平南越之后选置之行政中心所在地，南越国王朝在此经营了近百年，番禺的汉化程度较岭南他处要高得多。番禺东汉前期墓出土的一批陶城堡，是豪强地主的军事建筑。广州动物园麻鹰岗汉墓，墓砖刻字为“建初元年七月十四日甲寅治砖”，建初是东汉前期汉章帝年号。出土陶城堡，四周围有高墙，前后大门上均建望楼，城内有两幢悬山式房子。城门口有一守门俑，屋内有12个俑。其中凭几端坐于矮榻上者3个，其余为奴婢、侍卫和吏役等俑。〔33〕佛山、南海、广州出土的陶作坊，门口有人持兵器看守，里边有奴隶从事舂米、屠宰等劳动。这类明器形象地表明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纷纷建筑坞堡，割据一方，奴役农民和家内奴隶。〔34〕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的豪强地方势力大为发展，粤中地区出现豪强地主，这说明粤中地区的封建进程与中原已明显缩短了距离。广东西部汉人较少或甚少，越裔各族或汉化甚浅，或根本未曾汉化。其地虽在封建郡县管理下，大多仍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虽有奴隶主和封建的私有土地，但未形成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形态。〔35〕西汉灭南越国后，粤西苍梧一度成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东汉末，番禺成为州治，凭借其厚积的基础，很快恢复其在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注释：〔1〕《广东通史》（汪廷奎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称：南海郡“下辖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四会五个县”。《岭南文化》（李权时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称：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4县”。揭阳设县，有秦、汉旧县二说，见于《史记》可以肯定为南越国设县，是否为秦县未考。〔2〕《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岭南道一）：“四会县，本秦旧县也，属桂林县。”〔3〕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按语。〔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7；《通典》卷184。〔5〕林剑明：《秦汉史》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6〕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90～1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7〕麦英豪：《广州地区的两汉文明——广州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广东文物（千年特刊）》第69页，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2000年版。〔8〕《大越史记全书·越鉴通考总论》。〔9〕黄佐：《广东通志》卷40。〔10〕《说文·系部》：“滕，缄也”；《书·金縢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孔传：“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孔颖达疏：“若今钉谏之，不欲人开也。郑云，凡藏秘书，藏之于匮，必以金缄其表。”〔11〕《广州出土西汉南越国木简》，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0日。〔12〕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4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13〕《水经注》卷三十八：溱水“东至曲江县安聂邑东，屈西南流。泷水又南出峡，谓之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都尉任嚣所筑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2《广东三·英德县浈山》：“县北四十里，县之主山也，相传尉佗筑万人城于此。”〔14〕《史记·南越列传》。〔15〕《汉书·两粤传》。〔16〕屈大均：（广东新语·语·吕相祠》。〔17〕《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18〕秦一再大批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岭南屯成垦殖。《汉书·晁错传》：“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19〕《汉书·高帝纪》。〔2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21〕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第213、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2〕《汉书·晁错传》。〔23〕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4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24〕《后汉书·南蛮传》。〔25〕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外三篇））第18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6〕《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今持节治苍梧。”《后汉书·郡国志》“广信”条下注：“《汉官》曰刺史治。”〔27〕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48页，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版。〔28〕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9〕道光《广东通志》卷231《宦绩一·茨允传》。〔3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31〕郭宝通等：《广东清远出土地汉代窖藏铜钱），载《考古》1986年第8期。〔32〕《后汉书·卫飒传》：东汉初，桂阳太守卫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茨充接任桂阳太守，“令属县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纻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说明粤北的开发已有一定基础，地方官的业绩在于改善交通邮传，减轻劳役，聚居流民，发展蚕桑丝织。《后汉书·任延传》：东汉初，任延为九真太守，时九真“俗以射猎为生，不知牛耕”，任延令特作田器，教垦辟田畴。“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之性、夫妻之道”。任延“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而从西汉末至东汉初为交趾太守的锡光“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史载“领（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这个评价范围过大，并非整个岭南都这么落后，但可以说明粤西与桂东的不少地方此时才进入父系社会，接受农业生产方式。〔33〕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志》第63页，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3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332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35〕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249～250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七章 六朝隋唐时期的粤中

一、广州的建置及地位的提升

从汉末至三国，黄河、长江流域战火连绵，政局动荡，赋役加重。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相对安定得多，战略地位也不断提高。汉末，与地的豪族势力强盛，士氏家族据有交趾、合浦、南海诸郡，成为交州最大的地方势力，其代表人物士燮“雄长一州，威尊无上，震服百蛮”。〔1〕三国时期，粤地属吴，吴国为加强对岭南的控制，削弱士燮势力，黄武五年（226）从交州分置出广州，由吕岱任广州刺史，不久，铲平士氏势力，撤广州而恢复交州，将交州州治迁至番禺，完成了岭南政治中心由西南向粤中的转移。汉武帝平南越国之后，岭南政治中心有110多年不在番禺，至此，重新恢复了番禺（今广州）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吴永安七年（264），复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范围为今两广大部。南海郡辖番禺、四会、增城、龙川、博罗、揭阳、平夷（今新会）7县。范围约为今粤中与粤东。三国时期，岭南仍是朝廷谪放罪官的去所，被贬谪至岭南者有不少是经纶满腹的，对传播江南先进文化，提高粤地的文化水平有直接的作用。江东最有成就和影响的经师虞翻被孙权流放到广州。在岭南十多年，“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2〕他对易学的研究更自成一家，推进了交广地区学术研究的风气。孙吴末年，桂林太守部曲郭马在广州聚众攻杀广州督、南海太守，驱逐广州刺史，东吴派出镇南将军假节广州牧滕脩征讨郭马。晋灭东吴时，滕脩送印绶请降，广州和平纳入西晋版图。西晋在广州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3〕东晋以后，广州刺史兼平越中郎将，都督广、交诸军事，是岭南最高军政长官。两晋及南朝时期，岭南大量增置州郡，但广州作为岭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又是岭南的经济中心和国内最重要的外贸港口，西晋末及东晋前期，江南和荆州已数经战乱，中原和江南入粤的流民潮持续时间比汉末更长，无论是从陆路还是从海上南下的人数都比较多。南下入粤避乱的流民人口甚众，又一次掀起南下高潮，其中包括战乱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流放入粤的家族。相对安定的广州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片避难的乐土。广州发掘的西晋墓出土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砖铭的晋砖。〔4〕

东晋中期以后，广州也不太平了。隆安三年（399）孙恩在浙江起义失败，其妹夫卢循被推为首领，泛海转攻岭南。元兴三年（404），攻克番禺，又遣徐道覆北占始兴，酿成大势，追使晋室承认其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此后，卢循以广州为据点，率水师十万北上江宁，兵败逃奔回番禺，义熙六年（410）终于退至交州，在龙编（今越南河北省仙游县东）水上交战惨败投水自尽。余众有数千人“奔于海岛野居，唯食蚝蛎，垒壳为墙壁”。〔5〕有说这些人后世居水上，以捕鱼为业，成为疍民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战火不断，广州的人口成分变化是很激烈的，加上税调大增，编户亡叛捕逃大半，造成户口统计上人数的“凋残”。〔6〕东晋朝廷对流放岭南的大族特别优待，孙泰流放广州，当上郁林太守；王诞流放广州，任卢循平南府长史。世家大族子弟流放广州，一般必返原籍。留而不归者，多属寒门出身。南朝时期，流民南下仍然不断，刘宋朝在晋康郡（治今广东德庆）立侨宁县，在新会郡设招集县，皆为招集流民所设。〔7〕流民在南海郡聚成村落，加快垦辟。深圳布吉、白芒、坪山、观澜等镇的张氏，罗田、坪山、大鹏等地的赖氏，其族谱都记载其先祖是六朝时为避中原战乱南迁的。〔8〕

进入广州的江东流人，被官府召来从事冶铁，铸造兵器，使冶铁技术传播到民间和越裔各族居住地区，岭南各郡普遍使用了铁器。汉以前，受航海技术水平所限，傍海航行有利于交州诸港而不利于番禺，到吴时，深海航行发展，提高了番禺作为进出口港的地位。孙吴政权将岭南行政中心从苍梧转移到番禺，对番禺的海外贸易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晋时期，主要对外贸易口岸东移番禺，确立了番禺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的地位。对外贸易的兴起，推动了造船、采银等手工业发展，并使南海郡与江南各地之间的商业趋于活跃，北江流域的交通运输逐渐频繁，番禺对外文化交往增多，推动了粤中地区的社会进步。广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为人所重视。鄱阳大族陶侃任广州刺史时，励志勤力，“致力中原”。〔9〕他依托岭南，积蓄力量，相机而动，终于成为权倾一时的大将军。

二、南朝时期的粤中

南朝时期的岭南也非世外桃源，随着政治战略重心的南移，战事也南移不息，在岭南常发生宗室、长吏、酋豪武装火并之事。宋文帝时，原任广州刺史孔默之子孔熙先阴谋作乱，“以钱六十万使灵甫于广州合兵”。灵甫姓周，增城人，“家素以财称长雄，有家兵部曲万余人”。〔10〕按《宋书·州郡志》，当时整个南海郡共有编户人口49157，这个数字比实际数差得太远，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户口为豪族所隐占。周灵甫一家便拥有家兵部曲万余人，广州刺史与之结交，赖以为谋反之主力，可见其隐占户口之多及势力之大。齐末，“反者四起”，南海人覃元先“召募民兵为乡邦卫，据有番禺”，归梁之后，拜东宁州刺史。〔11〕梁末，广州户口不盈3万，较之刘宋时已大减，也比不上西晋，中兴之盛丧尽。陈朝广州刺史欧阳纥举兵拒命，遭朝廷派兵镇压，岭南已非平康之地，吸引力大不如前。“北人南迁以东晋为最盛，宋时已微，齐、梁、陈则大批之移民绝迹矣”。〔12〕所以南朝时期，南下移民呈减少趋势。岭南终于引起了中央政权的注意。南朝从刘宋文帝开始，先后遣其六子随王、八子庐江王、七子临海王为广州刺史，都督广交二州诸军事，虽都未到任，但开王室出镇岭南的先河。梁朝派往岭南的宗室增多起来，其中有梁武帝侄子萧元简出任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梁武帝堂弟萧昂、萧励，侄子萧映、萧誉、萧勃任广州刺史；梁武帝侄子萧恬代行广州刺史事。出身军旅的梁高要太守陈霸先罗致岭南豪强和三吴流寓岭南之士，扩大势力，出师越岭，终于成为南朝最后一代开国之君。陈朝宗室有陈方康、陈叔坚、陈方庆为广州刺史。〔13〕出镇岭南之外藩，居多为庸劣者，对岭南的建设无所裨补，但也反映了岭南地位较以前更受重视。这些宗室及从人到广州，对广州地区的人口和城市生活方式也有所影响。南朝时期岭南还经常接纳获罪朝臣流徙。刘宋时山水诗人谢灵运就被流放并诛杀于广州。他的文友何长瑜在此前也被流放到曾城（今增城）。这一时期虽有一批学者因各种原因南来，大多未有长居的打算，文化影响是有限的。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粤中是重要的传入地之一。自东汉三国之交佛教传入交州之后，进入粤中的外国僧人渐多。东晋，在番禺（今广州）、今佛山、东官郡的青山（今香港九龙）都有番僧活动。南朝，到番禺的外国名僧更多，除了修建佛寺，更主要的是从事佛经翻译，对岭南地区乃至中国想信教的兴起产生重要的影响。

南朝时期，岭南百越遗裔族名众多，一般通称为“俚”，有时亦称“獠”。这一时期岭南俚人仍占多数，四朝在岭南增置郡县，把未入籍的俚人纳入编户，并以当地酋帅为郡县官吏，加速俚人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史称南朝期间，“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珠玑、犀杖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14〕增置郡县，集中在今西江流域、潭江流域和高雷地区以及粤中地区。朝廷对俚人渠帅实行羁縻政策，敕封俚人的爵位高至公侯，官职有将军、刺史、太守、县令（长）等；对有功者赐给仪仗、汤沐邑，授予统治州郡大权，朝代更换而官职爵位不变，或由子孙世袭。实施这种政策的后果，助长了各州郡豪族势力的增长，但也增进了俚汉交融。广东西部以汉人豪族冯氏和正在汉化的俚人豪族冼氏最为强大。在粤中“据南海”的宁猛力后来受封为钦州刺史，是“倔强山洞”的豪帅，宁氏是俚化的汉人豪族〔15〕隋初，番禺俚帅王仲宣、陈佛智起事反隋，苍梧、冈州、藤州、罗州（今化州）各部落的豪强首领响应，聚兵围攻广州，隋广州总管韦洸中流矢身亡，后来还是冼夫人遣兵才解了广州的围。可见尽管南海郡一带作为岭南行政中心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岭南其他地方更深，汉化进程更快，但俚族豪帅的势力仍很强大，隋代之前，岭南的经济、军事、政治重心仍在西江流域一带。

总的看来，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还是有限的，经济实力尚未居于粤地最前列。汉末，“即使番禺（即广州）是较大的都会，但整个经济活动的重心，仍在粤北和西江流域，那些地方的人口也相对较多”。〔16〕六朝时期北方汉族迁入南来，主要仍是以粤北山区、河谷平原地带为落脚点，南部平原、沿海地带人口较少。西晋人口密度以粤北始兴郡（今韶关地区）为最密，每平方公里有0.19户以上；其次为西江流域，苍梧郡、广兴郡、高凉郡，平均每平方公里有0.16～0.19户；粤中、粤东极为稀疏，南海郡每平方公里不到0.1户。南朝直至陈代仍未改变历史上长期以来的“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人口分布状况。西江流域最密，信安郡（今高要一带）每平方公里超2户，永熙郡（今罗定一带）每平方公里1.6-2.0户。广东南路和连江流域（合浦郡东部）、熙平郡（今连县、阳山一带）分别居粤地之第三、四位，每平方公里1.1～1.5户。而珠江三角洲一带只有每平方公里0.5～1.0户。〔17〕尽管在人口统计上存在豪强隐匿人口以及少数民族的入户籍问题，但是这些数字还是可以说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是很有限的。唐代，广州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得以确立。隋代是一个过渡，平陈后在岭南东部设置广州（治曲江）、循州（治归善，今惠州市东）两个总管府，都督各州军事。开皇末，广州总管府由曲江移治南海（今广州）。唐初在边境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在岭南东部置广州、高州、南康州（治今肇庆）和循州4个总管府，不久改总管府为都督府。高祖武德九年（626）废南康州都督府，以所管11州隶广州府，广州升为大都督府。贞观元年（627）改广州大都督府为中都督府。永徽（650～655）以后设节度使，以广、桂、容、邕、交州五都督府统管岭南各州及其他都督府，称为岭南五管。五管统摄于由广府都督兼任的五府节度使，广府在岭南具有最高地位，“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求岭南节度府，其余四十州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四府对大府“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咨而后行”。〔18〕开元二十二年（734），分天下为15道，各置按察采访处置使。岭南采访使治广，辖境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全部和越南北部。与此同时，朝廷又于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岭南置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仍统五管。广管直辖23州（广、潮、漳、循、韶、连、端、封、康、泷、冈、新、恩、春、高、辩、潘、雷、罗、儋、崖、琼、振州）。岭南节度使（五府经略使）“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19〕唐末咸通三年（862）改岭南节度使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乾宁二年（895）敕赐岭南东道节度使号清海军节度使，仍治广州，辖24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海南二省全部及湖南南端一部。以番禺为中心的广州地区，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提高及稳固，对于广府人文之盛及在全国文化地位的提升，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后梁黄滔《祭南海南平王（刘隐）》文称：“五羊奥区，番禺世壤，汉为列郡，唐作雄藩，总百蛮五岭之殷，有出将人相之盛”。〔20〕镇于番禺的岭南节度使被称为“雄藩”。广州（南海郡）地位的提高，也见于所领县份之数目及等级在广东境内各州郡中绝对领先。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今广东境内有24郡93县，南海郡领13县，其他各郡所领仅2至6县。南海郡所领县份中，番禺、南海为上县，余皆为中县，其他各郡所领县份等级，除始兴郡所领的曲江县、连山郡所领的桂阳县为上县外，还有少数是中下县，其余都是下县。〔21〕唐代的州、县份等级是按人口之多寡而定的，以上情况显示了广府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及县级政区设置之密集，反映了唐代广州经济进展与社会文化的改观。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北方战乱，人口日减，而广东接受了大批北方移民，广州依赖海路之利而商业繁荣，广州府人数激增，从天宝元年至元和年间（742～806）这50多年，由4.2万户增至7.4万户。〔22〕不过，唐代广州的人口密度在广东境内只属中等。由于大庾岭道开凿和武水逐步利用，连江、浈水和武水成了广东与北方联系的主要通道，韶、连两州人口密度大增，并驾于西江沿岸诸郡之上，居全省首位。西江流域的采矿业得到发展，人户仍相当稠密。粤西高州至两阳一带，多高爽台地，也因金银矿业之兴盛而人口大增。珠江三角洲此时筑堤垦耕充其量只是发端，人口仍较北江、西江、漠阳江流域稀疏。广州人口总数虽然较其他州领先，是因为所领县份多、占地面积广，实际上人口密度尚属中等。

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与三角洲的成陆进程有直接关系。隋代以前，今珠江西北江三角洲堆积成陆较慢，前沿在今顺德安敦、逢简、富裕，番禺紫坭、茭塘一线；东江三角洲前沿在东莞洪涌到莞城一线。至唐宋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西北江三角洲前沿已推至顺德地华、昌教、龙涌、桂洲，番禺石楼、庙头一线；东江三角洲前沿也推移至东莞以西、中堂以东。〔23〕唐代西北江与东江两大三角洲前沿的推进速度，前者（从紫洞至万顷沙）每年约30米，后者每年14米。〔24〕珠江三角洲成沙的范围已到达今南海县境。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三角洲的居民已经开始了与水争地。宋代在南海西樵山一带修筑桑园围时，在波斯庙前发现有古基围和水闸，估计是唐代的遗存。〔25〕当地的吉庆围系唐代修筑。在山地丘陵地区，水利工程以修筑陂、塘、池、湖为主，防旱蓄水。增城东北150里有石陂，可灌溉大片农田。〔26〕但是唐代岭南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分布在“凡交通线经过的地区，以及气候干爽适于中原移民生活的高地，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尚未成陆，中原移民对湿热低地的利用尚差，广州作为港市的繁荣所表现的仅是它发展的核心性，其四周反不及山间盆地或高地地区”。〔27〕

三、唐代的广州城

唐代广州城是一座繁华的商城、开放的港城，北仗大庾岭之通，加强与内地腹地之物资交流；外向南海成为通海夷道之出发点，直通东南亚、印度、波斯、大食，间接抵达东非，对外联系大大扩展。不但在此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海关——市舶使院，还在城西建立了来华贸易的阿拉伯人聚居的蕃坊，“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底洞开，于是人人自给为家给户足”。〔28〕广州是奢侈商品最为集中的商业城市，各地商人云集，这对广州的城市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城市的商业特点，对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民性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的中国，重农及封闭性根深蒂固，而广州城居民的重商性、开放性却别具一格，消费风气让来自岭北的人感到不同。市内店肆行铺林立，邸店柜坊等服务设施已颇为完善。唐人《岭表录异》提及：“大抵广州人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载者，日有二三十辈。生酒行即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盎上白瓷瓯谓之刮，一刮三文。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盖酒贱之故也。”〔29〕唐前期都市尚执行严格封闭式的里坊制和两市制，作为岭南首府、节度使治所的广州，在隋代就已实行里坊制，〔30〕到了唐代，城市管理呈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允许蕃商列肆而市，城门洞开，提供贸易自由之方便。张籍诗有“蛮声喧夜市”句。〔31〕从开元初至元和百余年间，先后有多位广州的行政长官致力于“改造店肆”；〔32〕“为开大衢，疏析廛，以析火灾”；〔33〕“修伍列，辟康庄”；〔34〕“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35〕终唐一代，广州的城市规划、建筑水平、市容市貌有转折性的变化。《唐大和上东征传》谓广州“州城三重”。张九龄诗句“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36〕描述了城中住户家居水边，有交通、商业便利的居住环境。城内设坊市，《太平广记》载录天宝四年（745）有人将海潮漂来的特大蜈蚣剖其一爪“至广州市”，表明广州城内设有市。〔37〕尽管广州城内是繁华之地，出了城还是比较荒僻的。《太平广记》载：“唐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38〕这种事固然是不多见才被收载，但城外居然有熊出没，可见还是很荒僻。广州是一座国际商业城市，居民包括大量的外国商人。唐丞相萧仿任岭南节度使时，因“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凑，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39〕辐凑于番禺的洋人，不少是波斯、大食商人。唐代广州商业之旺，是以通海夷道之外贸为中心。“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40〕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奇凑”。〔41〕柳宗元的《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记述元和八年（813）十二月岭南节度使设宴作乐之盛况：“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42〕参加岭南节度使宴会的外宾就有千人以上，足见在广州的外国人为数之多。珠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43〕卒于公元957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麦斯俄迭云：“广府是一个大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岸上……从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岛和其他国家的船支，载运各种商品开进这条大河，一直开到广府附近。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二十万人。”〔44〕另一名阿拉伯游历家阿布赛特·哈桑（Abu Zaid Has-san）谈到黄巢攻陷广州后，“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45〕这些数字当有夸大，但当时的广州居住着为数甚众的外国人应是事实。城内的寺院中，还住有泛海来自印度等地的高僧。外国人在广州势力甚大，以至可以公开闹事。光宅元年（684）“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46〕乾元元年（758）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47〕广州城内由朝廷流放的官员及驻军人数也不少。《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所见的广州是“紫绯满城，邑居逼侧”。唐制，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可见南徙官员之多。跟随这些官员南下的还有不少中原人。广州市淘金坑发现晚唐墓，墓主是开成五年（840）太原人氏广州节度使王复元。〔48〕越秀山发现天祐三年（906）晚唐墓，墓主是随清海军节度掌书记的王涣。〔49〕此外还发现晚唐广州都督府长史、吴兴人提一的长女姚潭以及广州左监门卫长史、吴郡人信之女儿王氏墓志铭。唐朝实行流徙和贬降制度，大批流人、左降官进入岭南。广州城内还聚集有大批流人。长寿二年（693）二月，有告岭南流人欲谋反，武则天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到广州，“悉召流人……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三百余人”。〔50〕开成元年（836）冬卢钧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对“自贞元以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槥椟。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入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请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51〕当时流放官员及家属不能迁回原籍而滞留在广州的，经卢钧抚恤及撮合其子女婚嫁者就有数百家之多，流放人数之众可见一斑。流官中一些著名人物对传播中原文化，促进岭南文化发展影响尤大。但这些人往往多被徙贬到粤西、粤北、粤东等地而不在广州，如刘禹锡到连州，韩愈先到阳山后到潮州，但他们的影响也沾及广州。韩愈到阳山时，南海人区册慕名到阳山师从，韩愈赞誉其“文章卓然”。南海文士区弘也到阳山投韩愈门下，后随韩愈到江陵及京师，学业精进。四、广州的选补与科举唐代是科举制发展和确立的时期，科举人才的多少反映了一地封建文明开发程度和水平。唐代岭南与黔中同列为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为了改变大多数官吏由当地土著头人补授的弊病，上元三年（676），唐玄宗诏示取消都督选补官吏制，改由朝廷派出选补使负责简选。开元八年（720）选补使由广州移置桂州（今广西桂林），十四年（726）张九龄任桂州都督，兼任岭南选补使，反映了此时广州一带的吏选已不成问题，南选重点转移到少数民族势力仍然很大的岭南西部。天宝十三年（754），唐玄宗诏允岭南五府管内参加选补有“藻词可称者”，“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52〕既批准了岭南科举制出台，又将南选与授北官接轨。会昌五年（845），分配贡举名额，除两京及京师附近地区名额较多外，岭南与黔中、福建各分配进士名额7人、明经10人，虽然比长江流域名额要少一些，但已反映了唐后期科举制在岭南正常推行。各地区登进士第人数多寡是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一项主要标志，唐代广东登进士科者有36人，其中韶州9人、广州8人、潮州3人、封州3人、循州3人、康州1人、端州1人。〔53〕唐代岭南出了两位宰相：张九龄和刘瞻，分别为韶州人和连州人。张九龄之伯父张宏雅于显庆四年（659）举明经及第，是唐代首位粤人及第者。这些都说明北江上游粤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还在广州之上，并超过了文化一度领先的粤西。总之，粤地汉化的进程在六朝至隋唐时期仍然在继续进行着，而且逐渐加快了步伐。广府文化经过长期的积蓄，到了唐末，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在反复的较量中，纳四方之优长，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及政治中心的优势，终于确立其在岭南的中心地位，逐渐赶超曾经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各领风骚的粤西、粤北。注释〔1〕陈寿：《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2〕陈寿：《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3〕《晋书·百官志》。〔4〕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志》第67页，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5〕刘恂：《岭表录异》卷上。〔6〕《晋书）卷85《刘毅传》。〔7〕《宋书》卷38《州郡志》。〔8〕杨耀林：《深港客家源流考》，载《客家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9〕《晋书》卷66《陶侃传》。〔10〕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九《南宋伏波将军周公灵甫》。〔11〕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二《南梁刺史覃公元先》。〔12〕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周一良集》第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13〕胡守为：《岭南古史）第178～1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4〕《隋书·食货志》。〔15〕《隋书》卷56《令孤熙传》，卷68《何稠传》。〔16〕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4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17〕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41～4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18〕韩愈：《送郑尚书序》，载《昌黎先生集》卷21。〔19〕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载陆耀遹《金石续编》卷10。〔20〕黄滔：《祭南海南平王》，载《全唐文》卷823。〔21〕《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2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3〕《广东省海岸地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査报告》第103页，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24〕曾昭璇：《历史地貌学浅论》第107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25〕佛山东省地区革委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3册第4页，1976年刊本。〔26〕《元和郡县图志》卷34。〔27〕司徒尚纪：《历史时期广东农业区的形成、分布和变迁》，载《岭南史地论集》第54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28〕《进岭南王馆使馆图表》，《全唐文》卷575。〔29〕《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五引《岭表录异》。〔30〕越秀山出土《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王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日□于南海扬仁坊之私第。”见《广州文物志》第186页，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31〕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载《全唐诗》卷384。〔32〕《旧唐书·宋璟传》。〔33〕《新唐书·杜佑传》。〔34〕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载《全唐书》卷349。〔35〕（新唐书·杨于陵传》。〔36〕张九龄：《送广州周判官》，载（曲江集》卷4。〔37〕《太平广记》卷457，“杜”条引《纪闻》。〔38〕《太平广记》卷143，“李处鉴”条引《朝野佥载》。〔39〕《太平广记》卷117，“萧仿”条引《唐阙史》。〔40〕韩愈：《送郑尚书序》，《韩愈集》卷21《唐大和上东征传》。〔41〕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陆宣公奏议》卷3。〔42〕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柳宗元集》卷6。转引自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载《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21～12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3〕〔44〕〔45〕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258页。〔46〕《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条。〔47〕《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条。〔48〕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第184页，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49〕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志》第184页，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50〕《资治通鉴》卷205。〔51〕《旧唐书》卷177《卢钧传》。〔52〕《唐会要》卷75《南选》，《全唐文》卷33《谕岭南州县听应诸色乡贡举诏》。〔53〕转引自《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595页（据徐松《登科记考》、阮元《广东通志·选举表》、广东各府县志及部分唐人诗文笔记综合统计）。

第八章南汉宋元时期的粤中

一、南汉建都兴王府

南汉是建都于广州的岭南第二个封建割据王朝。广州在南汉时改称兴王府。广州进入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唐末黄巢起义军一度占据广州，大大削弱了朝廷对岭南的控制。起义军北上以后，岭南的各种地方势力乘虚而起，形成多个武装力量割据一方的局面。封州刺史刘隐经过16年的经营，扫平群雄，拥有岭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于劝进朱温建梁，得封清海（广州）静海（交州）两军节度使、南海王，从边将而一跃为强藩。刘隐病故，其异母弟刘岩继袭其职，继续网罗大才，扩大势力。后梁贞明三年（917）建立起大越国，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国独霸岭南，实力强大。其疆域包括今广东、海南、广西全部以及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各一部分，共辖3府64州（都、监）218县，是五代时期十国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南汉建都广州，改称兴王府。兴王府辖常康、咸宁、清远、增城、四会、化蒙、怀集、洊水、东莞、浛洸、新会、义宁、浈阳14个县（浈阳县后析置英州），包括了粤中全部，以及粤北、粤西的一部分。南汉国传五帝共67年，立国时间之长，在五代十国中仅次于吴越。刘氏“坐拥百粤，闭关自擅”。（1）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南汉前中期广东地方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农业、铸铁业、盐业无不兴旺，商业贸易活跃，尤其注重海外贸易。据《五代史略》记载：“南汉立国，倚南海商利为收入之大宗”，“招来海中査夷商贾。”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湖湘之后对其弟赵炅说：“中国自五代以后，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2）可见南汉时岭南已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地。南汉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南汉王的奢侈挥霍及兴王府的大兴土木提供了资财。南汉国的经营，更是为宋代在岭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汉在国内推行礼制，包括祭祀制度、州府县制度、百官制度以及科举制度，悉依唐制。恢弘的唐文化对南汉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兴王府的影响最为直接。以祭天制度为例，刘岩称帝，“祀天南郊”。（3）三主刘晟、后主刘，亦皆曾“祀天南郊”。（4）史载南汉在广州河南隔山乡建有举行祀仪的郊坛。宋人方信儒《南海百咏·刘氏郊坛》诗有“谁识郊坛八面圆”句。南汉还建有祈雨坛，同治《番禺县志》称：“祈雨坛在河南龙尾乡，又呼'龙道尾'”。坛前原来仿照唐含元殿前建有“龙尾道”，后传为“龙道尾”。祭坛已废，只在今河南宝龙直街遗留地名。《南汉书》记载南汉五主中，只有三位有祀天活动，前两次间隔9年，后两次间隔25年。这种祭天活动似乎不是经常举行，应该是很隆重的。南汉之草创，得力于延用中原入粤人才之襄助。晚唐藩镇为祸，愈演愈烈，“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5）刘隐十分注意从中延揽人才。刘岩建国时，“所招用多中朝名下士”。（6）这些人才因而集中在南汉朝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兴王府。滑州（今河南滑县东）人刘浚，其父为唐朝兵部侍郎。浚“以中原乱离相继，避来岭表”，投靠其伯父清海军节度使、岭南东道观察刘崇龟，龟死，“遂流寓广州”，后任南汉宰相，“居官清简有操持”。（7）唐司农少卿周杰，其父为唐司农卿。杰“无所不窥，而尤精历算”，在唐昭宗天复中避乱弃官“携家南徙”，任南汉太常少卿。聚于刘隐麾下的人才还有琅邢（今山东胶南）人容管巡官王定保、太学博士倪曙、李德裕之孙李殷衡、置管巡官杨洞潜、膳部郎中赵光裔等当世贤才。使刘氏政权有了一批中坚力量。“为陈吉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焉”。（8）对此，《南汉书》评价甚为中肯：“五岭之南，自李唐以前，声名文物，远不逮夫中原。光化、天复之间，扰攘干戈，事益多故，一旦策以治安，恐非岭表二、三君子所能任。赵光裔、李殷衡之徒皆出中朝华冑，竭其耳目、手足、心腹、肾肠以定规模，以匡庶绩，创乘五十余载，视他国运祚较长。虽日天实为之，抑微之数人者，不及此。”（9）南汉朝积极延用人才，促进了粤中地区的文化发展。二、兴王府的文化发展南汉初期，粤北人才仍优于粤中。唐末五代时，广东人赴内地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有黄损、何泽、孟宾于、何承裕、邓恂美、骆仲舒、孟虾等，黄损、孟宾于又是五代诗坛有名诗人。这些人中，何泽原为韶州曲江人，徙家番禺，何承裕为韶州人，其余均为连州人，说明粤北尤其是连州人才明显在粤中之上。南汉人才聚集于兴王府，对粤中文化的发展推动很大。乾亨四年（982），南汉朝采纳宰相杨洞潜的建议，开科取士，岁以为常。南汉科考进士9人：番禺人简文会、钟文会、钟允章，南海人陈渥，咸宁人王诩，曲江人王亥、胡宾王，广西人梁嵩、周邦。其中兴王府籍5人，已居大半。此5人后来都进入统治集团高层，各有建树。反映了粤中的教育文化渐居岭南之首的变化。南汉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出了不少人才和成果。南汉朝中的赵光裔、倪曙、王定保、李纾、王宏、王诩、张瀛、黄损、简文会、钟允章、古成之、钟有章、雷岳、陈守中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坛高手。中书舍人、知制诰胡宾王著《南汉国史》，入宋改书名为《刘氏兴亡传》以献宋廷。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著《唐摭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南汉宫廷乐舞戏曲丰富多彩，以太常寺之太乐署和鼓吹署为主要音乐机构，内宫有教坊。殇帝时，东西教坊伶官多达千余人。（10）后主派人迎高僧文偃入宫时，“许群僚仕庶、四海蕃商俱入内庭，各得瞻礼。瑶林畔千灯接昼，宝山前百戏联宵”。（11）南汉“不奉正朔”，建立了自已的历法体系，冯禧、何泽、周杰、周茂元、林楚材、胡万顷等均为南汉天文、历算名家。周杰认为唐开元间僧一行主持编写的《大衍历》“历数有差”，著《极衍》以纠谬。南汉朝设太医署、尚药局，地方设医学博士、助教和学士。著名医学家轩辕述“治病多奇验”，著有《宝脏畅微论》。南汉佛教文化昌盛，兴王府与韶州是佛教传播中心。禅宗的云门宗盛行于南汉，因创始人文偃驻揚韶州云门山（在今乳源县）而得名。文偃曾数度奉诏入兴王府问以禅机，圆寂后真身被迎入宫中供奉，在兴王府影响甚大。总之，南汉朝在荟萃人才之众，涉及文化领域之广以及成就之卓著上，堪称岭南文化史上之盛世。兴王府作为南汉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文化上的进步无疑是巨大的。南汉时期是粤中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三、宋代广州地区的开发宋代，今广东省境分广南东、西路。广南东路辖14州（府），治广州。广州辖南海、番禺、增城、清远、怀集、东莞、新安、信安（南宋时废去）、香山等9县。南汉立都兴王府，奠定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广州知州的官品和贴职一般都明显高于其他路一级官员。首任知州潘美是宋平南汉的统帅，在岭南地区拥有最高权力，使广州从有宋之始即显示出其岭南首府地位。仁宗以后，广州知州兼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广州是当时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为宋朝货财之源，宋代广州地区外贸、商业繁荣，珠江三角洲进一步开发，使广州的都市经济更加发展，原先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珠江三角洲也成为吸引移民的一块宝地。两宋时期，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在移民潮中剧增。例如，据《芦鞭开族琐记》，新会全境乡村“约査各谱，其始迁本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咸淳五年（1269），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焉”。（12）移民为广府地区的开发注入了生机活力。南迁移民精明能干，不仅在新辟之地迅速立足，而且成为开发当地经济的主体力量。南迁人员的主要成分是水田耕作技术更为先进的江南人民。太湖地区早就有圩田修筑的经验，围垦远比岭南为早，春秋战国时期已能利用堤防来治注地。唐代中叶以后，自苏州经平望至吴兴，环绕太湖东南半圈关系到下游洪涝问题的长堤已全线接通。而岭南当时的水利建设明显落后于江南。唐代全国所修水利工程共264项，其中江南道占了71项，岭南道只占6项。（13）移民大量迁入珠江三角洲，既对粮食生产有巨大压力，也带来了江南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由此翻开了珠江三角洲垦辟新的一页。有宋一代，粤境水利大兴。据文献所载，在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陆续修筑了大小堤围28条。《小榄麦氏族谱》记载，其南迁先祖在黄阁地区经营沙田垦殖，“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宋代翟氏由珠玑巷初迁至东莞，“日督家人开池养鱼，藩辅种橘，修畦以艺桑麻。凡可以养生之物，靡不蓄之植之，不数年，家益瞻饶。”（14）反映了移民不仅带来技术，还有一定的资金投入水利工程。大规模的围垦活动始于宋代，一直到明清时期仍继续不断。在围垦的基础上，进而出现了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的人工生态，出现了发展农业商晶经济的繁荣景象。在濒海诸县，这种迁民垦辟的记录于族谱、方志中十分常见。迁民垦辟不仅使海边新生沙坦多成耕地，沿海岛丘也有所改观。番禺东南迁户云集开耕，落籍沙湾的李氏两代，“居族最巨，灯火万余家”。（15）北宋时划为下县的新会，到南宋时已是“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16）宋朝300多年的垦辟，为珠江三角洲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明末清初的张穆谓：“茶山，莞巨镇也。……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相传由珠玑巷至，则皆海内避乱流寓者……是时茶山，犹荒落也，及宣（德）、成（化）、嘉（靖）、隆（庆）间，科第鼎盛，……里皆殷富。”（17）但是，珠江三角洲还只是处于开发过程，番禺黄阁以北是咸淡水交汇的浅水滩地带，（18）东莞西部仍皆是大海，新会县东南的三江及斗门一带多为海域，香山县则是“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19），所以东莞仍属中下县，新会、香山均为下县，番禺的海滨尚是人烟甚少。四、珠玑巷移民宋代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北方移民源源不断，南宋末年形成高潮。位于南岭大庾岭道上的粤北南雄珠玑巻，是移民入粤的重要中转站。交通条件制约着古代岭南的开发。在粤北，交通相对便利的连州，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发就比韶州更早。韶州大庾岭故道虽历史悠久，却因为特别险峻而被视为畏途。“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故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20）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路，使大庾岭道变成岭南通往中原最方便最重要的通道，加速了中原文化、经济对岭南的影响。宋代余靖说：“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渡梅岭，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之役，余皆篱工揖工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21）“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是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22〕珠玑巷是梅关驿道一处重要的墟镇。此处古称沙水镇，设有驿站、巡司，因此成为南北货物集散地和重要的商贸场所，也成为入岭移民落脚聚居地。此后，移民又向岭南各地，主要是向粤中播迁，成为广府望族之主要来源。族谱相传，粤中的梁储、霍韬诸望族俱发源于珠玑巷。屈大均称：“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23）孔子后裔孔昌弼因避朱温之乱迁居韶州正昌（现南雄县平林村），成为孔氏岭南派始祖，其孙孔承休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再迁居广州城西彩虹桥，成为珠江三角洲孔氏始祖，其后裔分居珠江三角洲各地，至今共有10万多人。仅在广州就有万余人，分别居于番禺、白云和花都等区。寓居珠玑巷人南迁最突出的事件是南宋罗贵南迁事件。粤中许多家谱、族谱对事件有所记载。大体都说是南宋时南雄牛田坊运粮上京的富商黄贮万载归潜逃的皇妃。事泄，有司恐皇上追究，伪称镇压贼乱，要在牛田坊聚兵筑寨。牛田坊以罗贵为首的33姓97人闻讯，乃联名陈告官府批给文引，结群乘槎南下逃难云云。具体情节在各家、族谱中略有出入：年份有绍兴元年，也有咸淳八年、九年，相差百余年；王妃称法有苏妃、胡妃、尼妃，莫衷一是。据陈乐素考证，对这些虚构故事不需穷究，但“罗贵等一行离南雄，总是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他们沿着浈水到韶州，又从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广州，再从广州逐渐散处各地。途中又经历许多艰险，如麦谱所载：‘遇风箪散'，溺毙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当是事实。”（24）罗贵等人联名请求允许南迁的呈词云：“远闻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伏乞立案批给文引，经渡关津岸陆，俾得路引迁移，有地安生。”（25）说明这次集体迁徙，出于自愿，理由是无地可容，自请前往土广人稀的南方安生。珠玑后人分布甚广，如《东海堂徐氏族谱》载徐氏先祖徐泽江在珠玑巷南迁97户中，先居花县，后迁肇庆府。子孙繁衍，继续迁徙，分居广州、南海、花县、顺德、中山、台山、三水、新会、德庆、阳江、鹤山、清远、从化、佛岗、增城、东莞、博罗、龙门等地。以罗贵为首的这次迁徙只是移民潮之典型个案，据黄慈博从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香山、东莞、恩平、广宁、清远、宝安、阳江、增城等地收集到的广府民系家谱、族谱统计，从南雄先后南迁的除了罗贵南迁这33姓之外，还有其他40余姓。北有清远的朱，增城的刘，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西有阳江的司徒等，其余诺姓分布在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县。较为集中的则是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新会等6县。（26）《麦氏族谱》称宋咸淳九年（1273），珠玑巷麦必荣5兄弟携家眷200余人南迁至珠江口，遇风浪登岸定居麦屋山，后散居海南、广州、湛江、东莞、南海、顺徳、中山等地。“香山小榄何氏，先世居北方，先祖前锋公以荫补郎中，值北宋末中原多故，携家南徙，流寓南雄珠玑巷，后迁香山小榄乡，……其后子孙繁衍，衣冠之盛，甲于一郡。”（27）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的广东275部75姓族谱中，就有187部“姓有宋代人口南移广东的内容。其中，北宋南迁38户，迁至南海、番禺、新会、东莞、香山的占了24户；南宋南迁163户，迁至上述县份的占了122户。入迁户数，南宋远大于北宋，绝大多数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各县。（28）三角洲的移民并非都是经珠玑巷而下的。今珠海市斗门区赵姓有2万多人，据族谱记载，其定居始祖是宋太祖赵匡胤三弟赵匡美的第8代传人赵怿夫，宋理宗时出任香山县县令，而后定居当地。（29）珠江三角洲更多的家族自称珠玑后裔，其中难免有臆测或攀附的成分，标榜望族之后以扬家声，并借以维护家族权益的。但是这种以珠玑为根的观念，在岭南开发的历史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珠玑巷是广府民系的家族旗帜与移民入粤扎根的新起点。珠玑后人族谱载有《珠玑村33姓97人流徙铭》：“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30）体现出移民的一种共同理念，也反映了珠玑移民由于原来的望族地位到了南方之后的优越感和责任感。因此，珠玑后裔在南下之后，成为加速岭南地区开发的生力军。岭南各地居民，有很大成分是由外来移民汇聚而成，移民规模大、时间长和成分复杂，十分突出，因此，认同于中转地的重根观念，有利于消除移民之间因祖籍生活习俗、语言以及身份不同所造成的隔阂，推进了移民的融合团结，对共建家园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移民原来所受的文化教育层次较高，他们的颠扑转徙又和国家的安危紧相联系，因此，他们的经济意识往往同关心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比营生求富的境界更高的经世致用的怀抱，表现为务实学、倡实业的风气，并成为渐而成熟的广府文化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五、广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南迁移民在致力于开发经济的同时，大力促进粤中文化教育事业。南下的滚滚人流中，不乏中原世家望族、上层人士。两宋入粤的书香望族，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家族后代的培育，尤其是经历了迁簸流徙与异族入主之后，对传统的中原文化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更有强烈的教育意识，极力推进中原文化风尚对岭南地区的熏陶影响。珠玑巷迁民中，不少是家学渊源，至性嗜学者，既施教子孙，又惠及同乡，入籍各地之后，致力于办州、县学和书院，使岭南的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起来。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从南雄迁移至东莞南街的程徽长子进士翟杰创办了桂华书院，这是广州的首间书院。其后，各地陆续兴建县学、书院，不少是得力于珠玑后人之力倡与支持。广东书院发展史上，南宋是一次高潮。当时广东有书院共40所。其中广府地区为13所，占全省的1/3。（30）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原文化的传入，由来自中原官员以行政手段推行封建礼教转变为由上层移民所带入，以封建家族为社会基础自觉推行封建秩序。移民渐而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主体，逐步改变了原来以豪强左右政治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完全汉化的区域。宋代的粤中地区大力推广封建礼教。北宋时期广东书院甚少，粤中地区已知的只有宋神宗时创于东莞的力瀛书院。（31）广州始设学校于北宋庆历三年（1043），教学质量看来不高，熙宁九年（1076）黄畿复任广州教授，逐章逐旬地讲说儒经，听课的士人竟然觉得“闻所未闻”。直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广州学校才较具规模。北宋时期，广东各州进士（不含特奏名进士）189名，广州有29名。不及连州（46名）、潮州（37名）。如果考虑到辖县多少的因素，也不如韶州（27名）、南雄州（18名）。（32）说明广州读书的风气还不如上述各州。到了南宋，广州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李昴英谓广州文风彪然日以张，虽蕉阜桄林之墟，蛎田蟹窟之屿，皆渠渠斋庐，币良师以玉其子弟，弦歌琤相闻”。（33）此语未免有所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州文风之急涨。南宋广东各州进士共377名，其中广州为135名，次为潮州（73名）、南雄州（30名）。（34）广州在广东各州中遥遥领先。跃居首位的原因，除自身的经济、文化因素外，南迁移民与定居广州的岭北官宦的影响当然不可低估。以东莞为例。有宋一代，莞人登进士第共三十二名，清一色是外来之族。其中很多人是入莞氏族的头三代人。（35）东莞的翟、赵、梁族皆因家学渊源，出现了四代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可见中原氏族的移入，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南宋时期，广州地区的书院数远在其他各州之上，已知的有：广州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濂溪书院、玉岩书院，高明的蜕斋书院，顺德的羊额书院、义斋书院、九峰书院、鼎斋书院、金峰书院，增城的菊坡书院，宝安的力瀛书院。无论是办学还是科举，广州居各州之首，表明了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教育已跃至广东之前列。这一时期的著名士人崔与之、李昂英，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国家栋梁。在全国政坛上的广东籍名人，在唐代、北宋时期有张九龄、刘膽、余靖，都是粤北人：南宋时期有崔与之、李昂英（探花）、冯元、张夔和王大宝（榜眼），前三人都属广州人，后二人是潮州人。宋代唯一一位广东籍状元张镇孙，是广州南海县人。这种情况，显示了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文化进步已超过了粤西、粤北，广州在岭南的文化中心地位已确立起来。宋代是广府文化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地域文化上的重要发展是粤方言的形成。粤方言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秦汉到唐宋的过程。“宋代的粤方言，大概已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去无几。它所用的语音和词汇，可能已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粤方言已经从北方的中原汉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支重要的方言，它已经'自立门户'了”。（36）粤方言成为通行一方的汉语方言，成为号中、粤西地区可以直接进行口头文化交流的工具，使粤地汉化具有特殊的语言基础。同时，粤方言也成为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民间文学、地方戏曲发展的必要前提。入粤官员与谪宦仍是对这一时期的粤中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理学名家周敦颐曾任职于广东路，周氏在广东后人达70万之众。南宋时，各州建有以其号濂溪为名的书院。广州的濂溪书院设在广州城内春风桥北（今西湖路小马站19号周氏书院），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早于禺山、番山书院的建立，是广州地区最早建立的书院。（37）广州知州廖德明，是程朱派门人。广州知州蒋之奇，倡修广州州学宫，又将以前的八贤祠扩建为十贤祠。他们都是极力推进文化发展的贤宦。宋代谪宣入粤，多到僻远地区，其中一些人对广州仍有重大的文化影响。大文豪苏轼流放惠州、儋州，途经广州，在东郊波罗庙登浴日亭，题咏留诗，与陈自沙和诗勒石立碑亭内，成为羊城名碑；游白云山濂泉蒲涧，不仅赋有佳句，还向知州献策引泉水入城为市民饮用，此乃古广州的自来水工程；留题“六榕”而使六榕寺得名。苏轼之孙苏绍箕致仕后由珠玑巷迁广州，归葬白云山并建有苏公祠（址在今山庄旅社）。现时珠江三角洲的苏氏后人每年仍到此扫墓集祖。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在广州药洲九曜石留题，成为一处珍贵的文物胜迹。南宋大诗人陈与义、杨万里、刘克庄都曾提举广东路要职，在广州留下了一批洋溢爱国思想的佳句。对岭南民众震动尤大的是南宋朝在新会的覆灭及文天祥等南宋忠臣的抗元活动。粤中各地普遍建有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三忠祠”。广东的抗元斗争长达三年，广州成了主战场，元军攻城竟有6次反复。东莞熊飞抗元转战死于韶州。南海人状元张镇孙舍身以换取元军不屠广州城。明清易鼎时，在广州地区又是一番顽强而惨烈的反复搏斗，出现了广东“三忠”（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再现。鸦片战争时期的抗英斗争、反入城斗争，尽管斗争的性质不能相提并论，强烈的捍土御侵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六、元代的广州路元朝统治广东近90年时间。元代广东道辖区即宋代的广南东路，领广州路等14个路（州），属江西行省。广州路辖广州录事司及番禺、南海、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等7县。广州路辖区大致是今人所指的广府民系文化区域范围。明代广州府建制不过在此范围上增加了桂阳州、连州，此二州与广州路直辖诸司、县的关系并不密切，后来或废或析。因此，就行政区域而言，元广东路基本确定了广府民系的核心文化区域的范围。元朝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及南人四等，前三种统称北人。在岭南的北人比例甚小。据大徳《南海志》，广州录事司10013户，其中南人9641户，占总户数的96%，北人372户，只占4%。而蒙古人的户数就更小得多了。广东路全路的北人户数只占总户数的0.3%，他们中的68%居于广州录事司，只有少数在其他各县治，南海县甚至无北人户。元朝在岭南驻军，常规在万人以上，按元世组定制，“江淮以南，以至南海，各以汉军及新附军等军戍焉”。（38）驻广州元军当兵的应是汉人、南人。各府县尉司、巡检司置巡军、弓手以及捕盗，也都由南人充任。因此，元朝在广州路民间的统治并不严密，珠江三角洲的封建化、家族化社会进程没有停步。在元末全国性反元大起义中，广东各地武装势力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东莞人何真在角力中控制了广东的大部分地区，被元朝延授江西、福建行省（元末合为一省）左丞，驻节广州。明军南下，何真审时度势归降明朝，使广东在这次改朝换代中没有像宋末那样遭受战争之灾难。元代的水陆交通（包括海上贸易）有较大发展。元初广东道宣慰使塔刺海“开驿路以便步……立水旱站一十余所，水铺一十五起”，（39）广州与大都之间“叶舟风递，明骑星驰，不十余日可至”。（40）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区交通主要靠船渡，从广州往返各县的定期班船叫“长河渡”，有50条航线，其中从番禺（广州城东）开出的有东莞渡、惠州渡、佛山渡、官山渡等，从南海（广州城西）开出的有新会渡、肇庆渡、龙江渡、里水渡等。（41）在水网区各处码头则遍设供行人过河的横水渡。在广州，与中国通过海道经常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朝的五六十处（42），到元致和元年（1328）以前发展至140多处。（43）完善的水陆交通成了元代广州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元代广州路堤围建设仍与宋代一样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西北边缘，即西江和高明河两岸。有些是增筑堤围使原来分散的堤围连接起来，如将南海桑园围筑成大路围；有些是对旧堤加高加厚，如对东莞福隆堤（东江堤一段）、南海罗格围加厚加高。元代筑堤技术比宋代有进步，有些地方开始筑以石窦、石坝，或在围内另筑小围以利排灌，用大石或沙包填塞缺口再填土。这些堤围较好地保障了围区的居民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同时有利于固定河床，加速水流出海，促进了下游平原的浮露和垦区的扩大。在三角洲的沙田不断扩展的同时，封建礼教也不断巩固发展。至今保存完好的番禺沙湾留耕堂就始建于元代。元代不但扩修了在元初被元兵毁拆殆尽的广东路学宫、广州学宫，而且新建了一批书院，有东莞聚秀书院、宁溪书院、城南书院，新会古同书院，顺德翠岩书院等。新建书院大多与当地家族重视教育，以及沙田扩展、聚族扩大有关。从南汉到宋元，广州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加快发展，变化明显。明《永乐大典》引《广州府图经》说：“广州为甲郡，地大民伙。贾胡□蜑杂居。土野沃饶。汉史云：人性轻悍，箕踞椎结，盖百粤非声教所暨，故其习俗与中州殊。然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自是以来，其俗尚渐染华夏，稍变于古。”（44）其间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广州的变化是一个飞跃：“建炎以后，中原士大夫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于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45）以大批移民入粤为契机，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技术，大大加快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粤中地区的开发，珠江三角洲的围垦开创了新的一页，而且加快了封建礼教的推广，改变了居民的社会结构，由豪强政治转化为封建家族政治，由唐以前的土著民族杂居融合为基本汉化，人才由外来为主逐步转化为本土化。所有这一切，为广府文化趋向成熟创造了条件。注释〔1〕王夫之：《宋论》卷一。〔2〕王偁：《东都事略》卷23《刘传》。〔3〕〔4〕《南汉书》卷4、5。〔5〕《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6〕《南汉书》卷1《本纪第一》。〔7〕《南汉书》卷3《刘浚传》。〔8〕《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9〕《南汉书》卷9《列传第三》。〔10〕《南汉书》卷3《殇帝本纪》。〔11〕陈守中：《匡圣宏明大师碑铭》，载吴兰修：《南汉金石志》卷二。〔12〕卢子骏：《新会潮连卢鞭卢氏族谱》卷26，宣统三年刊本。〔13〕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载《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14〕转引自杨宝霖：《珠玑巷氏族的南迁及其对东莞的开发》，载《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第13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5〕《广州普渡庵记》，康熙《番禺县志》。〔16〕《永乐大典·广州府》引《广州新图经》。〔17〕张穆：《铁桥集·补遗·故园茶山记》。〔18〕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一）》，1976年刊本第74～75页。.〔19〕（永乐大典·广州府》引《元一统志》。〔20〕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序》，《曲江集》。〔21〕余靖：《浈水馆记》，《武溪集》。〔22〕丘濬：《广文献公开大庾路碑阴记》。〔23〕屈大均：《广东新语》。〔24〕陈乐素：《珠玑巻史话》，载《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第94～95页。〔25〕《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载（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第19页。〔26〕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第5～9页。〔27〕龙廷槐：《柳州太守何敬亭墓表》，《敬学轩文集》之十。〔28〕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80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9〕《宋史》无“匡美”，只有“延美”，原名光美。也许原名匡美，为避讳一再改名。而《宋史·魏王廷美列传》也未载有其出任香山县县令之事。〔30〕黄慈博：《珠玑者民族南迁记》，载《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第28页。〔31〕白新良《中国书院发展史》第17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称南宋时，广东书院达到35所，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5。实际书院数不止如此，据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102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宋代广东书院有38所，加上该书未列上的宝安力瀛书院（位于今香港新界锦田）及南雄孔林书院，共40所。〔32〕道光《广东通志》卷六十六。〔33〕李昴英：《重修<南海志>序》，《文溪集》卷三。〔34〕道光（广东通志》卷66。〔35〕杨宝霖：《东莞氏族源流》（稿）。〔36〕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66页，广东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37〕《濂溪书院原貌古图昨天找到了》，载（广州日报》2003年11月12日。〔38〕〔39〕道光《广东通志》卷241。〔40〕大德《南海志》卷10。〔41〕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2〕大德《南海志》卷7，该书记事最后年份为致和元年（1328）。〔43〕《元史》卷99《兵志》。〔44〕《永乐大典》卷11907，《广州府三·风俗形势）。〔45〕《永乐大典》卷2339。第九章明与前清时期的广府一、广州置府明朝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广东省）。广州路改置为广州府，辖1州14县，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今深圳）、三水、增城、香山（今中山）、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县及连州（治今连县）所领的阳山、连山县。广州城为省城，是广东布政使司及广东巡抚驻节地。明景泰三年（1452）始设两广总督，此后复有罢置。两广总督先后曾驻广西梧州，广东的肇庆、惠州、潮州等地，崇祯五年至十七年（1632～1644）移驻广州。明朝在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全省共置15卫，在省城广州设有左、右、前、后四卫，“用以实中而制外”。（1）明朝以前，主要以户口多少划分县等。明朝改为以交纳税粮多少作为划分县等的标准，纳税粮10万石以上为上县，6～10万石为中县，6万石以下为下县。万历年问，广东有番禺、南海、东莞、顺德、新会、海阳、潮阳、高要等8个中县（其中南海从洪武到嘉靖年间为上县），其余为下县。（2）表明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重心已越来越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清代仍设广东省，省会仍在广州。清代行政区划在省下有府、州、厅、县等。广州府在清代辖属先后有变化，大部分时间辖南海、番禺、顺德、龙门、新宁、增城、东莞、从化、香山、新会、三水、清远、新安、花县等14县。顺治元年（1644），置主管两广军政的两广总督，驻广州，十二年（1655）后移驻梧州，以后两广总督的建置迭有变化，乾隆十一年（1746）由肇庆移至广州，直至清末。从清初至康熙十九年（1680）的30年间，平南王尚可喜拥兵据立广州。撤藩之后，在广州设立广州将军，率八旗兵5200人驻扎。广州在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得到全面确立。二、沙田扩展及宗族制度的完善明代以来，将那些在珠江主干道两岸和各支流沿岸以及沿海海滩上浮生的沙坦圈筑成田的土地，统称为沙田。宋元时期修筑的堤围，使河床得以固定，从而使南（海）、番（属）、顺（徳）、香山北部、新会东部大量泥沙积淀，明代加大了人工围筑的力度，加速了沙田的形成。从明初到明末，短短二三百年问，基本上形成今天珠江三角洲的面貌。珠江三角洲沙田较多的县是香山、新会、番禺、东莞，以香山县最多。明中叶以前，沙坦围垦集中在西海十八沙和新会县东南部，后来发展到东海十六沙和番禺县南部一带。至于卫所屯垦，在洪武年间就已扩展到新会的江门和香山的小榄、古镇等地。民垦和屯星的围田面积多达100万亩以上。（3）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割南海、番禺、新会、东莞四县土地建香山县。当时的“香山一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4）入明以后，海坦迅速浮露，沿海的黄杨山、五桂山及南沙等岛屿与珠江三角洲已连成一片，香山北部著名的西海十八沙、东海十六沙全部形成为陆地。嘉靖年间，香山有沙坦35个，（5）万历年间，“大小黄圃之沙坦弥多，顺民告承接踵”。（6）香山原先设有盐场，因“年来沧桑屡变，斥卤尽变禾田”。（7）沙田可稻可菱可盐可渔，而且在未成为熟田之前，三年不向官府纳税，成为熟田之后，纳税也较轻，因而吸引着向珠江三角洲的移民。随着沙田的扩大，人口也迅速增加。从香山大黄圃族姓迁入的时间看，大都在明代。注：本表转引自谭棣华著《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8）据民国《香山县志》卷三《舆地》氏族资料编。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发展至清初有相当规模。康熙年间，顺德的昌教堡“西通马宁，东为高站，壤接香山，弥望皆平畴，无烟村之障”。是一望无际的平畴沃野景色。（9）一些著名的大姓，如顺德龙氏、罗氏、苏氏，中山李氏、麦氏、何氏，新会何氏、李氏、赵氏等，不仅在老沙区建立起他们的基业，并且向新沙地区发展他们的势力，成为一方之豪右。在农业开发的实践中，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创造了因地制宜的生产经验。一方面，筑提防海潮盐碱；另一方面，将低洼地挖浚造塘，排涝防旱，挖出的泥土覆于四周成基，塘内养鱼，塘基栽种果木。因栽种植物不同而分别称为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等，成为多层次的经济作物生产基地。既减轻水患，又地尽其利。这种生产经管方式从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于南海九江、顺德陈村一带。万历《顺德县志》载：陈村一带“堑负郭之田为圃，名曰基，以树果木。……围中凿池蓄鱼，春则涸之播秧，大者至数十亩。”明末清初，又推广至“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蓄鱼。至春以播稿秧，大者至数十亩。”（10）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后，广东丝织品更多输往国外，进而推进了城乡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的发展，这一变化直接刺激了广州地区的养蚕种桑，桑基鱼塘逐渐取代果基鱼塘而大行其时。桑基鱼塘有优化环境，形成“基养塘，塘养基的生态良性循环的优点。“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11〕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朝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地区形成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南海与顺德交界的九江、龙江、龙山、坡山以及西樵、大同、沙头等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九江为中心的养鱼种桑专业化农业生产区域。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外来落籍居民，其先祖主要由南雄珠玑巷转来，至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人口迁移仍十分频繁。流迁方向大致是由地势较高的丘岗地区向沙田、堤围地带发展，促进了人口密集、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市镇的崛起。人气旺盛是商业发达的有利因素，因而城镇移民迭增而能相安无事。乡间则因为沙田垦殖之扩展，能容纳更多的新移民，同样能做到新老居民相安无事。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宗族制度始创于明代，完善于清代。立祀田、修族谱、建宗祠，蔚成高潮。清同治《番禺县志》载：“俗最重祭，缙绅之家多建祠堂，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宗，族不满百户者，亦有祠数所。置祭田、书田，岁祀外，余给支嗣膏火、应试卷金。清明、重九行墓祭礼，二分及至则庙祭。即僻境荒村亦有祖厅，昭祀岁时荐新。祭田谓之‘蒸尝'，亦谓‘尝产'，余利俵散，谓‘分蒸尝'云。”（12）兴起于明清时期的佛山，是宗族制度在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缩影。《佛山忠义乡志》称：“我佛山肇迹于晋，榜于唐贞观年间，士人姓氏到今罕闻。宋南渡后，中原文物流入岭南，有迁至佛山者。明初编立图甲，先到诸族得占籍为地著。逮正统年间，黄萧养作乱，围佛山，义士梁广等二十二人合当地八图人民击退之，敕赐忠义乡，蔚为天下巨镇。自是远近相宅兹土，闬闳相望，氏族之繁，不可胜纪。南海衣冠之气，亦以吾镇为盛。……世家大族，蝉连鹊起，乡望乡事，均有关系。”“粤地多以族望自豪，新徙者第不安其处，乡独无此浇习，名家巨族与畸囹之户、骤迁之客，和好无猜，故氏族至繁而门地自别。”（13）可见晋、唐时之佛山（时称季华乡）虽有人事，但未知有何士人姓氏。南宋以后，南迁者有入佛山之族，至明初占籍为地，编立图甲。明末，梁姓为望族大姓，起而纠合地方力量以抵御黄萧养起义。黄萧养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大族迁入佛山甚众，当地并不排外。民国《忠义乡志》胪列之望族大姓就有51姓。其中李氏自明初定居佛山，以冶铁兴家，是佛山巨族，出名宣李待问。（14）梁氏世居顺德麦村，乾隆年间迁佛山松桂里，后成佛山大族，出有不少富商人士，有名宦梁九图。（15）清代大臣骆秉章之祖父骆国祐自花县迁佛山，越三十年始显。这段历史反映了佛山的商业繁荣及开放性，故而能吸纳外来之族。佛山现存祠堂92座，其中始建于宋代1座、民国2座、不明年代1座，其余皆为明清时期所建（明代7座，清代79座）。清代所建未必为清代始迁入的，但必须是聚成大族，具有相当财力，才能兴建祠堂。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宗族之兴起，由此可见一斑。以礼制为纽带的宗族集团的兴盛，促成了一地风俗文化的发展及人文的勃兴。香山黄氏，其宋代先祖以直谏被贬岭南，卒于途中。其子从简初居南海西濠（今广州），再迁香山，后裔多为仕宦，成为香山望族，出有黄榆、黄畿、黄佐等名人。关羽后裔关肇治，原籍福建建宁县，宋乾德进士，左右春坊学士奉政大夫，谪守冈州（今新会），定居同州淡雅里。有两兄随任来粤，长兄定居南海九江，二兄定居顺德黄连乡，后裔散布珠江三角洲的广州、番禺、南海一带，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在广州小马站建有关氏书院。（16）南海石头、黎涌、石啃三堡，相距不及五里，明代产生了“五里四会元”（伦文叙、伦以训、梁储、梁韬），伦文叙一家又有父子四元双士”之称（伦文叙为状元，子以训榜眼，以谅解元进士，以诜进士）。清嘉庆年间，南海小塘李可端、李可琼、李可蕃同胞三人先后入翰林，时称“同胞三翰林”，为科举一时盛事。三、广州的繁荣及佛山的兴起广州城池在明初由宋代三城合一，加强了防卫。广州城是岭南地区最大的都市，政治、文化中心。城内及附近的村镇中，集中了从事纺织、印染到制糖、陶瓷等各种手工加工业作坊及大批工匠。由于交通便利和商业繁荣，珠江三角洲是华南地区粮食、棉花、棉织品最大和最集中的商品市场和加工制作地，除此之外，茶叶、盐、糖、瓷器、铁器也是广州市场上的大宗商品。由于经济发展，广州城市建设不断。明正统六年（1441），广东地方官员捐资以倡，将城内数十里街道重新铺砌。嘉靖四十三年（1564），吸取饶平柘林兵变攻掠广州，“居民走入城，壅塞小市街，残死无算”（17）的教训，将城市扩展向江边，在宋雁翅城的基础上兴建新城，前临珠江，把商贾云集的名豪畔街等包括在内。明代濠畔街“粤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18），把城内的濠渠进行疏浚并建闸门，自西关而入，逶迤城南，迳至归德门外，舟揖可通。城内街道宽广平直，主要街道可容10或者15人并马而行。街道一侧种植树木。沿街铺面接连，有了诸如鞋匠街、饭馆街等专业街。横跨街道建有牌楼。嘉靖二十五年（1546）到过广州的葡萄牙人克路士描述广州的主要大街两侧有带遮顶的人行道，既可以遮荫避雨，还可以在遮顶下出售东西。（19）这是骑楼出现之前南方商业城市的一大景观。自明中叶以后，日益发展兴旺的墟市、新兴的城镇和县城、府城，开始构成了广东境内的商业网络，使之货畅其流。广州发挥了枢纽作用，开始成为集散省内商品的中心城市，成为广东的商业中心。也就在此时，有了“广货”之说。《广东新语》称：“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20）九郡指的是明代广东九府，明代说的“广货”就是广东货，将广东货起统合作用的就是广州。清代，广州城垣变化不大。为保障沿江商户及护卫新城，自明新城东西两侧伸出直下江边筑东、西翼城。更主要的是，受手工业和商贸发展的影响，城区突破原有城墙局限，向城垣外的东、西、南方向扩展。西门外西关原是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河网交织，分布着农田、村落。明末已建有18个商业街坊，形成十八甫商业区。清代，西关大片民居兴起，以织造业为主的手工业区也在西关大片形成。在西关一带设有专营对外贸易事宜的十三行商馆。这一带的居民由农村居民变成富有的工商业户，许多繁华都市的民俗应运而生，多姿多彩的市井文化中产生了多才多艺的“西关小姐”。晚清，位于白鹅潭的沙面在鸦片战争后被英法强租为租界，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开发，具有完整的方格状道路系统。街心花园、教堂、学校、领事馆、洋行、住宅、俱乐部、旅馆等各具特色的西方近代建筑物，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道两旁。电力厂、自来水厂、水塔、邮政局、电报局、医院、运动场、清洁队、码头等近代市政公用设施也在沙面兴办，俨然是一个近代城市雏形。在明中叶仍是人烟稀少的河南，明末清初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民间土特产集散地和外贸重要口岸。到了清末，机器业、造船业等近代工业建立，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外地富商陆续迁入，形成与广州城区隔江相望的市镇，兴建寺观、园林成为河南一时风尚，至晚清的同光年间基本形成城市街道格局，有数百间工厂、商店以及岭南学堂、南武学校等近代新式教育机构。广州城东门外在明代多为山丘荒地及乡间道路，明末清初建有一批园林、寺庙，清代以后，商业区扩展至东濠东侧和城东的珠江北岸。清末，外国教会在此兴建礼拜堂、教会书局、学校，出现别具一格的城市风貌。宣统三年（1910），广九铁路通车后，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东山大建住宅，“地价日增，屋宇日盛”。在这里出现了洋派头的“东山少爷”。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移民聚族而居并带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崛起了一批城镇，其中以毗邻广州的佛山最为繁荣。佛山原属南海县地，地处西、北两江至广州的主要航道佛山涌的交通要冲，唐宋时期由渔村墟市逐渐形成工商业市镇。北宋称为佛山堡，延至明初，佛山堡迅速发展，当时有3000多户人家，冶铁业十分兴盛，形成栅下、祖庙、汾水三个具有商业中心功能的核心地点，祖庙还具有祭祀中心功能。它们是佛山城市最初的胚体。同时还形成了以居民住宅区、作坊区、庐墓区、田塘区组成的外围区。明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进攻佛山，当地22个巨室大家的长者率八图居民“罄费财，树木栅、浚沟堑，储兵械，一夕而具”。一夜之间，竖起栅墙“周十许里”。（21）沿栅设35铺，分兵把口。兵事平后，以军事为目的的铺区制度将原来分散的村落连结起来，沿涌建立的木栅犹如城墙，标志着佛山城市雏形的形成。到景泰年间，佛山“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22）店铺万余家，商业70多行，会馆200多家，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清代，佛山的冶铁、陶瓷、幼织、制药等商品生产高度发展。星罗棋布的冶铁炉沿河涌修筑。商业往来繁忙，成为岭南中心市场。从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成为周遭三四十里的繁华大镇，城区形成手工业、商业和住宅区三大区划。全镇工商店号在3000家以上，铺区从25个增至27个，街巷从233条扩至596条。城内有6个墟市、60个渡口和20座桥梁，尤以汾江南岸旧演榔街头为最繁盛之区，“商贾丛集，阛阓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23）佛山城市经济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天下“四大聚”（24）与汉口镇、景徳镇、朱仙镇并称“四大名镇”。佛山为名门大族聚居之处，商业同样是巨族大家所经营。由于土著市民聚族而居，祠庙遍布镇内。民国初统计，佛山镇内有祠堂378座。随着经济上的发展，佛山的社会结构为适应都市化进行了整合。明清时期的佛山有过三次不同性质的社会整合，第一次在明正统年间，由乡老领导进行，各个宗族在地缘关系上联系起来，使佛山出现了城市的雏形；第二次在明末，由新兴的士绅集团领导进行，击败了乡族豪强势力，使佛山权力结构转移到士绅集团，趋向官方正统化；第三次在清前期的乾隆年间，由侨寓人士与全镇商民联合进行，击败土著宗族势力，使佛山权力结构重组，利益重新分配。（25）在这些整合变迁过程中，调整了佛山乡族社会、新兴士绅集团与城市平民的关系，佛山的手工业生产全面发展，商人集团崛起，商品经济繁荣，成为与广州并立的岭南中心市场。在相当繁荣的城市经济中，佛山的人文环境和城市风貌呈现出广府文化的典型特征。明中叶，在佛山及其周围的南海县境内，接连涌现出科举鼎甲人物和权倾朝野的名宣大吏，被称为“南海士大夫集团”。其代表人物包括会元、内阁首辅梁储，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方献夫，会元、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霍韬，吏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巡抚、左副都御史庞尚鹏等，这些人不仅品秩极高，而且有不少任执掌官吏考成、升迁大权的吏部左侍郎一职。状元、翰林院修撰侍讲伦文叙一门皆有科名，次子伦以训为会元、南京国子监祭酒，长子伦以琼、幼子伦以洗皆为进士。四、领西风之先的珠江三角洲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给广州府带来了畸形的繁荣，也使广州成为欧美国家涉足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方文化在此发生了碰撞。香港、澳门殖民化则使珠江口的城镇尤其是香山一带的风气受西风东渐之影响更大。澳门在明末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船队“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26）获准上岸之后，进而租借澳门为暂居贸易地，直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葡萄牙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取得了“永居管理”澳门的特权。葡人则担自在澳门建筑城垣和炮台，设置行政机构，任命官吏，一方面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以之为据点，对中国内地开展贸易、传教等活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咸丰十年（1860），英国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强行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侵占。港、澳两地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处于不同政府管治下，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三地又有着特殊的人文关系。远古时代，三地同属于古越族文化的珠江口文化圈。在封建社会中的大部分时期，港澳两地均属广州，曾同属东莞县，以后分属新安县（后称宝安县）、香山县（后称中山县）。港澳原有居民以及后来大批从内地迁入的居民，语言相同、习俗相同，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和民间往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三地互相渗透，互相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流传“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三地关系。在经济上，珠三角的人力和资金大量地流向港澳，而港澳的转口贸易，又促进了广府地区的贸易、航运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三地成了清末改良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活动基地。在文化上，三地成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桥头堡。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上，粤地影响着港澳；在引进西方科技、教育上，港澳影响着粤地；西方文化科技通过港澳消化后传入粤地，中国文化艺术也通过港澳吸收后传到西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铸成了岭南文化特别是广府文化得风气之先、领风气之先的特殊气质，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上呈现出有异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封闭状态的内地文化的特殊风貌。西方近代文化首先通过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经澳门传入粤地。明代，天主教传教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经广州进入肇庆，带进了西洋自鸣钟、油画、日晷、世界地图，并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所教堂，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编著了第一部欧汉字典《葡汉辞典》。利玛窦还开始翻译《四书》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清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先是以澳门后以香港为活动基地，吸收了第一批中国籍教徒。随之传入了西方科技，包括医学、天文、枪炮、工艺技术。道光二年（1822）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温斯特与马礼逊在澳门设立医院。道光七年（1827）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第一间眼科医院，两年后在广州开设医务所。马礼逊于嘉庆十七年（1812）在澳门撰写《中国文法》，嘉庆二十年至道光四年（1815～1824）编成出版《华英字典》，道光八年（1828）编成《广东省土话字汇》，这使他成为一举成名的汉学家。此举的意义是从思想交流的基本工具即语言入手，开拓了文化交流的渠道。同治元年（1862），在香港洋行任职的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人唐廷枢与其兄弟一道编写、发行了一套《英语集全》，该书用广州话对英语单词进行了比译和注音，并专辟“买办”一卷，此书后来被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对推进当时广府人从事洋务的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出现的英才中，不乏走在时代前列，把眼光和脚步都转向世界的精英人物，显示出广府文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引领风气的特征。以今之珠海（原属香山县辖境）为例，清代之前，几乎没有出过什么著名人物，晚清时期却诞生了不少风云人物：中国第一位在外国高等学府毕业及学士、博士学位获得者，提倡及主理首批中国官派出国留学生事项的容闳；被称为“买办第一家族”，三代掌管英国庞大的太古洋行达63年之久的华人买办莫氏家族；以经商和办农场致富的首位华侨百万富翁，清朝首任驻夏成夷王国领事官陈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洋务运动代表人物，著名官商，创办或主持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第一条国产铁路唐胥铁路、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水泥厂，被称为中国第一企业家”的唐延枢；另一位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徐润，从事实业活动60年，经营企业涉及工矿、商业、运输、金融、保险、地产、印刷、垦务；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会办大臣、邮传部尚书，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这种群英迭起的情况，同珠海毗邻澳门得风气之先，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广府文化地位的提升从明代到清代，包括广府文化在内的岭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教育领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域，突出体现在兴办书院上。北宋初年，书院在中原及长江流域兴盛起来，在岭南尚寥若晨星。南宋以后，中国的书院由于政治原因有过几番起落，岭南的书院却基本保持发展的态势，至清代已雄踞一方，令全国学人刮目相看。这种状况与珠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据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引用资料分析，宋代全国书院有74%分布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占21%。明嘉靖、万历年间，长江流域占51%，珠江流域30%，黄河流域19%。按省份排列，广东跃居第三。清代，珠江流域书院数已居全国之首。（27）由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所附书院名录统计，广东书院有39所，其中广州占13所，为三分之一。明代广东全省书院有156所，广州府为49所，接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应是不完全统计，仅见于《佛山忠义乡志》所列6所建于明代的书院，全部没有收入此名录。清代，广东省书院有：340所，其中广州府136所，占了十分之四。（28）明清时期广府人物在历史舞台上亮相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清更为突出。涉及的领域不仅有经济、文化，也有政治方面。在政治领域，集中的特征是从政官员职级之高以及活跃于涉外、经济事务。《明史》立传的广府人，影响较大的高层官员有四川、浙江、湖广布政使何真，内阁首辅梁储，礼部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方献夫，礼部尚书霍韬，户部尚书谭大初、李待问；直臣谏官有御史何维柏，湖广按察使陈谔，浙江巡按周新，左副都御史庞尚鹏，副都御史罗亨信、彭谊，御史王学曾；军事人物有兵部尚书叶梦熊、袁崇焕，左都督、总兵官陈璘，并称“广东三忠”的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循吏良吏有南安知府翟溥福、曲靖知府庞嵩；学者文人有南园诗人孙贲等人；理学家有唐伯元、陈献章，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湛若水，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黄佐。《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人物传稿》立传的广府人不少，尤其是清中叶以后更多，较为著名的政界人物有：协办大学士兼四川总督骆秉章，户部尚书罗淳衍，闽浙总督何璟，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法都尚书戴鸿慈，安徽、山西、贵州巡抚邓华熙，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广西巡抚黄槐森，湖南巡抚吴荣光，河南、江苏按察使、浙江布政使许应，清驻外公使、民国司法、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外交家、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查办藏事大臣、外务部左丞张荫棠，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江苏、浙江、福建巡抚、状元庄有恭，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工部、礼部尚书、闽浙总督许应骙，邮传部尚书、民国总理唐绍仪，铁路总局局长、民国总理梁士诒；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民国开国元動徐绍桢、朱执信、胡汉民、陈少白；民主革命志士陆皓东、史坚如；思想家有郑观应、容闳、何启、胡礼垣；文人学者有：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谢兰生、吴兰修、朱次琦、陈澧、曾钊、林伯桐、李黼平、李文田、邹伯奇、苏曼殊、梁廷枏、吴沃尧、梁鼎芬、黄节；经济界有：十三行总商伍乗鉴、伍崇曜，民族工商业实业家陈启沅、简照南、简玉阶，著名洋行买办、实业家唐廷枢、徐润；科技界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航空先驱冯如，西医师黄宽，女西医师、医院院长张竹君；还有第一个华人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等。由此可见清代广府人才领时代之风骚。历史是人的活动，从以上所列，也可见广府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之提升，至清代已经跻身于先进文化之行列，而且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特色。注释：〔1〕明嘉靖《广东通志》卷31。〔2〕清康熙《广东通志》卷9。〔3〕《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2册第23页。〔4〕《永乐大典》卷11907《广字·风俗形势》。〔5〕明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土田》。〔6〕咸丰《顺徳县志》卷三《與地略·风俗》。〔7〕《但候德政碑记》，道光《香山县志》卷五《金石》。〔8〕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清康熙《顺德县志》卷三。〔1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鳞语·养鱼种》。〔11〕清光绪《高明县志》。〔12〕清同治《番禺县志》卷六《舆地略四》。〔13〕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志》。〔14〕明崇祯年间刻本、李待问撰《李氏族谱》，《佛山文物志》第146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15〕清咸丰五年（1855）梁九图撰《梁氏支谱》，《佛山文物志》第148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16〕仇巨川：《羊城古钞》卷七《濠畔朱楼》。〔17〕骆伟：《岭南族谱撷录》第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8〕赖振寰：《朱子碑楼辑存》。〔19〕克路士：《中国志》。【英】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二篇，中华书局版。〔2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黩货》。〔21〕明《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22〕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23〕徐珂：《清稗类钞、》17册，农商类。〔24〕刘献廷：《广阳杂记》。〔25〕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7页，广东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26〕郭棐（广东通志》卷69《澳门）。〔27〕转引自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第337、3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8〕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1025、1026、1069-1074、1048～105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59第十章晚清民国时期的广府-、战火的洗礼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是从珠江三角洲拉开的。正当清朝国势日下之时，迅猛发展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向海外扩张侵略，落后的中国成了他们主要的侵略对象。由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中国对英贸易处于出超状态，英国资产阶级竟以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手段。其后，美国鸦片贩子也加入了向中国贩运鸦片的行列。走私鸦片从珠江口外逐渐扩大至东南沿海，珠江口外则始终是走私鸦片的重要口岸。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广州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要场所。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和清朝统治带来的危害，引起清政府的关注，道光皇帝派遣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来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雷厉风行地领导160了广东的禁烟斗争，道光十九年（1839）6月3日至23日，亲率文武官员监督，在虎门海滩将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畑之后，英国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是一场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1】道光二十年（1840）4月，英国议会通过发动对华战争决议案，派兵侵华。这年1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他一面整顿军队，加强虎门防卫，招募编练水勇：一面组织人才，翻译外国书报，编成《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成为中国了解近代西方最早的著作。英军却转而北犯，攻陷浙江定海。英国的军舰开到天津白河口，道光皇帝立场动摇了，下旨将林则徐革职查办，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琦善下令撤除珠江口防务，遗散水勇，载减水师。道光二十一年（1841）2月26日，英军发动突袭，攻占大角、沙角、虎门炮台。4月26日靖逆将军奕芳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英方签订了《广州条约》，以交付英方赎城费、赔偿商馆损失等为条件，换取英军退出虎门。面对英军的骚扰，广州三元里103乡绅民奋起自卫反击，得到丝织工人、打石工人、水勇以及佛山、番禺、花县、从化各地义勇的响应，给英军以沉重打击，三元里抗英斗争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民间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广州郊区在鸦片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社学，原来是农村推广封建教化的组织，逐渐演化为兼有地主士绅兴办团练以“御盗贼”作用的机构，发展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自卫的武装组织，在反抗英国人强迫租地、反对英国人入城等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此后，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下，社学向两个方向演变：掌握领导权的地主士绅力图把社学团练变成维持封建秩序的武装：不少参加社学的农民则纷纷参加会党起义，在晚清农民起义高潮中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依据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英国强占了香港。英割香港与原来的葡占澳门，成为西方对华侵略活动的基地，也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对成邻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咸丰六年（1856），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翌年，与法国组成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押往印度。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徳投降，在由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及英法各一名军人组成的“联军委员会”（，又称“三人委员会”）严密控制下供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外国侵略者制造的地方傀儡政权。《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于咸丰十一年（1861）10月1日从广州撤出，此时已占据广州长达3年9个月。在此期问，广州城北与南海、番禺二县士绅首起组织团练，先是设局于佛山，此后东莞、新安、增城、花县、顺徳、香山、新会等县也都组织团练御侮。在籍侍郎罗淳衍等三人办理团练，设局于顺徳，后迁总局于花县。也是在此期间，英法两国提出租借广州沙面的要求，咸丰十一年（1861），签订正式租约。英法对租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沙面租界的近代化行政管理、近代化企事业以及近代文化体育设施，西方建筑风格，乃至广州人的近代化意识等，对广州社会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西方宗教势力对华的文化渗透自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之后，打开了传教的路径，传教士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手段，开办医院、教会学校，促进了广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鸦片战争带来了严重的民族矛盾，也激化了原来就已很尖锐的阶级矛盾，珠江流域孕育着新的社会变革，广州城北、城东的番禺、南海农村，香山、龙门、清远、东莞等县，经常发生民变。出身农民家庭、担任多年农村塾师的洪秀全，多次参加科考未中秀才，受到第一个中国传教士高明人梁发操写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的启发，演化出建立人间天国的理论，创立了拜上帝会，领导了一场席卷14省、与清政权对峙18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发动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以迅雷狂颂的方式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引发了继太平天国之后此起彼伏直至倾覆清朝的全国各地反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有利条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自己看作太平天国的继承者，黄兴、章太炎也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中第一个受基督教洗礼的高层领导人。他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中应当算是一个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另类。他所提出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是近代中国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具有启迪作用。-广东各地爆发了与太平天国相呼应的天地会“洪兵”起义，其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城乡其他劳动者。“洪兵”起义集中在珠江流域，成丰四年（1854）何六在东莞石龙镇首先竖旗起义，随之有佛山陈开、广州附近的李文茂、甘先、陈显良，三水陈金紅、新会陈松年、顺德陈吉、清远候陈带、练四虎等起义。此外，韶州、惠州、连州、肇庆、潮州各府也有“洪兵”起义。起义军控制地区为两广四五十个县，成为太平天国以外的武装起义局面。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在天地会的历史上是最具代表性、规模最大的一场反清武装斗争。·二、珠江三角洲城镇群的崛起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在整个华南经济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起着核心和中心的作用。有着全经济区最重要的区域市场广州以及中心市场佛山镇，市镇的密集度也远远高于经济区内其他地区。不论是手工业型市镇，商业型市镇，还是中转运输型市镇，在清代的增长数量一般都高于别的地区。据雍正《广东通志》所载，珠三角圩市数为全省最高，占全省总数的40%以上。：玗市增长速度最快的州县也集中在这一地区，广州府的南海、番禺两县是增长最快的县份。南海县的圩市数在明代后期仅为19个，嘉庆道光年间达到133个，宣统末年达到269个。番禺县的圩市数从乾隆年间的88个，至宣统末年达到132个。广州城内的：圩市在同治年间有29个。〔2〕专业性圩市迅速发展起来，光结宣统年间，广州所属的南海、顺德两个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在广州城附近不到二百公里的范围内，形成80个大的专业圩市。南海县在光绪年问，增设有桑市、茧市、蚕纸行、布行、節乾市、猪仔圩、爪圩、菜圩、菜市、猫狗市、鸡行、鸡鸭圩、花市等专业圩市共33个。流通的商品主要包括桑叶、生丝、绢织物、棉花、麻织物、谷物、鱼类、家畜、水果、花卉、香、原料、手工艺品和燃料等，涉及到当时珠江三角洲生产的主要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商品。【3）番昌县有以卖花为业的花市。顺德县江村堡的龙江圩和丝圩，专门出卖棉线、丝线和纯丝。（4）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网络的扩张，使珠江三角洲出现了一批崛起的城镇。除了省垣广州之外，著名的市镇有佛山、石岐、石龙和陈村，并称珠江三角洲四大名镇。晚清时期，虽然广州的外贸受到诸多通商口岸的开放影响，地位下降，但由于毗邻香港、换门，依托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继续发展，形成广（州）、佛（山）、陈（村）、（石）龙经济区。顺德的大良、北潛、龙江，在明代已是相当兴盛的商业圩市。龙江出产的丝织品质量上乘，眼绸“玉阶”、“柳叶”被列为广东贡品。明中叶以后決门成为中外贸易场所，蚕丝出口需求与日俱增，顺德发展成为广东的蚕丝和丝织业生产16S中心，在河流交汇之处兴起密集的圩市。鸦片战争以后，顺德加速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化进程，成为我国最早出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之一。农村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以蚕桑为首的经济作物大面积发展，带动工商各业全面兴旺，圩镇密度增大，功能趋于多样化。陈村是一个典型，早在17、18世纪之际便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谷物集散地，19世纪中期成为外贸口岸。清咸丰十年（1860）起在吉洲沙设海关，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省最大的蚕丝交易市场，为全县最重要的农副产品转运口岸，繁荣的商业港埠和金融中心。顺德大宗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除了蚕丝之外，丝织物香云纱、黑胶绸和刺绣工艺品、梳箆、木屐、锡纸、风炉等也长期购销海内外。清代，乐从、勘流（黄连恒聚酱园、华天宝制药厂和风炉制作驰名远近）、香坛（出过黄士俊、梁耀枢两状元），都是商业繁荣、文才旺盛的村镇。东莞农业经济发达，素称“鱼米果之乡”，宋乾德元年（963）已是“户逾三万称上第”之富裕大县，盛产稻谷、花生、木薯、豆类、蔬菜，还是甘蔗、黄麻主要产区。清代，石龙成为东莞一个重要的集镇，东莞“有蕉荔桔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5】鸦片战争以后，石龙是东江流域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与顺德陈村同为广东省两个粮食主要集散地，运输业、商业、手工业发达。晚清时期广州城与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各个乡镇的各类圩市以及商业城镇，连结为一个市场网络，使城乡所需的物品很快流通。使广州在失去了垄断贸易的优势以后，能够凭借强大的地区贸易网络，继续维系华南都会的地位。“广州的位置，珠江三角洲土地之肥沃，商人们的进取心以及全省人民普遍具有的動劳与聪明才智，将永远会使本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6）三、民族资本主义及维新思想的产生鸦片战争前，广东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国资本的人侵，虽然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但也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的半个世纪中，在广州先后出现了包括官办、商办和外资兴办的各种资本类型的新式企业。最先出现的是外国资本企业，主要有船舶修造、航运、银行等事业。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人约翰·柯拜兴建的柯拜船坞是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是年英国丽职银行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是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商创办的省港小轮公司是外资在中国境内开办的第一家经营定期航班的轮船公司。在广东由两广总督建立的近代官办企业有织布局、机器局和钱局。织布局后来随张之洞迁往湖北。广东机器局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经过30年的经营，发展为南方一家颇具规模的军事工厂。广东钱局建于广州大东门外，是我国首家用机器铸造铜钱和银币的工厂，所铸钱币流通于津沪各口岸，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全国其他地方一般先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出现民族工业不同，在广东是民族工业与洋务企业差不多同时甚至比洋务企业更早些出现。原因之一是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较迟，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力较小：二是广东是著名侨乡，华侨率先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同治十一年（1872），暹罗（今泰国）华侨陈启沅在家乡南海简村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成为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此后，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火柴厂一巧明火柴厂，比厦门自来火厂要早9年：台山旅美华侨黄秉常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比宁波电灯公司要早11年：南海盐步商人钟星溪发起成立宏远堂造纸厂，比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伦章造纸厂要早2年。随着外资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广东率先出现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是当时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外贸工业、近代商业莫不如此。清末我国列人统计的近代工厂，几乎三分之一在珠三角。珠江是内河航运最发达的水道，民营的内河小轮以珠三角最多：粤路公司则是清末资本最雄厚的民营企业：最早的近代百货业也是珠三角侨商所创办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华侨巨贾之外，是从地主、买办、官僚、商人转化而来的，其中以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168产家颇具实力，思想上接受西方文化也较早较多。地近换门、香港的沿珠江人海口，是集中产生这一阶级的地区。香山一地就出有下列著名人物：掌管英国太古洋行达63年之久的华人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被称为中国“买办第一家族”。近代著名买办、企业家唐廷枢，一生中自营、合营、人股或受别人和清政府委托兴办的企业就有47家。其中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的就有6家。其弟唐廷植接任唐廷枢所任的怡和洋行总买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发起投资建立中国玻璃公司，担任上海火烛保险公司首董及上海电光公司华人股东代表等。买办、企业家徐润，经营过的企业不下四五十家，涉及工矿、商业、运输、保险、地产、印刷、垦务。与此相应的是，还出有香山郑观应、宏間，南海何启，三水胡礼垣等一批提出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救国方案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思想影响最大，在几年内曾印10多万册。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民办工商业，倡西学、兴学校，设立武备学堂，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对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推动社会变革起过积极作用。与洪秀全所选择的变草社会的道路不同，在广州兴起以追求西学和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维新变法思想，很快形成为政治运动，领袖人物是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康有为在游历香港时初步接触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进而购买和阅读了大量介绍西学的书籍。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变法思想形成。自光结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91～1898），康有为在广州创设万木草堂，培养了梁启超、徐動等一批维新变法人才，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人类公理》等三部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著作。维新派在广东组织了圣学会广州分会、公理学会、群学会、显学会、东文学社、农学会等团体，创办了介绍新学和报道维新变法消息为主的《岭学报》、《新知报》等报刊，扩大了思想影响。维新变法运动虽遭失败，但变法维新思想促进了一代中国人的觉醒，使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业，还提出了“商战”、扩商权”等口号。在广州的各类绅商社团（包括士绅结社、商人行会组织及慈善团体）多次领导了旨在挽回利权的反帝斗争。广东与两湖三省绅商掀起收回粤汉路权运动，要求废除《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收回美国合兴公司夺去的路权。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拒约（指清政府拟与美国续签的《限禁华工保护华民条约》）反美运动中，在广府地区成立了“抵制苛待华工不用美货总公所”，作为领导全省运动的机关。由于旅美华侨最多，故运动时间最长，抵制最力。这场斗争最终却由于清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下谕禁止运动，绅商团体分化退出而失败。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的粤商自治会，是商人的立宪团体，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在维护商人权利、组织反对清政府对外政策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激进的政治态度，显示了广州商人强烈的参政意识，为参与宪政作出了努力。四、民主革命发源地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促使了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生活环境分不开。孙中山是香山（今中山市）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代远赴檀香山，在他哥哥华侨实业家孙眉资助下进入教会学校读书，回国后先后入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医。他亲历欧美，所接受的是系统的西方教育，既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学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因而主张“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同时又主张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7）体现出其理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鲜明特征，也是岭南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翌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明确提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并着手领导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兴中会组织了乙未广州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光绪三十一年（1904），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连续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有广州庚戌新军起义、三二九起义。这些起义都归于失败，却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广东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府地区则是这一革命的中心地带。孙中山之所以屡败不馁，并且选定广东特别是粤港作为活动基地，就因为这里有坚定支持他的革命追随者，是支持革命的广大华侨的故乡，开展革命活动有坚实的基础支持。革命党人中，出现了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吾党健将、“命世英才”的香山人陆皓东，继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番禺人史坚如，与孙中山志趣相投并称四大寇”的新会人陈少白等，革命中坚朱执信、胡汉民、高剑父等人。革命党人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斗志。尤其是广州三.二九起义，被孙中山评价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aJ这次革命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的道路仍然十分曲折受挫，孙中山在广州先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广州）、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等革命政权。广东成为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重要基地、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实现、黄埔军校的创立以及国民革命武装的建立、省港大罢工、北伐出师等

轰轰烈烈的事件，期间又经历了桂系军阀统治、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及联军东征、平定杨希闵与刘震寰滇桂叛军、镇压商团叛乱等政治军事斗争。孙中山逝世之后，又经历了四一五事变、广州起义的血的洗礼。广府人卷入了十余年不停的战火之中，一直处于一种高度激烈的政治情绪之中。从鸦片战争到大革命这80多年，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是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变局的时期，也是广府地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广府人在这个时期可说是领导了全国的潮流，广府地区是改革与民主革命的发源地。民国前期的十几年，广州经常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同时，广府地区又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地区。广府人在这一时期为振兴中华起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为岭南文化的特征注入了一种寻求变革，敢于变化的因素，无论是建筑、美术、戏剧、文学都受到直接的影响，表现出独特的广府文化的风格。

五、充满生机活力的近代文化

广府文化在近代进入了逐步面向世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从内容上具有民主革命及西方思想文化色彩，在形式上则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表现手段，从而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革新性，更充满生机活力。

近代广州文学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富有开拓革新精

173174神。在兴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他在1902年11月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份纯粹意义上的小说杂志《新小说》，发表了多部创作小说。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纲领性口号。小说异军突起，名家有吴沃尧（吴研人）及黄世仲（黄小配）。

.吴沃尧又号我佛山人，南海县人，被誉为清末四大小说家之一。他在1903～1910年间写有小说、寓言30余种，较为著名的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痛史》、《新石头记》、《近十年之怪现状》、《俏皮话》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吴沃尧强调以忧时惯世之心和恢诡之词写社会怪现状，以警醒世人，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小说形式多样，题材广泛，触及近代社会的各个側面，敢于抨击清官府媚外卖国，揭露官场腐败，暴露社会道德沦丧，反对封建迷信。其文字浅白，生动流畅，富于讽刺性和幽默感。尽管他在晚年时仍固守维新变法，反对民主革命，但他的小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黄世仲是番禺大桥乡（今属广州荔湾区）人。他于1902年在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当记者，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主编或参加编辑过10多种革命报刊，创作了15部中、长篇章回体小说。小说主要是以历史题材表现民主革命的主张和理论。其代表作《洪秀全演义》，曾在报刊连载，出版单行本，还改编为剧本演出。作品塑造了一批“为种族争，为民族死”的农民革命英雄人物。虽有夸大或背离史实，但其圆熟的艺术手法和高亢的思想格调，为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发挥了特别的作用。黄世仲的小说《宦海升沉录》、《廿载繁华梦》及《大马扁》社会影响较大。其自题为“时事小说”的《五日风声1），1911年连载于广州《南越报》副刊，采用浅近的文言，详细报道了发生于时在一个月前的黄花岗起义的经过，材料翔实，朴实感人，具备了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特点，被学界推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

广州历来是全国报业较发达的大城市之一。晚清时期，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传教之需，创办了报刊，使广州成了中国近代报刊最早的诞生地。1815年，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另一位传教士米怜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高明人梁发参与了该刊的撰稿、刻印和发行。道光七年（1827）创刊的《广州纪录报》，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英文报纸。道光十三年（1833）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这些报刊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一些情况。中国人也开始了办报办刊的初步尝试。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翻译出版《澳门新闻纸》（外文译报），是中国最早带有“参考消息”性质的报刊。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倡说中国应该马上办报，以通民隐、达民情、彰清仪、广见闻、资考证。咸丰三年（1853）伍延芳与友人在香港创17S1'761办了《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此后，，在广州陆续出现了《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等中国人主办的报纸。到19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1865至1895年30年间，在广州已有外文报刊5种、中文报刊10种。这一时期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因而，反对外国侵略和迫害，鼓吹维新变法，就成为这一时期广州报刊的主流。

1901～1911年，是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相应形成了广州新闻史上第一次办报高潮。11年相继出版各类报刊约100种。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所办的报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先后在广州创办过《国民报》、《二十世纪军国民报》、《平民日报》、《可报》等15种报纸，在唤起民众、支持和拥护民主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君主立宪派人士也在广州办起了《国事报》、《七十二行商报》-、《羊城日报》、《时敏报》等14种报刊。两派报刊围绕着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和如何看待清廷预备立宪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新闻图片、时事漫画，在这时期的报纸上得到了广泛应用。1904年在广州创办的中兴通讯社，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通讯社。1908年成立的广州报界公会，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之一。报刊的出现是社会的大进步，是近代文明的代表。广府地区的报刊办报思路活跃、敢为人先，种类繁多、版面活泼、信息性强，这种办报传统直至现代都十分突出。

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品种，电影艺术很快得到广府文化的吸纳利用。晚清时期，电影从外国传入上海，随后光绪年间在广州也出现第一批电影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北京摄制了一部以名角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相隔8年后，1913年，在香港制作了第一部改编自同名粤剧的故事片《庄子试妻》。1924年，黎民伟、黎海山、黎北海三兄弟在广州西关多宝坊开办民新影片公司。当年摄制了以《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第一部故事片《胭脂》，在香港上映获轰动效应。该公司还拍摄了广东革命政府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一批新闻纪录片。随后，在广州成立了29家大大小小的电影制片公司，摄制了30多部故事片、艺术片。随着粤剧艺人从影，粤语片和粤剧片也开始兴起。粤剧名艺人薛觉先于1926年在上海拍《浪蝶》，后又在广州组成非非公司拍粤语片，主演《白金龙》。至30年代，从影的艺人更多，在穂、港二地，曾摄制一批粤语片及粤剧片，不少具有地方特色，为观众所青味，对于粤剧革新也起了推动作用。据香港电影史专家余慕云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至1986年，仅香港一地就出产过963部粤剧电影。（9】从形式上分，还有纪录片、舞台片、歌唱片、故事片、折子戏片、杂锦片六大类。珠三角人在近代中国电影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胡蝶、阮玲玉等著名电影演员都是珠三角人。紧跟潮流、多姿多彩是粤剧电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这个特点在广州的电影事业发展史上，是一个突出的地方特色。从1946年吴楚帆、白燕、卢敦等主演的第一部粤语片《大地儿女》的公映，到1949年底《珠江泪》的上映，4年间岭南影片177总产量达495部之多，远超过上海同期产片133部的水平，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新中国诞生后，岭南电影界发扬了岭南电影本土味浓的鲜明的地域美学特色，创作出《珠江潮》、《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三家巷》等一部部以浓郁的地方特色为看点的影片。

六、加快近代化进程及华解的贡献

民国伊始，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民间最为人注目的变化，一是从头上剪辫子，一是拆城墙修马路。1912年3月2日的《申报》公布了广东军政府工务局的决议，把拆毁城墙、开展城市建设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实施近代广州第一个大的市政建设工程，推倒禁锢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城墙，拆除13个城门，利用城基修筑新式马路。

1921年广州正式建市，成立市政厅，首任市长孙科继续拆城建路的工程，同时开始了城市近代化市政建设。孙科自小生长在美国，接受了美国大学的教育，对都市规划有专门的研究，并选用了一批年富力强且学有专长的留学生中的著名学者担任市政当局属下局长，为其领导下的市政厅注入了生机活力。尽管当时政权甫建，局势混乱，经费难以筹措，但总算有所进展，得华侨的投资出力，城市呈现出一种新的市容面貌。

拆城建路以及发展市政之风盛极一时，.珠江三角洲的重178要市镇也都有鼎新之气象。1921年11月就任香山县（今中山市）县长的吴铁城主持制定并实施拆城筑路建设计划，至1932年形成城区主干交通通道。与此同时，在珠三角的城镇兴建起大批商业楼房及民居楼房、公园及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电灯、电话也开始出现了。近代化的步伐加快了。

从1929年开始，陈济棠任广东省编遣特派员，又被加委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实际上掌握了广东的军事大权及统治权，直至1936年被蒋介石赶下台，主粤八年。在此期间广东是相对稳定的建设时期，经济发展进入了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陈济棠全力经营广东地盘，重视教育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侨汇、侨资，充分发挥广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制订了保护号省工业的法规和政策，在组织管理制度上也作了一些改良，全省建设取得不少成就。集中在其统治中心的广州地区，新建了一批省营近代企业：将广州的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等处建设为中心商业区：集资兴建一批旅馆、酒家、茶楼、商店、戏院：增设商业网点，活跃市场：大兴广州的市政建设，修筑多条马路，建成广州市区第一条飞跨珠江南北的珠江桥，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办公大楼相继建成，并鼓励华侨投资兴建爱群大酒家等高层建筑和东山西式住宅区：以广州为中心陆续建成纵横省内的17条公路干线和326条支线，完成兴筑多年的粤汉铁路：发展农、林、渔业：重视文化教育，创办了省立勷勤大学、国医学校、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筹办了4所省立专科学校，179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有较大发展。广府地区呈现出一种百业繁荣、目新月异的景象，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以图新求变的风气为特征、以商业化社会的民众为基本群众的广府文化，如鱼得水，仍然不断发展，传统的广府文化至此达到了一种巓峰状态。

在广府近代化进程中，华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广府与海外交流历史悠久，广府人侨居海外古已有之，大量移民则在鸦片战争之后。侨居的原因，主要有经商办实业、战乱与政治避难、打工与务农等。鸦片战争之后，时值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先后发现金矿，美国、加拿大、秘鲁先后兴修铁路，西方国家在广州设馆招工，于是有自备川资或应招出洋的，也有被拐匪引诱、哄骗、绑架，成了“猪仔贸易”掠卖出洋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府是反清起义最为活跃的地区，太平天国失败后，有不少起义农民逃亡海外。因此，这一时期是广州史上移民国外最多的时期。据统计，清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十二年（1846-1873）间，由香港、澳门流人欧美的侨民人数就达32万多人，其中以广府人为多。据20世纪90年代的估计，祖籍粤语系地区的华侨、华人共约700万人。t'°）广州旅外华侨华人约有52万人，其中在美洲约20万人。t"〕华侨分布的地区主要是南洋和北美，原本是西方殖民地或受西方控制的地区，正如陈序经所说：“我们放开眼一看，百余年来，欧洲文化之伸张，遍五大洲，而华侨所居留的地方若不是欧洲180文化的发祥，大都乃是欧洲文化的移植地。”

（'2）华侨在国外艰苦创业，身在异邦，心怀祖国，对祖国的政治民主和繁荣侨乡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振兴民族工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侨对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多方面支持。孙中山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3】华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巨额的经费，许多华侨参加了武装起义，“三二九”起义牺牲的72位烈士中，就有31位华侨，其中祖籍广东的就有29位。

华侨更热心于祖国的投资办企业、兴教育、助公益。华侨在家乡办企业，引进的是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华侨在侨乡开医院、办学校、设立民众图书馆，对沟通海外信息、传播新文化思想起了推动作用。广州的培正、培英、广雅、执信等一批中、小学，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以及中山图书馆的建设，都有赖于华侨的捐助。华侨在商埠特别是集中在广州办商厦、开影剧院、建公用事业（公交、自来水、发电、水陆运输），对开启现代文明，改变侨乡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与观念习俗也有很大影响，给粤语带来了新的词汇、语音外来语因素。

华侨在侨乡社会所起的作用，从各方面影响广府文化的独特风貌。近代广府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较早发生地、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经济文化近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与华侨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

从晚清到抗战前的民国时期是广府文化的成熟期，这一181182时期激变的社会，社会商品化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华侨之推进近代化进程，使广府文化走向成熟。正是在这时期，我们今天加以注目研究的所谓岭南文化（实际上大多时候指的是广府文化）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和表现得到凸显，作为种以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为活力的地域文化，在急剧变化的近现代社会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显示出与时俱进的较之其他地域文化后发居上的优势。在全国的大舞台上，岭南文化原来长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默默无闻或只能充当配角°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是全国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之一：在政治上，是国内政治运动引人注目的地方乃至中心策源地：文化上，以兼容中西、多有创新、充满生机活力的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华夏文化中独树一帜。其地位大为提高，影响力大为增强。这种变化更明显、更集中地反映在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广府文化上。

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载《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蔣建国：《晚清广州经济转型的基本特点》，载《探求》2004年第6期。

〔4〕清道光《南海县志》卷13。

〔5〕清咸丰《顺德县志》卷5。

〔6〕《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一事海关报告汇集》第622页，題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孙中山全集》下卷第76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第1054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版。

〔9〕转引自王建勋《“粤剧电影”风光时》，载《羊城晚报》2005年4月10日。

〔10〕《广东省志华侨志》第14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广州市志华侨志》第23页，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12〕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

〔13〕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转引自新流、木子（华侨对广东地区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载《辛亥革命在广东）第13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3

下

第十一章

粤方言

广东省内流行着数种不同方言，其中粤方言在流行范围之广及使用人数之多上居于首位。粤方言俗称“白话”，文字上通常称为“粤语”，外省人往往称之为“广东话”。将粤语称为广东话，未免以偏概全，却反映了粤方言是广东最重要的方言。.两广地区使用粤方言的人数，20世纪末的统计数字，一说约3400.万人，〔'〕一说7400万人，〔2〕一说约5100万人，加上世界各地使用粤语的华人、华侨约1500至2000万，总计全世界使用粤语人数约有7000万人。

【3）粤方言分布地域很广，在各地有所差异而形成分支。在广州地区流行的粤方言，称为“广州方言”，习称“广府话”、“省城话”、''广州话”。只是属于粤方言的一个分支，不完全等同于粤方言，粤方言与广州方言不能混为一谈。由于广州在粤方言地区的中心地位，故而广州方言成为粤方言的代表方言。粤方言是广府民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187188又是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方言包括七大方言，粤方言属于其中之一。（'）方言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与各方言区的地理环境有关。方言演化的过程，受到移民数量、迁移路线以及文化先进与落后等许多因素的制约，是一个复杂的同化和异化的过程。粤方言的形成，是一个伴随着广府民系形成相应渐变的过程，显示了移民入粤以及与原住民的融合交流过程，反映了人群的离合迁徙、社会活动情况，因而，粤方言中的积淀层面，折射出这种融合的阶段性，可以看成广府民系史的活化石。粤地移民迁徙的频繁复杂，使得粤方言成为一种语言现象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词语较多的方言。

一、粤方言的形成

秦汉以前，广大的南方地区即所谓“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的地方，主要是古越族居住地。古越人使用的古越语，与中原使用的“雅语”是不相通的。《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是见春秋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之人说话像鸟语。清雍正《广东通志》指出：“古称妈舌者，为南蛮、瑶、岐诸种是也。”〔S）秦平南越之前，岭南地区居住的是百越族，使用的是古越语。古越语不属于汉语任何一种方言，与汉语没有亲缘关系。按照古代之交通地理条件，在岭南各地的古越语也会有较大的差别的。

西汉的《说苑善说》记载了一首春秋时代越人为楚人鄂君子皙所唱的越歌，鄂君子哲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6〕可见当时的越语与楚语并不相通。秦兵入粤带来了语言的变化，但是语言不通的情况，直至中古唐宋之际，在岭南的偏远地区仍是如此。《新唐书》记载：“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恬然不怪。”（7）可见，古越语在岭南一直沿用下来，在各地与入粤汉语有不同的接触融合。汉化程度比较大的粤方言中，也留下了古越语的成分。

现代的粤方言中，保留了古台语（古越语）的若干语音以及语词、语法特点。遗留至今的古台语各支语言，在现代属于壮侗语支和苗瑶语支。壮语在地名上有较多古越语的积淀。如地名上以塘、潭1表示水义，以洞表示坪坝，以罗表示田或水田，今广州自云区就有钟落潭、龙洞等地名。以板、古、都、思、番、班等表示村寨。古越人常以舟揖为交通工具，在地名上通用步、：埗、埔、甫等表示津渡码头。如广州地区的增i步、黄埔、凤埔，花都的官禄㘵，深圳的上埗等。一说古壮人分成黑、白、花、黄壮等分支，黑壮古文献上被称为乌蛮或乌浒蛮，便留下带乌字和黑字的地名。今广州有乌石，番禺有乌涌圩，顺德有乌洲等。黄壮活动范围最广，又叫黄族或大良族。“良”为壮语黄色的意思，顺德大良则是黄族居地之意。壮语“大”字表示“地”的意思，岭南有许多以“大”字为首的地名，如大石、大沥。

《淮南子》有平越秦军“一军驻番禺之都”的记载，番189禺是秦入粤之前已有的地名，秦代使用番禺地名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对于这一地名的考释却是众说纷纭。地理学家曾昭璇指出：“古已有谚云：'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整厔'，然不知又何以读番禺也，即因番禺是土语，即古代越人的语音。这两字有它的内容，不是汉语所能包含的。”“按古越语，如由《越绝书》所记古音，'番禺'可译为'咸村'，因古越语音'番'即村，今黎语仍用：'禺'即'盐'或'咸'之意，即广州古代已为盐水或成水到达的村落。”〔a】

粤方言的形成经过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

各种汉语方言的基本前提是采用共同的汉语文字体系，是以北方方言所使用的文字体系为共同的载体，因而在理解和使用汉文字上没有太大的障碍。汉语方言的产生是由历代北方居民向南方迁徙发其端的，因此，方言产生的时问与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南迁时间就有相应的关系。在六大方言中，以吴语最为古老，其次是湘语，其后为号语，然后是闽语，赣、客语的形成最晚。不同时期的移民南下的影响，形成了层次积压的关系，因此，在每种方言内部都可以找到其他方言的某些特征。某种方言在开端时的语态并不与今天完全相同，.也不能生搬硬套西方语言学的谱系树的方法去分析方言的演化。

秦兵人号之前，楚文化对岭南已有交流影响。秦兵入粤先经过楚地，楚人溯源也是来自中原移民，南迁的楚人所用的语言属于华夏族语言，在湖南境内的古楚语后来逐步演化19为古湘语。古楚语、古湘语对岭南的古越族语言有所渗透，只不过这种渗透是极为有限的。

秦兵入粤，政治统治的强势以及秦王朝推行“书同文”语言文字政策的强力，使得成守岭南的秦兵所使用的语言成为日后粤语的先声，粤语在此时发端。

此后，粤语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古代汉语特色。概而言之，粤语在秦代发端之后不断发展变化，但不是独立发展，而是在历代受到北方来的汉语的影响。各种方言保留古汉语的程度不一，中古社会的战乱时期，北方人民南下岭南比入闽更为容易，所以，“粤语在形态上不比闽语古老，它有一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以至任何现代歌曲都可以用粤音演唱。相对而言闽语的形态却要古老得多。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许多用普通话填词的歌曲都无法改用闽音演唱，如勉强唱出，也显得不伦不类。其原因就是福建僻处一隅，地形比较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较少，受北方方言影响相对较少，所以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特色。”（9】

说粤方言保留古代汉语特色较少，是相对于闽方言而言的，作为粤方言自身来说，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汉语影响的积淀层次还是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且为现代的北方方言提供了一些可作对比的古汉语特征。20世纪90年代，有语言学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即粤西的封川话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声母系统，这种现象在广东粤语各种次方言中，是仅有的。“正因为封川话浊音声母是《切韵》以及191《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断：在《切韵》之前大约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中原汉语就已传入封川，并逐渐偏离它原来的发展轨迹而形成一种方言。从今天的封川话，我们可以窥见早期粤语的某些面貌”。t'°）但也有学者不赞同此说，认为封川一带方言的浊塞音声母从系统上看根本不是“古汉语”浊塞音声母，它只表现了“帮”、“端”（清塞音）两声母，“并”、“定”、“群”（古全浊塞音声母）三声母一无所见。而且浊音的类型（当是缩气音）与汉语浊音亦迥别。论其为僅侗语的遗留尚有些可信，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声母系统”，至少是对古汉语的语音系统缺少应有的了解。更何况这一现象遍见于整个粤西地区，何以言“仅有”？（''）

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西江走廊无疑是中原文化传入的主要途径之一。持前论者因此还推论出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一带一今西江中部，魏晋南北朝时期“粤语形成自己的语言特点，成为一定范围内流通的方言之后，就拒绝继续接受北方汉语的同化，而按照自己的轨迹继续发展”的结论。t'21此说同样也值得斟酌。

魏晋南北朝以后，粤语仍然在接受各种外来语言的影响，并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而丰富发展，唐宋时代才是粤语自立门户”的时期。t''）因此，秦兵入粤为古粤语开端时，在秦人影响所至的地区使用的是源自秦时北方语言的古粤语，当时作为秦平南越后的政治、军事中心的番禺，也应当流行这种语言。人晋以后直至唐宋，北人入粤的重点地区是192粤中，特别是唐代大庾岭通道的拓展，使北人入岭的路线从自西至东转变为以自北而南为主，粤西地区对外界的交往减少，其语言受后来入粤的北语的影响也就少了。受北语南来新的影响，粤中地区粤语的变化更大些，西江中游的粤语则更多地保留了古粤语语言特征。粤西地区的方言中，保留的古汉语主要还是唐宋时期的古汉语。因此，不能以今见粤西粤语存在更多古音去反证秦汉时代的移民大都在西江中部落脚。有人提出“封开是广州话最早的发源地”（'】，姑不论此说法对“广州话”的定义是否准确，人入唐以后，珠三角人口的流动变化之大，是西江流域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在西江流域较多保留了唐以前的粤方言并不奇怪，显然不能因此就得出封开是“广州话”的发源地的结论。按此推论方式，岂不是可以将保存古汉语特征更多一些的南方说成古汉语的发源地？

叶春生推断“秦始皇在征服百粤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就派了50万人到西江中部驻戍，使中原汉语首先得以在西江中部传播，然后向东扩展，逐渐成为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并以东汉扬雄编的《方言》一书中收入了至今尚流传的广州方言“睇”字为依据，说明当时粤方言已经形成。（'S〕入粤秦兵50万之数已属夸大，说入粤秦兵都驻戍在西江中部，更属无稽。关于《方言》一书，林语堂曾根据《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合考证汉代方言可分为12个区域，其中并未提及岭南或南越。（'6）《方言》提供的材料以秦晋为最多，在语义的解释上也最细，说明作者对以西汉首193

都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比较熟悉。而《方言》提及的使用方言词的区域或地点共68处，最南面只到南楚。南楚在五岭以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以汉初的衡山、九江及江南之豫章、长沙一带为南楚，相当于今安徽中南部、江西全境、湖南湘资流域及湖北东部地区。《说文》收入“睇”字，释为“目小视也”。屈原《楚辞九歌山鬼》有“既含睇兮又宜笑”之句，说明战国时楚人就使用这一字。因此，不能以《方言》提及至今为粤语所使用的“睇”字就证明当时粤语已经形成。现代有以“古汉语中的某方言词”作为研究命题，这是颠倒本末，应当说是“某方言中保留的古汉语词汇”。

粤方言源自北方古汉语而终于演化成为一支在粤地流行的方言，成为一种既有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又与中原汉语有较为完整的语音对应规律的方言，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语言交流融合与调适。粤方言在唐代日趋成熱，发展到宋代，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去不远。唐宋的中原人感觉到粤方言与北方方言明显差异，说明粤方言已经分化成为一支重要的方言，自立门户。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岭南呼村市为墟。”“墟”正是现代粤语用词。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岭南方言，说到“至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问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时'，晚曰'晡时'，以竹器盛饭如箧曰'箪'，以瓦瓶盛水曰'罂'，相交曰'契交'，自称曰'寒贱'，长于我称之曰'老兄'，少于我称之194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姪'，呼至少者曰'孙'，泛呼孩提曰'细子'，谓慵惰为'不事产业'，谓人仇记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穷'，贫困无力曰'力匮'，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杀'，泊舟曰'埋船头'，离岸曰'皮船头'，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脚胫犬曰'大虫脚'。若此之类，亦云雅矣。余又尝令译者以《礼部韵》按交趾语，字字有异，唯'花'字不须译，又谓北'为'朔'”。t'7）周去非所举的方言例子，不少在现代的粤语中还存在，读音“字字有异，唯'花'字不须译”的情况，大体也与今同。这正证明粤方言在宋代已经基本形成，并与北方方言有了明显差异。

二、粤方言的定型及分布

粤方言在宋代以后继续发展，与同时继续发展的北方方言的差异越来越大。从明清以来《广东通志》及各府县地方志书记载的方言情况看，明代以后的粤语，与现代与语已大体相同。

明嘉靖《广东通志》载：“谣俗之中又有三者：有方言，有方音，有俗字。广人谓父曰，爹'曰'爸'，母曰妈'曰'阿姐'。呼兄捜辄以'亚'先之，亦曰阿°儿女安（按）排行亦先以亚（原按：如行二曰'亚二，行三曰'亚三'之类）。游乐曰'则剧'。问何如曰点样°诘人日'蔑地'。无曰.'毛'。移近曰'埋'。呼儿曰195'仔'。其不检者曰'散仔'。斥男女之贱者男曰'獠'，女曰'夫娘'。水津曰'步'，村市曰'虚'。甚至以物形状，如子弟汰而不晓事者曰'大头虾'。若增城东话谓屋曰窜'，东莞南头谓刀曰'多'。此类皆方音也。……两广谓：岩峒曰'冚'，亦'龙友'，两山之间也。顺德谓石梗曰：'，盖取谐声。番禺、从化谓地之宽平者曰''，音。则文无所取义，此俗字也。”【'°）这里指出粤语的方言特点，体现在词汇、语音和俗字上，举例与现代粤语基本相同。还注意到广州与周边地域的粤语方言有所区别，与现代粤语的情况也是相同的。

明人袁子让《字学元元》“方语呼音之谬”说：“粤音以'人'为'寅'，以'银'为'壬'，此'喻'、'日'互混也。”明人方以智《通雅》说：“广人呼'啼'为台'。”清人方本恭《等子述》说：“粤人以'双'为松'，亦以'松'为'双'，是呼'江摄'如'通摄'，'通摄'如'江摄'也。”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载：“粤俗呼泥腿日'滥仔'……呼使女曰'美仔'（按即妹仔'），呼十岁内男女曰'腮门仔'（按即'细纹仔'）……粤人呼荸荠日'马蹄'”。

可见从明代起，粤语与现代粤语已区别不大，从而认定粤语从明代起就基本定型了。说粤方言定型，并不是说它从此就不再变化了。作为社会交流工具的粤语，还会与时俱进发生变化，如吸收西方词汇，产生新事物的词汇，语音接受普通话影响向共同语靠拢等。但总的变化已经不大，而且这196种变化也是遵循自身的语言发展规律进行的。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述：“乡去省会仅五十里，语相若而音乃顿殊。城清以急，乡重而迟。土籍操乡音。侨籍多操城音，或仍其故土音，久之亦习乡音。土籍亦有嫌乡音之近浊，变而从城音者。”（'9）这种变化可以代表粤语方言区的一种变化趋势。

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各种方言在社会交流中都是相互影响、渗透和借用的，从而使方言分布的语言景观随之发生扩散而趋于复杂化。一般地说，在各种方言中总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方言占流动的高势能的。广州方言区边沿地区的粤语，逐渐向广州话靠拢。例如在增城，约有80%的人讲粤语，20%的人讲客家话，原县城（今荔城镇）内讲粤语，北部山区盛行客家话。但即使在粤语占优势的荔城镇，通用的粤语也混杂有客家话词语，如“落水”（下雨）、“鸡春”（鸡蛋），也有个别闽南语渗入增城粤语，如地豆”（花生）。中老年人所操的粤语，保留有较多的客家话因素，与广州话有一定的距离，被称为老派增城话。青年人所讲的粤语与广州话已逐渐靠拢，丧失了原来与客家话相似的某些特点。

在广东的三大方言中，粤语比客家话、潮汕话的影响要强大一些。粤北韶关地近通行客家话的贛南，原来通用客家话。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政府搬到韶关，省直机关的官员及随迁的各界人员中不少人讲粤语，粤语在韶关也流行起来。东江流域的深圳地区原来以讲客家话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急速增加，一方面普通话流行，另一方面受到香港197和广州的影响，讲广州话的人也多起来。在广东一些闽南语地区，出现了从单一方言向双方言过渡的现象。如汕尾市建市后，大批讲粤语的居民到来，当地人也以讲粤语为时尚，竟相效法。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使用粤语讨价还价及交际，当地人讲土话也夹杂生硬的“好嘢”、“唔该”（劳驾）、“利是”（红包）之类的粤语词汇。现时当地人几乎百分之百能听懂粤语，很多人能讲带浓重闽南口音的粤语。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对外开放的海岸、华侨众多以及日比邻港澳），广东最早接触、解读和传播西方语言。鸦片战争以后，有一种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常用的蹩脚的贸易语言，流行于中国沿海地区两百年之久，称为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Pid9inEn91ish），初时称之为“广东番话”、“广东英语”，这是广州及其附近一带的中国人叫出来的。西洋人则将之译为CantonEn91ish，起初称为CantonJar-9on或BrokenEn91ish。

实际上，英国的对华贸易开始于1637年，此前中英语言未有过接触，英国人只能依靠在澳门懂中国话的葡萄牙人或者懂葡萄牙语的中国人才能做生意。数十年以后，随着中英贸易的增大，中国洋泾浜英语才应运而生。葡萄牙人比英国人早到中国近百年，在产生洋泾浜英语之前就有了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出现，后来才为洋泾浜英语所取代，因此在洋泾浜英语中留下了一些讹变的葡萄牙语词，最早的广东番话是一种英语、葡萄牙语与汉语的混合物。

19世纪初，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为代表的一批人198从编辑中英对照词典以及语法书人手培养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人才，与此同时，洋泾浜英语的使用更扩大了范围。清同治元年（1862），任职于上海外国洋行的中国第一代买办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人唐廷枢，由于任职外国洋行的广东籍买办常向他请教，应接不暇，为此，唐氏兄弟编写了一本《英译集全》，用广州话与英语单词对译和注音，其中第6卷是专门为广东籍商人、买办使用的《买办问答》，颇受商界欢迎。据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所见，在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出售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把'外国话'创化为一种当地的语言”。

“它首先提到的是'夷'（Yun），下面是夷人'（barbarian）的释义，用另一个中文字'曼'表示man'的发音。在许多单音字之后，是双音节的词。如今日'（to-day）在解释外文意义之后，用两个其他的中文字'土地'来拼to-day的音。直至整句话也还是这样，由此语言的结构便被奇怪地改写。这本小册子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但它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该书的著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t2°）《买办问答》采用的正是这种形式。

吸收外来词汇使粤方言词汇成分更加丰富多彩，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变化，更有生机活力。粤语中在一些来自英语的词汇，如“士多”（小店）、“的士”（出租汽车）、“士的”（拐杖）等等。时至现代，广州人在吸收外来语言上仍有一些十分“大胆”的举动。广州市内公厕外壁上大多标有英文“w.c.”字样，在英语语言环境中，“W.C.”是类似199中文“茅房”、“茅厕”的粗俗说法，令初到广州的英国人觉得不雅。广州市内公共汽车前、后门分别喷有英文Up和Down，以表示前门上车，后门下车。但这两个英文词的正规用法翻译起来是“朝上”和“倒置”，从这种夹生英语中似乎可以追溯到洋泾浜英语的影子，而广州人并不在乎这种不中不洋的笑话，而是坦然以“实用”为宗旨，说明了这个城市的市井式语言开放。同时，英语词汇中有一些词则是由广州方言转化而来的，如1aichee（荔枝）、kun9fu（武术，由广州方言的“功夫”转化）、timsum（点心）。许多人以为是由英语typhoon转译而来的“台风”一词，其实是由广州方言的“大风”一词“出口转内销”的语词。

粤方言在成熟与定型之后，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在一定的生活区域内维持着其语言圈子，不仅依托珠江三角洲在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地位优势而保持其使用范围并不断扩大其影响，而且，在海外，由于广东人是晚清出洋移民的主体，在北美、南洋都形成讲广府方言的华人聚居区，至今百余年而延续不变。

广东境内使用粤方言的地区分布在粤中、粤北和粤西南地区，按其差异大致分为广府片、四邑片、高廉片（或称高阳片）、罗广片（或称勾漏片）：

广府片在粤.中、粤北，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深圳、云浮等市以及肇庆、珠海、清远、韶关四市的一部分，香港、澳门也在此语言区域内：

四邑片在粤中，主要分布在江门和珠海的斗门区：21）

罗广片在粤西北，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清远两市的大部分地区：

高廉片在粤西，主要分布在阳江、茂名、湛江三市。

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分别有所表现，最主要是表现在语音方面。语音不同是不同方言之间进行交际的主要障碍，也是划分不同方言的主要标准。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粤方言的各方言点、片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也都有一些差异，尤其在语音上的差别更大一些。狭义的广州话是指流行于广州市区（现辖越秀、荔湾、海珠、白云、天河、黄埔、花都、番禺、萝岗、南沙十区）的号方言。其实，就是在广州市区的十区中，语音也存在差别。广州过去老市区的话一般以荔湾区的西关话为代表，西关指广州旧时西城墙（今人民路）以西一带的居民聚居区，中心地带在今上、下九路和第十甫一带街道。这可能是由于西关地区居民较为集中、稳定，而且较为市井化。近年来随着居民的迁徙流动和语言交流的加大，西关话和市区其他各区的广州话已渐趋一致。深圳地区的粤语由语音特点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中中路白话以西乡话为代表，与广州话较接近，有8个声韵（广州话有9个声韵），但即使是同一方言片中，仍然能分辨出不同语调、语气，西乡民间有此形象说法：“南头妖（声柔），固戍娆（声嗲），西乡硬条条（声洪）”。

-离广州市中心较远的原市郊地区（如自云区的人和、龙归镇）的语音与老市区的语音有许多不同，保存了更早期的201广州语音。同属天河区的村与村之问也有差异，连讲话的尾音都有区别，民谣云：“车破哦，棠下喳，元岗、石牌、冼村耶。”沿着车破、棠下、沙河三条涌两岸的村落，发音分别相似，与河涌似有关系。车破与龙洞两村位于天河区南北两端，中间还相隔有许多山林台地，此两村同在车陂涌畔，乡音相同。旧时乡村以水路为交通途径，沿水路上下村落的人们便形成共同的乡音。

由于各地粤方言存在差异，也由于广州地区在岭南特别是在广东省的中心地位，因此，在对外交际以及将整个粤方言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时，广府片的广州语音成为粤方言标准音，广州话成为粤方言的代表方言。

三、广州话的语音体系

广州话的语音体系与普通话不同。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有21个辅音声母（此外还有以元音开头的零声母）、39个韵母、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有20个声母（包括零声母）、59个韵母、11个声调（上阴平、阴上、阴去、上阴人、下阴平、下阴人、阳平、阳上、阳去、阳人、新人）。声母、韵母和声调都不相同，差别最大的显然是声调。

历代语音发展变化中，声调的调值变化最快，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声调已没有人声，而在先秦至东汉的中原汉语声调202中不但有人声，还分长人和短人。南北朝至宋代这一时期，长人转为去声，短人转为人声。元代以后，不再有人声，原来的人声分别转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2'）而在现代与方言中还保留了入声，这就使一些古代押人声韵的诗词用粤方言读起来显得很顺口。例如柳宗元《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中的“绝”、“灭”、“雪”原来都是押入声韵的字，用普通话读却分别成了阳平【ju6】、去声【mie】和上声【xu3】。用粤方言读与用吴方言读仍然都押入声韵，字音短促，把寒冬江上大雪、渔翁独自垂钓的孤寂意境充分表现出来了。这说明吴方言与粤方言都是保留了较多古汉语成分，不仅音调上，而且在声母、韵母上也都保留了不少中古时代的汉语语音。杜甫的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目，恨别鸟惊心。

津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用广州话朗读此诗比普通话更押韵。“深”、“心”、“金”、“簪”广州话同韵，普通话却不同韵了。

在一些方言中，文白异读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种方言中，存在着同文不同音（包括音、韵、调）的两个读音系统，同一个字有两种读法：用于读书讲学、诵文吟诗用的“文读”和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土话、白话的“白读”。在吴语、潮州话等方言中，这个特征甚为突出，而在广州话、客家话中就不是很明显。例如，在潮州话中，有张（开张与张开）、丈（丈夫与丈人）、大（庞大与长大）、平（平生与203204

水平）、知（知会与知道）、寒（寒冷与耐寒）、精（精神与妖精）、变（变化与变面）、二（第二与二人）等许多文白异读的字，在广州话和普通话中就不存在文白异读的情况。文白异读是在方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白读系统保存的往往是上古读音，文读系统则是唐以后的读音。这也许可以作为吴方言、闽方言的形成与定型早于广州方言和客家方言的一个证明。

四、广州话的词汇特色

广州话的词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其一，是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语词。

这些古语词，有的在现代普通话中已经不用，有的在普通话中虽然还存在，却只用于普通话中已经不用的古义。广州话仍普遍使用的一些单音词，普通话已不再单独使用了。

广州话中保存的古语词，例如：

洓《说文》水部：“小雨零貌，从水束声，所贵切。”落兩洓洓，指小南零零落落的样子。

脢《广韵》灰鈞：“莫杯切，肋骨。”腊肉，指动物背脊两旁的肉。

潲《玉篇》水部：“山教切，臭汁也。”潲水，指洗过米、菜等的水。

拎《广韵》：“郎下切。”《玉篇》：“手悬捻物。”拎，指手拿。

畀《集韵》：“必至切。”《尔雅释诂》：“畀，赐也。”

渠方以智《通雅》：“唐时调人日'渠'，今呼为其'，或坑蛇反。”渠，指第三人称“他”。

焗《广韵》铎韵：“呵各切，熱貌。”

焗，指在锅里干炒或烘干食物。但今写成“屈”，《集韵》物韵：“纡勿切，心所郁积也。”屈气，指心头憋气。

菢《广韵》号韵：“薄报切，鸟伏卵也。”“菢鸡仔”为孵小鸡。

睇《广韵释诂》：“睇，视也。”“睇，”为看。

广州话词汇中保留古义的，例如：

递表示更改而又接续，“递日”、“递时”，改日期、时间。

边不知其属于哪一边，表示不肯定。“边个”是哪个，“边日”是哪天。

执用于具体的动作，“执药”，指配药：“执件衫”，指检衣服。

食普通话用“吃”。

行普通话用“走”。

系普通话用“是”。

除衫普通话“脱衣服”。

广州话中日常使用的单音词：

颈普通话用“脖子”。20S

翼普通话用“翅膀”。

朝普通话用“早上”。衫普通话用“衣服”。

弊普通话用“糟糕”。

悭普通话用“节俭”。

威普通话用“威风”。

其二，有一些语词吸收于古代壮语词。

粤方言中有一些发音与壮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语词，

有可能来源于古壮语词。如：“马蹄”（荸荠）与广西武鸣的壮语音同，古台语的意思是“地下的果子”，从这个词可分析汉代之前岭南一带已有栽培挙荠。“鸡项”是说未下过蛋的母鸡。“掂”，是说触碰。“塔”，是说锁上。

粤方言中有一个兼表语气的副词“添”【tim'】，常与重”搭用以表示数量、程度、范围的扩充，还有表示不满足或遗憾的语气作用，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还”、“而且”等词，其位置却在句末。如说“今日唔出日重落雨添”，“你搞错哂（全部摘错）重怨我添”。这个副词就来自壮语。与方言在形容词之前加“几”【9ei'】表示对该形容词的强调，如说“出戏几好看”，粤方言称一点为“一啲”【di'】，其语源都是壮语。

.号方言中有不少语词与壮语相同或相近，使用时有的自撰方言土字，有的只用于口语，无法在汉语中择出音译语词，只能注以拼音。例如：206【dai3】（蒂）【duk9】（尾部、尽处）.【aak7】（欺骗）【biu'】（喷出）【sai'】（浪费）【kaam'】（复盖）【am1】（恰当）【naam4】（软烂）【me2】（歪）【maau'】（蹲）【1ek1】（能干）【juk'】（动）【1un94hau2】（漱口）【dun96keiS】（竖放）其三，同一事物粤地语词与普通话不同。

有的与其他方言相同或相近，反映出粤方言的演变：有的是粤地的特定环境产生的语词，反映出粤人的生活特点与心态。如广州地处亚热带，不见结冰下雪，广州人冰雪不分，将冰箱称为“雪柜”，冰棍称为“雪条”。广州人日常吃的是大米，将粮票称为“米票”，粮店称为“米铺”。广州人从商者众，为图发财吉利，避忌晦气，故将“猪舌（与蚀'同音）”改称“猪利”，“猪肝（与'干'同音，水干即财源断）”改称“猪润”，又把此处的“利”字添上月”旁、“润”字改成“月”旁，真可谓煞费苦心。把丝（与'输'谐音）瓜”称为“胜瓜”，将“黄（人死称为'黄'）瓜”称为“青瓜”。又如将“猪血”改为“猪红”。广州人饮食习惯喜欢用慢火“煲粥”，时间越长越好，电话普及之后，又有“煲电话粥”的传神俗语。广州人习惯喝汤，以“饮头啖汤”形象地比喻既勇于开拓先行，又因领先得益。改革开放之初即出现的“跳槽”、“炒更”、“炒友”之类流行词，则反映了新的社会现象。

这类有地方特色的词语如：

由香港、澳门传入的语词如：

阻街

阻碍公众交通。

卧底初指打入匪帮内部的侦探，后泛指打入对方内部的侦探。人蛇偷渡者。

大耳窿放高利贷者。

阻差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

其五，丰富多彩的惯用语。

惯用语通常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以及一些熟语。粤方言拥有丰富多彩的惯用语，反映岭南的自然条件及民风民俗和思维方式，有的直接体现了粤方言的语言特点，在熟语和歇后语中表现得较为生动有特色。

熟语如：执死鸡（意外收获）、游车河（坐丰兜风）、卖猪仔（原指卖身到国外当劳工，引用为受出卖上当）、发钱寒（梦想发財）、摆乌龙（不动脑筋把事情办错、搞混）、车大炮（讲大话）、卖大包（卖人情）、无口齿（说话不算数）、老衬（占人家便宜）、摱车边（搭顺风丰）、吊沙煲（失业）、执手尾（收拾残局）、豆沙喉（说话或唱戏一种沙哑的声音）、有分数（心中有主意）、箩底橙（比喻拣剩的次货）、大头虾（指做事粗心的人）、残鸡婆（蛮不讲理的妇女）、大碌藕（指乱花钱的人）、失魂鱼（冒失鬼）、猪头骨（指难办的事）、斯文淡定（文质彬影，镇定从容）、一头雾水（比喻摸不着头脑）、倒泻箩蟹（形容慌乱，狼狈不堪的样子）、人细鬼大（年纪小而鬼点子多）、乱呃廿四（胡说八道）、画公仔画出肠（比喻说话过于表露，不含蓄）。

有的歇后语利用了谐音，或特指本地的事物，方言特色更浓厚。

如：门扇底烧炮仗——见声''唔'见影：生虫拐技靠，，害'（不）住：电灯胆——唔通气：甩头笔——唔写（舍）得：一三五七九一无双（谐音“伤”）：教师住搬屋——执书（认输）：年三十卖花——合时：风刮芫茜——垂（衰）到贴地：条条水都咸——津津有味：沙湾灯笼——何府（何姓为沙湾大姓，“府”谐音“苦”）：老婆担遮（打伞）——阴公（“公”谐音“功”，“阴功”指遭遇凄惨）：粉牌字——唔啱就抹：细佬哥过年——望利是：大马站过小马站一相差不远：忽必烈一吞金灭宋（广州话“餸”是来，与宋谐音，此歇后语指厨师克扣菜金，中饱私囊）：豉油捞饭一整色整水（捣鬼）：猪红蒸豆腐一黑白分明：酒楼例汤一整定：白糖炒苦瓜一同甘共苦：鱼片常一一一：滚就熟（指见面熟）。

五、广州话的语法特点

广州话与普通话相比有其特殊的语法结构，但与流行于岭南的客家方言、潮汕方言在语法上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广东各地方言在语法特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与这几种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中分化出来，都流行于南方，都与南方原有民族语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相关。粤方言在各类虚、实词用法上有些特点，在副词使用方言字上，表现出与普通话不同的文字来源。以下这几种情况较为突出。

特异的名词前后缀。将“阿”字前组于亲属称谓及人名，以表示亲切、熟悉，如阿爸、阿哥、阿莲、阿杰。将仔”字后缀于事物名及人称，如：狗仔、雀仔、BB仔、姨仔、歌仔、乖仔、精仔（聪明，有心计的人）、肚仔、打工仔。加于后缀的还有“佬”、“婆”、“公”、“女”、“妹”、“哥”、“鬼”、“精”、“虫”、“猫”、“野”等等，如：泥水佬（泥瓦匠）、鬼佬、大只佬（大块头）、麻甩佬（淫贱鬼）、捞佬（说北方话的人）、傻佬，八卦婆（好管闲事的女人）、肥婆、煮饭婆、癫婆（女精神病人），咸湿公（下流鬼）、伯爷公（老头）、大声公，靓女、衰女（坏女孩，现多作昵称）、臊虾女（女婴）、飞女.（女阿飞流氓），发廊妹、鬼妹（外国少女）、打工妹、唯食妹（馋嘴女孩），新郎哥、细佬哥、后生哥，阴湿鬼（阴险的人）、大头鬼、孤寒鬼（吝啬鬼），马騮精（猴精，通常说好动的人）、葫芦精，鼻涕虫、蛀米虫（好吃懒做者），污糟猫（肮脏的人）、赖猫（耍赖的人），老嘢（对老人不敬的称呼）、死野（死人，现多作呢称）、衰野（坏人，现多作昵称）。其中有褒贬鲜明的，也有并不表示好恶的习惯用法。

人称代词复数的特殊表示方法。不用单数人称代词加们”字表示复数，而是用“单数人称代词+'哋'字”的格式表示复数。古代汉语人称代词没有单复数词的区别，而采用“人称代词+'等'字”的格式表示复数。粤语似为此格式之遗风。

特殊的数词用法。略去基数一，如“一千五百斤”说千五斤”，“一百三十”说“百三”，“一碟菜”说“碟菜”。略去低位数，如“六百三十”说“六百三”，“一万五千元”说“万五蚊（元）”。

惯用的方言量词。如一眼（口）针、一箍（捆）柴、啖（口）汤、一揸（把）菜、一单（宗）生意。还有称人民币的货币单位为十蚊鸡（元）、五毫子（角）、三分钱，而角二分称“毫二子”。普通话的上位数与下位数之间的

213“来”、“把”、“多”，粤方言可加“零”表示，如五斤零（多）重、百零（把）人或“一百人度”（约一百人）、二十零（来）斤。.

-以“量+名”组合省略指示代词。如：“条鱼好大”（这条鱼很大）、“畀啲水我”（给我一点水）、“将碗药倒鬼咗”（把那碗药给倒了）。

特殊的情状副词。用“过头”、“得滞”后缀表示过甚。如“蠢过头”、“急得滞”。用“翻”后缀表示“再……一点”，如“等呢阵雨细翻先出门”（等这阵雨小一点才出门）。用“理”表示“连……也”，如“食理我呢份”（连我这一份也吃完它）。用“哂”表示程度的彻底，如“多谢哂”（太感谢了）、“睇哂”（看完）、“唔见哂”（全部不见了）。用“添”表示扩充、加重语气，如“讲错话重唔认错添”（讲错话还不肯认错）、“佢重系个博士添”（他还是一个博士呢）。用“紧”、“开”表示正在进行，如“食紧饭”（我正在吃饭）、“来紧”（正来着）、“坐开呢张凳”（正坐在这张凳上）、“做开功课”（正在做功课）。用“咗”表示完成时，如“去咗天津”（去了天津）、“老师入咗来”（老师进来了）、“小李落咗去”（小李下去了）。用“亲”表示已然，如“我琴晚冻亲”（我昨晚受凉了）、“只脚扭亲”（脚扭伤了）、“食亲就呕”（一吃就呕吐）、“我细佬打亲针就喊”（我弟弟一打针就哭）。用“形容词或动词+极……都”表示“再……也”，如“积极性高极都有限”（积极性再高也有限）、“天气冻极都系咁-”（天气再冷也只是这样214了）、“讲极都唔明”（再怎么说也不明白）。

位置倒装的状语。“先”、“多”、“少”等状语常放在述语之后。如“你食先”（你先吃）、“冲凉先”（先洗课）、买多n的”（多买一点）、“做少啲功夫都唔得”（少做点工作都不行）。

特殊的句式。比较句，用“形容词+过”作比较，如我肥过你”（我比你胖）、“你比我好过多声”（你比我要好得多）、“租屋抵过买屋住”（租房子住比买房子住合算）。处置句，不用普通话常用的“把”字式，如“卖咗呢啲旧书”（把这些旧书卖了）。双宾句，将人的宾语放在句末，如“大佬送咗支笔渠”（大哥送给他一支笔）。

上述略举各个方面的例子，说明粤语是一种在语音、词1汇、语法上都有自身特点的方責，保存了越族的语言底蕴和不同层次的历史语言积淀，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量的方言字。粤语令初到粤境者有如闻鸟语，一头雾水的感觉，学起来有较大的难度，语言的隔阂，也使粤人社会形成一定的封闭性。

六、.粤方言的走向

粤方言在走向成熟丰富的同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体系越来越大的差距，使得粤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不仅不可能同化，而且成为广东人学普通话的严重障碍。在北方还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的谣谚。这对南215北社会文化交流也带来一定的障碍。明代南海人霍韬颇有文才，但在朝任职时，就曾以自己口音为“南音”之故，力辞经筵侍讲之重任。

历代中央政权多有致力于在岭南推广共同语。清雍正皇帝曾于雍正六年（1728）愉示《愉闽广正乡音》，谕曰：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除奏履历之时，惟有广东、福建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当时籍之人，经户部演礼之后，其敷奏时，对场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論、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但语言自幼习成，聚难改易，必真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广东、福建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多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说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于通晓矣。”t22〕

雍正的谕示，对闽、粤各地官方推广共同语起了督导作用，对以仕途为业的读书人影响较大，但在民间之作用是有限的，南北语言障碍依然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粤地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统一工作，要求在政府机关及公众场合使用普通话，老师上课一律以普通话教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各界民众经常要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学习“伟大领袖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不自觉地起了大规模强化推广普通话的作用，使大部分广州人听懂了普通216话。广州的机关讲普通话蔚成风气，不少机关干部是由外地调人或军队转业，本地籍官员也带头推广普通话。顺德籍人、原广州市长黎子流，曾得到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的嘉奖。民间流传有不少关于他学说普通话的笑谈，最典型的是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郊区越美丽”听起来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娇妻越美丽”。这种善意的戏i虐，一方面凸现出这位有“卜佬（方言，对农民的蔑称或戏称）市长”之称的市长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推广普通话虽然很努力，而纠正发音却颇为艰难的调侃。

粤语使广府人见面有倍感亲切的“自己人”的感觉，却使外来人与广府人多了一层隔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外地入穂者感到对讲粤语的广州人难以沟通，不近人情。在东山湖公园的竹子上，有外地游人刻上：“语言不通如居国外，心情寂寞到此一游。”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如今在广州，普通话不仅绝大多数人听得懂，而且大多数人能讲。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外来人口成为广州新居民，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査统计表明，广州的流动人口数为广州常住人口数之半。珠江三角洲一些市镇，外来流动人口数目甚大，如东莞外来人口为本地人口六倍。在这些地区使用语言情况，出现了以下现象。

一方面是民间采用双语制。如广州的出租车司机中有不少是刚到广州谋生的外省人，操的是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广州人打的一听司机是外地口音的，大都能改口讲普通217话，也有依然讲广州话让司机边猜边学方言的。在肉菜市场买卖双方以双语讨价还价更是随处可见。改革开放大潮中，全国各地到广东做生意的、广东到外地务商的人数大增，商业来往，也是对广东人推广普通话的一种推动。广府人为了把生意做出去，开始使用咸淡交织的语言与四方商客打交道，以至在舞台上颂颂出现代表生意人身份的广式普通话，几乎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顾客是外省人，保姆是外省人，老板是外省人，打工仔是外省人，这就逼着双向学语。

另一方面，是官方、公共服务行业极力推广普通话。2003年9月，广东省政府确定了推进公务员讲普通话的三个试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要求公务员100%讲普通话。同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更通过一项提议：政府投入推广普通话：“普通话2003年”大型普通话推广活动也在香港开幕，为期两个多月，旨在将推广普通话的信息带到社会各阶层。近几年，香港公务员、学者的普通话水平进步可谓神速。推动香港人推广普通话的动力，除了因为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加强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内地游客成为香港旅游消费市场的主要对象，顾客就是上帝，上帝的语言当然要懂得。种种迹象表明，推广普通话在岭南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粤方言并没有在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中呈现出弱化的势头或走向沉寂，在广州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还有一种语言发展的方向就是粤方言的扩张。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粤218语在与这一地区的其他方言的碰撞中保持一种扩张的强势，例如中山市是属于粤方言地区，而中山沙溪乡居民讲的隆都话属于闽方言，是粤方言区的闽方言岛。但隆都话的许多词语已采用了接近粤方言的读音，是一种粤语化的闽方言。粤语的扩张还表现在更大的范围。在广东一些本来使用闽方言、客方言的地区渐而成为双语并用，甚至粤方言渐而成为主要方言：在外省（包括在上海），曾出现学习粤语的时尚，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一度出现了办粤语学习班的热潮，广州本地多数居民虽然能听懂和使用普通话，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场所却坚持着讲广州话，外地的年轻人流人广州后不需多长时间就能够用不咸不淡的广州话与广州人交谈。在远至粤-西的电白县，各种方言纷繁多彩，讲“白话”（当地人称粤方言为白话）的先民徙入电白比客家人还要迟，被当地人叫做“客话”，称讲白话为“讲客”。全县讲白话的约占总人口的9%，传统上讲闽方言约占65%，而现今粤方言也渐而挤占了主体地位，成为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交往的共同语言。20世纪90年代，电白县讲“白话”的居民人数虽然不多，但该方言已成为电白人约定俗成的交际、工作语言。该县在推广普通话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就现实情况看，除了学校使用普通话教学外，日常交际中普通话几乎没有地位。机关、工厂、农场、商店、广播、电视大多讲白话。当地各处的白话语音不尽相同，而现在许多人以会讲广州话、懂唱广州方言歌曲为荣。

广州话扩张的态势十分明显。有新闻媒介将粤方言的这219种扩张力与沪语作了对比，指出广州与上海两地在语言环境方面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却出现了“沪语告急粤语长红”的局面。并分析广东人从不把自己的东西丢掉，相反，把外来的东西化为己有，外为粤用，又用得不留痕迹，而上海话似乎难以做到这一点。t2：）这个现象也许还可以说明两地在民风差别上更多的问题。

粤方言扩张的动力有诸多因素，最主要的是经济动力。21世纪的一本畅销书说到：“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粤语有多好听：人们争相吃海鲜，并不是因为海鲜有多么好吃。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和广东，让他们成了全国人民羡慕的'首富之区'，在'嫌贫爱富'的人类孽根文化传统的驱使下，人们开始变得盲目欣赏和崇拜。”（24】海鲜好不好吃当因人而异，粤方言不见得有多好听，而且不好学，应当是事实。之所以有争相学粤语的现象出现，真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先富起来。

粤方言是一种强势方言，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广州和香港是粤方言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中心。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腾飞的强势，在商业来往、开办企业上推进了粤语的交流。改革开放之初，招商引资的对象主要是操粤语的港商，以娱乐消遣为主旨的香港电视剧在内地青少年中收视率甚高，粤语歌曲尤其是香港歌星演唱的粤语歌曲流行甚广，这些因素使得在青少年中以会讲几句粤语为时髦，随之，什么“麻麻n的”、“有毋搞错”、“买单”、“搞掂”、“生猛”、“大件事”、“大排档”、“炒鱿鱼”、“有型”、“靓女”、220“叻仔”、“好爽”、“打的”、“劲歌金曲”之类的粤语方言，居然混用于普通话中而流入北方人的日常口语中，不觉得生硬，反而觉得传神。2005年修订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入了2000多个新词，其中收入的粤语词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个。“买（理）单、花心、入围、生猛、煲电活粥、爆满、炒鱿鱼”等词源自粤语方言，仅房地产用语就有“按揭、楼宇、楼盘、楼花、置业、物业、写字楼、烂尾（楼）”等，反映了强势经济区域的语言有强势影响力。

对于粤方言扩大影响的走向，有研究者予以甚高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有人预言：“在未来的10年内，粤语作为广东省第一大方言（以前称省城话）和香港居民的主要生活语言，它的社会地位将不断提高，向心力也不断增强，对潮汕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影响也将继续.扩大。如按此势头发展下去估计在10年至15年内，汕头市将成为双方言区。而且，粤语有可能成为主要的交际方言，从而使潮汕话变成一种离心方言，再过几十年之后，被粤方言取而代之。这些话不是耸人听闻，故作惊人之态，而是有韶关市、惠州市和汕尾市的现实印证的。”（通）拙作《潮汕文化概说》对此提出异议并陈述理由：“一种方言体系的形成和延续有其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因，广东的三大方言中，粤方言、潮州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存在和延续都有上述因素综合构成的原因。另一方面，韶关、惠州、汕尾是混合方言区，本来就部分存在粤方言或近粤方言的地方方言，时221至今日，这三个地区的地区方言也没有被粤方言'取而代之'。以韶关地区而言，韶关地区地处'三南（赣南、湘南、闽南）一北（粤北）'之间，语言十分复杂，本地语言主要影响来自江西，粤方言流行于韶关市，是由于历史上与商在此地经商活动，加上抗战时期省会北迁等因素造成，但今之韶关，普通话十分流行，城市中同时能操三种语言的居多，乡下则方言占主要，在整个韶关地区，72%是讲客家方言，讲粤方言的占15%。C261所以对这些地区流行粤方言的原因和状况要作具体分析。”（2'】

深圳龙岗区原属宝安县，原住民主要使用客家话，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外来人口移入深圳，至90年代末，外来人口为本地人口六倍。外来人通用的主要是普通话，这样，在龙岗地区公共场所使用的是普通话，而本地居民之问通用的仍是客家话。值得注意的是现时当地居民基本都能听懂粤语。深圳市原住民中约有17万人讲粤语，20万人讲客家话，现在客家居民中的中年与青少年人大都学会了讲号语，杂居粤方言地区村落的客家人有“弃客用自”的趋势，如因修筑水库迁居的西乡径贝、麻布西村的客家人，他们的第三代大都不讲客家话而改讲白话了。从全国备地迁入深圳的新移民的语言也受到粤方言很大的冲击，在他们交际语言中不难听到“买单”、“有毋搞错”、“唔该”等典型的粤方言词汇。他们中的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都在学讲粤语，有的已经讲得非常流利了。深圳境内粤方言地区土生土长的中年、青少年，也逐步放弃“本地话”而学讲粤方言的代表222语一广州话。除了与粤语地区交流增多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普遍收看香港电视，使当地人熟悉了粤语。

粤语生命力旺盛的原因，除了粤语深深植根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根源，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适应性之外，粤方言中心区经济上的强势、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使用粤语的普遍，也是重要的原因。几十年之后，这一带讲客家话的可能越来越少，但是使用粤语的情况却不会减弱，因为产生粤语语言强势的因素仍在起作用。而且，为了争取观众，广州与佛山等地乃至广东的诸多电视台、广播电台节目采用了粤语颂道（有不少是将普通话电视剧节目翻译为粤语）。

总之，今后一个时期，普通话在粤方言区的推广和普及固然是主要的趋势，另一方面，粤语的流通和扩张则仍然是一种事实。以学校教育而言，教育部1990年就已要求城镇以上中小学必须使用普通话教学，但是直至2003年，广州市内尚有17%的中小学普通话教学未达标。（2°】在广州市一些地区法庭上，法官、原告、被告统统讲粤语，让外省专程来采访的记者“像个傻瓜一样，坐了一个上午，一句都没有听.懂”。t”1粤语自身在相对稳定中也会产生演变，然而，粤方言是除了北方方言之外的我国最大的强势方言，在粤地推广普通话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在较长的时间内，粤语与普通话在粤地双语并存，仍将显示出其作为地域文化主要特征的重要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在全国一些地区的方言快速衰微的今天，已有有识之士呼吁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方言。方言是一种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其特223殊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了方言，就是保证了语言的丰富多彩和生活的丰富性：就是保护了地域人之问的亲切感：就是保护了口头传承的语言历史，也就是保护了文化、保护了以方言为载体的地域历史和地域文化。”〔3°〕

注释：〔1〕《广东省志方言志》第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第19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力认为“汉语的方言现在可以分成八区”，与周振鹤七分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国方言再分为国北和画南方言两种。（见王力：《现代汉语》第6页，上海教育出版杜1979年版）

〔5〕转引白道光《广东通志》卷92《與地略十》。

〔6〕刘向：《说苑善说》。

〔7〕《新唐书》卷168《柳宗元列传》。

〔8〕曾昭璇：《岭南中史地与民俗》第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罗康宁：《封川话浊塞音声母初探》，载（岭南文史）1996年第四期。

〔11〕据暨南大学伍巍教授审读本章书稿的书面意见整理。

〔12〕陈乃良：《封中史话》第78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13〕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1【中原传入古汉语，广信传播成粤语一封开是广州话最初的发224源地》，载《羊城晚报》2004年7月18日。

〔15〕叶春生：《广府民俗》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转引自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方言》。

〔18〕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一》。

〔19〕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0《风土志》。

〔20〕【美】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据王力《汉语语音史》第525页（三）（声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2〕雍正《的画广正乡音》碑，此碑立于深圳南头古城旧新安县行门前。〔23〕《方言告急？》，载《羊城晚报》2005年2月5日。

〔24〕海默：《中国城市批判》第4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5〕林伦伦：《汕头话受与语的影响及其趋向》，载《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22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此数据为原韶关大学民俗研究所曾祥委副教授提供。

〔27〕陈泽泓：《潮汕文化概说》第19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8〕《广东有过半农村用方言上课一粤东、粤西情况尤其突出，广州市内尚有17%中小学普通话教学未达标》，载（羊城晚报》2004年4月23日。

〔29〕《老广说“官话”不再脸红了》，载（羊城晚报）2m年9月22日。

〔30〕毛海涛：《防止历史文化内涵缺失一尽快制定保护汉语方言政策》，载《人民政协报》2004年8月30日。

225第十二章粤剧

1. 粤剧沿革

粤剧是用粤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又称广东大戏或广府大戏，是岭南四大地方剧种（粤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粤剧是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凝聚海外华人方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粤剧的形成时间，有明万历说、清雍正说及清咸丰说等说法，无非是取其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而言，故而各执一说。其实，一个成熱的独具风格的地方剧种，不宜说其形成于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或某一段时问，而是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要经过众人的努力和相当时间的演变才臻形成。

岭南戏曲溯源甚远。早在春秋时期已有表演艺术，而且有专业的表演者。《楚辞》中也有既唱又226演的描写。汉代，中原艺苑中已有一种具有戏曲表演性质的艺术形式一百戏，集民间歌舞、音乐、杂技、武术之大成，是我国戏曲之摇篮。这种艺术形式也传入了岭南。1997年从南越国御苑考古发现的瓦上陶文戳记中，有“官伎”字样，，（'〕说明南越国宫中曾蓄养着一批专为皇宫演出的百戏艺人。唐代，南海太守蓄养有家庭戏班，经常在宴会上演出散乐以助兴。番禺地方习俗，中元节时集百戏于开元寺，官民一起观看。广州城北的楼船将军庙，每年都“作鱼龙百戏，共相睹戏，箫鼓管弦之声达昼夜”。（2）南汉时期，宫中“置东西两教坊，伶官千余人，常令昼夜出入宫中”。（3）戏曲甚盛。后主刘时，宫中演戏的情景是“瑶林畔千灯接昼，宝山前百戏联宵”。〔'〕北宋末年，形成于渐、闽的南戏以及元代兴起的北杂剧先后传入了广东。元末，有专业的歌舞戏曲女艺人，聚居于广州市的城南濠畔一带，人数众多，而且来自东南沿海地区，构成“朱楼十里映杨柳，帘税上下开户牖。闽姫越女颜如玉，蛮歌野曲声咿哑”的城市风景线。

（S）明中叶，昆山、弋阳腔由“外江班”传入广东。戏曲为粤中各地民间所喜闻乐见，城乡演戏蔚然成风，以至封建卫道的官吏豪绅严申禁令。成化年间，新会知县丁积因“乡俗子弟多不守常业，唯事戏剧度日”，责令乡老纠之和官府罪之。〔6）成书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佛山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告诫后人：“七月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于大体。”（71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魏校于正德十六年（1521）发布《愉民227文》称：“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8）

粤剧的萌芽和兴起在明末清初。戏剧成为大众娱乐之重要方式，至明中叶已势不可挡，终于相沿成俗。嘉靖《广东通志》记载节俗，称：“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谚云正灯二戏'”。【9）在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广州、佛山等地，各地客商云集，神诞节日各省戏班到来演戏之俗更盛，受此影响，本地戏班也开始组建，成为粤剧之发源。嘉靖年间，在佛山大基尾建立戏行会馆，称琼花会馆，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琼花宫，是本地戏班艺伶教习场所。（'°）万历十八年（1590），在广州太平门外，城西十八甫也建成琼花会馆。（''）可见这一时期在广佛一带的本地戏班数量已相当可观。这个时期本地戏班的声腔，主要是俗称为高腔的弋阳腔和昆腔。至清初，本地戏班又称为“广腔班”，说明弋阳腔已起了广东化的变化。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广东商业更趋繁荣，为满足客商娱乐之需，有成百个“外江班”入粤，主要来自江西、湖南、安徽和姑苏等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广州成立了粤省外江梨园会馆。“外江班”带进了板腔体的剧目，本地戏班所用的声腔在乾隆时也起了变化，过渡到梆子腔为主。道光年间，本地戏班向“外江班”学习了一些皮黄戏，二黄的吸收，使广腔向皮黄戏转化，广东人称“梆黄戏”。梆子高亢激越，二黄柔和温婉，广腔从梆子为主到梆黄并重，到后来二黄重于梆子，逐步形成粤剧的鲜明地方风格。梆黄腔的使用，标志着粤剧孕育成长于本22地并进入成熟阶段。

粤剧深受粤人所喜爱。一年四季各种神诞节日乡民“结彩演剧”，“演剧凡一月乃毕”：“琼花会馆俱泊戏船，每逢天贶，各班集众酬神谢恩，或三四班会同唱演，或七八班合演不等，极甚兴1i同”。（'21清代竹枝词记述看戏的盛况：“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晩沙。但到年年天照节，万人围住看琼花。”（'3】清广东举人杨懋建记述了道光十一年（1831）前的广州剧坛：“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所演故事，类多不可究诘，言既无文，事尤不经。又每日爆竹烟火，埃尘障天，城市比屋，回禄可虞。贤宰官视民如伤，久申厉禁区，故仅许赴乡村搬演。鸣金吹角，目眩耳聋。然其服饰豪侈，每登场金翠迷离，如七宝楼台，令人不可逼视，虽京师歌楼，无其华靡。……本地班近西班。”（'41当时的本地戏班，戏剧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外出演出乘红船（故而演出入员称为“红船子弟”），服饰布景豪侈，唱腔接近“西班”（梆子、乱弹为主），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咸丰初年，广腔班的活动已远涉重洋，粤剧戏班在旧金山华工聚居地演出。1852年10月18日名叫“鸿福堂”（译音）的粤剧戏班在旧金山的剧院首次登场上演。当年年底在唐人街建起了自己的剧场。在东南亚演出更频繁，咸丰七年（1857）广府戏班艺人在新加坡成立行业组织“梨园堂”（1890年改称“八和会馆”）。

粤剧在形成过程中，有过“本地班”、“广腔班”、“锣229鼓大戏”、“广府戏”、“广东大戏”等称法，至光绪末年始有“粤剧”之称。

粤剧的挫折和复兴在晩清、民初时期。咸丰四年（1854），粤剧戏班名伶李文茂率领红船子弟，与天地会陈开所部一同在佛山、广州及西江流域一带起义反清。红船健儿编为三军，穿戴衣冠戏服，作战中运用粤剧表演翻跟斗的技术。义军占领佛山后，曾以琼花会馆为大本营。起义失败后，佛山琼花会馆被毁，清政府禁粤剧，捕杀大批粤剧艺人。幸存的粤剧艺人或过洋，或客串“外江班”演出。

粤剧艺人兰桂、华保向十三行富商伍紫垣借用河南（广州海珠区）峡溪的花园，暗里招收童子班传艺，培养出武生邝新华、花旦姣婆梅、小武崩牙启、小生师爷伦、丑脚生鬼保等，成为中兴粤剧的主要人物。此后禁令稍弛，本地戏班乘机再起。同治七年（1868）本地戏班在广州建成吉庆公所。同治六年（1867）在广州刻印的《寒宫取笑》是现存见到最早的粤剧剧本（只有唱词没有曲牌）。光绪年间粤剧剧本的出版多起来，并已注有曲牌。

复兴后的粤剧更加壮大，取代了外江戏在广州城内的地位，而且能进入两广总督官署的“上房”演唱。同治、光绪年间，本地戏班“逐日演戏，皆有整本。整本者，全本也，其情事联串，足演一日之长。”并且出现“村市演唱，万目共瞻”的盛况。t'S）光绪初年，广州一地的粤剧戏班恢复到36个。光绪十五年（1889），八和会馆在广州黄沙落成，本地班再度建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会馆初期实行行长制，首任230行长用新华。会馆内设慎和、兆和、合和、福和、新和、永和、德和、普和等八堂口。八和会馆成为全省粤剧行业的首脑机构和艺人集中地，标志着粤剧活动中心从佛山转移到了广州。

这个时期的粤剧有了新的变化，角色分为十大行当（武生、正生、小生、小武、正旦、花旦、公脚、总生、净和丑），声腔已形成以梆子、二黄为主的格局，剧目有动作紧凑、武打描彩的正本戏，粤调文静的出头戏（折子戏）以及柔和委婉的文人戏，使粤剧既有热情如火，亦有缠绵悱恻的兼容特色。

粤剧在清末民初空前繁荣，新剧渐多，名优辈出。一些文人也参加戏曲创作，如梁启超之案头剧本《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苏曼殊之案头剧本《班定远平西域》等。《班定远平西域》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剧中还引用了英文及日文。

从光绪年间至清末，在广州先后建成河南、广庆、海珠、乐善、南关等戏院，粤剧戏班逐渐由戏棚、神庙戏台、农村广场转人戏院演出。从此，在广州城内戏班由受聘演出转为卖票营业，经营戏班演出的班主应运而生，其后又出现了经营戏班生意的公司。班主和公司老板出于商业利益，投合城市观众的口味，并适应戏院演出需要，要求戏班增大文戏比重，新编更多的华丽奇巧的言情剧，突出生旦戏，出现了以编撰剧本为业的开戏师爷，结束了粤剧戏班没有专业编剧的历史。唱腔音乐注重板腔的灵活变化和吸收民问曲调入231戏。省港大班只重武生、小武、小生、花旦和丑5行，其他行当逐渐成为次要的行当。由于演文戏的比重大，小武出台常兼文戏，出现了文武生这个新的行当。

辛亥革命前后近20年间，广州出现了粤剧改良运动。许多粤剧艺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邝新华、靓仙、金山佳等许多粤剧艺人成为兴中会、同盟会成员，有的还参与武装起义并捐躯。陈少白、李纪堂等革命党人在广州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创办天演公司（后称采南歌剧团），编演新戏，通过改良粤剧宣传民主革命主张，是为“志士班”之先声。此后出现了黄鲁逸等创办的“优天影”、陈铁军等创办的“振天声”等30多个“志士班”。关注社会生活与灌输反清意识的改良新戏（又称“文明戏”）大行其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许多粤剧艺人直接投身革命。改良新戏表现面广阔、形式灵活、生活味浓，由于内容需要，剧中吸收了小曲、说唱体（南音、粤讴、龙舟），采用方言俗语，给其他粤剧大班带来新的影响。粤剧舞台上，以广州方言取代戏棚官话道白日益普遍，进行了用平喉（真嗓）取代子喉（假嗓）唱曲的尝试，发展了唱功戏，使粤剧进一步迈向地方化。粤剧乐队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伴奏体制，增加了伴奏乐器，并开始引入西洋乐器。“志士班”涌现了千里驹等一大批红伶，还培养了后来成为名伶的靓荣、朱次伯，金山炳、白驹荣、郑群可、陈非依以及粤乐大师吕文成。20世纪20～40年代以粤剧省港大班为主导的改革，是粤剧的鼎盛时期，也是粤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232期创作的剧目达四五千个。著名演员有被称为“粤剧四大家”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表现手法多姿多彩，出现了“五大流派”：“万能老倌”薛觉先创韵味悠长的“薛腔”：名丑生马师曾创诙谐灵动的“马腔”，又称乞儿喉”、“柠檬腔”：“小生王”白驹荣创“白腔”：能编能演的丑生廖侠怀创“廖腔”：“金牌子武”桂扬创“桂腔”。

粤剧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急剧的多方面的变革。一方面，由于与美国电影竞争观众，翻新出奇，争妍斗丽，号剧的题材、说白、唱腔、乐器、布景都在追求变革。另一方面，受殖民地文化影响，加之戏班老板追求高额利润，演员追求高额酬金，商业化倾向日益显著。题材包括古今中外，新编剧目数以千计。戏班演员由行当制改为台柱制，每班设六大台柱：文生、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帮花旦、丑生。六柱制走向极端，发展到文武生和正印花旦常常脱离剧情和人物大唱冗长的主题曲，助长了重唱功轻表演的风气。表演艺术吸取京剧的武打和做派，也借鉴话剧、电影手法，大量搬用新奇怪异的东西来填补新戏。夏威夷草裙舞、西洋格斗、空中飞人、空箱换人等都搬上舞台，还有演员在前面唱，拉小提琴的跟在后面满台转的新花样。不少粤剧演员兼电影演员，薛觉先、马师曾更是“伶影两栖”。舞台语言基本上由戏棚官话改为广州白话，唱腔音乐更加变化灵活，旋律优美，平喉唱法风靡粤剧剧坛，但也出现了新曲调使用过滥、唱腔过于杂芜的情况。乐器增加了小提琴、萨克斯管等西洋233乐器。舞台美术借鉴电影，甚至发展到以布景、大幕上加一则瞩目的商品广告。服装追求金碧辉煌，侈言摩登，渐流诡杂。

抗日战争时期，粤剧艺人在全民抗战的热情鼓舞下，萌发爱国救亡意识，薛觉先领衔觉先剧团演出新戏《貂螂一》，马师曾领导的太平剧团演出《卫国弃家仇》、《洪承畴》、《汉奸的结果》。然而，抗战胜利后，粤剧滥编滥演的倾向日趋严重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粤剧开始了“改戏、改人、改制”的工作，废除旧的班主制，演出了新编粤剧《九件衣》、《白毛女》、《愁龙苦风两翻身》、《刘永福》等。同时，粤剧的商业化”、“买办化”受到批评，并进行了戏改工作。1953年摒弃了有碍传统表演的六柱制，对传统表演艺术进行挖掘抢救，广东粤剧团1956年赴京演出，由马师曾、红线女、新珠、李翠芳等演出《搜书院》、《秦香蓮》、《单刀会》、《夜送寒衣》，集中展现了戏改成果。

梅兰芳高度评价《搜书院》“是气象一新的民族传统艺术”。周恩来总理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座谈会上说到：“粤剧也是受了批评以后奋斗出来的。”还说：“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6）周恩来为广东粤剧团题词：“批判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创造性地发展地方戏曲音乐，使祖国的文化艺术放出新的光彩。”粤剧表演艺术有了整体提高，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成名的表演艺术家白驹荣、新珠、曾三多、马师曾、薛觉先、靓少佳、罗品超、文觉非、吕玉郎、郎筠玉、234红线女、楚岫云、陆云飞、小飞红等的表演艺术都有新的创新发展。青年演员罗家宝、林小群、陈笑风、陈小茶、谭天亮等崭露头角。创作和演出了《关汉卿》、《刘胡兰》、《山乡风云》一批艺术质量较高的好戏。红线女的“红腔”开始成熟，罗家宝的“虾腔”、陈笑风的“风腔”唱腔风格开始形成。

但是，具有特殊的宣传效应的戏剧在建国后的政治风云中本来就属于首当其冲的文化种类，大量产生新剧的粤剧更不例外。1951年新编历史剧《刘永福》被扣上“歪曲历史真实”，“污蔑了我们今天伟大正义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政治帽子。1952年改编传统剧《三春审父》被认为是一个全性护封建的剧本”。1953年改编传统剧《山东响马》以“保护资本主义”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粤剧移植革命样板戏，剧改竟然要求“要非驴非马，非京非粤”：移植京剧的唱腔、情节、唱词、念白、服装布景，不能有丝毫改动，凡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曲词一律改用普通话。粤剧学校复课后，传统程式不能学，梆子、二黄等声腔不能教，只能学唱样板戏，粤剧日益调残。1972年5月，周恩来陪同束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观看粤剧移植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时说：“我看粤剧还是姓'粤'好，应该发挥粤剧的长处，可以吸收马师曾等前辈的唱腔，不要搞'非驴非马'，这样会脱离群众的。”

（'7）文化大革命”以后，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并重的剧目政策得到确认，粤剧舞台上活跃着关国华、郑培

235英、卢秋萍、林锦萍、倪惠英、冯刚毅、彭炽权、丁凡、曹秀琴、曾慧、王凡石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演员。

二、粤剧特点

粤剧具有自身的特色，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两点。

一是大胆地吸纳变革。

粤剧形成于明末清初，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产生的背景是繁华的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商业和行会会馆娱乐、娱神之需要，受到商业化的利益驱动，又置身于激烈的行业竟争。粤剧的受体是处中西方文化激烈交流碰拉的广府地区的民众，特别是从流动下乡的红船帮、草台班变为在大戏院演出，又有机会出洋演出，接触外部世界与西方文化。所有这些，都使粤剧体现出一种商业性、开放性与平民性，不囿于传统模式，勇于改革，而且能够大胆接纳各种新的艺术因素，不拘一格地进行各种变革的尝试，“吸西方文明之风气，扇南国俊雅之精神”。

粤剧以商业为动力进行变革，显著的例子是《白金龙》的上演。1930年，华侨实业家简照南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推出白金龙香畑的牌子，选择粤剧为广告手段，薛觉先主演由美国电影《郡主与侍者》改编的粤剧《白金龙》。《白金龙》以中国传统理念演绎追求男女个性解放的主题，在艺术上刻意加以发挥。薛觉先扮男主角白金龙，出身名门，文武双全，为追求所爱姑娘，不惜假扮下人、酒吧歌236女、

卖唱乞丐，只身深入险境，克敌制胜。戏中采用不少新腔、新调、新唱法，有北派武打，有魔术、催眠术，又加插交谊舞、野人舞、単人舞、杨枝舞，乐器首次使用电吉他伴!、、，道具使用吕宋畑、电话、朱古力等，布景有豪华的欧化居室、野营夜景，令人耳目一新。演出时，舞台大幕上绣着观白金龙名剧，吸白金龙香烟”，台下免费派发自金龙香烟。演出轰动省港澳，持续一年，常常满座。既扩大了与剧影响，也使白金龙香烟风行于世。

20世纪30～40年代间，号剧史上翻开了重要一页一“薛（觉先）马（师曾）争雄”。薛觉先的觉先剧团以广州为基地（日军侵占广州后转到香港），马师曾的太平剧团以香港为大本营，展开激烈的艺术竞争。薛马二人在戏路、风格、艺术修养和成就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满粤剧现状，力图变革创新戏路。薛觉先宣称“融会南北戏剧之精华，综合中西音乐而制曲”，“不独欲合与北剧为一家，尤欲综中西剧为全体，截长补短，去粕存精，使吾国戏剧成为世界公共之戏剧，使吾国艺术成为世界最高之艺术。”（'a）马师曾则指出：“近年以来，中外的交通多么便利，生活的变迁多么大。我们的伶人依然死守着什么场口步式的成法，什么靶子演唱的老例，纯粹用图案做脊椎，决不能站起来自称艺术，在此电影戏和舞台戏竟争激烈当中，哪有不一败涂地道理呢？”他主张：“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放着胆子，打倒千百年的老例。”【'9i以博纳变革求生存的动机，使粤剧具有不拘一格变革不已的237活力。

粤剧唱腔多样，由本地班融会了外江班的声腔，逐渐以高亢激越的梆子腔演唱为主，还加上广府民间曲调，以广州方言俗语入戏。至道光后期，又吸收了徽班柔和温婉的二黄腔，以及西皮腔。粤剧唱腔广泛运用南音、粤讴、木鱼、龙舟、咸水歌、梵曲等，还新创了不少别致小曲（粤剧同人称为“生圣人”），使粤剧唱腔兼具懐慨激昂和哀怨悲叹之能，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粤剧舞台追求新奇。采用各种声光电化的手段，以“服饰豪侈”、“金翠迷离”诱人。1899年在港澳上演《水浸金山》时就曾以真水配景。民初上演《血战榴花塔》，把火车模型搬上舞台。上演《唐宫结梦》时，杨贵妃与安禄山梦会，竟加插电影片段。粤剧班到上海演出《黛玉葬花》时，名旦李雪芳刚在台上坐下，座椅立即光芒四射，把女主角映衬得如仙如圣，台下一片赞叹之声，原来是座椅上装置了小电灯。1932年胜地寿年剧团把上海京剧连台本《封神榜》改编为粤剧《龙虎渡姜公》演出，开机关布景之先河。20世纪40年代靓少佳的胜寿年剧团在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演出《穆桂英》时，弄穿舞台地板，竖起一根会旋转的、闪内发光的“降龙木”，大幕一启，令全场观众喝彩。演出《薛蛟斩狐》时，狐狸精吐出狐珠时，天幕下无数珠子滚动，凝成一颗五光十色的明珠，令台下掌声雷动。

粤剧剧目百花齐放。清代道光年间在广州就出现了第一间营业性质的“庆春园”戏院。民国之后，还出现了有新式238旋转舞台装置、男女合座的太平戏院等。粤剧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一个组成部分。为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新鲜感，也为了跟上时代的变化，粤剧在改编传统剧、历史剧、连台戏、外国戏、时装剧、民间掌故戏上兼收并蓄，累计剧目数以万计，新中国上演的就有一千多部。民国时期，新编革命时装戏有《太平天国》、《云南起义师》、《温生才》、《怒碎党人碑》等，改编世界名著有《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半磅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改编电影名片有《璇宫艳史》、《贼王子》、《复活》、《野寺情僧》、《无敌王孙》、《野花香》、《深瓯梦里人》等。仅从这些剧目就可以看到粤剧在取材方面的广泛与大胆。就其数量与表现面之广阔，是我国其他地方剧种所不能比拟的。

粤剧音乐唱腔丰富，不仅包括梆子、二黄等基本声腔，兼有高腔、昆腔及民间说唱、小曲杂调，对各种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省小调、外国民歌乃至电影主题曲等都兼收并蓄。乐器中西兼容，既有民族乐器古乐合奏，又有西乐和奏。民国时期采用大提琴、小提琴、萨克斯管、曼陀林、木琴、小号、吉他等整套西洋乐器。新中国的粤剧乐队，乐器以包括二弦、竹壳提琴、喉管、木鱼、沙的、高边锣、单打等特色乐器在内的民乐为主，又保留了小提琴、萨克斯管等西洋乐器。

粤剧是一个只有300多年历史的新兴民间剧种，却极具生命力，是公认的全国可塑性、包容性最强的地方剧种之一，也是演出市场最活跃的剧种之一，在海内外有广泛、牢、239固的群众基础，其影响和传播扩及全国和海外。

二是积极地贴近时代。

粤剧演员原来生活于社会下层，接触广而联系众，加上所演出的内容追求与民众共鸣，故而有一种关心国计民生以及关心和投身政治的热忱，使粤剧体现出革命性、写实性与时代精神。清代李文茂是怀着“为民抱愤，为国伤心”之情揭竿而起。同治粤剧中兴，八和会馆成立，演出包罗全班人马的《六国大封相》，帅旗上鲜明地写着“饮水思源，切勿忘本”字样，忠告全行业艺人必须团结一致，永葆粤剧青春，内含联合大众，团结精诚以打倒专制暴君之意。粤剧在省港班兴起时期，其题材不少是致力于启迪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道德情操的，也有不少是与时事政治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前后，粤剧编演的《温生才打孚琦》、《秋瑾》、《幸亥革命党人碑》、《徐锡麟行刺恩铭》等都取材于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对观众有极大的震撼力。名伶为演好戏主动深入生活，如薛觉先为了演好以名妓白玫瑰含冤昭雪为题材的《毒玫瑰》一剧中的律师角色，专门到法院旁听，细心揣摩律师出庭神态，演出效果逼真。

广东作为辛亥革命之策源地，戏剧的革命性和时代精神，较之北方更为突出。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指出：“民族革命之领导，人皆知为孙中山国父。民族革命之鼓吹，人皆知为国民党中兴会诸先烈曁清末报界文化界诸名宿。民族革命思想之传播，则人罕知为戏剧界，尤其是粤剧界诸先：t，10

达之特奏殊功。”（'n）大批粤剧艺人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有的利用戏班来往于穂港及南洋各地巡回演出的机会，为革命运送武器、传送消息，有的散发传单、为起义筹饷。1908年，振天声班到新加坡演出，宣传革命，适逢孙中山到那里为革命筹款，对演出大加赞赏，在晚晴园会见全体演员，未入同盟会的演员即席加入了同盟会。省港大罢工中，号剧团体有共产党人刘尔崧领导的“工人剧社”、苏兆征领导的乐乐乐剧社”，编演了《工人封相》、《段祺瑞败走绝龙岭》等剧目。《蔡松坡云南起义》直接配合了当时的北伐战争。在广州起义中优伶工会的粤剧艺人在中共党员太叔率领下参加了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的战斗。抗日战争时期粤剧艺人本着粤剧应该上火线”的信念，组织抗战剧团、粤剧救亡服务团、戏剧宣传团等在前线后方进行抗日宣传，编演了《爱国是侬夫》、《卫国弃家仇》、《汉奸的结果》等剧目。

广州解放初，1949年12月即演出以反封建为题材的粤剧《九件衣》，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粤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1950年演出粤剧《自毛女》，评论界认为是“粤剧史上的大革命”。粤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传统剧、改编历史剧、现代剧三并重的政策，其中以改编历史剧质量较高，而反映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数量剧增，几乎每个时期都有配合政治需要制作的剧目，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到每个时期的政治气候影响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政治化，表演艺术大多简单組糙，这对粤剧的发展显然带来不利。

上述两个特点集中地反映了粤剧的最突出的善变多变的241242

特征。在大胆的吸纳变革的背景下，粤剧中有不少优秀剧作受到观众的赞赏，如以《红楼梦》改编的《情僧偷到潇湘馆》就创下粤剧连续上演300多场的记录。《搜书院》受到戏剧家欧阳予倩高度评价：“标志着粤剧改革的新气象。”t2'】

但是粤剧同时也存在浓厚的都市化和商业化的倾向。虽然创作甚丰，大受欢迎，却不免有流于低级和追求噱头的不健康情调。为猎奇取宠，节目中有随意杜撰的《花街藏节妇》、《甘地会西施》之类的荒诞剧目。舞台上在古代花园里挂电灯。早在民国时期，麦啸霞在《广东戏剧史略》中既肯定了“广东戏剧在短期间的突飞猛进是可惊异的”，同时，又指出“它大体上仍不免流于低级趣味与传统因袭之未能完全捐除”。（22）1928年，戏曲大师梅兰芳访粤演出，抽空观看了粤剧，对粤剧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针对当时粤剧为吸引观众而流行的“机关”布置，他说：“我演《天女散花》、《上元夫人》等剧时，某些场面为演得逼真，借助于幻术，本来无可厚非，但仍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贵省的粤剧演出，动不动就摘'机关'布置，讨好观众，实在令人喷饭!而有些粤剧内容淫靡，置社会公益于不顾，太不应该!”【2'】真乃肺腑之言。1933年的广州市戏剧影画歌曲审査委员会审査了广州市32个粤剧团的264个剧目，修改后准演的45个、禁演的23个，禁演的主要理由是：导人迷信，做作神怪：内容有涉淫荡，表演淫亵，有伤风化等。

1952年10月文化部主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批评粤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染上商业化、买办化的恶劣风气”，认为粤剧在音乐上是有创造的，在粤剧舞台艺术上也有不少勇敢的革新，但它的整个艺术倾向有极不健全的地方，剧本创作粗制滥造，追求离奇的情节，每个剧中都要凑足六个主角同时登场，并不适当地以奇异服装相炫耀。这一切不但不是艺术，而且恰恰是破坏艺术。粤剧艺人中有不少有天才的、富有爱国心的，他们应当起来彻底改变这种恶劣风气，而建立一种真正适合于人民需要和艺术发展的新的健全的风气。”〔24〕报告对“每个剧中都要凑足六个主角同时登场”的批评，由于对六柱制行当体制的改革而得到解决，而对粤剧表演艺术中其他一些不足之处，受到大环境的制约，解决起来的难度就要大得多了。

三、粤剧走向

粤剧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长达20年的现代戏、样板戏独占舞台的状态，得到恢复发展。但是新时期的粤剧面临着种种矛盾和问题。按照《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的记载，其问题是：“剧目创作和艺术革新的步伐未能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要，剧团和队伍的数量过度发展，又面临日益增多的娱乐品种的激烈竞争，使得粤剧的上座率下降。”【2S1《广州市志文化志》还加上一条原因：“新一代演员的总体素质不够理想，演员队伍女多男少，导致演出质量下243降。”t26）

戏剧的不景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时代变化，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娱乐要求不同是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粤剧的上座率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广州市的戏剧（主要是粤剧）1979年演出1700多场，平均上座率为97%。1982年演出1700多场，平均上座率下降为67%。许多年轻人不喜欢看粤剧，据调査统计，平均1000个粤剧观众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不到10%。1983年以后，粤剧开始出现淡风，观众严重流失，剧团经济十分困难，演出场次大幅度减少。以广州粤剧团为例，演出粤剧场数1981年为1314场、1986年降至277场，1990年仅演出258场，其实在市区演出的只有112场。同年广东粤剧院也只演出262场，其中在市区演出的只有106场。即使如此少的演出场次，平均上座率也只有六成左右。许多粤剧表演团体无法在大中城市进行经常性的营业演出，只好赶“春班”、“秋班”至粤西等地去演农村广场戏。面对这一情况，粤剧行内外都有人发出“粤剧危机”的慨叹。1983年老演员：観少佳在病重中对粤剧观众的流失甚为焦虑，念念不忘的是粤剧要收复失地”。广州粤剧团团长倪惠英说：“广州市几百万人口，我们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广州的铁杆观众只有两三千。”（27】这个数字，无疑是太少了。

针对粤剧滑坡，粤剧界和文化部门极力采取一些对策和措施努力振兴粤剧。1984年广东省艺术节举办了红线女独唱会并演出了几部粤剧。广州市政府增大粤剧的经费，1992年成立广州振兴粤剧基金会，市长黎子流亲任会长并到港澳和24珠三角一带为基金会筹集基金，主持在1998年12月建成以展览厅、小剧场为主体的红线女艺术中心，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培训粤剧人才。市文化局统筹与市演出公司、广州粤剧团联合主办“粤剧黄金演出周”。与剧团从“修内功”做起，加强体制改革，精简人员，缩减开支，实行院、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演员聘任制：加强剧目创作，并对舞台表演、唱腔音乐家、伴奏乐器的配置、舞台美术等多方面进行改革。通过电视、广播、音像制品等方式传播粤剧，举办群众性的粤剧唱腔演唱比赛、粤曲卡拉0K演唱比赛、.粤曲私伙局”竞赛等活动以及支持茶楼酒家开设粤剧、粤曲茶座，推广粤剧、粤曲。199o年起，四年一度在广州举办羊城国际粤剧节”，并举办粤剧研讨会。在广东省委作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复兴粤剧的问题得到重视。

2003年6月，在佛山建成中国内地首家粤剧博物馆，馆藏文物2万件。由广东粤剧院与省粤剧学校组建的广东粤剧艺术大剧院在佛山落户。同年10月“华光师傅诞”，在广州修复了“八和会馆”。会馆重修揭幕时，举行了号剧大巡游，荔湾区40多个私伙局加入巡游队伍亮相。馆内陈列名特照片，供奉田、窦祖师牌位。2004年在商家赞助下的“中国移动之大学生走进剧场'”活动，举办10场粤剧《花月影》演出，组织上万名大学生以每人收取票价1元进入剧院观看演出，从观看演出的大学生中还选出50名贫困学生给予每人1000元的资助。2004年在佛山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京花与剧艺术节。2004年11月在广州举行第四届羊城国际粤剧节，24S

粤剧有近百支粤剧团队从海外归来，显示出粤曲粤乐文化在海外的生命力。由广东省三大粤剧团的青年演员演出了自号多媒体青春粤剧”的《梦惊西游》和英语粤剧《清宫遗恨》，旨在以新鲜吸引青年学生的眼球。所有这些活动，虽然有一时之效应，但却说不上从根本上解决了粤剧在都市剧场的不景气问题。2006年，国家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粤剧榜上有名，这对于粤剧的保护是一种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粤剧的延续发展，还得靠自身的努力。

戏剧的艺术生命力在观众，其能否拥有观众却在于自身的艺术吸引力。粤剧之沉寂，固然有与之竞争的娱乐品种增多，传统戏曲无论是节奏还是表演形式与变化节奏加速的社会不相适应等原因，而就粤剧自身而言，首先是体制上的问题。罗家宝认为粤剧人才匱乏，一是制度的问题，剧团由政府包了，“什么都不用干，也就什么都干不了”：二是政府重视宣传不够：三是上世纪不让儿童进剧场造成了文化断层o（28J

观众的流失，还因为粤剧渐而丧失原有优势特色。对于贴近生活，表现重大社会矛盾和民生关注问题，显然不是现时体制的粤剧所能表现的主题。粤剧原来具兼容创新以满足快节奏的商业社会中城市观众好新猎奇的心态的另一优势，成为寻找出路的突破口。2002年以当红粤剧演员、广州粤剧团团长倪惠英领衔主演的《花月影》在广州的几家大戏院登台演出，当事者意在以之为粤剧改革与振兴粤剧的一个重头戏。该剧的海报上赫然印有“巨大的投资规模，超强的创作246

阵容，融入交响乐、现代舞，以全新方式演绎的最具震憾性的粤剧新作”。投资巨大、创作力量强，不等于戏能吸引人，而“融入交响乐、现代舞”之谓则体现出号剧敢于将别的艺术形式拿来的传统特色。该剧号称“一次对传统号剧的全方位创新”，于一些细微处也可见编导者之苦心经营，扮演女主角杜采薇的倪惠英为了剧中的一段剑舞，请来全国武术套路冠军喻红传艺，演出时用的不是道具的剑，而是一把比赛用的真正的剑。过门不用传统的锣鼓过渡，改为切合人物心境的音乐。有一处还用了流行歌曲《真的好想你》的曲调。故事的情节是虚构清代粤州的一个悲剧。落难女子杜采薇被红船戏班收留成了梨园弟子。青年军官林园生初抵与州与伴宴演出的采薇一见倾心。二人皆因正直得罪了粤州总兵何镇南，何为平息匪患，竟命林园生护送采薇往侍海盗。采薇自杀于途，林园生复命被削职。全剧以红船班在《红船歌》中离开粤州而结束。这部花了不少功夫包装的戏，社会反响是毁誉参半”，据说“可能是步子迈得大了些，一些人接受不了”。业内还有人认为《花月影》投资很大却不像粤剧。而倪惠英的反应是“改革是需要勇气的，是有人骂的，但我们必须改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29）。

最近几年粤剧的革新，粤剧界确实使出了浑身解数。交响乐进入粤剧，演出时把乐池放水做成个荷花池，演出过程在台面放出烟雾，以及加插集体舞蹈的场面，与现代的电影、舞蹈等表演形式相比显得有些效颦而不觉新鲜，缺乏广味”的曲调也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概是受到好：2‘17

菜坞、上影厂将《花木兰》、《宝蓮灯》等传统题材改编成动画片获得成功的启示，红线女策划拍摄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粤剧动画电影片《刁蛮公主憨驸马》，并亲自为剧中女主角配唱配音。改编时，还特意增加了许多趣味性的情节。红线女对记者坦认：“此事是开拓粤剧的一个新路子，说实在的，我心里还不知道行不行。”【：：°）

从形式上看，从剧本到舞美、音乐，革新的力度颇大，在一时的新鲜和热闹之后，难以给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和明显扩大效应，反而有的粤剧观众担心这样改下去，把粤剧好的东西丢掉了。他们举例说，现在不少台词纯粹是向话剧学，听起来十分尴尬：在戏里安排了大量的小曲，甚至把新近的流行歌曲曲调作为音乐：音乐唱腔上改到连唱词都不押韵，不要上下句的规律，破格程度太深。广东粤剧艺术大剧院院长梅晓担心，好的东西丢掉了，新的东西又建立不起来，最怕就是大戏成了面目可憎的“四不像”。她呼吁粤剧改革万变不离其宗，粤剧必须姓“粤”。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是我们的岭南特色，比如广东音乐，这是最大的特色：二是粤剧传统的好的手法。（''〕

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出在改革的力度上，而在于选材上，像《花月影》这样一个远离现实而又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尤其是戏中所演绎的理念，对于青年一代实难引起共鸣，难以明白剧中众伶女排花魁与今天的选美有何区别，更不明白海报上所说的这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是什么意思。《花月影》演绎的本来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样的才2，‘1

子佳人戏的旧框架，策划者认为此戏不同于传统戏剧之处是在剧中看不到道德谴责，而且结局也不是传统戏曲的大团圆，而是一个悲剧”o2）。其实传统戏曲中的《杜十娘》、《孔雀东南飞》何尝不是悲剧？至今为止，似乎还未见到记者采访到大学生对此戏的思想性方面的评价，只是说很好看。不要说大学生没有得到什么思想上的共鸣，更麻烦的是恐怕连策划者也说不清戏的主题想宣扬什么。资深的粤剧名家罗品超对粤剧存在的诸多问题直言不讳，他认为粤剧学校闭关自守、粤剧学校不能出角、粤剧后备军跟不上、粤剧行当不全、生旦戏占主流、次角面临消亡。罗品超还言及广州新排的几部粤剧新戏没有看过，但听人说起，好像感觉还不是那么理想。（：n）粤剧被冷落的情况令红线女、罗家宝说起传艺来居然面有难色。

粤剧是一种有根底有活力的地方剧，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很有观众的，就在知名的粤剧艺术家在与其他艺术品种苦苦争夺大雅之堂的艺术阵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粤剧在今天的市井、农村和国外广府籍华人聚居区仍然很受欢迎。粤剧不仅在农村，在城市的民间（包括广州的西关和已经城市化了的黄埔、芳村、白云区的许多街镇），甚至在都市中心区也有一些“发烧友”。在广州越秀区大新街有广州目前唯一一个青年业余粤剧团，剧团成立于1988年时，团员最大的28岁，最小的13岁。15年来，几乎每年在演出中都获得省、市、区各种戏曲表演的奖项。其成员有个体户、打工仔、经理、医生、教师、司机、公务员，还有大中学249

生，有些是广州人，有些来自顺德、南海、清远等地，一有任务，随呼随到。粤剧在黄埔区一直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黄埔区的喜庆活动少不了请粤剧团演出，而且常常是观众爆满。黄埔区民间组织的粤乐社就有23个。在荔湾区，有40多个私伙局。在越秀公园里，经常有一班老年发烧友聚集唱戏。荔湾区少年宫从1997年起开办粤剧班，第一届招考时门前冷落，至2001年招生，竟有300人报名竞争20个名额。在佛山，据不完全统计，粤曲私伙局多达500个。村村有、镇镇有，队伍越来越大。而且珠江三角洲先富起来的一些家庭在盖起别墅、小楼中，还专门装修了可以随时开局演唱的厅堂，配备了专业级的乐器与锣鼓架，并热情邀请名家上门献艺和点拨。不少家庭音乐厅还有录像录音功能，表演之后，再播实况，自得其乐，而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私伙局的演唱活动并不满足于自我欣赏，已发展到联袂登台，售票经营。粤剧私伙局还有以盈利为目的，为粤剧发烧友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1996年，精于商业经营的香港人在深圳罗湖商业城大原内办起第一家粤曲社，接待香港人到深圳过演戏瘾。至2004年粤曲社已经发展到50多家，经管者以深圳粤剧团的演员为主，从化妆、录像到拍照形成一条龙服务。现时一年接待发烧友达15万人次以上。此可谓一个全国最大的粤曲培训基地。1999年，由24岁的女青年何静韵（笔名“水，冷”）创办的中国首个粤剧网站“水曲冷苑”，是最受欢迎的粤剧网站之一。节目内容有老信专访、名曲赏析、演出动态、粤剧行话趣事等。粤剧界的有识者也为扩大演出250

市场努力做新的尝试。佛山粤剧团编排粤剧《小周后》，除了在打造符合现代审美意识的精品上下足功夫，还意识到，“排了戏，就要生存下去，不能只在友谊剧院这样的地方演出。”因此，将《小周后》编成适合城市大剧场与乡下演出的两个版本，一曲戏两个版本探市场。（34）

粤剧在海外粤籍华人聚居地长期传承，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八和会馆分馆。近年，粤剧更有所扩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线女随广州粤剧团到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演出，所到之处，掀起“红线女热"。在新加坡，有六七个粤剧团在演出。新加坡敦煌剧坊还在佛山万福台演出英语粤剧《白蛇传》、《清宫遗恨》。1992年，在法国成立了广东粤剧社，此后，在英国、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华人成立了粤剧社，欧洲先后成立了20多个粤剧团体，1994年成立了欧洲粤剧研究会联合总会，此后每年由六个成员国轮流主办欧洲粤剧大汇演，还经常与粤地粤剧团体进行交流。粤剧成为海内外华人联谊的重要方式。2002年在广州举办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在中山纪念堂的开幕式上，就上演了大型粤剧串唱。

这些情况说明，珠三角的广大地区仍然是粤剧的流行区域，粤剧仍然有着为数不少的观众和发烧友，并且以其民族的、传统的风貌在海外华人中受到青睐。另一方面，粤剧对于城市中更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一代，对于越来越多的外来的新移民，其接受程度是越来越少了。粤剧观众结构年龄偏中老年，知识层次不高，是客观现状。粤剧进了博物馆，争取251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说明粤剧正日益走向文物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争取更多的观众，不仅有赖于官方的扶持，更有赖于粤剧本身的变革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粤剧在定型之后，追求激烈的变革就成了一把双刃剑，可能会不断地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可能逐渐地失去自我。传统文化的永久生命力，在于保持其本身特色，《茶花女》、《天鵝湖》长存，除了其主题的永恒，从艺术形式来说，更是因其各具歌剧、芭蕾舞剧的优美特色，而不是依靠不断的变化。“粤剧之优点在善变，而其危机亦在多变（多变渐滥，则流弊难免。本质易漓，则基础易摇）”。（3S）

在时尚变化极快的现代，将戏剧的延年益寿寄托在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的变革上只是一厢情愿。很难卜定粤剧将来的前景，但是，文化风俗的变革不是一日之变，粤剧在社会上还有其生命的延续力，这种延续越是扎根于底层，越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越是保持其艺术特色的个性，就越有生命力，而将其人为地“高雅化”和进行不遵循艺术规律的“革新”，只能缩短其存在的时间。同时，粤剧已经不可能如鼎盛期那样占据娱乐舞台的大哥大地位，不应对其在文化生活中的受众之广和地位寄予过高的期望，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注释：〔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第395页，广州.出版社2003年版。252

〔2〕光绪《广州府志》卷十八《杂录》。

〔3〕梁延相：《南汉书》卷三《殇帝纪》。

〔4〕陈守中：《匡圣宏明大师碑铭》，吴兰修《南汉金石志》卷2。

〔5〕孙資：《广州歌》，《南园前五先生诗南园后五先生诗》第4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康熙《新会县志》卷5《风俗》。.

〔7〕《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翁家箴》，載明成化修佛山石湾（太原低氏崇本堂族谱》。

〔8〕魏校：《諭民文》，载归有光编次《庄渠遗书》。

〔9〕嘉靖《广东通志》卷20（风俗》。

〔10〕《佛山市志》第16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李峄：《广州也有琼花会馆》，载《南国红豆）199'4年第三期。

〔12〕道光十年《佛山街略）。

〔13〕梁序镛：《汾江竹枝词》。

〔14〕杨懋建：《梦华琐薄》。

〔15〕俞洵庆：《荷廊笔记》。

〔16〕.《周恩来选集》下卷。

〔17〕转引自《广州市志》卷十六，第69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8〕薛觉先：《南游旨趣》（1936）。

〔19〕马师曾：《我的新剧谈》（1930）。

〔20〕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載（广东文物》第802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21〕转引自《广州市志》卷十六，第67页，广州出版杜1999年版。

〔22〕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载（广东文物》第792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23〕江沛扬：《梅兰芳访穗故事》，载《羊城晚报）。253

〔24〕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转引自（广州市志文化志》卷十六，第64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25〕（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第25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6〕（广州市志文化志）第70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27〕《无论如何改，i剧都姓“粤”一粤剧大力度改革给观众带来巨大视觉冲击，业界亦喜亦忧观点鲜明》，載《羊城晚报》20O'4年6月7日。

〔28〕（红线女罗家宝都想带弟子健在的老一辈名流太少，诚心学事剧的年轻人也不多》，载《羊城晚报》2003年2月10日。

〔29〕（倪惠英：我对得起事剧》，载（羊城晚报》2003年8月17日。

〔30〕《红线女羊年“玩卡通”》，载（羊城晚报》2003年2月3日。

〔31〕《无论如何改，粤剧都姓“粤”一事剧大力度改革给观众带来巨大视觉冲击，业界亦喜亦忧观点鲜明》，载《羊城晩报》20O'4年6月7日。

〔32〕《大学生走进剧场一个文化品牌的塑造》，载《羊城晚报》2004年5月17日。

【33〕（罗品超直言不讳一粤剧行当生旦太滥》，载《广州日报》2003年3月14日。

〔34〕《李淑勤：最年轻的事剧梅花》，截（广州日报：12004年6月3日。

〔35〕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1990年上海书店版《广东文物》第817页。254

第十三章广东音乐曲艺-、广东音乐源流

通常所说的“广东音乐”，并非广东全省民间音乐的统称，而是专称孕育并盛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州方言地域的一种民间器乐音乐乐种。广东音乐不但流行于广府方言区，而且在国内外广为传播，深为外省民众所喜爱，“广东音乐”一名首先便是由外省人叫起来的。广东音乐形成乐种之后，原来未有一个统一的名称，20世纪初期出版的一些乐谱称以粤乐，在香港及海外不少人亦习称其为粤乐，但广东音乐的名称似乎叫得更响而约定俗成。1994年在广州举行的“广东音乐国际研讨会”上，有学者呼吁使用“粤乐”一名。不过，至今为止，更多的场合更多的人还是采用广东音乐的称法。

广东音乐虽然经历过古代民族音乐文化交汇的漫长孕育，但从乐种特征看，却是成长于19世纪255中后期、成熟于20世纪初叶的新兴的民间乐种。广东音乐的形成是典型的岭南文化的表现。植根于岭南文化的肥沃土壤，在它的孕育过程中，吸收来自中原等内地音乐文化的精华，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涤荡，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乐种。

音乐和舞蹈是原始先民游艺的基本形式，岭南的原始先民的音乐文化，固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以了解，但应是依照人类文化史的共同规律而发展的，从一些文献和考古情况还可以推知一二。史前音乐是在歌舞结合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而声乐的起源又先于器乐。1987年在肇庆期売洲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骨笛（哨），是一件原始乐器。【'）距今3000多年的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岩画中有舞蹈人物的形象。（2〕南方越族喜好讴歌乐艺，南海人张买为汉惠帝侍游时，“鼓棹为越讴”，t3〕反映了越讴是一种击节而歌的民谣。广东各地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乐器，如在肇庆地区出土先秦六件一套的铜钟，其特点是甬高、身瘦、枚长，表明是自楚地流入的乐器。

在佛岗出土的铜饶，在博罗出土的编钟、甬钟，乐器的花纹很有地方特色，应是本地所铸造，说明了器乐从中原与楚地传入岭南并得以传播。在广州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乐器中，铜器有钟、证、勾鑃、铎、铃、錞于、铜鼓、铜锣等，石器有石磬，陶器有响器，革类见有绘于铜提筒上的建鼓，丝类有琴、瑟。可见这时在南越国的上层社会，音乐已与祭祀、饮宴以至日常生活的享受紧密结合。【4）

勾鑃上铭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字样，tS）说明南越国宫中仿照汉朝廷专设有管理宫中音乐的机构，已有相当规模的256

宫廷乐队。-

汉以后，岭南的音乐之风益盛。广州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加之中外海上贸易的交融，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各种歌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南海郡官宦之家蓄有家班“散乐”、“盛饰声伎”。（61元和八年（813）马總就任岭南节度使时，“大鎗完宴合乐……公北向，宾客南向，奏部伎于西…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楔击吹鼓之音，尽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迩。礼成乐遍，以叙而贺。”〔7）唐代部伎分立部和坐部，内容庞杂，（a〕可见中外乐舞齐奏于广州官府堂上。南汉宫苑更是歌舞不分昼夜。宫中置东西教坊，奏乐的伶人就有一千多人，组成一个庞大的乐队。（9〕时人赵损的《琴歌》诗中有“清声不与从乐杂”、“俗耳乐闻人打鼓”之句，说明南汉时广东的音乐很丰富。宋元时期，广州地区的歌舞多姿多彩。北宋诗人、端州知州郭祥正过访广州知州蒋之奇，其《蒲洞奉呈蒋帅待制》诗记录了广州人正月二十五日度蒲洞节的民俗盛况，有“城北夹道珠帘张，元戎要宾锤大鼓，老蛮献贤烧肥羊，倾城尽作蒲洞饮”句，描述了中外游客击鼓作乐饮酒宴会的狂欢节景象。南宋刘克庄《广州即事诗》有“东庙小儿队”句，是说南海神诞祀，南海神庙前有“小儿队”的歌舞演出。诗人在弦歌声中竟觉得广州“何似古扬州”。在诗人孙责笔下，元代之广州城南一带繁华处，有“闽姫越女颜如玉，蛮歌野曲声咿哑”，“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之景观，南北音乐在这歌舞之地融会。257

明清两代，随着安徽、江苏、江西、湖南诸省众多戏曲班社入粤演出，同时传入了中原古乐、江南小曲小调、昆曲牌子及其他民间器乐曲，渐与本地民歌民谣相结合，被吸纳而成为后来的广东音乐。沿着广东音乐早期曲目溯源，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传承：有源于古代器乐曲的《小桃红》、《汉宫秋月》、《八板头》等：有演变于昆曲牌子的《器皇天》、《得胜令》、《大开门》等：有大量的江南小调如《仙花调》、《剪剪花》、《送情郎》等：也有直接引用江南丝竹的《熏风曲》、《欢乐歌》等。经过明清两代与岭南文化的交融，流传至今，形成广东音乐浓厚的传统音乐文化基石。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喜庆有演奏锣鼓吹打的习俗，道光初年开始出现由乐工组成的职业八音班，其后又产生业余性质的锣鼓柜，还流行有“坐堂吹”、“古番锣鼓”等民间吹打乐形式。戏曲和曲艺，在共同的发展中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互相促进，推进了广东音乐的形成和发展。

就乐器而言，广东音乐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粤讴以琵琶为主，木鱼书以筝为主，戏曲以二弦、唢吶为主。在器乐伴奏之前后，有一些“引子”或衬托舞蹈动作及戏剧气氛的器乐“过场曲”，这是广东音乐器乐曲的早期形态。1867年木刻版的《粤讴集》，篇首有《琵琶引》一小曲，略似广东音乐的器乐曲《三汲浪》，是最早见于出版的广东音乐曲目。20世纪20年代以前，广东音乐以琵琶为主奏乐器，辅以筝、箫、三弦、椰胡等，接着出现以二弦（俗称硬弓）、提琴、三弦、月琴、横箫5种乐器组合而成的“五架头”组合。

2581926年开始使用以二胡（改用钢丝弦，现称粤胡）主奏，辅以秦琴、扬琴的“三件头”组合（俗称“软弓形式”）。此后增加了一些丝竹乐器和西洋乐器，带规律性地使用装饰音和“加花”的旋律发展法被普遍运用，从而使广东音乐成为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民间乐种。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批较为著名的音乐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

明代香山人黄佐，著有关于音律理论的《乐典序》、《审乐第六》。他还自制乐器，“常示门人以所制琴、瑟、钟、磬、管、箫、笙，分宫商以唱和”。（'°】

明末清初南海人陈子升，精于古琴，创作有古琴曲《况操》、《韩山操》、《水东游》等，还善于吹箫和击磬。他也是个昆曲作家，其所创作的昆山腔曲子有13首流传至今。

清代番禺人陈澧，是著名教育家和精于乐理的古琴家。他在音韵学方面著有《三统律详说》、《述乐》、《琴律谱》以及《声律通考》10卷。他还根据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一书仿制了古笛，成为我国研究和复原古乐器的先驱。这些音乐演奏家和理论家的实践和教育活动，对于珠江三角洲一带音乐理论的推广和音乐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广东音乐的发展更离不开一批杰出的名演奏家兼作曲家的传承与创新。

清末民初番禺沙湾何氏家族的何博众（1833-？），是宋代中原移民的后代，据族谱记载，其远祖精通音律，擅弹露259琶，并代代相传。何博众创造了岭南风格的“十指琵琶”技法，有“琵琶大王”之誉，他创作的《雨打芭蕉》、《饿马摇铃》，开创粤乐创作的先河，（''）至今仍脍炙人口。

严老烈（1832～？），檀长扬琴，以右手奏重音，左手奏轻音或助音，通常称为“右竹奏法”。他利用这一手法，以原有曲调为骨干音创作了《旱天雷》、《连环扣》、《倒垂帘》等名曲，使整个乐曲的音乐形象和旋律气质都有了质的变化，成了人们认可的地道的粤乐曲子。《旱天雷》原小曲《三汲浪》声调较低沉，旋律、节奏也较缓慢呆板，改编成《旱天雷》，旋律流畅跳跃，情绪欢快热烈，表达了人们久旱闻雷、知兩之将至的喜悦心情，成了两首意境完全不同的乐曲。将古老单纯的小曲改编为完整的器乐曲，实质上是一种难度更大、艺术水平更高的再创作，体现了一种乐曲品种的成熟。因此，严老烈所创的粤乐，被今人视为广东音乐发展的里程碑。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粤乐的成熟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演奏家兼作曲家，有作品问世的作者达60多人，现有曲名和乐谱可稽的乐曲达500多首。较为著名者有出自沙湾何氏家族的“何氏三杰”（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被称为广东音乐启蒙者和发展者的丘鹤俦，被称为“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等。他们分别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对广东音乐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贡献最为突出的首推一二代宗师吕文成。

吕文成是香山人，早年旅居上海，自幼酷爱音乐，尤其260

是广东音乐。青年时代已有“二胡王”之称。1932年定居香港，毕生致力于广东民间音乐事业。他一生创作的广东音乐曲子多达一二百首，并灌制了大量的广东音乐唱片。现今流行的广东音乐曲子以其作品居多，如《平湖秋月》、《蕉石鸣琴》、《渔歌唱晚》、《岐山风》、《步步高》、《醒狮》、《下山虎》、《沉醉东风》、《齐破阵》……广泛流传，百听不厌。

《步步高》更是妇孺皆知，被誉为“中国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他具有高超的二胡、扬琴、木琴等演奏技艺，并从小提琴得到启示，把二胡的外弦由丝弦改为钢弦，创造出号胡（后被称为高胡），作曲由一般在一个八度内伸展到两个八度，一气呵成，流利畅快，使广东音乐的乐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高胡成为广东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主奏乐器，广东人称之为“头架”（即首席）。他创造出两膝夹琴筒的持琴方式，能表演更为丰富的音量、音色。

20世纪20年代，吕文成等人在上海演奏的广东音乐，柔美委婉的曲调深受上海人的喜爱，新月、百岱等唱片公司为其灌制了大量的唱片。30年代，这些唱片流传到了北京，引起京人的注意，当时北京的几家电台天天播放广东音乐，成为市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茶叶铺为招揽顾客播放广东音乐，电影院开演前放的也是广东音乐。1926年吕文成率队到天津演出，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节奏轻松明快的广东音乐，让人在愉悦之中还感受振奋，在社会上大受欢迎，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40年代普及全国，在全国各地无论车站、茶馆、戏院都能听到那缠绵委婉、优雅动听的乐曲。这一时

261期演奏广东音乐的民间乐社林立，遍及省、港、澳以至沪、津、东北、西安、延安各地。在上海的商业性舞厅中，也常演奏广东音乐，使其成为全国著名的乐种，被称为“国乐”。在东南亚和美国、加拿大等地也有演奏广东音乐的民间乐社。广东音乐在现代仍不断提高发展。1953年集中全省广东音乐名家成立了广东音乐研究组，1956年扩大为广东民间音乐团，是广东历史上首个专业乐团。音乐团对发掘整理传统曲目和改进器乐作了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音乐名家有刘天一、朱海等。余其伟是现时著名的广东音乐演奏家，1984年他在京举办的高胡独奏音乐会，是广东民乐界第一个民乐独奏音乐会。

二、广东音乐风格特色

广东音乐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也是岭南文化最灿烂的奇葩之一。其风格特色最突出的是平民性和开放性，集中地反映了岭南文化的特点。

其一是平民性。表现在内容上的世俗性与形式上的旋律优美。广东音乐的曲目，表现内容丰富，有充满诗情画意的世俗图景（《赛龙夺锦》、《鹏程万里》），有的描写动人的自然景色（《雨打芭蕉》、《平湖秋月》、《鸟投林》），有的表现节庆欢乐情绪（《步步高》、《娱乐升平》、《狮子滚球》），有的表现生活情趣（《饿马摇铃》、《渔樵问答》、《晚霞织262

锦》），有的向往美好生活（《孔雀开屏》、《花间蝶》），有的发泄不幸与哀怨（《双声恨》、《昭君怨》），适用性很广。

广东音乐结构短小精悍，力避艰深，易奏易诵，许多还可以填上广州方言歌词，付诸演唱，成为粤剧、粤曲唱腔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于广东音乐的流传。广东音乐表现的内容，展现了世俗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场面和丰富的思想感一情，富有人情味，又有很强的音乐表现能力，适于表现人世间的各种喜怒哀乐，有一种十分难得的远离功利的调节情志的真情流露，易于为社会各界所接受。

广东音乐的音乐风格既继承了浓郁的岭南音乐风格，又吸收了西洋音乐营养，形成了旋律流畅优美，曲调激昂亮丽，音色清脆明亮，节奏清新明快的鲜明个性。广东音乐历来以曲调玲珑剔透、流畅优美，节奏清新明快而著称于世。其旋律“有一种珠圆玉润，婉转回荡的特色”，【'2）这种悠扬悦耳的旋律深得群众的喜爱。《平湖秋月》、《渔歌晚唱》、《步步高》等著名代表作，流传广泛，经久不衰，成为名垂史册的中华民族音乐经典。《赛龙夺锦》不只进入粤剧，而且进入电影、电视中，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赛龙夺锦》被安排作为闭幕式的压轴曲，作为我国民间音乐的一个代表作。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首次登上世界艺术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时，以联奏的方式演奏了《赛龙夺锦》、《旱天雷》等多首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的生命力在于其鲜明的南国艺术特色，正是浓厚的民族色彩的具体表现。这种不同于其他乐种的优美，有263

其内在的特质，是出自平凡的人的真情流露，即使是声调高昂、激愤感伤的忧国忧民之作，与北方音乐相比，也难免带有一点温婉之情。而这正是它的地方风格特色。

出于历史传统、社会环境等因素和俗文学传统的影响，对于古调雅乐，广东音乐崇尚的是其内在的风骨神韵，较少外在的摹仿。他们大都致力于通俗小曲的创造。不少作品行写了对丑惡事物的不满，对新生活的期待，对自然风光的依恋和赞美。广东音乐艺术精神虽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的。它以精短的体载，较直捷的形式，传达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南方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来，感情真切、自然：旋律上以不太强烈的冲突或分裂去摆脱一味调和的氛围，形成曲调的一气呵成而又抑扬顿挫，其中的一些佳作，更因其顺畅可口，，常常用以填词演唱。广东音乐较少深沉的人生喟叹与哲理深思，较少士大夫的典雅习气，也没有类似中原古曲那种悠深旷远的历史容凉感。长期以来，不断溶古今中外、东西南北音乐文化之优长，使致当代广本音乐的内通更为丰富，具鲜明而独特的岭南风采，呈示出多元性格的边缘文化特征。C'3）

正因为如此，广东音乐被广泛运用。在我国早期生产的无声电影，基本上是采用广东音乐为配乐的。如在上海拍摄的《火烧红莲寺》、《晨钟报晓》等电影，就是用广东音乐配乐的。固然因为当时的电影导演多为广东人，而广东音乐264

广泛的适用性及其旋律为大众所喜闻则是主要的原因。这又成了广东音乐传播的一个特殊而又广泛的渠道。其二是开放性。表现在博采广纳，求新善变上。广东音乐新颖善变。无论是乐曲的创作，还是演奏技巧的创新上，以及乐器的运用上，都注意不断吸收国内外其他乐种的长处，从而使自己在不断提高表现能力中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又注意将外来因素吸纳整合进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之消化融合而不致消失自我。在广东音乐形成阶段的明清时期，有数以百计的全国各地的剧团流汇广东。面对这些剧团所采用的不同戏曲品种以及曲艺、音乐，粤人以自己的民俗审美习惯及演奏技法把它们吸收改造，使之与广东原有的音乐艺术共融而化，成了广东音乐最早称谓的“谱子”。被粤剧吸收的常用的牌子曲，现今有乐谱可稽的约有110首，现在演化成广东音乐名曲的《彩虹追月》、《昭君怨》、《汉宫秋月》、《雁落平沙》等，其实就是从外省的曲目移植改编的，但在旋律结构上就呈现出与同名的其他乐种乐曲的不同风格。

在近代，广东音乐还大胆吸收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法。较早期的广东音乐的若干作品如《赛龙夺锦》、《二龙争珠》、《醒狮》等诸作品中，均大量吸收了西洋器乐曲中常见的节奏，在我国的古乐及其他民族民间器乐曲中实属罕见。尤其是大量地应用了切分音节奏及音阶上下行大幅度回旋的连串运用，这些撰曲技法在我国早期的民族民间音乐中更无前例。在西洋乐中，这种技法多为过渡性质的应用，而在广东26S

音乐的《赛龙夺锦》、《狮子滚球》、《双龙戏珠》等曲中，却作为乐曲的主要技法使用。

演奏广东音乐的乐器，最初只是“五架头”，即二弦、提琴（即大板胡）、横箫（即竹笛）、月琴、三弦五种。1920年前后，由司徒梦岩将小提琴引进广东音乐。曾经师从司徒梦岩的尹自重将小提琴9DAE四弦降低一个大二度为FC9D，适应了广东音乐的调式、音色与加花习惯，使小提琴演奏技法广东音乐化，或称西洋乐器演奏技法民族化。其他如木琴、吉它、色士风、班祖、小号和架子鼓等西洋乐器也陆续引进。由于这些西洋乐器的引进，后来形成了很典型的广东音乐风味的演奏技法。粤人先后从西洋乐器中吸收来的乐器为数之多，为我国其他乐种所不能比拟。1940年前后，甚至是全部由西洋乐器演奏的所谓“精神音乐”的合奏形式。这种洋为粤用的特色，在语言、文学、绘画、建筑等许多领域中都有显著的反映，可以说是整个广府文化领域重要的整体特征之一。1920年以后，加入了潮州乐器的椰胡和秦琴。1926年问，经过吕文成的改革，高胡与扬琴、秦琴等合起来演奏，使广东音乐以独特的面目出现于乐坛。其后何柳堂一门又以琵琶加入合奏。1932年后，易剑泉创办及主持的“素社”音乐，在原有乐器的基础上研究改革，创制了中胡、大胡、大阮、高音箫等中、低音乐器和广东云锣、排锣等多种击乐器。现在演奏广东音乐的乐器已发展至数十种之多。吹、弹、拉、打种种齐备：高、中、低音样样俱全。在演奏方式上，由早期广东音乐的三件头、五件头合奏，在此26

基础上，产生的小组奏、中组奏也较流行。此后，各类乐器的独奏技艺不断改进，大合奏、协奏、组曲、吹打乐、中西乐器与人声混合演奏演唱等形式均有展现。由此可见广东音乐不拘一格、灵活善变的特点。

正是这种平民性和开放性，使得广东音乐在社会变化节奏加快的现代，仍被广为喜爱，拥有甚多的传众和广泛的使用，是目前影响最广泛、流传最广远的中国民俗乐种之一。广东音乐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够不断跟着时代前进，同时，广东音乐在成熟定型之后，尽管不断创新变化，仍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保持其世俗平民性的风格、流丽优美的旋律，始终在民族音乐之林显出其独具一格的南国风貌。在日益市场化、人性化的当代社会中，以强调“平民意识、世俗感情”为美学品格的广东音乐，，t'''〕

越来越体现出其相适应的生命力。在中国民族轻音乐方兴未艾之时，有专家认为以昌文成的《步步高》为代表的广东音乐就是中国民族轻音乐的开山之作。在同样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谓“广东三宝”（粤剧、粤菜、广东音乐）中，较之于在变化中尚未找到自我定位的粤剧、粤菜，广东音乐的生命力显然更胜一筹。

对于广东音乐的现状，有报道概称“民间热专业冷”，“业余可谓万家弦，专业空叹墙外香”。t'S】

所谓专业冷，有两个意思。一是广东音乐在广东的音乐专业团体中地位不高，建国以来广东至今没有专业的广东音乐团体，省级专业艺术团体中近年连一个演奏广东音乐的最基本的五架头小组也没有。广东音乐在专业音乐会上演出的267

机会不多，在民乐节目中不突出。而天津音乐学院是国内唯一专设广东音乐专业的院校，上海民族乐团却在2001年成立了广东音乐演奏组。二是现时的广东音乐名家在海外登台表演受欢迎的程度远远大于在国内。所谓民问热，是说广东音乐在广府民间、外地某些地区乃至聚居海外的粤人中，呈现出走俏的势头。在北京有广东音乐研究社，在天津有广东音乐琴社，都是民间自发成立的团体。北京广东音乐研究社的乐友们已经活动了十来年，从1996年起在恭王府定期进行排练，他们整理出300多首广东音乐的曲目，还受到老舍茶馆的支持举办了十多场专场演出。随着珠江三角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珠三角富裕人家新建的私宅，大手笔构筑家庭“音乐厅”成了喜欢吹拉弹唱者的时尚。近几年民间的广东音乐“私伙局”活动前所未有地红火，仅是邀请余其伟辅导过的珠江三角洲城乡私伙局就不止100个。建成“音乐厅”式的私伙局，主要在东莞的厚街、长安、虎门、中堂，中山的小榄、沙溪，顺德的均安、大良，番禺的南村、钟村，增城的新塘，广州市区的荔湾、黄埔区等地。这些私伙局不仅自娱自乐，而且渴望提高文化生活的等级，艺术院校、专业团体的教授名家都是抢手的艺术指导。这对广东音乐的推广普及和提高有很大作用。广州和珠三角的许多中小学在第二课堂中都要求每个学生要选学一门乐器，相当多的学校选学的是民族乐器，演奏的是广东音乐。曾获得“中国曲艺之乡”称号的广州市荔湾区更是矢志不渝地将广东音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传统项目。商业服务行268

业也尝试利用广东音乐作为一个内容。在广州西华路拥有320个座位的彩虹曲苑，从2004年“五一”节起推出免费欣赏广东音乐项目，演出者除了著名前辈，还专门推出“女”1、子十人乐坊等新潮乐队。但是，即使在荔湾区这样发烧友集中的地方，彩虹的苑这样上演高水平广东音乐曲艺表演的场所常常面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在现代社会多变、多元的商业化乐坛上，要占据一席之位并不容易。

三、广府曲艺

自明代晚期至现代，广府地区的曲艺有木鱼歌、龙舟、南音、粤返、粤曲及粤语说书等，被统称为“广东曲艺”，准确地说，是广府曲艺。粤曲是用广州方言演唱的曲种，源于戏曲声腔，是广府地区曲艺的代表。粤曲的创作、演唱活动以省（广州地区）、港、澳地区为基地，流行于粤语方言地区以及粤人在海外的聚居区。

粤曲的形成在晚清。道光初年，广东的八音班乐工以器乐演奏为主，兼唱外江戏唱腔，后来逐渐改唱粤剧唱腔。同治初年，又有“师娘”（失明的女艺人）演唱粤曲。师娘自小由专门收养盲女传习粤曲弹唱技艺的堂口培养成职业艺人，以自弹自唱的形式应邀登门演唱或沿门卖唱谋生。民国初年，师娘开始进入茶楼开设的曲艺茶座演唱，开创“一几两椅”的演出模式。辛亥革命后，明眼女艺人（称为“女269

伶”）逐渐取代师娘演唱粤曲，改坐唱为站唱，改一人多角为一人多腔，套唱有故事情节“套曲”（又称“大曲”）的多段体单曲，开始奠定了广东曲艺演唱的基本形式。1918～1938年期问，是女伶阶段的全盛时期，广东曲坛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名家、名曲、名腔不断涌现。这一时期在演唱上产生了一些重大改革：改原用“戏棚官话”演唱为用广州方言演唱：改原用假嗓演唱为用真嗓演唱，基本调门相应从E调降为C调：将原按粤剧十大行当演唱的唱腔归并为三大腔系（多用于男角高音区唱腔的大喉、多用于男角中音区唱腔的平喉以及女角专用腔的子喉）。粤曲拥有7个类别的曲牌板式：梆子，二黄，牌子曲，同地区的各种曲艺形式腔调，小曲、小调，按梆、黄旋法创造出的小曲、杂曲，广东音乐及其他民间乐曲。

伴奏乐器也由自弹自唱发展为5种基本组合：以高胡、扬琴、琵琶、横箫、长喉管为核心的软弓组合（多用于平喉、子喉唱腔的伴奏）：以二弦、提琴、月琴、短喉管为核心的硬弓组合（多用于大喉及武唱的伴奏）：硬弓加上唢呐和锣鼓的吹打乐组合（多用于牌子曲及特定唱腔的伴奏）：以椰胡、洞箫、露琶、扬琴（或筝）为核心的组合（用于南音等曲艺腔调的伴奏）：吸收使用西洋乐器小提琴、色士风、电吉它、木琴等为核心的组合（多和软弓混合或交替为平喉、子喉伴奏）。

著名女伶有大喉唱家熊飞影、子喉唱家张琼仙和四大平喉唱家小明星、徐柳仙、张月儿、张惠芳。小明星是三水县270

人，自幼父母双亡，靠养母抚养，住广州河南，12岁登台演唱。她有唱曲天分，后自学平喉，创出一种别有韵味的新腔，以唱幽怨凄怆的“星腔”而走红。当时的名作曲家王心帆、吴一啸等常按小明星的腔调替其写曲，流行的有五六十支。其中王心帆撰曲的《痴魂》，一曲近千字要唱一个多小时，据说听众安静得连根针落地也听得出来。

粤曲的兴盛与茶楼商业有关。20世纪20年代初，在广州的大小茶楼附设歌坛很多，以九如、大三元、怡香、建南、一园、多如、咏筋、玉波这八家的上座率最高，歌坛布置也最华丽，有“八大歌坛”之称。1927年10月，香港如意茶楼歌坛在报上刊登广告，称一连15天在该楼举行“唱书选举”，选歌界明星以及生喉、子喉、大喉、平喉领袖各一名。随同茶票附送选票，每晚当众揭晓，登于榜上，汇集15天总数，以得票最多的女伶当选。粤曲爱好者对此甚为关注，富家子弟热心捧场，赌徒亦乘机开赌。此举对激活粤曲歌坛颇有效应。

粤曲早期曲目大都来自粤剧的班本：“师娘”时期，开始积累本身特有的曲目，其代表性作品有称为“八大曲本”的《百里奚会妻》、《辨才释妖》、《黛玉葬花》、《六郎罪子》、《弃楚归汉》、《鲁智深出家》、《附荐何文秀》、《雪中贤》等：女伶时期，竟争激烈，著名演员均拥有自己的首本曲目，.代表作品有大喉唱家熊飞影的《岳武穆班师》、《夜战马超》，平喉唱家燕燕的《断肠碑》，小明星的《风流梦》、《知音何处》，徐柳仙的《再折长事柳》、《梦觉红楼》，

271272子喉唱家张琼仙的《燕子楼》、《秋江别》等。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不少抗战题材的曲目，如小明星演唱的《恨锁五羊城》、《人类公敌》，徐柳仙演唱的《热血忠魂》、《血债何时了》，李少芳演唱的《烽火危关》、《闻鸡起舞》，张惠芳演唱的《杀敌慰芳魂》等。

新中国成立后，粤曲创作曲目多不胜数，演唱较多有历史题材《牛皋扯旨》、《周瑜写表》、《穆桂英挂帅》、《蔡文姫归汉》等。

现代题材以《河清有日》、《一条赶牛鞭》、《二泉映月》及咏羊城八景的《双桥烟雨》等最有代表性。建国后的名演员更是人才济济，有李少芳、关楚梅、黄佩英、何丽芳、白燕仔、谭佩仪、黄少梅、李丹红等等。近年，粤曲在专业演出中日渐消寂，但是在民问私伙局热火朝天的情况下，与广东音乐关系密切的粤曲也从民间得到了维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的土壤。

木鱼是一种说唱曲艺形式，相传是唐代佛教的俗讲、变文及宝卷与地方民歌民潘融合演变而来的。

明代晚期，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木鱼这一曲艺形式，是广府地区首个出现的地方曲种。因说唱时以敲击木鱼（一段刳空了的硬质木头）作声为节奏而得名。又称木鱼歌、摸鱼歌、唱木鱼书和沫浴歌。明末清初在民间已甚流行，屈大均《广东新语》称其为“摸鱼歌”。（'6）至清乾嘉年间，凡吟诵体说唱通称“木鱼”，从清代至民国初期十分盛行。清人王士桢《广州竹枝词》说到：“两岸画栏红照水，疍船争唱木鱼歌”。【'7）

木鱼唱词是七言韵文体，半文半俗，可添加虚字衬字，以四句为一小段，反复循环，小段中每句末字平仄的安排有严格限制。木鱼在民间流传纯为清唱，没有说白，不用乐器伴奏，曲体自由，没有起板和过门，不受严格的节拍限制，曲调简单朴素，很受民间妇女欢迎，居家传习，自娱自乐。在珠江三角洲城乡一带也有一些失明艺人唱木鱼，男艺人叫普师，女艺人叫管姫，男艺人日间多兼占卜。职业艺人比较讲究唱功，并创造出一种适于表达哀伤情感的“苦喉”梅花腔的唱法。也有在演唱时以右手弹弦琴，以左手拍侧板伴奏及即兴加插说白的。

广府地区最早的木鱼书木刻版本出现于明万历年间。由明代至民国初期，木刻和手抄的木鱼书不可胜数，现今有记载的多达500种四五千卷。传统的木鱼书以长篇为主，题材除佛家修行故事以及“劝世文”之外，还有从演义小说、戏剧传说改编的，有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的，有反映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的，如《金山客叹五更》、《华工诉恨》、《国事诉根源》、《西瓜园焚烧劣货》等。木鱼歌产生过一批富有岭南民间文学特色和较高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其中《花笺记》和《二荷花史》在国际文坛上也享有盛誉。《花笺记》先后翻译成英文、德文版本。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读了《花笺记》之后，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

晚清至民国初年，进步文化人士在香港及广州的报刊上发表过一批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短篇木鱼歌作品。丘逢甲在广东厉行禁赌措施，孙中山、黄兴等民主革命先驱的事迹，都曾被编为木鱼歌予以赞颂。抗日战争以前，每逢中秋之夕，书坊从木鱼书中选.印其中章节，批发给小贩沿街叫卖，名日“撞卦木鱼赢”（广州人讳“书”字与“输”同音）。20世纪20年代以后，创作和演唱木鱼歌者日渐减少。

木鱼歌的腔调始终停滞于简单的原始状态，本世纪初，木鱼歌被粤剧和粤曲吸收，作为一个曲牌使用，使其腔调得以保持下来。粤剧、粤曲中的木鱼歌，至今仍承袭清唱，不用乐队伴奏。龙舟又名龙舟歌，形成于清乾隆年问，其来源有几种说法，有说是由顺德龙江一破落户子弟通过改变木鱼歌腔调始创而来：也有说是由人们在端午节赛龙舟时向龙王爷口唱消灾纳福、驱邪保境的颂词演变而来。

龙舟是珠江三角洲水驿江洲之歌谣体载，演唱多在乡间渡船上，也有在茶楼市集、庙宇亭傍、桥头树下聚众之地。演唱者为民间职业或半职业失明男艺人，常手持一支上端架着精致的小龙舟的长棍，胸前挂着一副特有的小锣小鼓敲击节拍和唱，不用弦笛乐器伴奏，徒歌清唱。新春期间挨门卖唱，谓之贺正龙舟，其唱词必定讲究如意吉祥，诸如“龙舟舟，出街游，姐妹行里莫打斗，封封利市碛龙头”。在公共场所演唱多为即景抒情，随缘收取赏钱。走街串巷的沿门卖唱的多为吉利颂词式的短篇，固定设点卖唱的多为完整故事情节的中长篇。

龙舟唱词以七言韵文为基本句式，四句为一组，上句辙274韵自由，下句必须押韵，有相对固定的曲调，腔调简朴流畅，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富有乡土气息，是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民国初年，在顺德大良东门上街庙举行过有奖龙舟演唱竞赛，吸引了许多艺人参加。据说主评判还是一位盲人。参赛者若唱错一句，主评判就敲一下锣，锣声过三响的，表示参赛者已落选。

-龙舟曲目或来自木鱼歌书，或由艺人自编自唱。有神话传说，有历史故事，也有慨叹人生坎坷的。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曾利用龙舟的文艺形式，推行“社会龙舟”、“政治龙舟”，编写《缫丝女自叹》、《广东禁赌纪念歌》、《庚戌年广东大事记》等曲目。抗战胜利后，有艺人编过劝谕除三害”（鸦片烟、賭、毒）的龙舟歌。新中国成立后，龙舟出现过一批歌颂新生活的现代题材作品，如《白衣人影》、《财礼夫妻》、《喜笑扬眉》等。并有一些改革探索，如改男艺人演唱为女艺人演唱：改单人演唱为双人对唱或群口齐唱：尝试用小乐队伴奏等。也出现了“龙舟棋”、“龙舟德”、“龙舟宁”、“龙舟会”等一批唱腔、鼓点各有特色的民间艺人。

随着老一辈艺人逝去，龙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渐少有人演唱，风光不再，只在文娱晚会中偶见。近年，广州有老艺人专意发掘，创作龙舟歌《泮塘五秀》等，以时代题材新编龙舟歌，在荔湾、越秀区的几间小学辅导小学生兴趣班，学习这种曲艺。

南音是由文人在木鱼歌和龙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南275词、潮曲的某些特点加工而逐渐形成的曲种。

南音形成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初时多在文人雅士中传唱，因其音乐性比木鱼、龙舟强，专业演员乐于接受，故在舞台上演唱的机会渐多。南音未有专名时，一般人将其列为木鱼歌。道光初年，叶瑞伯所作的《客途秋恨》【'8j在民间广为传唱，有别于戏棚官话和吴声歌调，始将其调称为“南音”。早期传唱于勾栏画舫中的南音，唱词为七字旬韵文体，可加减衬字，但句格、声韵、节拍要求严谨。曲目大多数是中、短篇，短的只有几百字。唱词较典雅，曲调哀怨缠编。南音作品出自文人墨客手笔，大多以反映畑花女子不幸身世和遭遇为题材，多追求华丽词句，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较高的文学价值。代表作《客途秋恨》、《叹五更》被称为南音双绝。

流入民间的南音，乡土气息浓郁，称为地水南音。其大量曲目来自改编木鱼书或直接撷取木鱼书中某些回目或片断。《今梦曲》、《增刻今梦曲》是唯一传世的南音作品集。

南音的乐器选取秦筝、扬琴、椰胡、三弦中之一种伴奏，后来职业曲艺团队演唱南音，则以椰胡、洞箫、扬琴（或筝、琵琶）三件核心乐器的小乐队伴奏，并加一檀板敲击节拍。南音是唱曲，除在音乐过门时可由歌者即兴加插一两句简短的口白外，唱本是没有口白的。南音腔调有正线本腔、扬州腔（为“飏州腔”之讹传）、乙反线梅花腔（也称苦喉”）几种，各有不同的版面（序）和过门，并有慢板、中板、流水板和快板等板式。旋律婉约优美，因而作为独立276的曲种在舞台上出现的机会比木鱼、龙舟多。

演唱南音的民间艺人，多为自弹自唱的男性艺人，称作瞽师。清末有一批演唱南音的名艺人。自抗日战争以后，南音职业艺人日稀，现已不复见。南音自辛亥革命前后为号剧、粤曲吸收，至今仍作为常用的曲牌曲目。新中国成立后，曲艺团体的专业粤曲艺人创作演出过一批南音曲目。20世纪60年代初，由韦丘作词、李丹红演唱的《沙田夜话》，成为南音保留节目。

粤讴又名越讴，曾经是广泛流行的广府曲艺品种。

越讴作为粤地的说唱文学昔已有之。明欧大任《百粤先贤志》述及粤人张买于西汉“孝惠帝时，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之事。【明明代岭南著名诗人孙責，在都门犯罪被逮充苦力，“望都门讴吟，为越声”。t2°）所吟唱的也是越讴。不过，汉代、明代的越讴是什么样的已无从得知。

现时所说的粤讴，形成于清嘉庆年间，是由岭南名士冯询、招子庸在木鱼歌、南音的基础上，改变腔调而创造出来的曲种。冯询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招子庸编撰的《粤讴》一书在道光八年（1828）由广州西关澄天阁出版，收入粤讴97题21首，并附有曲引和方言凡例。粤讴初期多为画舫歌妓所唱。《粤讴》面世之后，在广州方言区广为传唱，由于该曲集第一首为《解心事》，故粤讴又得称“解心”。郑振锋的《中国俗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都给予招子庸很高评价。郑振锋评价《粤讴》是“好语如277

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2'】。此书不仅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占有地位，而且进入了国际文坛。1904年由香港总督英国人金文泰（一译克里门蒂）译为英文，改名《广州情歌》出版，介绍到欧美。后葡萄牙人庇山耶氏把它译为葡文出版。

招子庸之后，不少文人学士步其后尘，撰写了大量粤讴作品。1901年，就有署名“香迷子”编撰的《再粤讴》出版。这段时间的粤讴，内容多是身世感怀，男欢女爱，尤其是对下层妓女悲慘生活的披露与同情，《吊秋喜》、《除却了阿九》是代表作：但也有以时事为题材思想性较高的，如抨击鸦片贩子和外国侵略者的《颠地鬼》、《义律鬼》，歌颂禁烟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颂林制军》。《颂林制军》以调侃的口气，讽剌和適责了清廷和奕山的卖国行径，歌颂了林则徐的忠诚爱国：

你真正系笨，做乜苦苦要做忠臣？纵然忠烈，有几个明君？有道正好做官，元道要隐。好臣用计，重办乜夷人？虽则你系报国精忠，原是本份，总系圣人远隔，，黑白难分。你睇人地做官，重有连升品，战而无计，用了六百万餘银。好比你系岳飞，同佢一样饮恨，将近成功，调佢转身。被贬伊犁，心又怎念。唉!心不忿，忠臣难见信。等我四面城门来关紧，炮台整过好让过夷人。

道光末年以后，粤讴演唱逐渐中落，但作为俗文学形式仍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不少具有民主革命思278

想的文人编撰出大量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内容，介入社会，鞭挞丑恶的新粤讴作品，如揭露清廷、军阀和保皇党的《吊李莲英》、《你唔好死住》、《知道有今日》、《地无皮》、《兵过似箆》、《一味构陷》等：歌颂民主革命的《黄花颂》、《女英雄》、《英雄泪》等：提倡民主自由的《自由钟》、《开民智》、《复民权》、《想钳制报馆》等。大革命时期，粤讴常见于报刊。省港大罢工期间刊行的《工人之路特号》就登载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粤讴。

粤讴可以清唱，也可以合乐，多以琵琶、洞箫、扬琴伴奏，旋律悲凉沉郁，节奏舒缓，适宜于表现伤春怨梦、别绪离愁的情调。唱词以七字句为主，间以十字句。但单句的格律要求很严，行腔滞板简单，故民国以来传唱的人越来越少，民间已少有人习唱。现在已很少作单独传唱的，只有号剧或粤曲中作为一种曲牌使用，人们尚能听到保留有粤讴韵味的“解心腔”。

粤语说书俗称“讲古”，是艺人用广州方言对小说或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和讲演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

粤语说书的特点是以表（旁述口气）为主，讲究语言的韵律性和节奏感，大量运用本地的民间成语、谚语、谶语、俗语和大众化的生活语言，并借鉴戏曲中的一些表演技巧，对书目进行润饰。

据说明末江苏说书大师柳敬亭当了抗清将领左良玉的幕客，随军南下把说书艺术传到广东，因此有了粤人说书，故而广州的说书艺人尊柳敬亭为祖师。早期的说书艺人多在寺279

庙门口对香客讲演“劝世文”，后来自搭简陋的“讲古寮”，或在街头“开街档”，或在中下等茶楼设点。清末，讲古佬先生连”在东较场搭草寮开讲，以炷香计时收费，自此讲古多以一炷香为时段计时收费。茶楼为招体生意设“古坛”讲古，主客按茶数三七计分。“开街档”的艺人在人群聚集地方拍下手掌，大声吆喝：“讲古啰，有嘢听!讲个……”人们便聚拢上来听开讲，艺人则在讲至精彩处卖个关子收茶水费，有些艺人还兼卖些甘草榄、陈皮、话梅之类的凉果补助收入。后来有了电台，个别水平较高的艺人就被请到电台做讲古节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干臣、李我与邓寄尘分别在广州的广播电台开讲长篇书目，备受大众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文化公园和一些文化宫、俱乐部开设固定的说书台，在电台设有说书栏目。代表性书目是《杨志卖刀》、《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供五义》、《李自成》等历史故事和革命故事《雷锋》、《红岩》等。广州的讲古行业由盛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到80年代，已日显疲态。1996年广州文化公园取消了讲古，1999年陶陶居茶楼“西关古坛”关闭，2001年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讲古坛转营卡拉0K。作为广州最后一代的一位讲古人颜志图为谋生计转行当上武术教练。几年前，这位讲古人登广告招收了10个学徒，免费传授讲古绝活，不到一年时间这些学徒就全“失踪”了。颜志图将多年来自己及老艺人的积累经验整理写成10万余字的《讲古艺术研究》，至今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据颜志图看来，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是令这个老280

行当走向式微的主因。（22）针对这一情况，2004年，广州市越秀区文化部门为挽救讲古行业，在改辟为区博物馆的五仙观门前广场定期设“越秀古坛”，邀请颜志图免费向市民讲古。但是，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讲古作为一个行业的消失，在加速变化的珠江三角洲恐怕是难以挽回的了。

相声原是流行于北方的曲艺形式，建国后，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以及电台广播相声段子和外地曲艺团体南下演出，相声渐为粤语地区辞众所接受。1958年广东音乐曲艺团演员在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观摩会演后，学习相声并开始尝试用广州方言移植相声，在广州成立了粤语相声艺术团、相声艺术学会，在广州举办了群众相声比赛和中小学生相声大赛。除了改编之外，还创作出了《大不相同》、《虾仔入城》、《学戏》、《生死恋》、《打破常规》、《广州话趣》等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作品。相声一度受到群众的欢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号语相声日渐低迷，其原因与全国的相声行业的低迷有相同之处，而粤语相声从选题到语言的过于世俗化，也是与新的时代背景下欣赏要求不断提高的观众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的重要原因。

四、岭南琴派

广东的古琴音乐拥有独有的演奏曲目，历代都有传人，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自成一派，称为岭南琴派。岭南琴派主要活动在珠江三角洲，在中国古琴诸流派中自成一派。

281.秦汉时期，中原的古琴文化已传入岭南，广州南越王墓东耳室中出土有南越古琴，出土时琴的木胎已朽，只能从仅存的37个铜琴移推论其应该有一件七弦琴和至少有三件十弦琴或六件五弦琴。【n）南北朝时期粤北曲江人候安都善鼓琴。南宋末年，宋室南迁，更把中原的古琴文化带来广东，相传《古冈遗谱》就是当时留下的南宋宫廷琴谱。宋以后，广东的琴学开始昌盛起来。

明代以后，广东出有不少琴家。明末陈子壮等南园十二子亦多琴家。陈子壮之弟陈子升所藏的唐大历四年（769）造“绿綺台”及“风凰”两琴，邝露所藏的唐武德二年（619）造“绿结台”琴，清人潘仕成海山仙馆所藏的唐代名琴“天蚃”琴，均流传至今，是藏于广东的古代名琴。

清道光年问，新会人黄景星曾到粤秀书院就读，学琴纂谱，自成一家。受两广总督阮元所聘到学海堂书院任教琴谱。他把其父手抄的《古冈遗谱》中的三十多首曲谱，加上乃师何洛书传授的十余首曲谱，经过订校，整理成《悟雪山房琴谱》四卷，于道光十六年（1836）刊行。这些遗谱，据说是陈白沙抄录下来的南宋行朝驻脾新会圧山时留传下来的王室秘本，既保存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又兼有岭南地方文化的意味。这一琴谱中有未见于其他流派的著名曲目《乌夜啼》，有与其他流派相异较大的《渔樵问答》，也有与其他流派的谱近似而演奏风格却有很大差距的曲目，从而使岭南琴派拥有全国最古老的琴谱。黄景星与邑人琴友在广州组织琴社，切磋琴艺，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刚健、明快、282

爽朗的风格，对岭南琴派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开创作用。

近代，岭南琴派有众多的琴家，如中山的郑建侯、广州的容心言等，进一步发展了岭南琴派。

当代，影响较大的古琴家，有番禹人杨新伦，从艺60多年，早年在上海学琴，先后在上海、天津、沈阳、广东等地从事琴艺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回广东任省文史馆馆员，悉心从事古琴事业。

曲高和寡的古琴在现代因种种原因一度到了灭绝的边缘。20世纪80年代，省音乐协会成立古琴研究会，杨新伦担任会长，主持开展古琴的演奏、广播、录制、研究等活动，并先后授徒数十人。师从杨新伦习琴的区君虹，自幼习医习武，醉心于书法篆刻，从弹琴、识琴到修琴，进入另一番艺术境界，成为集古琴演奏、修复和研制于一身的古琴艺术家。199o年杨新伦逝世之后，谢导秀接任古琴研究会会长，极力发杨光大这种高雅音乐。谢导秀认为：“兼容并蓄正是岭南古琴能够发扬下去的秘密”，他从其他民族器乐移植了许多优秀曲目，如古筝曲《平湖秋月》、《高山流水》，用古琴演奏出来别有一番韵味。现时琴友每周末在大佛寺、每月末在海珠区邓世昌祠（区博物馆）雅集。古琴艺术继昆曲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岭南古琴艺术发展的一个契机。2003年，越秀区在省内成立了第一个区级古琴社一南越琴社，定期组织古琴爱好者在五仙观内表演交流古琴演奏技艺。近年来，在广东一带，学琴者也越来越多，但出于商业演出的动机与家长望子成龙而送子学琴者多，真正为抚琴自娱陶冶情操者是不多的。

283注释：〔1〕《肇庆文物志》第30页，广东省新闻出版局1996年版。

〔2〕盖山林：（中国岩画》第18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OC14年版。

〔3〕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

〔4〕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301-310页，广东人民出版杜1993年版。

〔5〕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30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转引自黎田、黄家齐：《粤乐》第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一

〔8〕据（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部伎分为二：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立都伎有八，其中《安舞》、《太平乐》为周隋遗音，《破阵乐1杂以龟兹乐，《庆善舞》专西凉乐。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使，坐部伎有六，其中《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小破阵乐》用龟兹舞。“兴王之舞”指《七德舞》、《九功舞》之类：“服夷之伎”指西凉伎、天竺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之类。

〔9〕《南汉书》卷3《殇帝本纪1）。

〔10〕范端昂：《粤东见闻》。

〔11〕黎田、黄家齐：《粤乐》第4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朱道忠：《广东音乐乐汇中的音形》，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86年第3期。284

〔13〕余其伟：《广东音乐述要》，载（羊城今古）1995年第1期。

〔14〕余其伟：《广东音乐，民间热专业冷一建设文化大省应重视这一海外流传最广的广东艺术），截《羊域晚报）20a3年10月28日。

〔15〕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粤歌》：“」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一一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連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日'模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或使管师唱之，如元人弹词目'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乃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竞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踏歇者，不用弦索，往往引连物类，屈曲譬11ii，多如《子夜》、（竹枝》。”

〔16〕王士祯：（广州竹枝》，杨资元、黎元江主编：《英雄花照越王台》第259页，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17〕余其伟：《广东音乐，民间热专业冷一建设文化大省应重视这一海外流传最广的广东艺术》，载（羊城晚报》2003年1o月28日。

〔18〕梁培炽：《南音与粤讴之研究》，旧金山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8年版。-

〔19〕欧大任：《百粤先贤志张买传》。

〔20〕《前翰林典籍孙公責》，黄佐：《广州人物传》第十二卷。

〔2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453页。

〔22〕莫伟浓摄影报道：《飘逝的讲古声》，载《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1日。

〔23〕《西汉南越王墓》第46页，第四章《东耳室），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28S

第十四章岭南画派

-、早期的岭南美术

在珠江三角洲、南海沿海岛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晩期彩陶纹，南中国沿海香港、珠海、澳门等地的远古岩画，以至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前室的壁画、出土玉雕图案以及铜提筒上所刻的羽人船图，说明了广府地区美术在新石器时代的发源以及在秦汉时期的发展。然而，明代以前，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原内地的美术史相比，岭南的美术发展是缓慢的，即使在较多接受中原等北方文化熏陶的粤中地区，留名中国画坛的画家也为数不多，更说不上有什么流派。较为出名的，有唐代南海人张淘、僧徽，分别以善画吴山楚岫枯松怪石和善画龙出名。

明清两代，广府的绘画有空前的发展。

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后，见于绘画创作中，山水286画、人物画、花鸟画、道释画等各种题材，已无所不备。出现了一批富有个性的画家。

-明代南海人林良，是第一位以擅长花鸟画名震宇内的岭南籍职业画家，与浙江名师吕纪齐名，时人有.“林良吕纪，天下无比”之誉。他的花鸟画，既有工笔设色，又有水墨写意，二者都有很高造诣。他对水分和墨色把握得宜，而又极重形似，被誉为“自然界的写实主义者”，“是广东精神在画家身上最初的发露，尤其在他的写实派的写实倾向，隐然潜伏着现代广东画家的写实运动的最初的胚胎”。t'1

岭南学坛的宗主陈白沙在他的“业余艺事”之中，以书法为多，也偶画花鸟。其画作虽已不复见，但从史籍的一些文字记载之中可窥一斑：“陈白沙飞自竹直幅，竹三竿，空勾不设色，下作一石如蹲狮，润以赭黄，疏花间之，花朵亦空勾，不设色，清奇无匹，名儒手笔异人乃尔。”（2）陈白沙还有多首题画诗传世，他所主张的纯任自然、洒然自得、书画怡情的人生态度，对岭南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顺德人李孔修，字子长，善画禽鸟动物，“尤善画猫，毛骨如生，鼠见惊走”o民间有“李子长活画”之传说。

东莞人张穆，以画马著称于世，每得良马，便“饮食坐卧其側”，重写生而又强调形神兼备。

顺德人黎简，号二樵，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善画山水，“他生当委东派盛行之际，但能潜奇造化、取法自然，脱窠日而不为所拘，取众长而臻于独步，使岭南四季如春、色光明艳的景色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几乎接近现代水彩画的作287288

品上”。〔3）“黎简的意义和地位的问题，就不完全在于他的作品的实际成就，而在于他以其自创的面貌、博采众长而又大胆操为的解放精神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为广东绘画的发展注入了一种生动的活力。”【'）

道光以后，驰誉于广东画坛的画家是并称为“二苏”的顺德人苏六朋和苏仁山。苏六朋，善画山水、花鸟，尤擅人物。所作人物画既有历史题材，更以描写现实生活的民间风俗画为特色，代表作有《群盲聚斗图》、《吸毒图》等。苏仁山，工人物，兼画山水、花卉，直接用焦墨及草书的笔法画人物，有鲜明的独创性。

上述画家成就不同，笔下的花卉人物山水题材也不同，但在艺术主张上及表现手法上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富于个性表现，不为传统技法所拘泥，重在师自然写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从他们身上，可以察觉到后来的岭南画派一些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

明万历年间，已有西方传教士将宗教油画带入广东。16世纪末，有传教士在澳门传授油画，培养和造就了中国最早的西画。清代，18、19世纪在通商口岸的广州，出现了以制作外销油画为业的中国画家群，他们是中国人画西画的先驱者。其创作题材以写实为主，包括风景、人物、花鸟和城市历史的方方面面（甚至有关刑律的题材），绘画技法则有油画、水粉、水彩画。在广州生产的以外销为主的陶瓷器、漆器和十三行商馆图案上，也采用了透视技法。广州的画家很快熟练掌握了西方绘画的技法，有的画家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表现方式。这批画家以技法高超和作品甚丰的“林呱”为代表，有“林呱学派”、林呱画派”之说。道光年间，在澳门学得西画的道士李青来还奉命制作了一批油画作为广东向朝廷的贡品。

广东还是中国近代漫画的发源地，兴中会的三号人物谢缵泰创作于1898年的《时局全图》是中国第一幅具有近代意义的漫画。在孙中山授意下，同盟会的潘达微把创办的同盟会第一份机关刊物《时事画报》办成了发表漫画的主要阵地，催生了中国漫画这一新的独立画种。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也是《时事画报》的创办人之一。

这些有地区特色的美术创作活动，显示了广府地区文化活动的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得风气之先的兼容性和变通性，直面社会、关心民生的鲜明的平民性、革命性，以及明显的商业性与功利性等各种特点，表现出一种不園于传统而敢于与世界接轨的眼识与实践，也说明了在20世纪之初在广府地区诞生了高扬折衷中西的艺术革命大旗的岭南画派并非偶然。

二、岭南画派的形成

与岭南画派的开创有着直接的师法渊源的，是清末的番禺二居一居巢、居廉。二居为堂兄弟。居氏原籍江苏扬州宝应县，先世来广东做官，定居番禺，祖父及居巢之父曾任县官，居廉之父是郡庠生，能诗善画。是为书香世家。居巢精诗词，檀金石，尤长于书画，远师挥南田，近事江苏入粤28929

的花鸟画名家宋光宝、孟觀乙，既受恽南田“写生正派”极大影响，又师承宋、孟没骨花卉画法，善用“撞粉”、“撞水”法。据说他不分日夜，常于草间林下细察花鸟草虫的情态，下笔之际，神气活现，栩栩如生。道光年间，居巢应出任广西地方官的东莞人张敬修之聘，游幕广西。居廉自幼家贫失学，由居巢带往广西并学画，其诗文、书法修养虽有先天不足，却能以勤补之，画艺大进，渐与居巢齐名而并称二居”。咸丰五年（1855）张敬修落职返家乡，在东莞修筑可园，留二居在园中盘桓，写生作画。九年后，张敬修死去，二居返回番民隔山乡（在今广州海珠区）建十香园居住。不久居巢病逝，居廉在十香园设馆课徒。他身为名家，仍不忘造化自然，观察写生细致人微，如谓“蝶又分春秋两种：置于春花者则翅柔腹大，以初变故也：置于秋花者则翅劲腹瘦，以将老故也”，故能一丝不苟地将草林虫鱼精确地描绘出来。对“撞彩”、“撞水”之法的运用更为得心应手。正是由于二居的努力，将恽派清丽妍妙、雅俗共赏的纯没骨写生花鸟画沿着刻画更精细、色彩更浓郁、形象更鲜活的方向推进了一步。居廉一生動于动笔，在十香园培养门徒数十，私淑弟子近百，在清末的咸、同、光三朝雄踞广东画坛数十年，形成了以“居派”（或称“隔山派”）花鸟画为主流的粤画新局面。他的不少弟子卓有成就，尤以末期学生高剑父、陈树人最有建树。由于高、陈二人与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开创者，被世人誉为“岭南三杰”，故而十香园被誉为岭南画派的摇篮”。

岭南三杰都有在政治风暴中投身革命的经历。

高剑父名崙，以字行。番禺人，家贫失学，13岁随居廉学画，動奋用心，到了入迷的地步。15岁时，拜师兄伍德彝为师，得以遍阅伍家及广东几位大藏家的藏品。17岁时，至澳门岭南学堂就读，得从法国画家麦拉习素描。1906年东渡日本，翌年考人东京美术学院，研习东、西洋画法。他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旋被委任为同盟会广东支会会长，领导南方革命运动达8年之久，屡举义旗。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高剑父加入选锋队（敢死队），冲锋在前。此后，担任“支那暗杀团”副团长，参与组织策划暗杀镇压三二九起义的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州将军风山的活动。辛亥革命后任东路军总司令，率部收复虎门要塞。广东光复后，各路兵马争任都督，高剑父首先解散部众，联合诸将领设立海陆军团协会”以控制局面。各军将领共推他为广东都督，他坚辞不就，宁愿投笔从艺，以笔墨画技效劳革命。

高奇峰为剑父胞弟，因家贫寄食他人家中做佣人。高剑父任职教书之后，高奇峰才得以留在家中，在哥哥指导下苦练绘画。他在高剑父之后也东渡日本求学，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又与高剑父同时回国投身于发动起义，日间为联络同志奔波，夜间安寝于底下满贮炸弹的床上，全无惧色。

高氏兄弟俩在日本学习美术时，开始将西洋画的透视、明暗技巧运用于国画作品之中。回国后，即使在紧张战斗的日子里，.也都没有放弃画笔。1910年，他们在广州举办画展，受到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岭南二高”的美誉即始于此。民国291292

之后，高氏兄弟同赴上海，创办了最早印行美术作品的审美书馆，出版了《真相画报》，向全国展示了岭南画家的艺术风貌，开始形成了“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岭南画派。

二次革命失败，二高流亡日本，高剑父第一批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高剑父回国。此后二高致力于艺术革新事业。孙中山逝世后，高剑父公开表示永不做官”、“不问政治”，把精力放在培育艺术英才上，创办了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广州市立艺术专门学校，培养出一大批画坛俊彦，对当代影响较大的有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何磊、黄独峰、赵崇正、容大块、方人定、司徒奇、苏卧农、杨之光、陈金章等人。1929年，高奇峰因患病迁居二沙头疗养，在那里建了座“天风楼”，除了养病作画，还设帐课徒，从学者有数千人之多，其中较有建树的是并称为“天风六子”的黄少强、叶少秉、张坤仪、赵少昂、何添国、周一峰。二高之画作，其题材、技法对传统国画都有大胆的突破与创新。二人之艺术风格则各有千秋：剑父擅长花鸟、山水、走兽，.风格奇拔苍茁：奇峰写生有独到功夫，翎毛、走兽、花卉，风格雄健俊美，把居派的“撞水”、“撞粉”与西洋彩画技巧的结合，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简又文曾以“用笔灵巧，敷色鲜润，写生肖妙，韵致趣逸”十六字概括其特点。tS）

二高”之外，岭南派的开创者还有“一陈”，就是番禺人陈树人。他是居廉的关门弟子，聪明動奋，很得居廉器重，将侄女居若文许以成婚。陈树人在青年时以笔鼓吹革命，1905年加入同盟会，翌年赴日学习美术并开展革命活动。学成归国，从事美术教育。曾受孙中山委派赴任国民党加拿大维多利亚总干事数年。1922年归国，恰闻陈炯明叛变，马上离别妻儿，冒险登上永丰舰誓与孙中山共生死。他以国民党元勋身份，历任国民党、国民政府高层职务，却无心功名利禄，始终保持学者、诗人、画家的品质和风格，自谓“吾生也更无他愿，得作江南一画师”，“艺术为国魂，推陈出新，予将以此为终生责任”。他的作品风格讲究线条优美流畅，构图新颖独特，格调追求诗意，较“二高”之画更具温文尔雅气息。

1926年，高剑父在广州主持筹办了第一次全省美术展览会，以“二高一陈”为代表的岭南画派创新国画，在这次展览中崭露头角，引人注目。“二高一陈”之中，高奇峰在画坛最活跃，影响最大，有“画圣”之尊称，但他于1933年筹备在德国柏林召开中国艺展时旧病发作逝世，年仅44岁。陈树人于1948年逝世于广州。他为人耿直清廉，一生淡泊，家无余财，靠卖画得款作治丧费，令艺术界同仁十分敬佩。高剑父潜心致志于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1951年病逝于澳门。在他的《美术节语录》中，大声疾呼：“自然之门大开，即艺术之门大开，尽可任我们予取予携，收诸眼底，发诸毫端，宇宙万物，莫非我的模特儿呢!”“艺术是进化的、创作的。应一创再创，创之又创：一进再进，进之又进，以至于无穷。”（6〕这些话，饱历烟尘，至今依然吟啸生风。

二高一陈”既是满腔热情投身革命的民主革命者，在293294艺术创作上也是大胆的革新者，他们将东、西洋画法结合中国画法的优点，大胆地改革国画，创立时人所称的“新画派”（也有称之为“新派”、“新国画派”、“革命画派”）。还常以联展或师生联展的形式在广州、上海、南京及香港、换门等地举办画展，产生很大影响。由于他们与弟子大都是岭南人，故从30年代后期起，就有人称他们为“岭南画派”。但是高剑父本人对“岭南派”的名称并不同意，认为此派不应局限于岭南，他宁可自称为“折衷派”，其意为博采众长，合于一身。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岭南派”这个名称，而且已经造成广泛的影响，“岭南派”的名称便约定俗成了，《辞海》中也收有“岭南派”的条目。

二高一陈”被公认为岭南画派的开山祖师。门人中的黄少强、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颇有造诣。这些画家秉承岭南画派创始者的画学传统，在革新中国画的基础上各自形成风格：赵少昂形神皆备、注重意境渲染的花鸟画，黎雄才雄壮奇伟、大气淋漓的山水画，关山月集雄伟与秀丽为一体的山水画等，各显所长。他们都开馆授徒，画风薪火相传，流布海内外。

三、岭南画派的特征

岭南画派，是产生于岭南地域的画派，却不是整个岭南地区都流行的一个画派。例如，现代名画家赖少其就说到，他不是岭南派，说岭东派还可以。【7）姑不论赖氏所说的岭东派是否成立，而其表白自己不属岭南画派之态度已很明确。

关于岭南画派的定义，《广东百科全书》只说是“现代中国画流派之一”【°11。《广州百科全书》所述也大致如此：“20世纪20年代崛起于中国现代画坛的中国画流派。”（9】《辞海》1999年版有“岭南派”条目：“近代中国画流派之-。广东番禺高剑父（崙）、高奇峰（嵡）兄弟和陈树人（哲），早年师事花鸟画家居廉，后留学日本进修画艺。他们的作品，多写中国南方风物，在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日本的西洋画法，注重写生，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丽，别创一格，人称'岭南派'”。【'°J作为一个画派，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应当表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宗旨，《辞海》的条目尚未能尽言岭南派的艺术宗旨。高剑父的高足杨善深曾概括评价高氏兄弟：“盖皆娴于国画，参以西洋画法，创为新中国画，开一代宗派，且寓艺术于革命，故其名益彰。”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广东风物志》称：“岭南画派是近代中国画的一个流派，它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和民主意识的勃兴而诞生，具有时代的创新精神，是中国画的改革派。”〔''）这个概括也是比较全面的。岭南画派的重要特征是革命进取的精神、兼容写实的画风、别具一格的技法，从本质上反映了广府文化兼容变通的特质。20世纪40年代，黎雄才遍历西北旅行写生，当时的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冯国瑞有七言长古《岭南画派歌》为他送行，诗之开头即云：“岭南決決革新功，气倾百代凿鸿濛，其于艺事依然同，挟东西295洋求会通”C'2）。可谓一语中的。

岭南画派的祖师们提倡一种时代的革命精神，以此为创作的原动力，并将其融入作品之中。高剑父的艺术革新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孙中山政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艺术革新与政治革命是连在一起的，他曾激昂地呼吁：“广东为革命策源地，亦可算是艺术革命策源地!”t'：：】高剑父说到：“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艺术实有革新之必要。”【'4〕他认为：“现代中国画是离不开现代中国的革命需要的。艺术家要从高处大处着眼，为着革命的未来的发展，配合着目前各种需要，而努力增进自己的修养。”（国陈树人曾对高剑父说：“中国画至今日，真不可不革命。改进之任，子为其奇，我为其正。”〔'6J因此，岭南三杰不但身体力行地充满时代激情地投身革命，在革命活动中显示了一种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夺取政权之后，做到功高不居功，淡泊名利地位：而且以革命的激情和情操创新国画，从题材和技法上都有一种勇于探索的全新气概。

他们大胆提倡表现新的题材。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高剑父在创办《时事画报》时，就与画家何剑士以国画笔法画过不少宣传革命或讽刺时弊的作品。他在山水画中画过电线杆、飞机、汽车等现代事物。抗战时期他鼓励学生画抗日救亡的题材。他的《东战场的烈焰》一画，体现了综合西画的透视法则与传统水墨画的用笔技巧的新收获，成为代表性杰作。他们还极力主张描绘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现实的题材。高剑父说：“他若民间疾苦、难童、劳工、农作、人民生活，296

那啼饥号寒，求死不得的，或终岁劳苦、不得一饱的状况，正是我们的好资料。不一定要画那琼楼玉宇、明皇赢浴、贵妃醉酒、蓝采和与何仙姑'拍拖'!也不是除了'荒江老屋'、'山市晴岚'，便无着意处。五都三市、十里洋场，又谁不许你搬上画面呢？”（'7J这一时期的岭南画派画家反映平民大众生活题材的名作，便有关山月的《从城市撤退》、方人定的《雪夜逃难图》、黄少强的《洪水流民图》等。

他们提倡博取众长，一炉共冶。主张吸取外国的摄影、透视等方法和东、西洋画的优点，同时注意继承中国画的优秀传统技法。高剑父认为，历代各宗各派画家都有长有短，后人不能定于一尊，要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同时，也不分中国外国，都可以去芜存精，创立出一种不脱离民族风格而又推陈出新的现代新国画。“新国画固保留以上的古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条件，而加以补充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如'投影'、'透视'、'光阴法'、'远近法'、'空气层'，而成一种健全的、合理的新国画。”o9〕“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技法。”“希望这新国画，成为世界的绘画。”（'9】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岭南三杰”最早提出并在实践中调和中西画法。他们提倡技法上的创新。重视写生，师法自然，认为画家必须走出画室，接触生活。在画法上采用西洋画的透视法、阴阳分明，有影有光，彻底抛弃勾勒、匀色，而基础仍以国画为功底，除撞水、撞粉外，更喜用撞色（一笔数色），成为岭南画派技法上的一个突出特征。从表现物象的实效出29298

发，他们不仅熟练地运用了古人的浓、焦、积、缩、泼等墨法，还增加了流墨法和印染法等。同时又提倡要有自己的个性与自己的面目。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特点：高剑父笔法雄浑，神在画外：高奇峰刻画明快，细膩入微：陈树人轻微淡远，韵味清逸。“二高一陈”的画风其实并不一样，“如果把高奇峰的艺术风格与高剑父、陈树人作一比较，可以认为，高剑父奇拔苍拙，陈树人秀雅淡逸，高奇峰则是雄健与俊美兼而有之。”【2°）

四、岭南画派的走向

岭南画派的祖师中，高剑父桃李满天下，高奇峰也有足以光大师门的弟子，只有陈树人“但开风气不为师”。岭南画派的一代传人活跃于岭南画坛上，后来还扩散到海内外，从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群芳竞技的灿烂局面，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被誉为当代岭南画派四大画家。关山月山水、花鸟、人物倶能，与傅抱石合绘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厅的《江山如此多娇》巨画，为岭南画派争得顶峰光彩。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图解化的创作影响了关山月向全新格调的冲刺，但纵观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道路，还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岭南画派的进取精神。黎雄才将北宗之雄峻奇丽与南派之温润清雅融成一炉，创立了岭南画派个性鲜明的山水画风，得来美术界“南黎北李（可染）”的并称。赵少昂擅长花鸟虫鱼题材，其光鲜明艳、细腻活泼的设色和工意结合的笔法，达到雅俗共赏的难得意境。杨善深以笔墨豪放，尤以写生动物之生机生气著名，有“虎王”之称。这四位画家，堪称大师，又各有很高成就。此外，岭南画派传人还大有其人，且各有所长。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岭南画派从崛起到鼎盛，曾经与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流派之一，在国内外颇有盛名，在广州美院风靡一时。

还在岭南画派方兴未艾之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就已有真知灼见：“这画派（指岭南派）已博得世界上艺坛不少同情。可是这方法，是不是一定要这么画的，永远地这么画？此不过对我国现在的环境而言的，换言之，是占据了现代一个时代的地盘罢了。在进化史上说，一时期有一时期的精神所在。绘画是要代表时代、应时代而进展，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了。”“这派将来究竟变到怎样，进化到怎样，或成为更新的未来派，或未来派的未来派，也未可知，恕我不能为此预言的本领吧。”t2'】进入21世纪，岭南的画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自我标榜的“后岭南画派”，“看来声音正好出自广州美院，那就更值得注意了。使人感到好像后院起了火，很不简单”。（n）有论者提出，“后”字号的出现，是革命而不是改良，是对前者的否定而不是延续，“后岭南画派的崛起，也就是岭南画派的终结”。（23）

事情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2003年，《羊城晩报》专门组织了“岭南画派该画句号了吗？”专栏讨论。发表的意见颇有些针锋相对，有说“画句号为时过早”，有说“该画句号了”。“为时过早”论者认为：“岭南画派是广东文化第一29930

品牌，是载入《辞海》的中国唯一的画派，这是粤人的骄傲，我们不应自轻自贱……岭南画派还应该有一段发扬光大的路要走。”（21“该画句号”论者认为：“在世界艺术史上，当然不存在任何超越具体时空规范并历久不衰的艺术流派。”“正是那些乐于自诩为'岭南派画家'的'岭南画派门人'或'岭南画派传人'，在实践中彻底地抛弃了本来意义上的岭南画派的声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在形式上做了一些依样画葫芦的工作之外，在艺术上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珍贵的精神遗产之一，岭南画派仍然会在各种阐释体系中产生复杂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岭南画派能够长盛不衰。”t2S〕

岭南画派创始人所提倡的“革命加艺术”的精神，是以风云变幻的特定的时代为背景的，岭南画派祖师那种以革命为己任，在艺术创作中表现为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其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中都锋芒毕露，在当时的社会界和艺术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这种革命精神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扭曲，从斗士一度变为配合政治需要的宣传图解。此后，在岭南画派传人中又基本表现为以鸟语花香、青山绿水为主题，以秀雅、温熙为审美定势，已经全然不见那种“革命加艺术”的态势了。更不要说在不少自诩岭南画派的传人中，以形似祖师为足者众，尚没有出现传承风格又独树一帜的公认的新一代的岭南画派艺术大师。另一方面，岭南画坛一些颇有成就的画家，对于岭南画派之称，由于某种原因也不俯就。高剑父的大弟子方人定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不要重提岭南画派的动议。（26〕

跟高剑父学过画也跟徐悲鸿学过画的杨之光坦言“我不属于哪一派。因为以前有人说我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或新一代的岭南画派，我说你们错了，他们是我的老师，我没有加入派。……我所努力的不是为哪一个派争光，我搞自己的派，叫做'杨之光派'”。（n）诚然，从创作原则与艺术技法上说，岭南画派首先提倡的中西折中、共冶一炉的艺术创作原则，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充分肯定，这种精神已经在国画界得到发扬光大，在当代已经不只是岭南画派一家的主张和实践以及独有的艺术特征，而已成为一种超越流派的相当广范围的共识和实践。在目前和今后，岭南画派创始者的革命精神还会激励一些画家继续奋斗，还会有认真華仿岭南画派祖师画风、技法特征的画人，还会有许多认真研究岭南画派真谛者，但这和一个画派的延续应当是两回事，正如现代的油画家还大可以研究“点彩派”、野兽派”、“抽象派”的手法在新时代的影响，采用其艺术手法进行创作，但是在世界美术史上，这些流派无疑已经成为曾经辉煌的一页一样，艺术应当与时俱进，岭南画派应不应该写下句号，不在于哪个人主观的结论，而在于它能否解决好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仍保持其特有的创作宗旨，以及如何在保持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的前提下继续创新的命题。301302

注释〔1〕任真汉：（广东的绘画一看广东文物展览会陈列的绘画后试评》，载《广东文物》第687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2〕《玉雨堂书画记》，转引自汪兆铺（岭南画征略》第36页。

（3〕谢文勇：《广东画人录》第235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4〕李公明：《广东美术史》第5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转引自周锡馥著《岭南画派》第97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6〕高剑父：《美术节语录》，原载1949年《市艺》创刊号，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38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李育中：《迎新送旧，势有可行一由一个画派到另一个画派》，，载《羊城晚报》2003年7月16日。

〔8〕《广东百科全书》第5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版。

〔9〕《广州百科全书》第4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杜1994年版。

〔10〕《辞海》第22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11〕（广东风物志》第236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12〕转引自周锡馥：《岭南画派》第123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13〕高剑父：《由古乐说到今乐》，原刊1949年4月30日（市艺）第2期，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38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221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5〕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24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6〕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230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7〕周锡馥：《岭南画派》第105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18〕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22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23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李公明：《高奇峰艺术论》，转引自周锡馥：（岭南画派）第97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21〕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金f父诗文初编》第23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杜1999年版。

〔22〕李育中：《迎新送旧，势有可行一由一个画派到另一画派》，，载《羊城晩报》2003年7月16日。

〔23〕黄一瀚：《后岭南画派的崛起与岭南画派的终结》，载《羊城晚报》2003年6月29日。〔24〕唐朝人：《画句号为时过早一陈金章教授访谈录》，载（羊城晚报》2003年7月16日。〔25〕李伟铭：《漫说“岭南画派”》，载《羊城晚报》2003年6月29日。

〔26〕黄大徳：《该画句号了），载《羊城晚报》2003年7月16日。

〔27〕吴小攀：《我是“杨之光派”），载《羊城晚报》2004年4月10日。303

第十五章广府诗坛

-、早期的粤中诗歌

粤地民歌十分发达，“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粤人好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如《史记》就载有汉代越人张买“鼓棹能为越讴”之事。粤地民歌对岭南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直到近代，诗人招子府还记录下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粤讴，为中外文坛所注目。历代岭南的官员和文人都很注意收集和刊印民歌。清代诗人李调元在广东任提学使期间，将粤地民歌和谣谚收辑其所编写的《粤风》、《粤东古观海集》、《粤东笔记》等书中。这些书所收集的民歌，主要是粤中一带的民歌。

东汉时番禺人杨孚所著的《南洲异物志》一书中的赞语，被认为是岭南诗歌创作之发端。此书虽已散佚，但从遗存下来的残卷赞文中也可见一斑。304

例如《榕》：

榕树栖栖，长与少殊

：高出林表，广荫原丘

：孰知初生，葛蘲之俦。

此诗采用四言韵语，言辞优美。诗中赞美岭南各地长得特别茂盛的榕树，有着特别旺盛的生命力，寄托着作者的审美趣味及志向。虽然在写作手法上明显吸收了楚辞比兴的手法，却开了岭南文人诗先河，而且体现了以事寓意的地方特色。

唐以前岭南诗歌传世之作不多。但从残卷散篇可以看到粤中的诗人们仍然继续沿着文风清新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着诗歌，既受到中原诗歌格式之影响，又显示出长于咏物言志，有一种清高孤倣之气的特点。南朝陈代时，番禺人刘删被誉为“岭左英奇”。《艺文类聚》中存留有他的9首诗，语言清新，不流于六朝结靡俗艳之时风。《独鹤凌云去》以孤鹤寄意，抒发乱世中避祸游子的思乡之意，情调哀怨而意兴高远：

孤鸣思造海，矫翻避虞机。

怨别凄琴曲，凌风散舞衣。

五里虽回顾，千年会欲归。

寄语雷门鼓，无复一双飞。

t2J在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唐代，岭南也受到熏染，出身于粤北寒门庶族的张九龄，在政坛上以其贤相风度为人所敬重，同时也是开岭南一代诗风的的巨匠，被唐玄宗称誉为30S306“文场元帅”，赞其所作之诗“自有唐名家皆弗如，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

张九龄的诗博采《诗》、《骚》之长，发展了前代岭南诗咏物言志的传统，自成一格。他的诗多写景、咏物，抒情诗喜欢用略带浪漫气息的象征手法，来表达对美的颖悟和追求。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诗句为千古绝句。张九龄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耿介不阿的性格，有“雄厉振拔”、“骨峻神竦，思深力遒”的劲健风格，又别具一种“雅正冲淡”的盛唐气度，其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岭南。明人胡震亨称：“张子寿首开清谈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義、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t'）

清乾隆《始兴县志》记载，九龄父弘愈“尝侨寓南海，生九龄”。《旧唐书张九龄传》称张九龄“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日：此必能致远”。《新唐书》也载有此事。可知张九龄很可能出生在广州，幼年也可能在广州生活过。王方庆是一位動政清廉的地方官，“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S）从张九龄以后从政的迹行，，也可以看出王方庆对他的影响。张九龄不仅成长于广州，居高位以后，来广州还作有《使至广州》、《与王六履广州津亭晓望》等诗。其《送广州周判官》诗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广州的城市景观，表达了他对广州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

海郡雄蛮落，津事壮越台。

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

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

观风犹未尽，早晚使车回。t6】

张九龄开创了岭南诗清新、隽美、雄直、雅健的风格，后人将他看作“岭南诗派”的创始者。广府地区则直接受到张九龄诗风的深刻影响。

粤中地区诗坛的兴起始于宋代，代表性人物有余靖、崔与之、李昂英等大家。曲江人余靖曾任尚书左丞知广州，在岭南任上以廉洁闻名，人称其“前后在南为帅十年，未尝截南海一物”。在诗歌创作上，他继承了张九龄所开创的雄健道直的风格，诗作苍古格高、幽深劲峭，力扫北宋初年曾经盛行一时的西昆派綺丽靡曼的风气，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同盟者，深为时人和后人所称许，对岭南诗歌雄直诗风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是宋代开岭南诗风之第一人。余靖主张“有美必宣，无愤不写”，他的诗多发自胸臆，“弃华取质”，五言尤佳。如这首《寄题广州田谏议颐堂》，表达仕途养正之心，淡泊自然，全无矫揉造作之态：

退食公堂暇，应无俗虑侵。

帘开双燕影，支散百花阴。

海域逍遥境，荣途澹薄心。

政成先养正，惠爱及民深。

增城人崔与之，是南宋名臣，他先后-13次向朝延辞任相职，淡泊名利，晩年归居广州，以韩琦“老圃秋容淡，寒花晚节香”句自勉。文天祥誉其“盛德清风，跨映一307308

代”。t7）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问，形成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一菊坡学派。

其诗多抒发爱国忧民的感怀之语，沉郁深挚中不乏苍劲激昂之气，“高华壮亮，犹有唐人遗音”。【°）他的诗内容充实，感情深挚，骨格苍劲，对岭南诗坛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特别要说到的是，在崔与之之前，岭南虽有词作，却是为数极少且格调低下。崔与之词如其人，词笔老健，开创了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他出任成都知府兼本路安抚使时作有《水调歌头题剑阁》，潘飞声赞其“起四旬雄壮矣，虽苏、辛无以过之”。t9）麦孟华也大表称赏：“此词豪迈，何减稼轩!”t'°）此四句是：“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长安。”

番禺人李昴英是崔与之的门人，探花，孤介刚直。宋理宗曾对人说：“李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他的诗如其人，直抒胸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李昴英之《文溪存稿》日：“诗问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言。益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即使是描写岭南景物之作，仍能突出其鲜明风格。如这首五律《景泰寺》，意境幽苍凄迷，而气势劲厉：

树合疑山尽，攀缘有路通。

远鸦追夕照，低雁压西风。

瀑势雷虚壑，松声浪半空。

凭栏僧指似，漲雾是城中。

诗与崔诗同属岭南传统的雄直诗风，而又各具特色。较之崔与之诗的高华壮亮、深挚苍劲，李昴英诗更多地表现出刚直激昂、奇崛遒健的风格，在南宋岭南诗坛上前后辉映。

二、岭南诗派的形成

宋元之际的剧变，给岭南造成强烈的家国沧桑的动荡。南宋末年，广府出现了一批爱国文人，以南海（今佛山市顺德区）人九峰先生区仕衡影响较大。诗人把自已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其诗文真实地反映了宋末的重大社会矛盾，充满爱国热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岭南传统的雄直诗风和简劲文风。地近广州的东莞，是抗元的鏖战战场，诗人诗作多，存世也多，咏物明志，怀古伤时，不乏様慨凛冽之气。东莞籍诗人李春叟的《送熊飞将军赴文丞相麾下》，如今读来还令人热血沸腾：

龙泉出匣鬼神惊，猎猎霜风送客程。白发垂堂千里别，丹心报国一身轻。

划开云路冲牛斗，挽落天河洗甲兵。马革裹尸真壮士，阳关莫作断肠声。

宋亡人元，赵必環等几位南宋宗室后裔落籍东莞，悲歌当泣，深挚动人：“江山如昔日，人物已星辰。往事风前絮，浮生水上萍”。赵必f象与李春叟等人结社吟咏，是有诗可证的岭南首家诗社。在这种环境下，雄浑刚直的岭南传统诗风得到了充分的的发扬，“所谓岭南诗派，实际上已在此时开始形成”。

（''】元代，中原诗坛流行纤巧颓靡之作，“刻翠剪红，或近309310

晚唐小令”。而岭南诗歌仍然保留沉郁的现实主义传统，新会人罗蒙正的诗格调颇高，“圭臬盛唐，元气浑然，调高字响”。（'2）其诗对明初岭南诗风颇有影响。

在中原诗坛不景气的明代，长期厚积的岭南诗坛终于迎来了大盛时期。元末明初，广府诗坛异军突起，孙、王佐、赵介、李德、黄哲五诗人在广州南园抗风轩共组“南园诗社”，后世尊为“南园五先生”（又称“南园五子”）。他们的诗力纠元代诗坛纤弱萎靡之风，使岭南诗风振起。“南园五先生”与“吴四杰”、“闽十子”同时，共开有明一代风雅之宗。五子之中，以孙责成就最高，被誉为岭南诗派之始。t'3）他的诗歌创作，凡汉魏六朝乃至初、盛、中唐无所不学，更贵在于锒锤独运、自铸伟辞，诗作气象万千，既有气象雄浑、兴喻深致的一面，又有清圆流丽、明珠走盘之另一面。孙责的七言古诗尤为出色，其中《广州歌》形象地描画了广州风物繁华盛况，常被后人所引用：

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南畔更繁华。

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牗。

闽姫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

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乱鸣鼓竞龙舟，争睹金钗斗百：草：。

游冶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酔时花满：提。

扶留叶青蚬灰白，盆饤槟榔邀上客。丹.荔批把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

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尊。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

明中叶，岭南诗坛倍加活跃，诗人辈出，佳作如云。不少诗人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广府诗人最有特色者，有新会陈献章和香山黄佐。

陈献章是明代理学名儒，其学说外以人格伦常为准的，内以自得乐天为指归。他富于艺术才华，其诗作与其学术主张有异曲同工之美，论诗首重性情，次及风韵，大多数作品重自然、重韵趣，写得清新秀丽，充满天趣。试举一首《访山家次韵》：

清泉煮族蕨爱山家，夜饮西岩望月斜。：

涧底白云留不住，半随红雨落天涯。

即使寄寓哲理或议论艺事的诗作，也写得奇瑰跌宕、情理交融。如《偶得示诸生》其一：

江云欲变三山色，江水初交十日秋。

凉夜一蓑摇艇去，满身明月大江流。

此诗意在阐发“以静应变”、“万化自然”的哲学观念，将诗人淡远的襟怀，澄明的心境，尽加抒发，而不失自然真趣。

黄佐博学多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在“明人311312

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诗创作题材多样化，有不少忧国忧民之作，这在明人诗作中是不多见的。在艺术风格上，其诗不傍门户，倜傥不群，雄奇恣肆，有“吾粤之昌黎”之称。在岭南诗歌发展史上颇有影响，《粤东诗海》说：“其诗体貌雄阔，思意深醇。旗鼓振发，群英竞从。一时词人，如南园后五先生，皆出其门，粤诗大著。”【'4J朱彝尊赞日：“岭南诗派，文裕（黄佐谥号）实为领袖，功不可泯”。

明中叶，岭南诗派声气大盛。嘉靖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李时行、吴旦五人，继南园五先生故事，在南园抗风轩聚会，重振南园风雅，称“南园后五子”。此五人均曾师从黄佐，诗风受黄佐影响，风格雄直刚健，重视反映社会现实。清人檀萃认为“岭南称诗，曲江而后，莫盛于南园：南园前后十先生，而后五先生为尤盛。”t'S】欧大任的咏史诗沉郁深厚，直抒胸臆。如这首《镇海楼》：

一望河山感慨中，容苍平楚入长空。石门北去通秦塞，算水南来绕汉官。

虚槛松声沉螟壑，极天秋色送征鸿。朔南尽是尧封地，愁听樵苏说霸功!

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等人在京任职期间，与蜚声文坛的诗人文徴明、李攀龙、王世贞等酬唱交往，诗名颇著。欧大任被王世贞称为“广五子”之一，梁有誉名列明代诗坛七才子”。这说明南园后五子的影响进入中原，其成就在前五先生之上。但他们的创作也不免受到当时笼罩诗坛的复古风气的影响而造成缺陷。而高明人区大相却能“力祛浮靡，还之风雅”，写下了大量内容充实、感慨深沉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反映了明王朝日渐衰落的社会面貌，使岭南诗派摆脱复古主义的影响，继续发展其雄直风格，终于出现了明末岭南诗坛奇特的繁荣局面。

明末政乱国危，广府诗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他们在为挽救民族危亡勇赴国难的同时，以诗言志，留下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相当高度的作品。崇被年间12位诗人重组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十二子”，是广府诗坛的佼佼者。十二子中，最为杰出的是被誉为“号中屈原”的南海人邝露、“粤中李白”的番禺人黎遂球和“与中杜甫”的顺德人陈邦彦，后人称之为“岭南前三家”（区别于清初岭南三大家”）。黎遂球还因在扬州江淮名士雅集“黄牡丹会”上即席赋诗名列第一，有“牡丹状元”之雅号。三人都为抗清斗争献出了生命，在国破家亡之际，这些岭南诗人创作了许多表达对明王朝的忠贞和对志行操守的执著的悲壮之作，诗歌发自孤介忠心，慷慨苍凉，使岭南诗歌雄直雅健的诗风特色更浸染上一层血染的风采。对明代岭南诗的发展脉络，如陈遇夫所述：“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有过之无不及者。其体大率亦三变：明初南园五先生倡之，轻圆妍美，西庵（孙）为首：嘉靖七子建旗鼓于中原，梁公（梁有誉）与焉，所尚高丽庄重，名馆間体：驯至启、桢，政乱国危，奇伟非常之士出，抚时感事，悲歌当泣，黎、邝诸君发为慷慨哀伤之音，而明祚亦遂终矣。”（'6】

明末清初，是一个十分剧烈嬗变的时期，一方面是异族313

入主、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另一方面却又是经过清初的休养生息出现了国势空前强盛的康熙盛世。在各派政治力量曾经激烈较量过的岭南，聚积着各种持有不同政治态度的人士。众多的抗清诗人、遗民诗人、仕清诗人以及布衣诗人，都似乎找到了一种共同的抒发情感的载体，从而使岭南诗坛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状态。在众多诗人中，最为杰出的是被誉为“岭南三大家”的广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三大家的人生经历不同，诗歌创作题材也有所区别，但他们的诗作沉郁勃发、饶有韵致的共同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因而被公认为岭南诗坛继往开来的领袖。三大家的出现，是岭南诗歌走向鼎盛的标志，也是岭南诗派在全国地位确立的象征。清初，雅好文学的两广总督吴兴祚时与岭南三家等粤中文士作诗文之会，对岭南文学起了直接的倡兴作用。号称南北二诗宗的朱彝尊、王士祯分别入粤，与“岭南三大家”等粤中诗人交游唱酬，岭南风雅一时称盛。

三大家首推屈大均，他是番禺人，明末诸生。曾从南明军队抗清失败，削发为僧，法名今种。还俗后北游大江南北，广交遗民志士，又曾从吴三桂反清。后来避祸渐江，隐居故里，赍志而殁：。他的诗歌充满强烈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又富有浓郁的浪漫情调，如惊风掣电，万壑奔涛，在清初诗坛上独标一格。“超然独行，当世罕偶”。t'7】由于他遍交天下，名闻四陲，更得到清初文坛盟主朱彝尊等人的宣扬，诗名益重，使岭南诗坛雄直之风的信誉鹊起海内，奠定了岭南诗派在中原的舆论影响。屈大均的五律意足情挚，别有撼人心灵314

之势。如《秣陵》凭吊前朝，语悲苦而无套话陈句：

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帝官。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

访旧鸟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

龚自珍对屈大均评价极高，称其“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t'°】

顺德人陈恭尹是因抗清壮烈就义的“广东三忠”之一的陈邦彦之子。他与屈大均为友，为抗清复明而奔走，一度被捕入狱。后隐居羊城，以诗文自娱。他的诗主要抒写家国沦亡之慨，激昂盘郁，最工七律，怀古之作尤为突出，借题抒情，警策意深。如《崖门谒三忠祠》被誉为“大气磅礴”的“卓绝千古”之作：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長向苍普读旧碑。

张维屏评说此诗：“七律到此地步，所谓代无数人，人无数篇者也。”（的陈恭尹的《西湖》诗有“休恨议和奸相国，大江犹得百年分”句，南宋议和，犹得苟延残喘百年，对比南明弘光、隆武诸朝仅一年短命，“休恨”二字深讥人骨。陈恭尹在诗学观上直陈诗为情而作的主张，其诗学见解的影响更为深远。他批评“近世之言诗者，或用心于模拟补绽，或

315316矫之以酸涩枯瘦，否则枝望平衍，斩然无味，皆未得泉源者也”（n）。他的《次韵》诗之四，充分地表达了诗人的诗学主张：

文章大道以为公，今昔何能强使同!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末滞胸中。

维扬不入删诗地，百越咸归霸国风。终古常新唯日月，金乌先自海东红。

诗中提出“常新”说，可视为稍后袁枚“性灵说”之端倪。

梁佩兰的诗作较屈、陈逊色。与屈、陈忧国伤时、贴近现实、悲愤沉雄的诗风不同，他的诗多唱酬之作，“温厚平和，置之清庙明堂，自是瑚琏圭璧”。【2'）

由于岭南三大家都能“发摅性灵，自开面目”，t22】前人常将其作为一个诗歌团体与“江左三大家”相提并论，更有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的赞誉。〔23）在岭南三大家影响之下，加上惠士奇、翁方纲等大家入粤对岭南诗歌也很有影响，在广东派生出“岭南四大家”、“北田五子”、“岭南七子”等诗歌团体，涌现了邝露、程可则、王隼等许多诗人，流风余韵，历久不衰，中经宋湘、冯敏昌、黎简，至近代更加大放光芒。

冯敏昌之诗作被时人认为是昌明博大，力追正始。他是钦州人，而宋湘是梅州人，他们都曾在广州的书院任教职。宋湘在广州主讲粤秀书院时，冯敏昌主讲越华书院，相与论诗，过从甚密。他们的治诗主张及才干，对广府诗坛有重要影响。顺德人黎简，32岁中秀才，此后无意科举，淡泊功名，足不逾岭而名震中原。他的诗不随流俗，刻意求新，喜欢用奇特的词语和创作手法。如《寄黄药樵》诗，表现出一种“摄魄勾魂”的意境：

墙头暮鸦飞不起，鸦背松声冷于水。

如山北风压破屋，拍枕大江浮两耳。

窗竹偃蹇欲折根，急雨落瓦寒有棱。

饥鹘嚆嚆状啸鬼，纸窗琅琅如裂冰。

风头越大兩点重，松子逾时尚跳动。

灯危在壁寒不明，心战如波静还涌。

我忆滇山西远征，冰天苦月寒時味。

两奴争被静一哄，独马恋人悲自鸣。

身劳归惜妻拏苦，裘敝倏惊年岁更。

煌煌肥马从朋友，跕跕飞鸢阅死生。

生还喜尔情过绝，以病示人无病骨。

明日梳头视青镜，今夕苦吟得白发。

莫思广厦庇众寒，少陵诗分古迂拙!

黎简是画家，他的诗也有不少自辟畦径的轻淡清新之佳作，如《广州歌》之二：

绕城骀荡柳毵毵，映水女儿红汗衫。

向晚棹花春浪软，香云先渡白鹅潭。

嘉庆、道光年间岭南诗人继起，驰突诗坛的有被翁方纲称为“粤东三子”的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

阳春人谭敬昭擅长描写岭南风物，清新可诵。见其《珠317

江竹枝词》：

珠海珠江是安居，柳阴停棹晚船初。

水头潮长卖花去，水尾潮来人卖鱼。

香山人黄培芳的诗格高浑，于平实处见纵横，《燕郊秋望》为压卷之作：

三辅扼雄关，答茫秋色问。风高碣石馆，日落蓟门山。

塞马平原牧，居人古柳环。寒衣刀尺急，词客几时还？

番禺人张维屏是嘉道年间岭南诗坛的领袖人物，晩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写过不少反映现实的诗歌，文学史家都把他当作近代文学开创者之一来论述。

三、近代岭南诗派

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成为抗英前线，风云变幻，岭南诗人与民众同仇敌忾，满怀激情地讴歌反侵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与事迹，诗歌创作更加笔墨酣畅，使雄直诗风带上了高亢激昂的鲜明的近代革新色彩。诗人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居于中国诗坛的首位。张维屏的诗歌本以优雅结丽称，亲历两次鸦片战争，目暗时弊积重，其诗也转向质朴激越。述事长诗《三元里》气势凌厉，堪为近代史纪实的不朽之作：“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家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齐作气，妇女齐318-

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读来何等令人回肠蕩气!同时期的粤中诗坛，涌现出彭泰来、陈澧、朱次琦、徐荣、冯询、谭莹、汪瑔、叶英华等优秀诗人，他们的诗作从各种角度反映了鸦片战争，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一代诗史资料。

战争的结果，却是“不堪呜咽”。在民族危机中，岭南出现了积极宣传改变现状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黄連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也是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进步诗人，以时代的强音推进着岭南诗界的革命。

黄遵宪是嘉应州（今梅州）人，从小雅好诗书，存于他的诗草中开篇的《感怀》诗写道“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显示出他主张研究现实，放眼世界和“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的思想。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黄遵宪一走上了历时八年的科举应考之路，多次往返及经过广州，他的诗记述了经历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城内“闻道鸾声都寂寞，讪楼蜃气亦空虚”的时代剪影。他后来高举“诗界革命”的旗帜，提倡并实践“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对粤中诗界乃至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康有为评述说其诗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24〕。梁启超更称誉说：“公度之诗，诗史也。”“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人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2S）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康有为之诗作“积健为雄”，（26）在主张诗歌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上，与黄遵宪是一致的，所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捜319320

欧亚造新声”。【WJ在具体的诗句中更注重一种磅礴的气势、浪漫的气息。如这首《秋登越王台》：

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衰。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轮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

临睨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吸雄才。

诗歌创作非梁启超所长，但他还是进行了诗意、诗体和诗境多方面的革新尝试，写出不少成功之作，其在1896年至1912年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归国这段时期为诗歌创作最旺盛时期。如《太平洋遇雨》之以小见大：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劫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由黄、康、梁等人激起的岭南雄直诗风，一直兴盛不衰。岭南诗坛上不断出现意气豪迈的诗人，如清末被称为近代岭南四家”的梁鼎芬、曾习经、罗惇属和黄节。四人中，除了曾习经之外，余皆为粤中籍人士。他们的诗学主张、创作方法和诗歌成就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在表现清劲诗风方面颇有相似之处。黄节把雄直与清劲诗风融为一体，兼采百家而又独辟蹊径，其诗有唐风宋骨，思想性与艺术性在同时期的岭南诗人中更是出类拔萃。黄节之诗七律尤佳，如这首《沪江重晤秋枚》，句奇意重，笔力雄健：

国力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兩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民初的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等人，都不以诗人自居，也决不斤斤于学唐学宋，而是以诗歌直抒其情，谱写出岭南诗歌健雄直气的新声。

说到近代广府诗人，还必须提到一位名震中国近代文坛的青年诗人苏曼殊。苏曼殊是一位集革命家、艺术家于一身，僧俗兼半的传奇性人物，在人间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却在文学界、宗教界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奇才，是一个诗人、画家、学者、翻译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尤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苏曼殊是香山县白沥港（今属珠海市前山領沥溪村）人，特殊的身世造成他既放浪不羁又惆性至极的特殊性格，时而是最激烈的爱国革命者，时而是最消极的厌世陷情者，徘徊于人生的两个极端。他想超世绝俗，却又难以舍世灭欲。独特的西方文化熏染、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佛学的神道悟性，交错在他的灵魂深处，使他的诗歌从初时的曾经发出“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雨着浮身”的雄健激昂转入缠绵哀婉的意境，“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袈裟点点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泪痕”等诗句更是传涌一时。他的诗歌反映了他挣扎在佛性与爱情的边缘的禅情之间的痛苦，深刻地表现出深受封建宗法制度重压，无法如愿以偿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的心灵苦闷，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而风靡全国，柳亚子将他的诗歌概括为思想的轻灵，文辞的优美，音节的和谐”。这类耸动世俗、哀心艳骨的爱情诗，其艺术风格又别具一格，从根本上说，321

是特定时代条件下青年的呼声，成为引领近代诗坛的一种清新气息。

“岭南历代诗歌，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形式方面，都富有革新精神，从唐代至近代优秀的岭南诗人，每能一依傍，自立门户。”〔2'）从张九齡的首创清淡之派，至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诗界革命”的主要人物，给传统诗歌增添了生气和活力，使雄直之古风，发展为雄阔铺陈的诗风，带来了鲜明的近代革新色彩。总之，近代是“岭南诗派”最为成熱鼎盛的阶段，也是岭南诗歌创作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岭南文化的精神传统和独特风格，在近代岭南诗歌中得到了极为辉煌和充分的表现。

四、广州竹枝词竹枝词

原是唐代流传于四川一带的巴东民歌，经中唐大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倡导而风靡全国，以反映风土民情、诙谐风趣见长。

岭南地区的竹枝词内容丰富，富于生活气息，其地方特色与中原有很大的差别。唐代入粤诗人皇甫松、宋代杨万里等已有采用竹枝词描述岭南风情的。如皇甫松所作：

槟榔花发鹧鸪肥，雄飞烟瘅雌亦飞。

木棉花尽荔枝垂，千花万花待郎归。

岭南竹枝词在元、明时只称以“竹枝词”，后来为突出地方特点，遂冠以地名。广州地区的竹枝词，除称以“岭南322

竹枝词”外，还有“广州竹枝词”、“珠江竹枝词”、“羊城竹枝词”、“南海竹枝词”、“番禺竹枝词”等称法。清中叶以后，竹枝词采用得越来越广泛，类别也越分越细，出现专咏一地、一事、一物的竹枝词。如专咏广州西关八座桥的《西关八桥竹枝词》、专咏荔枝的《岭南荔枝词》、专咏七夕的《羊城七夕竹枝词》、专咏卖花买花的《花田竹枝词》、《花渡头竹枝词》，甚至有专咏捞现卖期的《广州捞期竹枝词》、专咏妓馆的《羊城青楼竹枝词》。竹枝词有很多出自民间歌手，但也为文人学者所喜用。入粤的王士祯、杭世骏、李调元、阮元、彭玉麟等高官大吏，都写下了不少以岭南风物为题材的竹枝词，推动了粤地竹枝词的创作。如阮元的《岭南荔枝》：

不须事署尚书怀，怀核归来味共参。

此是白沙真种子，甘泉浸得水枝甘。

不仅点出岭南佳果荔枝之名贵品种的来历，而且一语双关带出对理学名儒陈白沙、港甘泉的学术渊源的确切比喻。以俗入雅，体现出作者的学识修养。

兵部尚书彭玉麟入粤督师抗法，所写的竹枝词另有一番情韵：

羊城城内塔层层，结伴烧香点佛灯。

六月观音山上去，芙蓉双颊汗珠凝。

（原注：与俗妇女皆以脂涂颊并眼。）

广州城内妇女熱衷于烧香拜佛，上观音山拜佛的盛况，以及汗流双颊的娇艳之态，读来如见其景。323

康熙年间，督学广东的惠士奇以珠江竹枝词试士，南海生员何梦瑶应试之作，将广州写得清丽易⊠透，光洁照人，深得名家袁枚欣赏：

看月谁人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

花国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

广州地区的竹枝词，历来被视为岭南竹枝词之正宗，最能反映岭南风土之故实，俚而不俗，花而不俏，“发自然之天籁，相题构意，曲曲传神”。〔29〕岭南的文人学者，甚至官员绅士也参以创作竹枝词。粤中诗人屈大均、理敬昭、张维屏、潘有为、梁启超等都曾以竹枝词写下了许多优秀之作。屈大均所作，是今见岭南人较早所写的竹枝词，他的《广州竹枝词》之一被今人作为研究十三行的重要史料引用：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缴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竹枝词所记述的包括各种市井镜头，地名、时俗习尚、景色、社会变化皆收入诗中，饶有生活气息。试举下面几首为例：

柳波涌外浪如花，西炮台边日正斜。

树树螟烟看不见，两三星火照渔家。

（林雨人：《羊城竹技词》）

茉莉鸡冠又刺桐，四时草木记南中。

红棉十丈如荼火，尚见炎州霸气雄。（

白云樵子：《羊城竹枝词》）

南海祠前古庙'多，独钟灵秀在波罗。324

年年赛会游人返，买得红鸡共一窠。

（罗国材：《羊城竹枝词》）

大新高楼十二层，巍峨俯瞰五羊城。

西提东提好风景，夜来携手与郎行。

（易石公：《续羊城竹枝词》）

琶洲塔口月初低，雁翅城头又夕辉。

日月西沉有时出，暹罗郎去几时归。

（罗天尺：《珠江竹枝词》）

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

除夕案头齐供奉，香风吹暖到人家。

（佚名）总之，广州竹枝词将粤中的岭南果蔬花木的南国特色尽兴勾勒出来，将富有地方特色的时节活动的盛况表现出来，将华侨离乡后家人之思念刻画出来，将城市在近代化中的演变反映出来，乃至置民的水上生活，茶室食肆的热闹，民间百相，男女挚情，旧俗新风，皆可在竹枝词中得到反映，保存了民俗学的不少第一手材料。

竹枝词在广州地区广受欢迎。光绪元年（1875）在广州地区曾进行了一次以“羊城竹枝词”为题的大型征诗活动，参加者多达142人，共收诗489首，结集成书，后由11今香阁编印《羊城竹枝词》。民国9年（1920）又有羊城如卢诗钟编的《续羊城竹枝词》出版，共收作者40人的诗97首，诗中颇多新事物、新名词，如“金乌坠后电灯明，夜夜如游不夜城”，“电力终输机器力，电船今已遍珠江”，“粉墙铁栅325新衙署，式仿欧西土木兴”，“吉服却嫌经锦俗，新人头罩白轻纱”，反映出广州社会的发展变化。

五、新诗在广州的崛起

民国初期掀起新文学运动，处于激变的中心地带的广州，最早出现的新文学体载是新诗。诗歌以简洁的语言、火花般的灵感，首闯文坛。1918年10月，《广东省学生联合会月报》创刊，发表白话文现代新诗。一时《南风》、《劳动与妇女》、《光明》等杂志也纷纷响应。大量新诗以崭新的形式和自由的风格给文学界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民主革命理论家、活动家朱执信是最早的新诗作者之

一，1919年9～11月问在《星期评论》发表了三首新诗：《悼余建光》、《毁灭》、《悼黎仲实》。作者使用新的不受旧体束缚的体载，抒发澎湃的感情，即使在《毁灭》这样关于星光的“戏成此诗”【：：°）中，也寄以深意：

一个星毁灭了，，别个星刚刚团起：我们的眼暗昏湿了。还有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

黄花岗起义十年后，1921年3月发表于《劳动与妇女》上的《黄花岗》，凭吊起义烈士，质朴自然，情景交融，令人清然泪下：326

如血的残阳，，

照着满山红土，，

松林深处，，

立着新碑无数。

十年前的事那堪提，，

十年后的事凭谁诉，

我来凭吊一看便去了，，

却交付红土残阳、朝朝幕暮。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有影响的岭南诗人有梁宗岱、黄药眠等。

新会人梁宗岱，从1921年起就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两年问创作200多首，被誉为“才华横溢的南国诗人”。1924年，他在上海出版了诗集《晚祷》，是岭南第一本新诗集。梁宗岱是广州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在《越华报》的《文学旬刊》上写了不少新诗。其诗多用联想、.隐喻的手法，通过象征来表达内心世界，委婉含蓄，开拓新意境，探索新形式。

梅县人黄药眠居于广州多年，其诗集《黄花岗上》收入其1924～1926年在广州所写的诗作。代表作《黄花岗的秋风容雨》长80行，是当时广州诗界最长的一首抒情诗，技艺纯熟，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是广州新诗的一个突破。诗中写道：

啊!华夏的英魂消沉已久，，

渺渺的神州谁能为国奔仇，32'7328

高高的黄花只是年年垂泪，，

空伴着这空中的恨血长留。

梅县人李金发，20年代留法归国回广州，是最早把法国象征派诗作介绍到中国的诗人。其诗含蓄嫁胧，幽怨深沉，被称作“诗怪”。代表作有《弃妇》、《故乡》等，可称为中国新诗朦胧派之鼻祖。

此外，还有直观描写工人农民生活境遇以及政治抒情诗的诗作。诗人蒲风的诗集《茫茫夜》，大部分是取材于农村的生活和斗争的。他的抒情叙事诗《六月流火》共24章18o0行，创下新诗篇幅的新纪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诗坛现实主义的诗风得到发扬。在蒲风、温流的影响下，一批青年诗人敢于反映现实，，取得新的突破，初步出现现实主义新诗的主流。1937年在广州成立了广州讲坛社，出版刊物《广州诗坛》，在这份杂志周围涌现出一大批各具风格的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浦风、雷石榆也回到广州，《广州诗刊》改名为《中国诗坛》，在抗日浪潮推动下，诗人们逐步汇集到抗日救亡的诗潮中来。《中国诗坛》从1937年7月到1949年5月终刊，共出25期，是新诗界时间最长、期数最多、发行最广的一种，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七月》同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刊物。在刊物上发表诗歌又独立结集的诗集就有20多种。数量之多、作者之广、时间之长堪称新诗界翘楚。《中国诗坛》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诗坛上有重大的影响，成为当时诗歌界的主流。这一诗派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诗人各具风格，风采异呈，“如黄宁婴的贴切细膩，蒲风的刚健激越，陈芦荻的热情奔放，李育中的亢奋坚实，黄药眠的恢弘博大，陈残云的朴厚凝重，鸥外鸥的离奇怪诞，楼栖的朴素平实等等”。（''）

新诗在广州诗坛的崛起，广府诗坛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和影响，印证了其贴近生活的现实性、开放性、多元性的特点。

注释：〔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粤歌》。

〔2〕《艺文类聚》卷九十。

〔3〕释骚餘云，转引自温汝能辑纂《粤东诗海）卷1，第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胡震享：《唐音癸签》卷九。

〔5〕《旧唐书》卷《王方庆列传》。

〔6〕张九龄：《送广州周判官》，温波能辑集《粤东诗海）卷一第1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文天祥：《跋崔丞相二帖》。

〔8〕梁善长：《广东诗粹》。

〔9〕潘飞声：《粤词雅》。

〔10〕梁令娴辑编：《艺蘅馆词选》。

〔11〕陈永正：（岭南文学史》第12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2〕温波能：《粤东诗海例言》，《粤东诗海）第17页，中山大学329出版社1999年版。〔13〕胡应麟：《诗薮续编》。

〔14〕温波能：《粤东诗海例言》，《粤东诗海》第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檀萃：《南园后五先生集叙》，《南园前五先生、南园后五先生》第17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陈遇夫：《岭海诗见序》。

〔17〕毛奇龄：《岭南屈翁山诗集序》。

〔18〕龚自珍：《夜读民集>书其尾》。

〔19〕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国朝诗人征略》卷五。

〔20〕陈恭尹：《梁药亭诗序》。

〔21〕温法能纂辑：（号东诗海）卷67，第127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王瑛：（岭南三大家诗选序》。

〔23〕洪亮吉：（道中无事，倡作论诗截句二十首》，《洪北江诗文集更生斋诗》卷二。

〔24〕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载《黄遵宪诗选》第4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之四，载（黄連宪诗选》第4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

〔27〕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28〕陈永正：《>前言》，（岭南历代诗选》第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吟香阁主人：《羊城竹枝词》。

〔30〕朱执信：《毁灭》，原载《星期评论》1919年10月5日第十八330

号，收入《朱执信集》下集第90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1）李勤德：（传承与变异，广州百年文化演变历程》第9S页，广州出版杜m1年版。的1332

第十六章广宗学术与变革思想

-、宋以前的广东学术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岭南文化，包括教育事业、典籍撰著、学术思想的发展，起步比中原地区慢，当中原地区已进入百家争鸣黄金时期的先秦，岭南还是蛮荒之地，学术一片空自。秦汉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对岭南的军事、政治行动，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也给岭南注入了中原的封建文化。在或避乱或谋官岭南的中原士人于粤地传播学术的同时，为数不多的北上出岭粤人率先接受中原的文化教育，并有所建树。

西汉时期在中原是经学全盛时期，西汉末年，广信（今封开、广西梧州一带）人陈钦北上师事黎阳（今河南浚县）人贾护学《春秋左氏传》，其学问“直接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盛、程方进、胡常之一脉，源远流长，尝撰为《陈氏春秋》以自别”。（'）陈钦学有渊源又有所创见，曾向王莽传授经学。东汉初，陈钦之子议郎陈元继承家学，撰有《左氏训请》，被立为刚刚设立的古文经学博士之首。陈元之子陈坚卿亦“能传父之业”，在经学上有所建树。后人称陈氏祖孙为“三陈”。三陈之成就在岭北，但他们对岭南学术尤其是岭南经学的影响却甚为深远。屈大均称道：“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间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2）建安年间，雄长一州的交趾太守士燮早年曾游学京师，学经名儒，在官事之暇玩习经书，撰有《春秋左氏注》、《士燮集》。士燮之弟士壹、士鮪、士武，都是从政的学者，兄弟四人并称“四士”。他们与南下到交趾避难的士人一起研讨经学，使广信成为当时岭南的学术中心。东汉末的佛学著名学者牟子、康僧会也出自交州。牟子著《理惑论》，成为我国最早一批佛教思想的阐释者之一。康僧会曾注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又曾编辑《六度集经》，他的济世思想是掺合儒、道、释三家的早期产物，是继牟子之后出自岭南的又一位佛教思想的阐释者。东汉末，番禺人董正、罗成精于经学，居乡授徒讲学，南阳郡（今河南南阳）车遂慕名竟千里迢迢前来向董正受教。【'）

如果说岭南经学是汉代之时学流风的话，那么，汉代粤中有地方特色的学术著作起于修志，这也是岭南最早的学术著作。东汉番禺人杨孚官拜议郎，撰成《异物志》，是岭南33：：

人撰写的第一部地域性的风物志，也是南海郡人撰写的第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此书是我国最早关于地区性物产资源的专著，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汉代岭南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第一手资料，在体例上也开了这类书的先河。西晋初任广州大中正的王范，认为秘书丞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一书“略于岭服”，乃搜罗百粤典故为书，名日《交广春秋》。“太康二年（287）上之，众见咸称服。”C4】《交广春秋》又称《交广二州春秋》，是岭南历史上第一部地方综合志书，.后人对其开创性评价很高。范端昂即谓“交、广向缺修载，自公乃创为之，文献赖以存焉”。〔'）王范之后，南海人黄恭因《交广春秋》多所遗漏，补遗撰成《交广记》。《交广春秋》及《交广记》均佚，现仅见于《水经注》及其他史籍的介绍。.

佛、道二教在相近的时间内传入岭南。道教在西晋由北方传入岭南，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葛洪曾滞留广州五年，师事南海太守鲍玄（靓）学道，“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t6】这一时期对葛洪道教思想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以后他在罗浮山修炼十三年，著述不辍，创立了道教理论，使罗浮山成为道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场所。

佛教则在东汉末传入岭南，广州作为州治之后，又凭借着航海业发展的优势，很快超过交趾而成为南方又一学术文化中心和传播佛教文化的译经中心。直到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佛教经典译撰事业远比北方发达，在南方译撰的佛教经311

典，最多出自建康（今南京），其次为番禺。从三国孙吴起，就有海外番僧到广州来停驻译经。在建康建初寺之后，广州建起南方第二所寺院一制止寺，作为官方接待番僧并供译经传教之场所。从东吴到隋代，来广州的西来高僧络绎不绝，其活动主要内容是翻译佛经。梁武帝请来的西天竺僧真谛（Paramatha译名波罗末谛），是中国佛教史上译著最多的译师。他在广州期间，就译出《金刚经》等18部佛经，占其在华所译经的近半数。在这样的氛围中，使粤中地区的佛教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唐代佛教禅宗南宗创始人六祖惠能在家乡新兴闻经悟道，所听到的就是《金刚经》。

唐代，岭南出了两位文化名人，他们的活动与广州都有密切关系。一位是受儒学熏陶，从科举出身，既得中进士，又应试才堪经邦科登第、道牟伊吕科优等，卒至成为岭南第一位在中央政权任相的政治家一张九龄，他很可能在广州出生和度过了幼年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家，唐玄宗以其风度为准的。张九龄文集《曲江集》中的有关文论，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贤明与远见。另一位是惠能，他在湖北黄梅得五祖所传，遁回岭南，匿身怀集、四会一带，其后在广州的法性寺（今光孝寺）公开身份，受戒登坛，高扬起禅宗顿教的旗帜。惠能禅宗恩想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其主要的特征是平民性、世俗性，倡立人皆可以成佛的平等观念，直白“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主张佛在自心中，不假外求，普通人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修炼解脱，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惠能开创的一代禅风，成335

为中国佛教史上一股不可阻挡的新潮流，终于登上中国佛教正统地位。而禅宗文化更融入了此后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对哲学、伦理、文学、书画、音乐，甚至茶道等影响尤深，显示了其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特殊的力量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并且具有长远的影响力，至今更走向世界。张九龄与惠能之登上中国文化舞台，反映了岭南文化后发而异军突起。

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中原文化传入岭南的渠道是以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为载体，由北而南，由西而东，张九龄为曲江人，惠能为新兴人，唐代的粤中在人才的优势上以及拔尖上，还只是在积聚阶段之中。这从本书上篇所述的粤中地区南宋时的办学情况及科举名次才干超过粤北的情况可以说明。但作为政治中心地位逐渐确立起来的广州地区终究要体现出其相应的文化中心地位。

二、宋代的广府学术

宋代的广府地区终于有了在全国说得上有影响的学术界士人。

.古成之是宋代岭南第一位进士。关于古成之的籍贯有几种说法，他的祖父、父亲都曾任信安县（今新会）知县，黄佐《广东通志》说他“本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贯增城”。t'）古成之赴试的端拱元年（988）戊子科只录取28名进士，古成之名列19，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他被称为33

“宋代岭南首第”，对开启岭南文风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古成之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官职虽低，但负责编辑校定经籍图书，须是极有学问之人始得充任。他撰有《易疏删定》，t'】是粤中地区较早的经学著作。

北宋增城人崔与之，号菊坡。其父有言：“不为宰相，则为良医。”（9〕他所受的教育是经世致用，为民解困。他是岭南人由太学生考中进士的第一人，有满腹经纶，高风亮节，曾先后十=次向皇帝提出辞任率相。文天祥誉为“盛德清风，跨映一代”。在学术思想上，崔与之与当时风行全国的程朱理学异趣，而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思想相通。他对理学被官方推向独尊颇不以为然，晚年时曾删处士刘舉语为座右铭：“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他倡导的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胸中经济学，为国好加餐”，在岭南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一菊坡学派。广人将崔与之与张九龄并称“二献”，【'°）南宋广州学宫有祠祀“二献”肖像。咸淳年间，在广州高桂坊建崔与之祠，明代成为南海县学，又于崔与之故第、白云山蒲涧等处建祠。明天顺年间，在二献祠旧地重建崔祠，称“仰高”祠。清代，在学宫街、蒲涧寺、漱珠岗都建有崔公祠，在越秀山麓建有命名“菊坡精舍”的书院。可见崔与之为学对广府地区的影响之深远。黄佐说他是“吾广百世师表”。（''】

崔与之之高足李昴英，番禺（今广州）人，居家文溪之上，因自号文溪。南宋字宝庆二年（1226），他到临安应会337

试，考官拟选拔他为第一名，因其所治为《春秋》之学，宋理宗刚即位不久，崇尚帝王之学，将治《书》义的台州王会龙擢第一，品英调为第三，成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虽然当不了状元，而由此知其才学之高及治《春秋》之有成就。曾任太学博士、校书郎、直秘阁、大宗正卿兼国史编录院检讨、翰林侍讲学士，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他与崔与之一脉相承，开宗立派，在岭南历史上破天荒地形成了学术流派，成为南宋岭南学术的主流。崔与之、李品英与曾任广州知州的曲江人余靖堪称为岭南南宋三大家。现存文稿，余靖有《武溪集》二十卷，崔与之有《崔清献集》十卷及《崔清献公言行录》三卷，李品英有《文溪存稿》二十卷，是现存宋代岭南学人文集之分量最大者。

南宋时期，理学传入广东。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曾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广州知州廖德明等地方大员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学生，也热衷于宣扬理学。南海人简克己于孝宗时前往湖南师事理学名家张拭数年，“精确有守”，学成归号，被廖德明请到州学讲学。南海人陈春华，曾往江西象山（今贵溪）师事理学名家陆九渊，陆九渊的象山学派是与朱熹的考亭学派相抗衡的。番民人梁百揆，精研理学，归隐于禺山书院讲学。东莞人李用，钻研周程理学近30年，设馆授徒，撰《论语解》，邑人李昂英向朝廷进呈此书，奉旨在全国印行，诏授李用为校书郎。李用不愿做官，说是“著书自为干禄计哉!”宋理宗特赐“竹隐精舍”匾额以表彰其高风亮节，并迁承务郎。李用之子李春叟居家授徒，岭海名338

士多出其门，朝廷赐号“梅外处士”。正是在理学的熏陶下，广东不少士人在南宋末年元兵南下时，毁家纾难支持文天祥之抗元。李用鼓励其婿熊飞起兵動王，抗元兵败之后，他东渡日本以传诗书，成为岭南第一位东渡讲学者。

三、白沙学说与甘泉学说

明代岭南，出了两位重要的思想家陈献章与湛若水。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村人，世人多称其为陈白沙或白沙先生，其学说被称为白沙学说。他的学说颇有建树，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和后世都有较高的评价。

中国古代官方哲学，从南宋末开始，以程朱理学为正宗，至明初完全为程朱理学所垄断，学术界如一潭死水，不敢越雷池半步。陈献章年轻时，也曾崇信程朱理学，在科举屡次不第的情况下，他转而治学，形成了“学贵乎自得”，“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体系，从而突破朱学的藩篱'，成为独树一帜的江门学派。

江门学派提倡比较自由开放的学风，对岭南思想界有着相当的影响。陈献章很讲究“自得”，注重“疑”，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2）就是主张治学要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要有自己的见解，“求之吾心”，而不盲从于书本教条。陈献章针对宋以来重“理”陈习，别出一格339

地强调“心”的作用，提出了“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他说：“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3）故而自沙之学也被称为白沙心学。这“心学法门”，是一个以“静坐”为主，以读“古人紧要文字”为辅的修养方法，也是认知的途径和方式。陈献章不像朱熹那样把“理”（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绝对本体，而是提出了万事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观点：“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4）他认为天理和人欲共同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所说的“静”，就是停止人欲的萌动的那种状态，人的欲望停止萌动，与人欲同时存在的天理就不会受人欲的干扰，人就能很好地把握它。这种从“静坐”中直见心体的思想和方法，比起朱学要更为简易，从而使明代学术思想由理学转向心学，因而成了由朱学转向阳明心学的过渡环节。“陈献章学说在明中叶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强调不假外力反求诸心的修养方法，对人的主体意识的高度肯定，从而对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收敛身心'，压抑人的欲望和意志去屈从天理，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展示了中国哲学由注重外在必然性而向注重人的内在潜能和主体意识转换的契机”。（'S）对于陈献章开明儒心学先河的贡献，《明史儒林传》予以高度评价：“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黄宗羲说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6】

陈献章对岭南学风的改造，对岭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也340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学贵乎自得”和“以自然为宗”，就是他改造当时学风的思想武器。他给学子湛若水的诗就是体现了他的治学思想的生动启示：

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

（'7）他的意思是老师只把能绣出鸳鸯的金针授给学生，但绣出什么样式不是老师来指定的。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奔放的感受，正是治学的最高境界。

陈献章多才多艺，他是明中期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书法家，惯用自制的成束山茅草笔写字，称为“茅龙”字。陈献章在世时，其诗作已有刻本流传。在他死后五年，即有其门生所辑的《白沙诗文全集》刊行。其著作合集有《白沙子全集》、《自沙诗教解》。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通海点校本《陈献章集》使用明清各种全集版本并补遗，是较为完整的全集。

陈献章创立江门学派，成岭南学坛宗主。由于他的恩想比较开放，因而不为当朝权贵所看重。《明史f需林传》说宗献章者日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故而江门学派在全国范围影响有限，但他在岭南的名气还是很大的，而且教育功绩不小。《明儒学案》中的《白沙学案》收录了他及弟子十人，再传弟子一人。弟子中有华盖殿大学士、曾任内阁首辅梁储，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诩，户科给事中贺钦，廣吉士邹智，监察御史陈茂烈，国子博士林光，两浙盐运使3111342

史桂芳，其中学问最大、最有影响的是湛若水。他是陈献章最重要的学术继承人，发展了陈献章的学说并自成一家，形成为一个学派，被称为甘泉学说。

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因居家增城甘泉都，人称甘泉先生。湛若水一生仕途通达，官至南京礼都、吏部、兵部尚书。晩年致力于讲学著述。湛若水任职翰林院十年，不仅结交了一班文人学士，而且有机会畅游燕赵，讲学齐鲁，自谓仰观人文于上国”，浸润和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使他的学问具有一种博大精深的涵养。他长期担任高级学官，所建有名可考之书院即有30多间，从学弟子也众，“相从士三千九百余”，为传播心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一生著述甚富，主要有《心性图学》、《樵语》、《四书训测》、《古本小学》、《圣学格物通》等。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因悟出“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深得陈献章赏识。陈献章视其为自己学术思想的继承人，临终前把传道的重任交付给他。湛若水对老师也一往情深，他十分重视师承，凡在讲学的地方必奉祀白沙。

湛若水承传陈献章的治学精神和学风，是通过贵疑、重思来寻求自得，并符合以自然为宗的江门学派。但是，虽然他对陈献章非常尊重，而对陈献章的思想观点却并不盲从，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发展老师的的心学修养方法时有所修正。他对陈献章治学十分看重的“静坐”提出异议，对陈献章只讲内心涵养而与读书博识相对立的观点批评说：

“别求置书册而静坐以为学，便是支离，终难凑泊。”〔'8】主张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敬立而动静混矣，此合内外之道也”。（'9）湛若水思想的核心观念是“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a】这一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敬”，一是“勿忘勿助”。“敬”是说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持一种敬的态度，以此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勿忘勿助”是说保持心境的空虚、无一杂念的状态，“天理”自然会呈现出来。总而言之，要依照伦理道德进行自我反省，自觉地把“天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他极力主张学以致用：“吾儒学要有用，自综理家务，至于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无一不是性分内事，皆有至理，处处皆是格物工夫，以此涵养成就，他日用世，凿凿可行。”【2'）

湛若水的学说与王阳明齐名。王阳明主张“致良知.'为宗，湛若水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他和王阳明都讲格物”，但他反对王阳明把格物陷人空虚的理解，主张格物为体认天理”，自称“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22J王湛两人的学说各自都有相当的影响，当时天下学者不是归于王阳明则归于湛若水，时称“王湛之学”，称阳明学派为“浙宗”，甘泉学派为“广宗”。王、湛在学术上虽有分歧，但双方都持对对方敬重的态度，其学生也可以往来择师。从而开创了明中期个人讲学，学者可在对比中择师，学术上互有往来的新风气。343：34

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岭南文化走向成熟，广府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也突显出来，在粤中地区崛起江门学派与甘泉学派是点的表现，从一组数字则可以说明面的情况。据《广东文征作者考》和《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统计分析，得广东历代主要人物的两组数据：一为分时代数据，即汉魏六朝6名、唐13名、五代3名、宋51名、元9名、明300名、清330名、近现代2064名（与清代稍有重复）：二为地区分布数据，总计2776名，其中，番禺（广州）320名、南海257名、顺德169名、香山146名、梅州147名、东莞126名等，（23）南、番、顺、香、莞五地还不能完全班括广府地区，已约占总数的49%。从中可见明代无疑是一个大跨越的时代。除了陈献章和湛若水之外，还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学者。以下举数人为例。

被《四库全书总日提要》称为“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的著名学者黄佐，与陈献章、邱浦并称明代岭南三大学者。黄佐是香山县荔山（今属珠海市）人。黄氏家族明初定居香山，为闻名岭南的“文献之家”。黄佐祖父黄瑜，世称双槐先生，父亲黄畿，世称粤洲先生，皆为一代名儒。黄佐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兼输林院侍读学士，时人称泰泉先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立有《泰泉学案》称：“先生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博而反约于心，则视听言动之中礼，喜怒哀乐之中节，彝伦经权之中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黄佐提倡的是知本务实的思想。他不仅是博通经史的大学问家，更为可贵的是淡泊功名，潜心著述，一生著述宏富，且多为乡邦文献。一生著作计460多卷，其中编察志书就有200多卷。

Ca1东莞人陈建，曾任福建候官县教谕、山东信阳县知县。归乡后锐意著述，隐居不出。其主要著作《学蔀通辨》，阐明了朱（熹）学与陆（九渊）学之根本不同。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陆王心学，主张“务实而无失”的思想。其学说被称为东莞之学。陈建的实学思想不但用以破王阳明心学之非，而且要立议政之实，其实政思想体现在他的《治安要议》、《备边御戎十议》等著作中，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所著《皇明通纪》（清乾隆年间列为禁书）是著作明史之先锋。

番禺人何维柏，官至南京礼都尚书等职。是一位耿直不阿，嫉恶如仇，享有盛名的清官，他因疏奏首辅严嵩劣迹，被问罪下狱，削职归家以后，在广州设“天山草堂”授徒，从学者众。之所以取名“天山”，是因为“天崇高而莫及，山重厚而不迁，自天而下，惟山特立于中”，“端平凝重，肃然使人不敢犯”。以此标榜一种顶天立地、决不随波逐流的高尚人格。他的教学宗旨是“学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褥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在事则匪懈，优游以俟成”。他的教育思想影响及后人。何维柏的理论与陈献章相类，而注重纲常社稷，热心地方公益。著有《易学义》、《礼经辨》、《太极图解》、《天山草堂存稿》、《陈子言行录》。

34534南海人黄衷，历任江苏、福建、广西、云南地方官，官至兵部侍郎。致仕归居广州越秀山麓，在广州创办了矩州书院，潜心施教，所著《海语》一书，是他晚年居家时，与来往外洋的舟师、舱卒、番客来往留心记录下来，再加整理，记述暹罗（今泰国）和满刺加（马六甲）风情、东南亚物产以及海上旅途之险山恶水和物怪，成为研究16世纪东南亚史地及中国与南洋交通史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黄衷并未见有出洋的经历，此书其实是他采风之作，反映了广府人士放眼向洋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此书成于嘉靖初海贾所传，见闻较近，似当不失其实，是尤可订史传之异，不仅博物之资矣。”

南海人方献夫。在西樵山上筑石泉精舍讲学，与湛若水、霍韬等学者往还论学，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兼吏部尚书。致仕之后仍归西樵山，将石泉精舍扩充为石泉书院。继续讲学不倦。其著述有《周易传义约说》、《学解诸说》、《程子语》、《大学中庸二原》、《西樵遗稿》等。

南海魁岗石头乡（今佛山石湾）人霍韬，曾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著有《诗经注解》、《象山学辦》、《程朱训释》、《渭厓集》、《西汉笔评》、《霍氏家训》。后人汇刻为《霍文敏公全集》。

四、学海堂与广雅书院

清初的广府，学术上最为著名的学者是番禺人屈大均。屈大均在参加反清事业失败之后，隐居故里，以著述终其晚年。屈大均著述甚多，有将其全部著述称为屈沱二十四种，也有将其所著《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皇明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屈大均全集》475万字。《广东新语》是一部笔记性的岭南地方历史文献，全书共28卷，条目式，分列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宫、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等语，详细记述了岭南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文物古迹、名人佚事、经济物产、制作器用、生活见闻、诗画艺术、学术著述等，内容极为丰富。“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2S〕对于研究明清之际的岭南尤其是广府的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清初大行文字狱，屈大均死后，其遗著不止一次受到禁毁。屈大均著作版片销毁殆尽，发布搜访销毁民间私藏的屈大均遗书书目就有其所著13种。屈案为清代广东文字狱之先例，文网森严，此后，岭南学术界在较长时间内陷于沉寂的局面。

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他在粤九年，使文化事业灿然可观，成为广东学术的转折点。阮元是历三朝之封疆大臣，身居要职，而他同时又是士林泰斗，著名学者。他重视提倡朴学，到广东不久，主修《广东通志》，是史学界至今公认为“体载渊雅，记载详核”的善本。当时在广州已有羊城、越华、与秀、应元四大书117348

院，阮元不以为足，为招揽人才，提倡朴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办学海堂，道光四年（1824）在越秀山麓建成学海堂书院。阮元自任山长，以后又规定书院设学长8人，不设山长，以利学术之风。阮元明确宣称：“本部堂建学海堂，为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古之所”，“且课举业者，各书院已大备，士子皆知讲习，此堂专勉实学。”t26J定每月集书院生童于此课诗古文。

清代书院基本官学化，死拒科举时文，教育思想僵化。学海堂提倡实学，成为一所崛起的新式书院。书院招生严格，在授课方面，改变以科举为目的专攻八股的课程，不课制艺不习时文，而是教授经史疑义、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强调学思、学用结合的新学风，学生每日要写日记交教师详阅。每季季考，往往由阮元亲自命题。学海堂的章程、课程为广东其他书院所效仿参照。学海堂兴办80多年，培育出无数英才，学风大振。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传播当时经学的最重要的成果，刊印的丛书，以广东文献居多，对广东的教育、文化事业都有极大的影响。此外，阮元还在三水创建了行台书院，造福乡村教育。

阮元为发展教育，知人善任。先后邀岭南著名学者鹤山吴应逵，顺德马福安，嘉应吴兰修，番禺林伯桐、张维屏、陈澧，南海熊景星、谢克功、曾钊、谭莹、朱次琦，香山黄培芳，或为学长，或为教授，兴文重教，一时群星灿烂。曾割是广东专治朴学第一人。同治《南海县志》肯定曾割在广府学术转折中的关键作用：“吾乡谈经术者，代不乏人，而以汉学为倡，断自钊始。”这些人多重实学，持有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满怀富国强兵的经世思想，使实学成为从理学通向近代新学（西学）的中介和桥梁。学海堂成为广东有志实学者之讲习所，以学海堂的创建为标志，后人称之为“广东学派”开始迅速崛起，人才蔚出，著述成果先后问世。广东学派的文化群体，大部分是广府人，一些不是广府人的学者如嘉应州人李前平，应阮元聘评定学海堂课艺，留府授诸子经，其学术活动也主要在广州。

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27〕在他督粤期间，一时名流辐辏，居幕者众。不仅使学海堂声名鹊起，还有两件大事发生在广州，引起全国学术界的瞩目。此两件大事，一是集清代解经之书，刻成《皇清经解》。成书时，阮元已移节演静，因版片藏于学海堂，又称《学海堂经解》。此书不但是清代前期汉学的一次总结，也大大提高了广东学术界的声望。学海堂也俨然成为全国学术重镇之一。还有一事是为《国朝汉学师承记》引发的汉、宋之争。清代学术界的汉学、宋学之争由来已久，时汉学占优势。阮元幕客江苏人江藩是时人眼中之宿儒、通儒，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清代汉学大师作个别的记述，标榜汉学，虽有较多门户偏见，仍有甚高的学术价值，首刊于广州，是清代广东学术界之盛事。此书之出版，引起同时客幕阮元府署的安徽人方东树反其道而大张宋学旗帜，撰著《汉学商兑》，对汉学发起全面的攻击。这场理论斗争，将清代汉、宋之争首次公开化并引至高潮，成为u9350

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一幕，并把广州一下子推到全国学术界的焦点，对广府地区的学术界打破门户之见也有较大影响。正是阮元的大力提倡，广东学风才盛极一时，并且造成了以广宗学术为主体的广东学派的崛起。

道光后期及咸丰期间，在鸦片战争多事之秋中，广府的学术活动进入低潮。在“同治中兴”的背景下，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浚頣于同治五年（1866）在越秀山麓学海堂东侧创建菊坡精舍，聘陈禮为山长。陈灃“不自立法”、“不自立说”，“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t2e〕而菊坡精舍在继承学海堂之教育模式中，其实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学海堂一岁4课，精舍一岁30课，考课数量大增：学海堂设学长8人，共司课事，轮流负责，学生择师而从，而精舍以陈禮一人专门负责讲学，师生关系明晰密切，陈禮能够通过讲学，详细系统地将其学说传授学生，这对日后东塾学派的形成十分重要。在此期间，陈澧主持了学海堂和广东书局的校勘刻书，广东书局版片皆藏于菊坡精舍。菊坡精舍是对学海堂的继承和发展。

陈澧是番禺人，字兰圃，世称东塾先生，是一位博学广闻的著名学者，他在《东塾读书记》自序中自我评价：“生平无事可述，唯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可知其一生业绩在研经治学。他在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书法上无不有所研究，无论是整理文献、改革教学、科学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他先后被聘为学海堂学长、东莞龙溪书院山长、菊坡精舍山长。陈澧治学的态度是融会贯通经学、理学，破除门户之见。曾说：“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t29〕主要著作有《东塾集》、《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弧三角平视法》、《汉书地理志水這图说》、《水经注提纲》、《切韵考》、《声律通考》等100多种。在全国学界享有一定声望。《汉儒通义》是采两汉经师义理之说，分类排基，欲与汉学、宋学两家共读之。书之宗旨，与当时学者专一于字义训请、名物考订，以及热衷于汉、宋之争者迥异。《东塾读书记》重点在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与乾嘉以后诸儒是正脱误、辨审异同、请解音声、钧稽章句的治学路数与风格完全不同，是当时学术风气转变的一个标志，被公论为清代经学经典名著之一。东塾学派是广东朴学的集大成者，完成了汉宋兼采，是清代朴学的殿军。陈禮在学海堂为学长期间，已有弟子从学。咸丰时期，在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艰苦环境中，陈禮仍追求学术，著述不辍。慕名求教者日益增多。菊坡精舍的创立，对维系其师生间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东塾学派的正式形成。其门生中，胡锡燕、赵刘婴、廖延相、王国璲、谭宗浚、黎永椿、饶轸、林国庚、林国赞、马贞榆、沈葆和、陶福祥、杨裕芬、温仲和、陈伯陶、汪兆铨、汪兆镛、梁鼎芬、桂文灿、虞必芳等人都是东塾学派中声名卓著者。汇集自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七年（1881）凡15年菊坡精舍优秀课卷的《菊坡精舍集》中，选取作者已有102人，则东塾学派阵营之盛，于此可见。光绪年间，补为学海堂学长的351352

26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东塾人门弟子或再传弟子。

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他在广州先后创办博学馆、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广东电报学堂、广雅书院。对学海堂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广雅书院创办于光绪十四年（1888），张之洞亲自择地建院，书院占地7万平方米，规模宏大。院中仅学生宿舍有200间，招集广东、广西两省诸生才志出众者，每省百名。张之洞亲自选聘院长及名师前来任教，时而亲自来书院讲经论道。广雅书院首任院长为番禺人梁鼎芬，二任院长浙江义乌人朱一新，皆为在朝中直言被谴者，教学上极为尽职。广雅书院同其他1旧式书院相比，具有一些洋务新味：在教学内容上，并不专习八股文，而是设经、史、理、文四门课程，兼习舆地、历算等实学：在教学方法上，除授课之外，每月都有考试，成绩在前者有赏，提倡竟争，学生素质较高。光绪十九年（1893）会试，广雅学生就有18名中进士。张之洞还创办了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在清末各省书局中虽属后起，而刻书数量却在全国众书局之首，史书数量占所刻书的十之八九，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罕见的原稿本、传抄本、海内孤本等，校勘十分严格精审，对保存文献、发展岭南文化起了推动作用。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力为宣扬，谓学海堂之《经解》、广雅书院之《史学丛书》（即广雅书局刊刻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t：n】广雅书院、广雅书局的创办，对清后期广东尤其是广府的学术文化是有力的推动。

咸同之际，在广东除东塾学派之外，还有一个九江学派。其代表人物为朱次琦。朱次琦与陈澧一样主张融合汉宋之学，但其偏重取向却大相径庭。“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3'〕朱次琦的治学要领认为：经史各有所专，但又互相联系，“夫经明理，史证其事。以经通经，则经解正：以史通经，则经术行”。又认为性理之学是关乎安身立命、处己待人的原则，辞章之学不仅用来丰富生活，也有其社会影响及作用。他强调读经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且身体力行，为人所敬重。同治即位，下诏起用人才，全国被召的知名学者有16人，朱次琦为其-。他称病不赴，被人称为“朱征君”。康有为、简朝亮都曾师从朱次琦。

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的出现，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改变了广东的教育面貌，对广东私塾教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澧对宿儒教授生徒百数十人者的大馆寄以很大希望，“变讲时文之风气为授经讲学之风气，其有益于学术人材者甚大”。当时在广州的大馆最为集中、最为著名，“省城及近县大馆师十余人，弟子千余人”，“幸有十余大馆，讲书久成风气，兴学术作人材，不望之大馆，而更何望耶？”〔32J利用传统方式推动教育改革，为广府教育在后来的变革中走在全国前头作了前奏。

东塾学派的出现，在全国学术界足以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更是广府学术文化水平的充分体现。张之洞后来在湖北办学，曾聘请东塾学派传人陶福祥为两湖书院经学分校，在致陶福祥信札中说到：“若得高贤来主舉比，必能牖启士林，3S3354

昌明绝业，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t33）可见张之洞对东塾学派之推重。清后期的广府学者，不仅人数众多，像陈澧、李文田、候康、吴荣光、谭莹、邹伯奇、梁廷枏诸人，著述之繁富，造诣之精深，涉及领域之广泛，堪称当时全国一流学者，显示出广府的学术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阮芸台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t：：4】正说出了广东学术在清代朴学发展中的变化及地位。

五、维新思潮与民主思想启蒙

早期维新思潮发端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从洋务思潮中孕育分化出来的。清初朝延指定广州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使广州成为对外交往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珠江三角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加上鸦片战争中受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倡导，产生了一批了解外国、探索新事物的人才。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梁廷相根据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所撰的《合众志略》为基础，补充修改而成《合省国说》3卷，这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由中国人修撰的美国通志。同年，又刊刻了《耶録教难入中国说》1卷、《粤道贡国说》6卷，两年后刊行《兰伦偶说》4卷，与前三说合刊成《海国四说》。这些著述，对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风俗等方面作了系统

的研究和介绍，成为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最早著述之一。而在推介西方的同时，更加肯定西方进步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无异在清末社会的阴霾中响起一声霹雳。

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容闳（1828～1912）、郑观应（1842～1921）、何启（1847～1916）、胡礼垣（1859～1914）等在思想上提倡向西方学习。容闳是中国最早留美学生之一，曾任清政府驻美、西、秘副公使兼出洋肆业局副委员，向清政府提出公派幼童出洋留学计划并推动其实行，著有《西学东渐记》。郑观应由洋行买办出身成为民族资本家，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轮船招商局帮办及总办，所著《易言》、《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海人何启生于香港，留学英国多年，后在香港任大律师和立法局议员。三水人胡礼垣也生于香港，创办《粤报》。何、胡二人合著《新政真铨》，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理论批判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这些思想家针对洋务运动的弊端，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由商人自主兴办各式工厂和铁路、轮船等交通事业，提出收回海关行政权、修改税则、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和减少出口税和厘金，建议设立各类商业学校。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从政治上探索了西方富强的本原，提出“君民共治”-。早期维新思潮要求护商富民、保护商办企业和实行君民共主，是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反映，其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性与这个新生阶级的不成熟状况是相适应的。相对于其他早期维新思想家而言，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更为成熱，他在丰富的社会实355356

践中特别是经营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些。早期维新思想家理论表现出来的重商性、开放性以及民本观念，从本质上正是反映了广府文化的特质。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举国震惊，救亡图存成为国人思虑的焦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心也从以前的“技术救国”转到“政治救国”上来。而在此后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使社会上要求进一步反帝反封建主义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情况下产生了。广府地区是这一运动的重要基地，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从广府地区走向政治舞台的。

南海人康有为（1858～1927），出身于封建官僚世家，少年曾师从朱次琦，深受其''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路数所影响。光绪五年（1879），康有为游香港，直接感触到西人治国之有度，不能再以夷狄视之，开始购读西学之书。光绪八年（1882）他赴顺天乡试未中，归途道经上海租界，看到一派繁盛，加深认识资本主义制度较中国的封建制度优越。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大讲西学，开始了向西方寻找图强真理的努力。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改革国家现状的维新变法思想，并且把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要停留在理论、宣传活动的做法转变为行动。康有为先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北京第三次参加顺天乡试时写了

《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的建议。受到挫折之后，使他认识到“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t'S）决心将启发民智放到当务之急。于是在广州办起教育，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变法人才。同时也撰写尊今抑古之书，为变法造舆论。他在广州创办的学堂先后称长兴学舍、万木草堂。最先慕名向他求学的梁启超（1873～1929）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以后又成了他政治活动的得力伙伴，以“康梁”并称.。

康有为将办学当成革新的一种尝试，自立规程和教学内容，以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教学宗旨。授课内容除了中国古书之外，还要读西方译著。教学方法上采取启发诱导方式，既启发学生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也介绍西方先进制度和科学。万木草堂学生千余人，成为维新运动的人才，其中的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動等十弟子更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他在广州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尊孔之名行维新之事，为拥护变革现状的人提供了理论根据。康有为所撰写的《大同书》，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政治上废除国家帝王，实行社会自治，“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书中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公工”、“公农”、“公商”t37），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同社会。这些主张，实际上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梁启超所言：“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357358

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a）此书一直秘不示人而没有产生影响，而现实中的康有为却选择了一条拥护帝制的维新之路，他连续上书，推动光绪皇帝实行百日维新，变法的基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引领的维新运动在近代思想史上推动了一代人的觉醒。但晚年康有为从维新时期的先进分子逐步转化为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最后成为顽固的保皇派。

梁启超早年在政治领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在协助康有为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组织维新派、宣传变法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和舆论宣传工作，成为仅次于康有为的维新派领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以“新民”为职志，不懈地宣传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学说，继续启发民智的启蒙宣传，在清末民初的青年一代中起了巨大的影响。郭沫若说到：“平心而论，梁任公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一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一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t39】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又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我国近代学术史影响较大的人物，是颇有成就的学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史学（其中又有学术史、文化史）、佛学、文学、法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方面，著述多达1400万字，收入《饮冰室合集》，分文集和专集两类，共148卷。他在新闻出版、司法、教育、财政经济以及图书馆事业等方面均卓有建树。梁启超所著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开山鼻祖的地位。他所倡导的“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各个领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康梁提倡的变革主张却日益深入人心，他们在戊戌前后开展的启蒙运动促进了一代中国人的觉醒，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恩想基础。

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近代化先驱。孙中山是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小时曾在家干农活，12岁时随母亲远涉重洋到檀香山，投靠在那里垦荒办牧场兼营商业的哥哥孙眉，思想上有了新的转变，自谓“始359360

见轮舟之奇，苍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他在檀香山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其后致力于推翻封建帝制的政治运动，提出并不断完善了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一同盟会，提倡并倾全力组织以武力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为维护共和的原则，在广州先后建立三次革命政权，发动了“二次革命”、反袁、护法等运动和北伐战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孙中山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恩想家。他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探索、总结和创立了三民主义为主干的完整的民主革命与近代化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广府文化在近代世界文化潮流中勇于开拓、与时倶进的时代特性。也充分体现了广府文化的务实、开放、善变的区域文化特色的升华。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时也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全部内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位列最早，提出最早，实际影响也最大。辛亥革命之前，民族主义侧重于提倡“民族革命”和“革命排满”，辛亥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加大了对“反帝”和规划民族国家等内容的网述，“民族自决”成为其集中体现。民权主义居三民主义的核心地位，擘划了民主政治的建政原则，其理论基础是政治学上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其主要内容包括有关国家政权性质的诸课题，认为政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权形式，即国体与政体的间题。并围绕“民主政治”原则擘划了“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分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民生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起点和归宿，其最要之原则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宇宙进化观是他的民主革命论和民权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他的“知难行易”说为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为他所开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民生史观、文化观、物质与精神观、宗教观、伦理观，也无不贯注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观的继承和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吸收，着眼于为民主革命的实践和目标服务。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也十分重要，大致包括区域建设、交通、农业、工业、钱币革命、开放主义等六个方面。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经济建设思想，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体现了孙中山思想的强大的生命力。他所倡导的爱国爱民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顺应潮流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以及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朱执信、胡汉民等广361

府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不但参加了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也为民主革命思想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胡汉民曾担任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政治部长、党刊《民国》主编，以及孙中山倡导创刊的《建设》杂志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唯物史观，成为在中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之一，不过他的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也只局限于唯物史观的范围之内。

朱执信生平著述甚多，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历史乃至新诗，反映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视野之开阔、学问之广博、思路之敏捷。作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他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积极参与革命派同保皇派的大论战，写出《论満洲虽欲立宪而不能》、《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之国家主义》等数万字的政论文章，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大造舆论。在孙中山发动反袁斗争时，他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官，同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在革命处于困境时，他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撰。朱执信不仅在宣传和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上作出了贡献，与同时代的革命民主派许多理论家相比，他的思想更多一些激进的革命色彩，较早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在《民报》第二三号上连续发表了《德意志社会362

革命家列传》，指出：“自马尔克（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社会主义。”他从马克思学说中吸取了许多新的观点，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丰富了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理论。

相比于朱执信、胡汉民的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香山南屏区北山乡（今属珠海市）人杨匏安不仅是南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先驱，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和楷模之一。杨匏安在留学日本时接触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学说，吸取了许多新思想，为他以后的思想进步打下了基础。归国后迁住广州，一面在中学任教，一面从事写作，以宣传进步和革命思想为目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半年时问，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40多常介绍西方青年心理、美学、哲学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其中从1919年5月21日到12月底，连载19期的近十万字的文章《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章发表的时间，与李大与1i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杨匏安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的先驱者之一，因此有“北李南杨”之说。杨匏安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1929年，他利用工作之余翻译了列宁等人的《地租论》，编著了一部《西洋史要》，特别详细地记述了巴黎公社，第一、二国际，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关于西方史的著作，开创了我国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河，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363：：64

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还经过了与无政府主义的较量。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欧洲的一种否定国家政权与阶级斗争的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早在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刘师复就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鸡鸣学舍，并于次年创办了机关刊物.《晦鸣录》（第三期起改为《民声》）。刘师复原名刘思复，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早期加入同盟会，在日本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返回广东，亲自组织和投身对清朝大员的暗杀活动，受伤失去左手。是华南地区有相当影响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当时的现实，他愤慨不已，把名字改为“师复”，力倡“道德救国”。其后在广州建立鸡鸣学舍，宣传无政府主义。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源于日本的幸德秋水，成型时主要源于克鲁包特金的理论，他认为这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主张实现一切公有，各取所需，提倡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排斥一切政府、政治和法律，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社会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种寻求社会出路的政治派别，虽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却有着很大的迷惑力和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把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归咎于政府，要打倒一切政府和权威，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广州的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和《广东群报ⲻ论战的主将是应省长陈炯明之邀南下来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和岭南大学教授南海人区声自。陈独秀在省公立法政学校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批评了无政府主义，提倡科学社会主义。区声白在《广东群报》上发表《致陈独秀先生书》，开始了论战。如此往复三次，陈独秀将三次往来信件刊登在《新青年》杂志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上，使这场论战的影响扩大到全国。陈独秀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主义》等40多篇文章、演说词和通讯，共产党员高明人谭平山、i章植棠也在《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参与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论战的主要问题包括自由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国家政权问题以及生产和分配问题。通过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一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进步青年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宣传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长林修梅是军界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将军，于1920年底在广州写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一系列文章，声称“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与此同时，《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以及共产党早期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数十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量传入广州，在广州的共产党人阮啸仙、刘尔崧、周其36S366

鉴、张善鸣、杨善集等人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创办广州机器工人夜校，创办适合工人阅读的小型通俗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得到广泛传播，为广州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做了干部准备。

从上所述，可以见到，尽管各个时期的广府学术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但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开放性，重视效应的务实性，融合众长的独创性，敢为人先的开拓性上，广府学术表现出一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及内在联系的，并且有一种越到近现代就越为先进的趋向，这种趋向与以广府文化为集中表现的岭南文化在近现代的崛起有着相应的关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在广州的率先提出，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无不显示出广府地区的这种学术理论特征以及广府学人的学识、勇气与风格。

注释：〔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粤人著述源流》。

〔3〕道光（广东通志》卷268《董正传》。

〔4〕〔5〕范端昂：《中见闻》卷十六（人部四王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6〕（晋书）本传。

〔7〕嘉靖《广东通志》本传。

〔8〕道光《广东通志》卷189《艺文略一经部）。

〔9〕黄佐：《广州人物传》本传第15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o〕张九龄溢“文献”，崔与之进“清献”。

〔11〕黄佐：《广州人物传》本传第16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2〕（与张延实主事》十三，《陈献章集》第16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陈献章集》第6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4〕《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中）》，《陈献章集）第5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15〕黄明同：《陈献章评传》第13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黄宗義：《明儒学案自沙学案》。

〔17〕（示湛雨》，《陈献章集》第70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8〕（大科训规》，《甘泉文集）卷二。

〔19〕《答余督学》，《甘泉文集）卷七。

〔20〕《雍语》，（甘泉文集》卷=。

〔21〕《天关通语录》，《甘泉文集》卷二三。

〔22〕《答杨少默》，《甘泉文集》卷七。

〔23〕骆伟：《论岭南文献》，載《高校文献信息学刊》1995年12月第2卷第4期第10页。〔24〕黄佐生平撰述，据《明史本传》称共260卷，但《明史艺文志》录入即有经类之《诗经通解》21卷、（礼典》40卷、《乐典》36卷、《续春秋明经》12卷、《1、学古训）1卷、《姆训》1卷：史类之（通历）36卷、《革除遗事》6卷：职官类之《输林记》20卷：方志类之《广州府志》22卷、（香山县志》8367卷：传记类之《广州人物志》（《四库全书总目》称《广州人物传》）24卷：子类之《泰泉庸言》12卷：总集类之《明音类选》18卷：赋类之《两都赋》2卷：诗文集《泰泉集》60卷。以上统计，已有319卷，实际上远不止于此数，其所修纂的《广东通志》70卷，如此重要的著作就没有收入。此外还有《罗浮山志》、《南雍志》24卷、《广西通志》60卷等。

〔25〕潘耒：《广东新语活序》。

〔26〕林伯桐：《学海堂志》。

〔27〕《清史稿》卷3“本传。

〔28〕陈澧：《东塾集》卷二。

〔29〕《清史稿》卷482本传。

〔30〕徐绍棨：《广东省立图书馆沿革》，《广东文征续编》第二册第254页。

〔3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章（康长素》第71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2〕陈澧：《讲书议），《东塾集》卷2。

〔33〕张之洞：（致陶春海札》，《张文襄公全集》卷219。

〔3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35）梁启超：《南海底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2页。

〔36〕康有为：《大同书》第256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37〕康有为：《大同书》第246、240、249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38〕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第21页。

〔39〕郭沫若：《少年时代》。

〔4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368

第十七章民间信仰

广府传统民间信仰甚盛，成为支配人们风俗习惯和行为禁忌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广府的民间信仰源头具有多元化与复杂性：有广府先民原始崇拜演化而出，有北方移民带人的神灵崇拜，有本土生成的神祇，有宗教神灵的民间化，也有受官方祀典的影响而张扬起来的民间信仰。当然，也有各种因素混合而造成的信仰。

-、土地神与五羊仙

广府地区原始先民的原始宗教，既自发地表现出入类幼年时期的共性规律，也有由移民或文化交流带入的与外部地区的融合因素。广府地区的原始崇拜，是先民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甚少的结果，从而产生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并对后来的民间信仰产生深远的影响。

原始先民对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369370不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事物，都有着依赖、恐惧、敬畏的神秘感，对飞禽走兽、爬虫鱼蛙、草木土石、山川河流、天地日月、风云雷雨，无不视为神灵凭附或化身。因而有土地神、五谷神、大树神崇拜。土地和粮食为民生之本，而阳光雨露是土地创造农作物的神力的先决条件，故而民间社坛是露天的，一个土堆、一块大石、一棵大树，都可以被指认为社神依附之所。此风在全国各地本来普遍存在，到了明清时期，在内地已少见了，而在广府地区仍较为常见。清人张渠记载：“各乡具有社坛，盖村民祷赛之所。族大者自为社，或一村共之。其制砖砌石，方可数尺。高供奉一石，朝夕追度。亦有靠树为坛者。”（'）入粤外地人士叹为“宛然有古人风焉”。t2）广府各地祭社时日不一。《香山县志》云：“八月上戊祭社。”（3）佛山祭社则多在元宵节，日间还举行“社火”活动，敲锣打鼓，歌舞杂技，尽情欢乐。清代广州祭社在二月，社肉分给社中“小儿食之，使能言”。〔'〕广州的妇女，有“除日”拜社的风俗。所谓“除日”，指十二日为一组的日子中，第五天为“除日”。妇女拜社神，大抵事出有因：做了噩梦、患病、惹上是非，担心被小人坏了好事，拜社神是为了消灾攘祸。社神的职能，远远超出了土地的奉献，成为除病驱邪乃至消灾解难的一方之守护神。

由于社神兼有一方守护神之职能，祭祀社神就成了维系一地居民的重要组织方式。祭祀同一土地神的民间组织渐而演变成民间地方基层单位，率同神人祭祀的领头人，也逐步演变成基层组织的首领。明清时期的佛山，约有40余里社。里社供奉的社神，俗称“社公”，不是偶像，多以石头或石碑刻上社稷之神或只刻上社名。第一忠义社社内置石麒麟图像，故又称“麒麟社”。社神崇拜与图腾崇拜融为一体。佛山神坛择地而建，大基头有一处社坛因迷信风水改建向街内，称“倒向社”。社坛惯例多无上盖，惟大口社、祷边社因社内祀奉观音而建有上盖。社神与观音合署办公，反映了民间信仰造神全赖于功利驱动的随意性。

社神本是自然神，体现出土地与农作物的自然属性，后世赋予其种种的社会功能，又派生出兼管阴阳二界事务的一方之神一土地神。土地神职位虽卑，却最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受祭祀的虔诚程度非同寻常。广州旧俗，以三月二十九日为土地公生日，于此日及传统节日拜祭土地神。广府人家三间两廊宅屋人口廊间的壁上，首设的就是土地神位，名号往往冠以“生财降福”之类的字眼，有的花纹雕刻得十分精细。直至现代，广府地区的居民仍有不少人家以门前摆一个易拉罐为香炉，甚至在门口地上摆上个苹果，在苹果上插上三枝香，以极为简单的形式延续着对土地神的崇拜。求神者已不再是务农者而是市井居民，其功利在于祈福避灾，而不在求五谷丰登。

祭社程之神是将土神与谷神一起祭祀的，一旦土神以土地神的身份出现受祀，谷神也就另立炉灶受祀。旧时花县每年二月二日为谷神诞，时在春季备耕之际，家家户户烧香点烛，祈求谷神保佑丰收。巷口门前贴出“五谷丰登，六畜繁昌”的巻头符，表达一种良好的愿望。371

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五谷神，就是广州的五羊仙。五羊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自北方携牲畜、稻谷良种南来，落籍岭南的这么一个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转变的历史进程。也有人推测，这个传说的含义，反映了广州地区的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是羊。至于仙为五位的含义，有说是代表东西南北中，与五方神、五佐神有关。那么，五仙神既是五谷神也是宗族神。还有人说，过去五仙观中所祀五羊仙像，以一少者居中，余皆老者，据说反映了先民南移时未审水土，最先带来的黍稷一类的北方作物移植失败，后来者带来权稻始获成功，少者因此得到特别的礼遇。农业科学家发现，广州地区是野生稻生长之地，至今在增城等地仍有野生稻种生长，五羊传说反映的或许只是北方稻作技术的传入以及与之俱来的谷神崇拜。

珠江三角洲的谷神多为女性。香山（今中山）村落，多祀禾谷夫人，有说此是传说中的后稷之母姜嫄。屈大均认为姜源之祠在陕西武功，对此传说大不以为然，并说里有社稷之神就够了，祀禾谷夫人属于淫祀。tS〕其实，流传已久的民间神话，正反映出移民南下的轨迹，以及这些神话最早发生于母系社会的痕迹。

二、南海神与天后

河网交织，江海相汇的生活环境，使广府居民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先民以渔猎为生，多靠水路来往，有一种372亲水感情。另一方面，江河湖海风急浪高，滩险流激，对水路来往和水滨作业者构成安全成胁。因此，在原始先民的自然神崇拜中，水神有着显著的地位。

祭祀水神的行为早已发生。在珠江口的香港、澳门、珠海发现的一些岩画就传达了这方面的信息。

香港佛门堂石壁石刻，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纂刻的《新安县志》记述为“龙形石壁画”。据近人陈公哲实地考察，石壁岩画地处大崎山南端海滨，距海岸300米，画面并不是龙形图案，主题纹饰是6个正方形的涡纹，从结构看，显然是圆涡在形体上变型图饰。与石壁岩画近在咫尺的沙同背古文化遗址，出土遗物具有鲜明的石器时代遗物特征，遗物主人极可能是石壁画作者。方形涡纹“标示含义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岩画中的圆涡纹、同心圆纹及水波纹有着共通的寓指。它所反映的凿刻者的意识也极为清楚，显示了先民们对海水的依存关联以及敬長的崇祀意念”。t6〕香港发现多处岩画，都在海拔仅数米高的海边，其图纹曲折复杂，可以辨认出蛇首、鸟形等明显图案化的纹饰，标示出民族在迁徙和组成中兼及多种崇祀图腾的复杂意念，也反映出依赖渔猎生存的部落祈求镇抚怒海的意愿。

珠海宝镜湾天才石岩画，刻于孤悬海边高出水面约5米的巨石上，刻着两个人形、一条船形和三个符号。在宝镜湾藏宝洞顶部的大坪石岩画，刻着20多个人物、动物围绕着一条大船奔走、跳跃、跪拜，犹似启航前祭海的情景。（7）在藏宝洞岩画所处的山腰向下，采集到石斧、石锛、网坠以及陶器等物。据中科院广州地理所的热释光测试，这些文物属于4248±425年前的遗物，有的标本距今3899±390年，为高栏岛岩画的年代提供了背景佐证。在澳门也发现有以船为主题的岩画。【8】这些岩画反映了远古时代先民生活于珠江口，并产生了与海有关的原始宗教。南海交通历史悠久，南海神的起源也早。有关南海之神最早的记载，与蛇有关。《山海经》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日不廷胡余。”【9】又载有“讙头国”，或日“讙朱国”。【10】传说尧的儿子丹朱被放逐到南方，是为南蛮（苗）之祖，丹朱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丹朱之子居南海以祠祀，子孙繁衍，为丹朱之国，又称“讙头国”或“讙朱国”。值得注意的是，“不廷胡余”快读音成“番禺”。似乎还掲示出南海之神同古广州的起源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隋朝开皇十四年（594），隋文帝下诏祭四海，于近海处建祠祭祀。在广州南海镇（后称扶胥镇，今黄埔区庙头村一带）建南海神庙。历代帝王对南海神庙迭有封赠。唐玄宗年间封“广利王”：宋代先后加封号“洪圣”、“昭顺”、“威显”，宋真宗赠玉带加王冕九流：元代诏尊神号“广利灵孚王”：明太祖赐黄金香盒：清雍正年间封“南海昭明龙王之神”。民间至今称南海神为广利洪圣大王。历代，皇帝每年要派地方大吏或钦差大臣到南海神庙举行盛大祭典，唐开元起，每年立夏之时行祭。至明代以后，则是春秋二祭。这种恩宠，为其他海神所不能比拟。南海神庙全盛时有大小厅堂120间。彼时广州城西还有一座“南海行神祠”（址在今文昌路广州酒家附近），称西庙。而扶胥口的南海神庙则被称为东庙。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赞美南海神庙的雄伟壮观称：“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賭建章宫!”将其喻为西汉京城长安以华丽著名的建章宫。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文称：“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祝融本是火帝，南海神为什么叫祝融？三国吴学者虞翻的解释是：“祝，大也：融，明也。南海为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开炎天，故曰‘祝融'也。”【11】这说明南海神及其祝融的称法在三国时已有之。祝融是火神，职司南方，“帝南岳，又帝于南海”，【12】以扶胥为离宫。按五行之说，“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后火生于外。火非水无心为命，水非火无以为性”。【13】故而祝融既司火又兼司水，既在南岳又在扶胥。据《管子》称，祝融是黄帝的六个助手之一，“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14】祝融被古代南方越族视为共同的南方之神至兼任南海之神，有个转化的过程，反映了越族接受自北而南的文化融入。从原始先民岩画所表现出来的祀海场面，到南海神之号祝融，尊奉为帝，将南海视为祝融离宫，反映了粤人事海神甚谨，从原始宗教的自发意识到中原文化南来将民间信仰纳入官方祭礼之演变。自然神功能之衍生，是自然崇拜的一个普遍规律，官方37S376也热心于推进南海神功能之扩展。南海神最初是作为自然神出现而负起海上通航保护之职，进而有地方保护神之职责。比如兵事祭神：唐咸通年间，高骈征安南，出征前曾到南海神庙谒神，海陆两路夹攻，海路风平浪静，谓有神助。北宋皇祐四年（1052），依智高兵临广州城下，广州守将发兵抗击前要到南海神庙祷告。事平，宋仁宗于翌年酬种谢灵，救封南海神为“昭顺”。南宋庆元三年（1197），大奚山岛民暴动围攻广州，守将发兵前也先向南海神祷告。碰巧大奚舟船在庙前胥江上遇风浪而被官兵击败。祷雨解旱：北宋熙宁七年（1074），广州知州程师孟四次奉诏祷雨、谢雨于南海神。明宪宗曾派专员到南海神庙祭祀求雨。南海神又兼司送子，明嘉靖十一年（1532），世宗特差命官来南海神庙祭祀求子，五年后得子，遂于十七年（1538）遣官员到庙致谢立碑。官方行为在民间之效应极为热烈，善男信女深信南海神可佑一方平安、风调雨顺，乃至于保佑生殖。南海神庙千余年来香火不断，祀南海神不仅为官方之祀典，也成为广州民间盛大的“波罗诞”。南海神由自然神演进为多功能神，民间各有所祈。如谓在神殿前拜石上睡一晚可望得子，在祝融神神龛后小龛取土喂家畜可六畜兴旺，将南海神当为生殖之神。广州民间将南海神庙称为“波罗庙”，波罗之名来历已久，宋代广州八景已有“波罗浴日”。为何称波罗，有多说，或说外国船员带有波罗树种植于庙前：或说有外国船员遇海难，村民为其送葬，见其身上带有波罗树种，称之为波罗：又说印度商船船员到庙中参拜，讲梵语“到达彼岸”音为波罗。无论何种说法，都与海上来往有关。波罗诞为南海神诞，诞期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一、十二、十三连续三天，以十三为正诞。方圆数十里的四乡村民云集来会，路上行人如蚁，庙中人声鼎沸，爆竹轰鸣，香烟缭绕。庙前的黄木湾原来水面辽阔，日渐泥沙淤积，波罗诞期正是春汛期，海水淹没了浅滩，广州附近及珠江三角洲各县村民都划船来到庙前，各展本地的灯饰、戏艺，鼓乐喧天，旌旗招展。陆上则有庙会、杂耍。神庙头门前空地上搭起舞台，请名伶老倌唱粤曲、演大戏。四乡村民分别抬着神像四出巡游，到各乡贡例”接受供奉。热闹非凡，胜似春节，民间有“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的说法。南海神崇祀在珠江三角洲甚盛。广府各地建有多处南海神祠及洪圣王庙，成丰《顺德县志》所载即有南海神庙14座，【15】实际上，乡间的南海神庙、洪圣王庙很多并未入志，数量远在此数之上。多元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而在接受各方雨泽的广府更为突出。天后崇拜与南海神崇拜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并存而祀，在广州近郊四面环水的小谷围岛，可以见到天后庙、华光庙、南海神祠并列面向珠江航道。天后崇拜是在南海神祀之后传入的民间信仰。天后普遍称为妈祖，是中国东南沿海乃至东南亚广泛崇拜的海神。妈祖姓林，出生于福建莆田县湄州岛（一说贤良港）平民之家，长大成为乡间巫女，善于占卜，研医济世，热心公益，可惜年轻而夭折。死后为人们所怀念，诸多传说，演变为海上保护神，发展到祈雨、求子、驱疫、助战、赈灾、退洪，无所不能。妈祖迭受封号，“天后”之号，是清代康熙所封。妈祖籍贯福建，信仰却流布甚广，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宋代，妈祖信仰已传入广东。南宋刘克庄记述，“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16】南宋广州有称为“崇福无极夫人庙”（五代时妈祖封号“崇福夫人”）的天妃庙，东莞县官厅头建有妈祖宫。元代，天妃被称为“南海之神”，【17】在广州同时接受朝廷致祭。明、清以降，广东各地兴建天后宫，在广州的兰湖东岸、西关荷溪源头、新城卖麻街、太平沙、芳村、西濠、西华路北洗马坊、西关十三甫、第十甫、怀远驿、十七甫、东教场、小东门外等多处建有天后宫。珠江三角洲一带几乎村村建有天后庙。深圳赤湾天后庙，始建于宋代，明代永乐年间重新修建，一度是广东·最大的天后宫。清代有记载说其“最显灵，凡渡海者必祷，谓之‘辞沙'，盖以庙在沙上也”。【18】可见此处天后宫名气很大，而且形成“辞沙”祭祷之俗。佛山建有多处天后宫，以始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的栅下天后庙最为著名，其布局具有特色。明李待问《栅下天妃庙记》称：“左右两庑，翼肴岿然，中堂广深，设神像俎豆其间，后建公馆堂寝，为乡人及众商之所。”可见此处天后庙已成了商贾及各界人士聚会娱乐之处。妈祖诞一般为三月二十三日，各地在此前后举行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广州的水上居民对天后尤其崇信，妈祖诞期视为大节，郊区有天后庙的均打醮庆贺。以河南沙园一带最为热闹，家家请亲友前来观看迎神出会。该处虽无天后庙，却有天后像，每年诞前必求神“问杯”，卜到某街，即将天后像送到某街公所或祠堂中供奉。是日迎神送神，各街均出仪仗、乐手，或舞狮、舞龙，游行于各村之中。各村在村口、祠堂备祭，迎送天后妈祖路过。各家也摆香花祭品，神像经过时燃放爆炮。一连三天演戏酬神，来客也住三天，气氛热烈。但诞日也有不同的，顺德杏坛镇以每年八月初八为天后元君圣母娘娘诞日，除了游神、演戏，还要举行赛龙活动。正月初五、初六还有为期两天的天后出巡，隆重异常。天后庙祀之盛，是广府海运贸易发达的反映，也是民间多神信仰的一种表现。对广府人来说，既“以水为财”，有赖江海带来渔盐商贸交通运输之利，又时常身受风暴潮涝之惊险危害，故而对水上神灵特别顶礼膜拜。三、龙母、金花夫人与何仙姑广府民间信仰中的女神崇拜甚盛，大体有两类背景：-是母系社会的遗风，一是巫神文化的遗风。前者如龙母，后者有金花夫人与何仙姑。西江流域水系发达，水患剧繁，许多地方建有保佑平安的龙母庙，而以中游的德庆龙母庙为“三江水口龙母祖庙”。传说龙母是秦代温姓（一说姓蒲）渔民的养女。她在江边拾到巨卵，竟孵出五条小龙。秦始皇得知此事，派人强召其入宫。船至广西始安，风雨大作，原来龙子们为留住温女兴风作浪，将船吹回悦城，如是三番，钦差只好作罢。温女老死后被尊为“龙母”，葬于南岸，后移墓至江北今龙母庙内。唐代户部侍郎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泛舟西江南下至悦城，专门写了察文向龙母祝祷，得天降大雨，江水暴涨而顺利过了悦城滩。他寄诗家人，有“风水多虞祝温龙”句。清《德庆州志》载有唐龙母庙碑二记，可见唐代已有龙母庙。此庙在宋代曾称“孝通庙”，则重于宣扬龙子报恩。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集中两广名工巧匠，用七年时间构筑的，占地一万三千多平方米。西江流域民间将龙母视为至高无上的祖宗神、自然神和守护神，人们将祭龙母称为“探阿嬷”（奶奶）。西江水上的船只多供有龙母圣像，过龙母庙前要鸣笛、鸣金或放鞭炮致敬，至今依然。民间求子求财、去病消灾也要到此祈祷，每年前来龙母庙祭祀者有百万之众。龙母诞有春秋两诞，正诞五月初八，润诞八月十五。从五月初八至初十，八月十四至十六，都是贺诞日期。珠江三角洲的三埠四邑、港澳以及桂、画、競等地到龙母庙进香者如潮涌来。正诞期间，麋集人数多达二三十万以上。这位龙母应是古代百越民族生活在西江流域之一支的首领，正当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故知其母不知其父。传说中将龙母与秦始皇的时代联系起来，正反映了中原文化传入岭南之初与土著的瓯族势力的碰撞这一背景下的产物。龙子的传说，体现了百越民族崇拜龙（蛇）图腾，也反映了由图腾崇拜转向民族始祖崇拜。也有学者认为，龙子的传说可能与古代西江生长鳄鱼有关。【19】中国民间为祈求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本已赋予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書萨一个特殊的送子功能，然而，在广州地区，妇女在生育方面却多崇信金花夫人，认为她不仅有送子的功能，还有催生保生之神通，服务一条龙，其香火旺盛。广州及附近诸县建有不少金花庙。金花娘娘身世与天后妈祖有相似之处。据同治《粤小记》称，金花为广州少女，年轻时是位小巫女，被称为“金花小娘”。她l4岁时，广州巡抚陈旅的夫人难产，数日不下，危难之时，梦见一位神灵告以“请金花女至则产矣”。巡抚找到她后，用轿将她抬进署里，刚一入门，巡抚夫人便能顺产。从此，金花名声大振，却没有人敢向这位特殊身份的神女求婚，以致金花羞愧投湖。死后数日尸体不腐，并有异香，里人为之殓葬。后来在湖中发现一根沉香木，形似金花，浮于水面，将其捞起立祠而祀。传说金花投水之湖，改称为“仙湖”，湖边建金花小娘庙以祀之。金花本未出嫁，不宜称夫人，但明成化初，广东巡抚陈濂重建此庙，将女神升格，庙也改称为“金华普主惠福夫人庙”。仙湖本为南汉园苑之名，却被附会到金花女身上，可见传说的能量远胜于历史。明嘉靖年间提学魏校清除淫祀，将金花庙毁祠焚像，但是广州人仍笃信金花神，又成立金花会。在广州的金花庙不止一处，香火不断。官方对此总结了经验，阮通志称：“南粤神祠，不列祀典者颇多。如悦城龙愠，见于《太平寰宇记》、《與地纪胜》诸书，由来已久。金花之祀，以无子，于古高操为近，皆未可略。38其余淫祀，一概弗登，俾知秩祀谨严于以做人心、正风俗，而不黩于邪焉。”【20】说明官方对影响深广的民间信仰不得不予以让步。位于河南西邻白鹅潭的金花庙规模最大，供奉着80多尊神像和12位奶娘，这些奶娘大抵与养育、保胎有关，有白花夫人、养育夫人、转花夫人、送子夫人、红花夫人、保胎夫人等等名目。金花诞在四月十七日，盛况非凡。清人《羊城古钞》载：“每岁首夏神诞，报赛者烟火、火炮、百戏并集，歌舞之声旬月未已焉。”【21】金花娘娘的信仰从广州流播至广东各地，仅佛山一地就有4座金花庙，平日已是香火不断，诞日更热闹异常。四乡醒狮队接踵而来，争先人庙。庙中高挂花灯，灯面四周悬挂无数红白色彩纸带，专供求子之人采摘，求生男者摘白带，求生女者摘红带，回家后将带供在祖先神位前，保佑早生贵子。金花神崇拜后来渐被淡漠，20世纪40年代中期，广州河南金花庙也渐荒芜，随后各处金花庙也渐消亡。今见南海神庙内仍附祀有金花娘娘殿。金花庙的不兴，应与现代之生育观及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何仙姑崇拜在增城一带，颇有名气。何仙姑是道教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有关传说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当时道教八仙队伍尚未定型，何仙姑更并未进入八仙的序列，因此，她首先是一个民间神。直到明人吴元泰写的《八仙出处东游记》，何仙姑跻身八仙行列，为民问的八仙造神选神画上了句号。何仙姑籍贯少说也有八九处，增城的何仙姑最为出名，有其原因。北宋初的《太平广记》记载，广东人何二娘以织鞋为生，素来不修什么神仙之术。忽一日，对母说想出去走走解闷，便飞翔至罗浮山寺。她不吃不喝，日日采集果子送给和尚们当斋饭吃。和尚发现她所采集的杨梅竟来自数百里外的循州山寺，知非凡人。此后，她离开寺庙，行踪不定。开元年问，唐玄宗派使者往广州宣诏带何二娘进京。使者见何二娘长得漂亮，心生邪念，何二娘知其不怀好意，飘然而逝。【22】传说中之何二娘既有飞升之仙风道骨，又居于佛寺中，佛道不分，正是民间造神的特点。南宋《舆地纪胜》中有“何氏女”及“何仙”两条目相续。【23】“何氏女”下注：“《孔氏六帖》云，增城何氏女，有神仙之术，持一石措小石楼之上，远观其石如画罗浮山。有大、小石楼。”“何仙”下注：“《会仙观记》：昔有何仙居此，食云母，唐景龙中白日升仙。”此两条目不同出处，可能同指一人。可知宋代已有会仙观，建于何仙居处，但还未有何仙姑之称。何氏女白日升仙的时间在景龙年间，与《太平广记》所说何二娘在唐玄宗年间飘然而逝时间只差十至三十年，所据可能是一个原型。明洪武十一年（1378）孟士颖撰《何仙姑井亭记》称，“仙姑姓何，邑人何泰女也，生唐开耀间（68l-682）”。“所居春冈，即今凤凰台东北”。“乡人因称之日仙姑祠于姑居，今会仙观是也”。【24】时有“何仙姑”之称，生年较明确，其父也有名有姓。尽管由此生年推算，至景龙年间，何仙姑飞升”时应是二十六七岁，而不是十几岁了。又据明成化383《广州志》一书“会仙观”条下注：“即何仙姑旧祠，在县南凤凰台。唐大历间道士蔡乙改创，于观左立仙姑祠。有田三十三亩。”【25】由此知唐大历间已有“仙姑祠”建于此。会仙观建于大历年间，离开耀年间不到百年，那么，何氏女成仙的传说在中唐已成形，在增城已有庙祀了。仙姑祠祠田唐代有三十三亩，明初有一顷八十二亩，【26】足见其历久不衰，规模不断扩大。以上记载说明，何仙姑的传说在增城流传已久，从何二娘，到何氏女、何仙、仙姑，又到何仙姑，有一个演变过程，故阮元《广东通志》称：“窃疑何二娘、何氏女、何仙乃一人，即世俗八仙之中何仙姑也。”【27】何仙姑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升仙”之后，还不断有其显灵的记载。“至玄宗天宝九载，都虚观会乡人齐，有五色云起于麻姑坛，众皆见之。有仙于缥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识其为何仙姑也。代宗大历又现身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翚具上其事于朝”。【28】前一事，自称见到何仙姑的只有道士蔡某一人。后一事，见于广州刺史奏言。可见官民都在不断地造神，使何仙姑在增城成为久祀之神。他处的何仙姑，包括较为显赫的永州何仙姑，都是产生于宋代以后，增城何仙姑产生于唐代，历史更为悠久。流传久远而又世代加工，奉祀不断，说明何仙姑在增城有深厚的民问社会基础，正如孟士颖所慨叹：“嗟呼!神仙之说若诞幻不足深信，如何仙姑者，询之故老，考之郡乘，历历在人耳目，抑尤有可信者焉，况384何氏之族至今尚蕃衍有足征也。”【29】历史上增城何仙姑信仰长盛不衰，有民间的因素，也有官方的因素。从民间的因素来说，道教八仙是民间传说俗神长期演化选择的组合。八仙在中国众多的神仙中独出风头，是因为其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要，满足了全民喜庆娱乐的需要。八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文庄粗野，不一而足，社会各色人等，均可从这支队伍中找到自己亲近的偶像。何二娘是织鞋为生，何仙姑之父何泰是做豆腐的。何仙姑又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年轻美貌，成仙的经历又有反抗包办婚姻的色彩。何仙姑成仙之后，又有许多关于她为人占卜“洞知人事休咎”、“逆知祸福”的传说。女巫职业是与人神沟通，又能预知人之祸福，易被神化。妈祖、金花娘娘，这些很有影响的女神，都是出身于女巫这一行。美丽的何仙姑配上所执清雅的荷花，是传统画喜欢表现的题材。凡此种种，使何仙姑在八仙中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增城民间对何仙姑情有独钟，为之生发出一系列传说故事，特别是将著名特产挂绿荔枝与何仙姑联系起来，仙姑因荔枝而扩大影响力，荔枝因仙姑而增添神妙感，产生了他处的何仙姑所没有的特殊效应。民间地方神灵得到官方承认的过程，也是官方利用神灵推行教化巩固政权的过程。从县志中录存的数篇何仙姑祠记可见一斑。明万历两广总督刘继文撰立的《重修何仙姑庙碑记》，记载有何仙姑卜卦助战的事迹：385岁已丑春移镇端州，时澳酋李茂、陈德乐啸聚海上，鸟合至千余众，一时未集舟师虑怀巨测。因筹计问仙。而仙姑至，乃凭舆授算诗日：“将军稳卧九霄官，进士高登万岁楼。明公若欲谈兵事，莫外区区一女流。”盖自谓识兵也。窃欲同夫钟吕，又日：“用兵勇往是良图，惧敌全身岂令谋。将相协心同费事，何愁山寇不消除。”盖谓兵贵择将也。而深有恶于贪生。时琼崖当事，参将懦怯，所谓“畏敌全身”者，因以邵都司往代之。不两月间，而我师大捷，遂草薙禽猕，岭海宁谧。悉符仙谶云。夫难料者兵，况女流谈兵，古未有也。岂其仙灵圆朗藏往察来，征应之神，不异于钟吕二仙之谈兵事耶!【30】刘继文于是下令县里对何仙姑祠重加修茸，并撰文遣官致祭。何仙姑本领有长进，不仅能预卜未来，而且精通兵事，由抗婚飞升的道仙变成保土安民的地方保护神。明万历间的另一件碑记是广东布政司左参政李得阳所撰的《增城何仙姑神应记》碑。李得阳早年归隐家中，梦见携家上任，稍憩旅馆，人室见一女姑南向立，自称为何仙姑。后来他到广东上任，询及增城何仙姑祠，规制与梦境相合，可惜因王事复将度岭而北，不得亲拜何仙姑祠，只能捐俸令县令代为治酒浆祭祀，立碑以记。康熙《增城县志》中还收录有明增城知县谢士章所撰的《拓建功立业何仙姑祠记》、陆清原所撰的《存仙井亭记》。【31】皆为修建仙姑祠所立。谢士章将祀何仙姑与祀崔与之相提并论，陆清原则赞扬何仙姑事母纯孝，及凭箕授算、济师殄寇，则姑之仙固以忠孝存386也。”这就将何仙姑的道德品质，纳入了儒家的忠孝道德标准的范時，树为邑人榜样。何仙姑的保土安民作用进一步升华，进入了精神层面。何仙姑在官民的各自努力下，不断塑造形象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要而演化延存下来。何仙姑的故事，是增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或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粤东诗海》收录署名“何仙姑”的诗有五题八首，【32】虽则唐代是诗歌盛世，但制作豆腐人家的女孩，怎能写出诸如“玉笙吹过黄龙洞，勾引长庚跨鹤来”这样道骨仙风的文字，更不可能有“洞门不闭丹炉静，惟有松花绕洞多”这样老道口气的吟咏，显然是后人所移接。据说何仙姑出生地方原称春同，后因何仙姑诗中有“风台云母似琼花”句，于是改地名凤台。《全唐五代词》也收入有何仙姑的词，当然不可信。但是后人吟咏何仙姑的诗句就不一样了，说明其影响是存在的。南宋的自玉蟾是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留有《题会仙观》诗，这可能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咏何仙姑诗，对了解自玉蟾的適教思想有所帮助。以何仙姑为题有一系列遗迹，康熙《增城县志》称：“论日增城故多仙迹，以罗浮朱明为之堂奥也。何仙姑身从井化，益多显迹，君子津津言之详矣。”【33】在县城，唐代就建有会仙观，据说建于何仙姑故居上，解放后已拆毁，存有何仙姑井”。在小楼镇，有何仙姑家庙，庙内同样有仙姑仙化的“问仙井”。家庙屋顶长有一常年不枯的桃树，结的果被称为仙桃。387增城民间节俗，传说阴历三月初七是何仙姑诞辰，旧时十分热闹，一般都要唱大戏贺寿，贺诞时间视乎集资多少而定，少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月，甚至延续数月。“问仙井”的井水在这几天也特别走俏，说是吃了可治百病。从初六下午便有人来“请仙汤”，实际上是庙中道士加了红枣冰糖熬的井水。远近的人赶来敬香还愿，络绎不绝。四、财神与关公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广府地区，财神是民间颇受欢迎的神仙，而且不止一位，举凡与发财致富有关的神灵都可以称为财神。财神有文武之分，广东人所祈的文财神是“增福财帛星君”，广州人又称为“都天至富财帛星君”。旧时，几乎家家都拜这位财神，与福、禄、寿、喜合称五福神，但未必拜神者都知道这位财神的来历。传说这位财神原是商封王臣下比干，善于理财，因忠谏被杀，在《封神演义》中，被封为北斗七星之一，降临人间即为文财神。广州地区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为财神诞，人们供牲醴、放炮仗、烧金纸膜拜。粤语民谣：“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其睇起你，你有前途!”珠江三角洲之人还将保佑发财的职能赋予观音菩萨，使这位大慈大悲的佛教尊神变成民间信仰的一位大财神。顺德地区建有不少观音庙，旧时各家各户无不将观音偶像请进厅堂，正月十九观音诞、六月十九观音得道纪念、九月十九观388音出家以及初一、十五烧香膜拜，香火缭绕，而这些纪念日的祭拜活动，都没有正月二十六日观音开库之隆重。所谓观音开库，是说每年正月二十六日子时至亥时，观音必大开金库，借钱与民，助民致富。因此，善男信女当在此时赶紧进香“借钱”，许愿发了财以后还本纳息。到了次年此日，向观音借钱发了财者，会抬着整只“金猪”（烤猪）来朝拜观音。据说顺德县内最灵验的观音庙，是建于南宋年间的桂洲金鱼岗白莲池时的观音堂，近千年来香火旺盛，历代修葺不断。观音菩萨居然经营起类似现代银行的借贷，向观音借钱反映了广府人在民间信仰上的商品观以及在珠江三角洲金融意识之浓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伴随观音开库朝拜活动的同时，有一种称为“生菜会”的活动应运而生。或同宗族祖、或街坊邻里、或相识友好，二三十人乃至上百人不限，在观音开库这天，聚在一起“生菜会”。所谓生菜会，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生菜包。生菜包是用生菜裹以炒熟的蚬肉、韭菜黄做成的，取蚬、生、韭之音或谐音以寓显、生、久之意，表达出人们对发达、生财、长久理想的强烈愿望。吃生菜会者提前在正月二十三日就在观音堂附近山地搭起数以千计的棚屋。观音开库这天，来观音堂朝拜“借钱”或“还本纳息”的香客，超过十万之众，除了就近的顺德各乡村民之外，还有来自邻县南海、中山、新会、番禺乃至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除了拜观音、吃生菜包，当然也有各种演艺、集市，购买种子、家具等各种春耕物资的。生菜会在新中国成立后389沉寂了四十来年，20世纪末又复兴起来。广州芳村坑口的生菜会，有百年以上历史，以前的生菜会一连三天，现时只有正月二十六日一天。从此日子时开始，主要活动为舞狮，正午吃免费的生菜饭。2002年春节，除了广州市民之外，还有南海、顺德、佛山市区等地共3万多人参加坑口生菜会，总共摆了100桌，主要是村里的民间组织生菜联谊会筹措经费，村民自发煮菜、洗硫、招待客人，饭桌上最有特色的菜式就是生菜包。现今虽没有祭拜观音、财神的仪式，但也有扮成财神者在生菜会上派生菜，显示出这一活动的宗旨。武财神或指赵公明，或指关圣帝，广府一带以关帝为盛。关帝之祀，旧时在全国各地极为普遍，多以宣扬忠义为目的，广府地区以关帝为财神，首先是选取关帝勇武无敌、义气压邪，可以充当保镖之意。还有一说，因关帝红脸，商家以红”为“红利”的好意头而将其奉为财神。在广府，关帝庙成为仅次于天后、龙母的三大庙堂之一。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和九月初九为民间祭祀关帝诞期。广州从清中期开始，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在居民私宅的神楼上和店铺中，多有祀关帝者，店铺多数设专龛以供关帝神像，朝夕燃香，节日则以三牲酒果祭祀。居民所祀不一定有关帝像，许多只在红纸上写上“忠义仁义关圣帝君”作为神位。近代佛山一地就有l1座关帝庙。五月十三日关帝诞，关帝出游，以东头、弼头、福德、仙涌、福庙等五庙出游为隆重，称为“五虎下西川”。建国前，关帝诞这天，广州的各处关帝庙张灯结彩，搭棚演戏，大闹八音。以越秀山脚的武庙、禺山关帝庙、小390港关帝庙最为热闹。小港关帝庙面对小港涌，是日还有各乡龙船前来助兴。工商业者在是日集会联欢，俗称“关帝案”：凑钱购买烧猪等祭品，舞狮、烧爆竹还神：祭后分祭肉，晚上大摆筵席。小港关帝庙过去还有请“胜灯会”习俗，每户会友”出一元钱，祭过关公后，可取回红灯笼、烧肉、红包。回家将红灯笼挂在门口，称为“胜意”。是日，关帝庙还将鸡、鸭、鱼丸、斋料施给乞丐和儿重。传说吃了此饭菜的小孩特别听话，因此不少有钱人家的小孩也被家人领去分得一份。以前祀关帝，辟灾邀福，求雨退洪，无所不求，并不专重于求财。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帝庙一度断了香火，关帝诞之类的活动今已销迹。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关帝以财神的身份从香港返回沿海城市，进而传至内地。香港的关帝庙不算多，但庙外供奉不少，如赌馆、妓院，后来又进入警署、商行等等，因为香港炒黄金、赌马以及在社会主持公道等都有风险，需要一个万能的神保佑，所以关公变成了武财神。关公被引回内地之后，广府一带的商场店铺供奉关帝为财神，中外合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店堂、私宅厅堂遍设神龛，安放关帝神像。香案、烛台配上电烛，香火昼夜不熄，居民也有受影响者。在关帝的诸功能中，突出了其武财神的功能，反映了商品经济浪潮中商家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处境以及寻求保护的心态。除了文、武财神这种“正财神”之外，还有所谓偏财神的“五路财神”，传说是五位江洋大盗，生前为人慷慨，急公好义，北方称五显财神，南方称五通神。同样也受人供39l奉，尤其是祈求发横财者祭拜更为虔诚。这五路财神的诞日是五月初五，此外广州的财神诞还有正月二十为招财童子诞，五月二十三为财主娘诞等，这么多的财神诞，是广州商业城市民间信仰的一大特色。五、民间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广府地区，民间信仰对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述广府“习俗尚鬼，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每有所事辄求珓祈签以卜休咎，信之惟谨。有疾病不肯服药而问香设鬼，听命于师巫僧道，如恐不及。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始尽毁而痛惩之，今乃渐革”。【34】这种渐革，其实是不彻底的。神鬼崇拜的作用与宗族有着密切联系。番禺小谷围岛上流传着“北亭多庙”的说法，北亭村人口有4000多人，以梁姓为主。以前村里有15座庙，由村中不同宗姓建造和管理：由梁姓管理的张王爷庙、天后宫、土地庙、候王庙、茅山庙、将军古庙、武帝庙、康公庙，陈姓管理的东山庙、先锋庙、华光庙、魁星楼，崔姓管理的华光庙，还有全村公有的魁星楼、金花庙。庙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以神设教，补王法之不足：立庙为界，以为地界之标志，杜绝各姓发展谋地之纷争：作为公用场所。在道德教化上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一些庙宇的楹联可见一斑，如关帝庙的“义结桃园高风传万化，名垂史册家谱续千秋”：金花庙的“欲向案392前求子嗣，且回家里奉翁姑”。神鬼几乎无处不在，与神同在，是民间的一种生活程式，最大限度地参与民间的日常活动，是民间神祖神祇得以存在的原因。随着时代的进展，敬神的心态不加减弱，只是祭神的方式已经简化了或者更加便当了。旧时在珠三角的一般人家，从门口过天井入厅堂，都有一系列的神灵错落布置着。其次序是：土地神—门官—天官賜福—井泉龙王（神）—定福灶君—九尊大神—祖先位、地主位。现在在乡间，修建新屋时，已经在瓷片上烧制出各种神位，直接镶嵌在恰当的位置就行了，不必再做泥塑神明。由此可知，祭敬神明的仪式已经与时俱进了，但是，即使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现代，民间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仍明显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传统的国家宗法宗教发生了总体性崩溃。但是，作为社会风俗的鬼神信仰心态延续了千百年，尽管经历了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其社会土壞还存在，其根基并未彻底动摇。民国时期，官方有提倡科学，明令禁止游神活动的举行，一些神庙佛寺也被改作他用。1930年当局在民众中开展大规模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今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有当年国民党市党部组织撰写的移风易俗文集。新中国成立后，从破除迷信起至“文化大革命”之“扫四旧”为高潮，鬼神崇拜反复受到暴风骤雨式的扫荡，求神问卜几尽偃息。然而，沉寂几十年，在改革开放之后神鬼信仰竟然又死灰复燃，先富起来的地区也不例外。一些地方热衷于修庙建祠，大兴土木：风水占卜、跳出了研究的圈子，诸多393介入人们的现实生活，问卜求神在许多庙观中已司空见惯；关帝、天后、土地、财神，堂而皇之地接受各界善男信女的供奉。凡此种种，说明民间鬼神崇拜的韧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不少地方修复民间祠庙，多由政府批准甚至出面倡修，称为修复文物、倡兴旅游，实际上也考虑了民间信仰的作用，有的官方人士本身就是民间信仰的热心人。这一时期在南海、番禺、东莞，陆续建成耗资巨大的特大观音塑像，在深圳、顺德、花都复建或创建了大型寺观，一些寺观中的祀神场所不断扩大，客观上对民众包括年轻一代大力推广了神佛崇拜。广州的三元宫在1982年恢复开放，適教三大诞日参拜进香的人数甚多，人宫人数最多时一天达十余万人，宫内人山人海，宫外排队长达近里。有的人为了烧头香，在宫外通宵达旦等候。90年代，宫外“人行道上甚至马路两边那些卖香烛迷信品的，摆地摊为人占卜算命或摆卖各种物品随时准备‘走鬼'的，无日无之，有时更是喧嚣不已”。【35】2002年，农历三月初一，佛山恢复了废止近百年的场面壮观的北帝出祠巡游的民俗活动。北帝出巡时，神像前有“肃静”、“回避”高脚牌开路，随后由粤剧演员扮演众仙”和民间老人组成的八音锣鼓柜、麒麟队、大红花轿、大头佛等紧紧相随，在祖庙门前巡游之后，回到古戏台万福台前表演。巡游四天，据说“巡游的目的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这样大张旗鼓地游神，对于围观者精神层面上的效应，绝非拉动旅游业那么简单。【36】效应不需多久即可体现。2001年的《人民日报（华南：394版）》以《学校门口香火旺过寺庙》为题报道，在先富起来的珠江三角洲的农村，不少幼儿园和学校门口香火旺盛，“络绎不绝的妇女手提着满袋香烛纸钱，在校门外一个不知谁设的神位'前插上香烛，点燃纸钱，然后微闭双眼、双手合十、喃哺细语地对着‘神位'行礼。”“据悉，这些信女都是学生家长，每逢学期开始都要来拜祭，求神灵‘保佑'自己的孩子健康活泼、学业有成、平平安安、快快长大”。【37】东莞某中学的副校长认为学校风水不好，竟在主教学楼设立“请姜太公在此”的神牌。【38】在这场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科学与迷信的争夺战中，则是与那些烧香的家长站到了同一立场上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原来只为适应华侨、华裔回乡寻根而恢复祭祖活动，一发而成为合族祭祖习俗的回潮。一些地方兴起的合族祭祖，与祭者动辄数以百计，规模大者甚至达十几万人，祭仪及祭者的心理，无异拜神，寻求庇护之意远大于慎终追远之心。乡间尊神建庙的风气则越演越烈。据2002年《羊城晚报》所载读者来稿，顺德勒流镇黄连乡在“文化大革命”后先后建立起来的庙有昔地村的关帝庙、东坊村的金顺喉庙、北头村的二帅府庙、关地村的洪圣庙、涌口村的华光庙及将军庙等数间，每间庙按现时造价，均不低于人民币20万元。其经济来源于封建迷信活动。某庙每年庙诞烧香拜佛，烧大炮仗做大戏、放电影、食大锅饭等要搞上十个八个晚上。【39】这种风气在城市也有变相的表现。在广州滨江路，记者发现某高层住宅区绿草坪上有座水泥建造的一米见方的小庙坛，供奉着关帝、土地等群神的陶瓷塑像，焚烧香烛竟把草地地面395烧黑了。【40】在越秀山“古之楚庭”牌坊前的阶梯平台上，不少善男信女摆酒水、燃香烛，把平台面前一块石壁下面熏黑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块石壁上写有这样一行字：“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神仙，要改造世界也不能依靠上帝，只能靠我们自己。”据说，越秀山曾名观音山，“古之楚庭”坊附近以前有一莲花池，目前已被填平，牌坊前的祭拜活动一度废止之后却又盛行起来。【41】改革开放之后，广州某大学堂上开设“风水与建筑”课，已试讲了多年，其中包括教人“辟邪”之类，有学生直言这使无神论受到冲击。【42】这些现象说明了民间信仰的韧性，而且说明其影响力远不止于民间的层次。民俗学家认为，即使在现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构架“还将继续以其特有的相容性和互不侵扰的特点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只要人们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只要人们无休止的广泛需求还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使这种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民间信仰发展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发展很久，很久。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历史不会就此终结。”【43】广府地区也不例外。根本的问题在于，物质文明不能代替精神文明，物质丰富无法充实精神贫乏。注释：〔1〕张渠：《粤东闻见录）。〔2〕钮玉樵：《觚剩》卷七。〔3〕光绪《香山县志》卷五。396〔4〕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十一《风俗》。〔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神语·禾谷夫人》。〔6〕李洪甫：《太平洋岩画》第22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7〕《珠海市文物志》第l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8〕李洪甫：《太平洋岩画》第25l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9〕《山海经》卷十《海经·大荒南经》。〔10〕《山海经》卷五《海经·海内南经》。〔11〕转引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神语·海神》。〔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神语·南海之帝》。〔l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神语·南海之帝》。〔14〕《管子》卷十四《五行第四十一》。〔15〕咸丰《顺德县志》卷十六《胜述略·祠庙》。〔16〕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卷36。〔l7〕《元史》卷七六《条礼志·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18〕范端昂：《粤东见闻》卷五。〔19〕曾昭璇：《天后的奇迹》第147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l年版。〔20〕道光《广东通志》卷145《建置二十一·坛庙一》。〔2l〕仇巨川：《羊城古钞》卷三《祠坛·金花庙》。〔22〕《太平广记》卷62。〔23〕《舆地纪胜》卷89。〔24〕康熙《增城县志》卷14《外志》。〔25〕成化《广州志》卷25。〔26〕康熙《增城县志》卷14《外志·会仙观》。〔27〕道光《广东通志》卷329。〔28〕嘉靖《广东通志》卷64《外志一·仙释》。397〔29〕康熙《增城县志》卷l4。〔30〕康熙《增城县志》卷14。〔3l〕康熙《增城县志》卷14。知县谢士章，本志中，《秩官志》作陈士章”，《艺文·<集流杯亭>四首》作者作“谢上章邑侯”。而民国《增城县志》卷l1作“邑侯陈土章”。〔32〕（清）温汝能纂辑：《粤东诗海》卷100。〔33〕康熙《增城县志》卷l4《外志》。〔34〕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民物志一·风俗》。〔35〕冯沛祖：《广州风物》第250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36〕《佛山北帝仪式队近百年来首次出祠巡演》，载《广州日报》2002年4月l4日。〔37〕《开学刚好碰上“鬼节，珠三角农村出现令人唏嘘一景——学校门口香火旺过寺庙》，载《人民日报（华南版）》2001年9月7日。〔38〕《认为自己所在的茶山中学“风水不好”——校长竟设神牌请姜太公》，载《羊城晚报》2003年7月l5日。〔39〕《寺庙何其多》，载《羊城晚报》2002年6月2日。〔40〕《何来“庙坛”坐滨江》，载《羊城晚报》2002年2月26日。〔4l〕《香火复燃越秀山——古之楚牌坊前几乎天天有人祭拜》，载《羊城晚报》2003年5月9日。〔42〕《风水课，在学堂上教“辟邪”——这门既有科学成分又迷信杂陈的科目，在广州某高校试讲八年，师生各有说法》，载《羊城晚报》1998年4月l0日。〔43〕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98第十八章广府民俗一、广府民俗的演变所谓民俗，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形态，从语言、交际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婚姻宗族、生老病死，无不为民俗所涵盖。同时民俗又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广府民俗文化是中国汉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华夏的一种地域文化，广府民俗以保存有古代南传汉文化的积淀、汉文化与南越文化的结合变异，以及近代以来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等因素，构成其独特风采。其基本模式是在中华汉文化相同的形式下赋予岭南文化的特定内涵。广府地区民俗，大体经历过这么几个阶段：古越族的民俗：从秦统一岭南之后到唐宋时期不断汉化的民俗：明清逐渐凸显岭南文化的广府民俗：清末民初添加异域文化色彩个性更强的近代广府民399俗：积淀于现代生活中的广府民俗。各个时期的风俗各呈特征，但又有其延续性，时至今日，广府人的许多生活习惯与古代的风俗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由于特定的历史传承及地理方位上的差异，造成了生活习惯及观念意识上的差别，赋予广府地区民俗在中华民俗文化中的独特的风貌，在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先秦百越时期的风俗，从一些古籍对上古时期的越人及对中古时期文化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岭南俚僚人的生活习俗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略窥一斑。如古籍记载“粤人之俗，好相攻击”，【1】“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2】考古发现有地面或半地穴式木骨泥墙茅屋以及“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日干阑”的干栏式房屋，【3】有喜占卜、断发、凿齿、文身等风俗。其日常生活因所在为江海河网地区而习水善舟。有与中原迥异的“魋结箕踞”【4】的发式与坐式。秦统一岭南之后，至唐宋时期，由于地方长官推行汉化及移民南下等因素，中原文化南下，对改革广府地区的社会风俗起了熏陶渐染的作用。交通改善，唐朝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通道，“中原之声教日近，遐陬之风俗日变”。【5】这一时期的广府社会，仍然有不少令由北方初到岭南者感到新奇的风俗习惯。如唐人的《岭表录异》中说到喜食槟榔，又说到“生酒行即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61】唐代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在城西外国侨民聚居处设有蕃坊。外国人与华人相婚嫁。广州城“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底洞400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7】唐代著名诗人许浑咏广州诗有“蛮声喧夜市”句，【8】可见当时广州商业城市风气以及开放之风，显示出与尚执行着封闭式的里坊制的中原地区的城市有所不同。唐代的广州，人际交往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妇女上街穿短袖衫，这在中原是罕见的：富家女嫁给和尚，还大摆筵席，人不以为怪：和尚开店卖酒致富，也不会遭人歧视。可见当时的广州风气还是比较自由的。而广州人也过中原传统节日，城中已有城隍之祀，则是中原文化传播的表现。明清时期，广府地区逐渐形成广府民系自己独特的民俗风貌。明代，“广为大府，俗杂五方，控制山僚，压服海外，舶贾峒氓，性犹顽犷，渐入版图，旧俗亦革”。“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东近质，其西过华，其南多贸易之场，而北则荒凉。故谚云：‘东村西俏，南富北贫。'外县穷乡民俗，大抵多俭嗇而耐動苦。依山者多朴，其失也愚；依水者多智，其失也伪：濒海者多阔疏，其失也悍。”【9】就是说，广州城东西南北因居民结构成分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民风。因居住在依山、靠河、临海的不同地域，其民性也有不同的特征，分别有优点也有劣势。社会风气较以前也有较大转变：“礼俗冠婚简略，丧葬烦缛，燕会日趋于靡。良家妇女不出闺门，翁妇嫂叔非令节未尝一见。惟嫁女务以资妆糖果粉饵相高，甚至破产为之。”【10】珠江三角洲各县也各有特征。如顺德“民性悍而好利，岁恒争产盗禾。言语嗜好，与郡城类。40l妇女尚饰，高髻大袖。设县以来，士以通经学古为尚，多贵显者。山林之士，皆能摘章染翰。务农善渔，工匠日趋于巧”。东莞“士尚淳厚，农力稼穑，工不求巧，商能致远，素称易治。地轶赋夥长材，秀民之战艺有司者倍他邑。田夫野老，亦曾读书，樵童牧儿多解识字。民俗素厚，士夫鼎盛，嫁娶重门第，居人不为僧道”。香山“土地卑湿，人多蹑屐。至别其制以辨良贱。婚娶必论阀阅。病不求医而信巫觋。動于农圃而不学工商。故斥卤尽成畎亩，而贸易每为人所欺。惟别男女，耻争讼，颇有古风”。【11】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民俗自明末或明中就开始发源，如南海一带的生菜会、佛山的“行通济（桥）”。清代的广府民俗与明代有所不同，《大清一统志》记述为：“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民户不多，俚僚猥杂。尚淫祀，多瘴毒。婚礼用槟榔以当委。丧礼盛嘉肴以待送客。位于离，故恒燠。濒于海，故多风。阳德之盛，钟为人文，蜚英腾茂，甲于他州。”【12】南海县士多刚方，崇信义、际风云者，喜以勋业自见，廉耻相高，时穷见节，往往有之。词章文藻，视为润饰绪馀，然登高作赋之流，摩肩辈出，华实并茂矣。西淋之西，文物颉颃。中州陶冶之良，亦甲他处士朴民淳。其俗尤厚海，州镇涌金瓯绿潭。刀笔是竞，民七吏三，溺于习也。九江小民，尚力任智，健讼好争，则张武衔勒之谈为良剂矣。”【13】番禺县“缙绅尚气节，崇礼让士，耻奔竞，重儒雅。冠婚丧祭，衣冠之族多行家礼，妇女罕出闺阁。东南秀丽，土沃民402稠，科第接武，顾洪涛浩渺，易以业奸。邑之北，农而不商，谿峒之间，乡豪为政。西南迩郡，不乏士族”。【14】顺德县“舆地濒海，田广而腴，鱼稻之饶甲于他邑。士以通经学古为尚，振翰云霄，多跻通显，有历卿相者。士夫俭嗇，有戋戋风，而乡落富民，器服相高。宫室雕镂，富而厚生。其俗吝相周而喜争竞”。【15】而在从化，“从人质朴，知耻知廉。以今视昔，虽不尽然，大略士不豪华，民動耕凿，女多纺绩麻缕或斧斤，日用饮食之外，无嗜淫巧。迩来士习丕振，群尚诗书，彬彬儒雅之风，不让上国。冠昏丧祭，一秉于礼：惟嫁娶之夕，以宾朋宴乐为吉”。【16】看来，也向封建教化文明靠拢。清末民初，随着岭南的经济、文化在全国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及西风东渐注入新的生机活力，现代化的工业、商业、电气化等方面的事物，有许多是在广州最先出现，人民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等的现代化，许多也是首先在广州兴起的。在激烈动荡的时代中，广府民系的民俗文化开放兼容，重在民间，在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变革，敢为人先而不事张扬，鲜明地表现出广府文化那种适时善变以求发展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在大中华民俗文化中别具一格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今天人们经常说到的广府文化乃至岭南文化典型的西关文化，以及戏曲方面的粤剧和广东音乐、建筑方面的西关大屋及骑楼、饮食方面的广州茶楼文化、艺术方面的岭南画派，大体都是这一时期甚至稍后一点时间的产物。403二、节俗广府节俗从大的岁时节俗看来与中原内地无甚差别，仔细分析，在时序安排、对某一具体时节的重视程度以及活动方式上，体现出特有的地域特色。如宋代诗人郭祥正在他的诗中记述了广州人每年二月初二游越秀山越王台的风俗，“邦人每逢二月二，熙熙载酒倾城来”。此日，有倾城人士前往游越秀山越王台的风俗，经略安抚使在越秀山大宴宾客，有歌舞、音乐以及百戏，还有“鬼奴”进肴，并为宾主在衣服上洒进口香水，可见当时广州的达官贵人有用香水的习气。【17】在郭祥正的另一诗中，记载了北宋广州人春游白云山满涧的风俗：“菖满洞底生九节，流水遂作菖蒲香”。“至今正月二十五，城北夹道珠帘张。元戎要宾锤大鼓，老蛮献贤烧肥羊。倾城尽作蒲涧饮，美俗眷恋神仙乡。穿云丝竹度别浦，绕山金翠明残阳”。【18】此证北宋的广州人一年两次游蒲涧：正月二十五是蒲前同节，七月二十五是安期生飞升日。广州人倾城往游白云山，一直玩到日将落山。从游越王台到游蒲涧之俗，可以看出北宋时的广州地区人民普遍有游山玩乐的爱好，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从当时的节俗活动中可以看到商业发达，特别是对外贸易交往颂素的反映。见于地方志书，在清代前期的雍正年间已形成别具特色的号地节俗：迎春日竞看牛，或酒以菽稻，名曰“消疹”。啖生404菜、春饼，以迎生气。元日礼神贺节，上元观灯，或作千秋百戏。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十九日挂蒜于门以辟恶，广州谓为“天穿日”，作祷神曰“补天穿”。二月祭社，分肉小儿食之，使能言。入社后田功毕作（谚日“懒人傍社”）。十五日花朝至三月上巳祓禊。清明插柳于门。其前五日始，一月中扫基行，谓之踏青，亦日“铲草”，俗曰“压纸”，以楮置坟上也（《岭南杂记》云：“宗孙盛者，堆如积雪”）。四月八日，浮屠浴佛。五月朔日，祀祖先五日，饮蒲酒、饟角黍、书朱符，为儿女佩采莲，竞渡，至五日乃止（广州有逾月者，夺标较胜，往往成讼。今此风已戢。惟大舟龙船高大如海舶，具渔龙百戏，积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出则诸舟行以从。悬花球、绣囊，香溢珠海。孙仲衍所云：“天香茉莉素馨园”是也）。夏至日，擘荔荐祖考，磔犬以辟阴气。七月七日曝衣书，家汲井华水贮之，以备酒浆，曰“圣水”。儿女以花果作供，捕蜘蛛乞巧。十四日浮屠盂兰会，剪纸为衣，以祀其先。望日以龙眼花果相傲遺曰“结缘”。二十五日，士庶多为蒲涧游（广州相传，安期生以是日升仙，自古有“邀头会”）。八月望夜赏月，剥芋食螺。重阳有墓祭者，亦曰登高。细民放纸鸢（风鸢之戏自古有之，或云因天地之风候以舒小儿之气，而除内热。但广州则以重阳，若琼州同于五月南风盛时截竹绷布，续藤为绳，放之声闻数里，鸢制大可十倍）。十月朔日，以五敛杂芥405菜食，辟寒气举火星醮（广州禳回禄，圜阓次第行之，自十月朔至岁暮）。冬至，作冬糍手祀祖，有祭墓者。腊月念四日，为小年夜，祀灶，用爆竹、饴糖。除夕祀祖，家人聚饮，曰团年酒。围坐达旦，曰守岁。相遗以物，曰馈岁。易桃符，小儿卖痴呆。此粤俗大较也。【19】此所谓粤俗，其实主要是广府地区之俗。对照今时之广州地区节俗，有很多还是延续不变或者一度偃息又再兴起的。当然，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则有了较大的适时改革。如生菜会、行通济、清明扫墓及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团聚之类，无不轰轰烈烈，既具剌激性，又与各种商机紧相联系。广州地区的节俗中保留了不少在中原已淡化或变革了的传统节俗。有的是历史积淀延续，有的则是迎合今人需要花样翻新。如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这一天，民间称之为冬节，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广州人却常说的“冬大过年，是说将冬至看得比春节过年隆重，家人必团聚吃晚饭，并要吃汤圆。我国早在殷商时代，是以冬至的前\_天为岁终，冬至这天是新年岁首即元旦，相当于后来的春节。秦朝仍以冬至为岁首，称为“过小年”。到了汉朝，以冬至为冬节，称为“日至”，官场举行贺节之仪，并且放假休息。唐宋仍循旧俗，北宋时，“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飨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20】明清时期，冬至还有皇帝祭天祭祖之礼，但北方民间已渐而简化406为冬至吃馄饨的习俗了。而在南方，这一节俗仍很受重视。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载：“‘冬至'祀祖。乡最重冬祭，春秋之祭间略，冬则无不举者。祀毕，与家人宴于室，曰团冬'。”【21】由于当代的休假日安排及人口流动，冬至在许多地方已不再重视，而在广州地区则仍沿袭重视冬至之俗。广府人对传统风俗的复古积极性也是民俗传承的重要依托。如从20世纪90年代末在番禺学宫明伦堂悄然兴起的开笔礼，即旧俗中的“破蒙”礼。身穿博士服的孩子，郑重其事地以朱砂开智、敲钟鸣志、取状元井水洗面，迎合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而将秀才服改为博士服，将对孔子的三拜九叩改为鞠躬，又是适时改革。在佛山、三水、新会、肇庆、德庆等地也举行了类似仪式。在佛山澜石，农历三月初三北帝诞举行乡饮酒会，据传是明正统年间佛山民团击退黄萧养义军之后，本地乡绅为庆祝朝廷封赐而形成的一种乡俗，停办多年，在富裕起来之后，l997年起又恢复了，近百桌酒席坐满了全村乡亲和亲友，欢聚一堂，赋予了创造和谐气氛的新功能。一些极具韧性的广府特殊节俗反映出广府地区特殊的经济环境。在东莞东坑镇有个民俗节日叫做“卖身节”，据镇志所载，农历二月初二为卖身节，该节已有数百年历史了。东坑地区地处大朗、大岭山的水陆交通中转站，来往者众。明万历年间，塘唇村大户卢同锦需雇佣长工耕作，山区人闻之前来受雇，卢同锦雇佣不完，当地大户闻讯赶来，将未被他雇佣的工仔全部雇用了。此事传出后，每年开耕前，出卖407劳动力的人都来东坑找雇主，逐渐形成了二月初二出卖劳力的墟日，久而久之称此日为“卖身节”。被挑中的雇工，由雇主带到茶楼供食一餐，确立雇佣关系。由于来往人多，带动了小茶摊、小食摊的兴起，继之有小农具及什物摊档应时而生，从而形成热闹非凡的东坑特有的墟节。解放后，买卖雇工的现象消失了，但是，这个流传数百年的节俗照样传承下来，只不过其活动形式改变为以商：贸集市与娱乐为主，人民政府将其改名为“翻身节”，后又改称“欢乐节”。“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节日被勒令取消。可是，民间仍以化整为零的形式在延续，在田边地头买卖农产品，在偏僻村边交易小商品。“卖身节”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交易市场，劳动者以其自身的劳动力作为他们投入市场经济的一种资本，这种买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劳务市场中得到了肯定。东莞地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兴起，需要招聘包括外来人才在内的大量的外来工，于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卖身节”得以重返，得到了民间乃至当地官方的认可和张扬。从2003年开始，东坑镇将其变成以大型的劳动力和人才招聘活动为主体的一个综合文化节俗，提出了以“东坑风情、万民同乐、文化博览、经贸活动”四大板块构成“卖身节”基本内涵，把城市文化、企业文化、旅游文化与乡村的民俗文化融合为现代节俗文化。除了观赏麒麟欢舞、醒狮祝福、特色游艺、传统美食之外，又加入了射水狂欢（这大概是迎合广府人的“水为财”的民俗心理，又有一种极具剌激性的狂欢节的娱乐色彩）、舞火晚会、擬影比赛、旧车展销、智通人408才新春交流会、商品展销等等，看起来似乎有些大杂烩，其实这正是一种转型期的民间节俗的表现，经过时间的淘汰，终将会选择显示出这一活动的最突出的特色，而让民众从各自的需求去得到愉悦，能以当地最终驱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作为文化节俗的支柱。说到底，符合平民性和商业性的需要，这就是珠三角民间节俗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现代广府的各种节俗活动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迎春花市及七夕乞巧。广府地区的岁暮迎春花市源远流长。广州气候温和，适于各类花木生长。唐代诗人孟郊对广州的人们种花蔚成风气赞不绝口：“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22】一千多年前的南汉时期，就已有不少种花为业的花农。花市起源于明万历年问，但早期花市是天天都有，明代花市在五仙门。到了清代，逐渐固定在七个城门一带，所卖只是素幕花。每天早上，花农采摘大量素馨花，从珠江南岸运往城北，由五仙门登岸，故此码头又称为“花渡头”。清中叶以后：广州花市规模、品种逐步发展，花市主要集中在广州西关打铜街（今光复南路）和桨栏街（今桨栏路）一带。举行的日期，已固定在春节前三四天，到旧历除夕的午夜收市，而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除夕午夜花农必将售不出去的花砸个稀烂。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晚清咸同年间，花市设在双门底一带，是常年开业的夜市。但已出现“岁幕尤盛”的情况，“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409霞，大家小户，售供坐几，以娱岁华”。【23】岁暮迎春花市的地点，近年已发展到广州市区各区分别设市，十里长街张灯结彩，一般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历时三天，除夕夜进入高潮，人山人海。百花上市，争妍斗艳，喜庆气氛热烈。1959年郭沫若春节在广州写有即兴花市诗，有“游人手把花成束，迎得春风上面庞”句。1966年陈毅的《广州花市》诗写道：华灯照不夜，歌声喜欲狂。人人争买花，忙煞卖花郎。花市过午夜，春浓风更吹。攘攘人百万，个个买花归。近年，由于广州各大公园在春节前后有花展，在花都、芳村有大型花卉市场，广州人对“行花街”只是意在逛街而不专意于买花，加上花市棚架成本加大，花农参市积极性有所减低，花市上搭卖玩具饰品成分加大，尽管有关方面对花市的布展环境想方设法，但花市已显出一种下滑之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中山等地的花市也各呈异彩。号称“小广州”的中山小榄也自称“花城”，因其主要栽种菊花，故又称“菊城”。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起设菊会，自嘉庆十九年（1814）起，每隔60年要举办一次盛大的菊会，展示千姿百态的菊花，既是对菊花园艺的检阅，又是当地一次商机盛会。参观人数在百万人之上。而今小税也在每年岁馨举办花市。农历七月初七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传统称4l0之为女儿节、姑娘节、乞巧节。在汉代已初见端倪。至南北朝时，乞巧习俗已极为普遍，成为少女少妇聚会抒怀、展示手艺、祈福觅缘的一个节日。这是个富有民族韵味的妇女节日。乞巧之俗最讲究的据说要算广州。宋人刘克庄曾有诗咏道：“粤人重巧夕，灯光到天明”。姑娘们于是晚上摆出用通草、彩绸、珠片、色纸、芝麻、米粉等制成的花果、仕女、宫室、器物等的模型，向天上“七姐”神仙跪拜，穿针乞巧。日间还结伴泛舟游石门沉香浦，游艇用素馨花、茉莉花装饰，热闹非常，谓运气好者还可以遇见“石门返照”的海市蜃楼景观。乞巧节也是一个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节日。七夕拜仙，已婚女子一般不能参加，但新婚女子在过第一个七夕时，要在初六晚举行一次“辞仙”仪式，表示与姑娘节离别。据一些书籍记载，旧时广州姑娘于七夕中展示出来的巧艺，有谷粒大小的绣花鞋，指甲般大的扇子，酒杯大小的花盆内栽两朵一模一样的花，一真一假，难以区别，恍如一个工艺品展览。20世纪60年代起，乞巧节在广州市内基本消失，然而在番禺大石镇凌边村却一直延续不断，该村的这一活动早已不局限于未嫁女子，而是全村团聚欢乐的节日，竟然比春节还要热闹。据说明清时期凌边不少自梳女到了香港或东南亚，每年均寄钱回来支持村中大办乞巧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中断，因而这个村是全广州甚至可能是全国唯一没有中断过乞巧节的乡村。广州天河区东圃珠村，明清时期就已盛行“摆七娘”。每年近七夕前三四天，41l村里女子自发组成“七娘会”，负责设计和筹备“摆七娘”的材料，有条件的大户人家就在自己家中做起“七娘”。晚上请来村里的姑娘和八音锣鼓演奏，观赏和称赞的人越多，主家姑娘就越高兴。男人们也借观物看人，有钟情者便托媒说亲。20世纪后半期，这个传统曾消失了半个世纪，2001年又复活了。村里七八位耄耋老太自发带着一群姑娘，花费4个多月时间精心筹备了一场“摆七娘”活动，在村中的祠堂案台上展示。用彩绸、珠片、色纸、泥娃娃制成巧夺天工的“鹊桥相会”、“天庭仙女”等微型景观，用米粒、谷粒、瓜子壳、八角、通纸等制成菊花，用冬菇、花生、芝麻等堆成斋塔和香火，将谷种和绿豆放人碗碟中使之发芽长成“拜神菜”。人工制成的腊梅花足以乱真，以芝麻粘成无数梅花的梅花香，令人赞叹。近年来，广州的黄埔、番禺、天河区一些乡村自发恢复了迎七夕“摆七娘”的节俗传统，“摆七娘”的村子逐年有所增加，所不同的是参加活动的多是中老年妇女，未嫁姑娘较少。三、特色游艺伴随着诸多的游神活动，在广府地区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游艺民俗。其中以各种“出色”和舞龙舞狮最具特色。广府民间有多种多样的“出色”。节目包括工艺品和表演艺术两大类。以表现形式分类，有灯色、车色、马色、飘色、地色、水色、景色等七色。412有以展示工艺制品为宗旨的，如個佛山秋色，利用普通材料制作各种仿古器皿、银盏、石雕、彩灯、花鸟、虫鱼，达到以假乱真。其主要工艺门类有扎作、纸朴、粘砌、批削、针刺等，如以冬瓜雕刻成采莲船，以刨花粘砌花灯，以腊塑为瓜果，以纸朴成石狮子。其中以灯色最为出色，佛山民间工艺社制作的稻草灯，如象牙雕般晶莹剔透，在法国博览会上被誉为“世界灯王”。据考佛山秋色赛会始于明永乐年间，已有五百年历史，逐渐发展成一种民间文娱活动。康熙《南海县志》中收有一首诗，描绘了当时出秋色的情况：“柚灯如昼妒姮娥，丝竹沿街按节歌。纸马莲舟都入画，果然秋色比春多。”佛山秋色充分体现了自然材质美的艺术，表现了平民的理想和艺术，深受群众欢迎。每年秋天，农忙告一段落，人们便将其精心制作的各种工艺品推上大路街头，配以锣鼓柜、舞龙舞狮，载歌载舞，展示游行。1982年举办的秋色赛会，参赛的秋色制品近二千件，一千多人参赛，一连四晩在佛山城区及石湾游行表演，观众达50万人次，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达3万多人。有以人物化装游行的，如番禺马色（由男童着古装骑马上）、沙湾飘色与崖口飘色、市桥水色与小榄水色（按专题扮演人物，用船或筏饰以布景道具在水上表演）、紫坭春色（女童站在方桌上的树桩枝头叫“树头色”，或站在锣鼓柜的支架上叫“锣鼓柜色”）等。各种艺术表演的“出色”中，以沙湾飘色最为出名。所谓飘色，是在一个称为色柜的小舞台上，设法用各种物体的4l3形状（树枝、花篮、动物乃至一片芭蕉叶等）将一条钢筋（称为“色梗”）伪装起来，让各种扮相的孩童演员或坐或站在这些巧妙的伪装物上，有“飘”在空中的视觉。凌空的人物叫“飘”，在台面站立着的叫“屏”。一组造型有3至5个小演员，过去用板车或4人抬起来巡行，现代也有用机动车载着表演的。一般在节庆、神诞、庙会时举行，每年三月初三则有专门的飘色表演。传统的沙湾飘色内容十分丰富，计有二百多板色，大多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旧时飘色往往在下雨时节的三月初三举行，前来观看的宾客人潮让本地人应接不暇。故民谚有云：“沙湾飘色，雨水滴滴，关起门来避亲戚”。据说沙湾飘色源于员岗，而员岗飘色约在明崇祯年间从江西传入番禺，再传入沙湾，康熙年间沙湾留耕堂重修落成时已有以飘色助兴的记载。百多年来，沙湾的飘色活动由一居三坊十三里为单位分别“出色”，每次“出色”连续四天，每天“出色”三十余板（每单位各出两板），争奇斗艳，评奖“赏色”。民间艺人在整理传统板色的基础上还不断创作出现代题材的飘色，如《体育之光》、《江山秀色》之类。而员岗飘色却没有创新，村里只有一位老人懂得制作色梗，眼看就要失传了。实际上，飘色在广东的另一些地方也流行，如粤西的吴川梅業一带，并且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追本溯源，现在中原地区还遗留有与飘色类似的游艺。如河南陕县大营村，唐代是驻兵屯田的兵营，大营社火【24】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大型民间游艺活动。其中有一种称为芯子414的游艺，是将扮演角色的小童固定在铁芯上，也可以上下起落、左右旋转。这些铁芯固定在特制的方桌上，用彩单装饰，四人一组抬行。这与在广府地区所见的飘色无异。【25】在山西，民间社火中有“阁、跷类”，阁即“抬阁”（在广西有“抬盒”之称，应由此而来），有的地方称为“铁棍”、“杠装”，采用结构奇巧的铁棍、铁拐、铁卡，将演员绑扎成一出出故事，底座抬着一步三颠，高处演员漫舒广袖，犹如九天仙女降落凌霄。流传于襄汾县中黄村一带的叫“中黄高台”，据说早在明朝已形成。由于每逢祭神之时，扮演各种神者在吹打乐伴奏下从神庙出来串街表演，观众过于拥挤看不清楚，于是将扮演者抬起，创出了“中黄高台”。铁棍、背棍的结构也不断改进。2005年春节期间，山西民间的这种游艺形式还应进到了广州雕塑公园表演。可见，广府地区的飘色，其实来自中原。结合当地的实际，不仅在工艺内容上有所变化，而且有了水色等新形式。舞狮在岭南各地都很盛行，尤以珠江三角洲为最。广州俗称“舞醒狮”，每逢佳节喜庆、迎神赛会，必有锣鼓舞狮助兴。狮头制作为突出特征，广府的舞狮分为佛山狮和鹤山狮两大流派。以佛山狮子最有代表性。舞狮在中国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宫中便出现舞狮人。中国的舞狮分北狮、南狮两大类型，传说南狮源于佛山。在明代初年，传说佛山地区出了逼供独角怪兽，眼大口阔，口中发出“嗹嗹”怪叫，故而人称“嗹兽”。每年春节前后就出来伤害人畜，糟蹋庄稼，弄得鸡犬不宁。众人商4l5议以兽治兽，做成竹编纸糊的长独角的狮子头，挑选身强力壮汉子戴上狮头，带上锣鼓，埋伏在怪兽出没之处，等它出现时，敲锣打鼓，群狮猛扑上去，把怪兽吓跑了。从此，舞狮驱邪便相沿成俗。另一种说法是认为“醒狮”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最初是表现武术馆的尚武精神，到了清中叶，在两广地区已经广泛流行以吉庆为主的舞狮。当时以广州三元里和泮塘“狮子”最具特色，据说过去广州的舞狮多源于这两个地方。舞狮活动融舞蹈、武术、音乐、体育于一体，热烈奔放，色彩夺目，深受群众欢迎。醒狮与北方狮子艺术造型不同，大体来说，醒狮讲究神似，北狮讲究形似。北方狮子四脚着地，活像真狮：醒狮只有狮头，舞者两脚着地，以一块红布做成狮身，盖着狮尾另一演员。南狮造型富有南方风格，夸张浪漫。额高而窄，眼大而能转动，口阔带笑，背宽、鼻塌，而颊饱满，牙齿能隐能露。分文狮、武狮和少狮三大类。醒狮形象多姿多彩，有红色的关公面，黑色的张飞面，还有老虎面、二花面等。设色分七彩狮和黑白狮：七彩狮是“狮 乸”，自眉红须，色彩艳丽：黑白狮是“狮王”，青鼻铁角牙刷须，挂满绒球，贴满铜镜，光彩照人。按照行规，在耍狮过程中两狮相遇，七彩狮要给黑自狮让路致礼。鹤山狮独具一格，俗称“蛤乸嘴”，嘴扁阔，角短，体形略小于佛山狮。传统的舞狮技艺，融南派武功于舞蹈之中。文狮表现温驯和善，武狮表现勇猛刚烈。少狮即为幼狮，憨态可爱，-般随文、武狮同场表演。醒狮舞的表演，分为单狮、群狮和4l6迎宾狮三类，各有套数。迎舆狮实际上也是群狮，不过规模更大，以50头狮子为一方阵，动作、锣鼓有特别的要求。各种表演都着力表现醒狮的威、猛、勇。传统技法有“出洞”、“上山”、“巡山会狮”、“采青”、“入洞”等。以“采青”动作难度最大。有采高青、地青、水青、凳青和桥青等。所采的“青”，是一棵悬挂起来的带有菜头的生菜，扎上利是、香烟之类。其中最难的是采高青，又称“企膊”。原先是舞者站立于另外两人肩膀上表演，后来发展到在2米多高的梅花桩上跳跃，边舞耍边将挂在桩上的“青”采下来。还有边爬竿边舞至竿顶采青的。传统的舞狮技艺还有狮子上楼台”、“狮子吐球”以及流传于石湾中窑的“狮子花灯”。用竹蔑或藤扎成数层的滚球花灯，灯内点燃的灯烛随着狮子表演滚动而不熄灭。由于这些高难动作、特技动作都需要平时苦练技艺，因此过去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武馆均附设有“狮子会”，教练拳术与舞狮，成为一种把强身与娱乐紧密结合起来的民间游艺。一些乡镇有几个醒狮队，并经常以各种表演机会切磋比试技艺。南海大沥的狮子会是醒狮竞技的大集会，会期是每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南海、三水、番禺、顺德、花都等四乡醒狮云集，最多时达480多头。围观群众多达10多万人。各处舞狮队先是沿街起舞，自由表演，然后集中比赛评分，优胜者获得大会发给的奖品锦旗和金猪（烧猪）等。1997年成立的番禺沙坑村龙狮团，翌年即参加巴黎国际雄狮争霸赛勇夺冠军。1998年沙坑村被广东省文化厅命名为广东省民族民4l7间醒狮艺术之乡。沙坑村在每年正月初八举行醒狮生菜会，到2005年春节已达到1000席盛况。结合举行的龙狮会，也是一年比一年规模更大。2003年在沙坑村新落成的体育馆举行了广东省第五届龙狮（首届传统南狮）大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0多支醒狮队整整在此比赛了3天，盛况空前。2005年的沙坑第十届醒狮生菜会，使这个只有1300多人的小村庄，吸引了来自广州、佛山、肇庆、阳江乃至广西的300多只醒狮及四乡数万观众。在广州，舞狮越来越旺。广州市总工会在1985年元旦成立广州工人醒狮协会，这是全国第一个醒狮协会。不到五年，已经发展到遍及全市各行各业的40多支狮子队，2000多会员。广州工人醒狮队在广州、北京、上海、武汉及港澳等地的庆典活动中多次出场。鹤山狮的艺术特点是以猫为形，以狮为性，舞起来结合猫狮的特点，分为喜、怒、惊、疑、醉、睡、醒等7种动作，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色彩。并且特别讲究道德和礼仪，如过武馆之正门擂鼓3次以示友善：遇丧事人家悄然而过不扰悲哀气氛：两狮相遇互换柬片以示亲善等等。此外，中山的健武狮，吸收了南北狮艺之长，既有南国醒狮扎作夸张的狮头，狮身又有北方狮舞四脚着地的装扮，将南方舞狮的雄浑奔放及北方狮子的细膩精湛的技巧杂糅为一，自成风格。除了舞狮，番禺黄阁的舞麒麟、番禺沙涌及从化的舞鳌鱼、番禺三堂及黄埔双岗的舞凤、增城麻车的舞火狗、广州西关的舞榕叶龙、新会的纱龙、中山的醉龙、东莞的烟花龙，都曾经名闻一方。鳌鱼舞在明初由来到番禺海滨屯垦的4l8明兵从浙江奉化丹桂乡金鳌村传入番禺，流传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先是被当地人看成追念先祖的一种活动，其后又与科举中的“独占鳌头”的意念联系起来，因而历久不衰。如今发展成为一种欢庆节日的广场表演舞，充分表现了热烈、欢乐、祥和的气氛。所有这一切，既是民族传统的延续，同时又适应广府地区娱乐活动平民性、商业性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变化。四、南拳与赛龙舟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粤地就有“越俗好斗”的说法，这一传统的影响延续到后代，广府地区的体育多体现出其竞技性及雄武刚强的特点，特别是在拳术及赛龙舟等项目上以其独特的南国风格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广东的拳术在中国拳术中称“广东南拳”。所谓南拳，泛指流行于长江以南各省与北派拳术迥异的一派拳术。而广东则是南拳发展的中心地区。练武自古是人们自卫抗暴的手段，故成了民间传统体育，而明末清初乃至鸦片战争前后广东的社会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民间习武之风从秘密到公开，越演越烈。这是广东武术发展的客观原因。以至到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国武术被称为“Kungfu”，这是广东人对武术称为“功夫”的译音，可见粤人传武的影响之广泛。清初，朝廷虽不许民间习武，但秘密社团如洪门会、天地会等亦广传武术。清代军队的武术训练是必有的功课，民问亦有4l9420保镖武师一行。乾隆年间，广东已有人到海外传授武术。鸦片战争前后，广府民间激起练武的热潮，官府也不再禁民问习武，城乡习武者众，使广东南拳的洪、刘、蔡、李、莫等五大门派及白眉、龙形、蔡李佛等门派在广州城乡广泛流传。民国初年，国人为雪“东亚病夫”之耻，武风为之一振。不久，广州的李佩弦、郭子硕、黄爵珊等投身上海精武会习武，学成回粤后推广了鹰爪拳、螳螂拳、谭腿等数十种套路。1919年，广东省精武体育会成立，主张体育救国、振兴中华，开展武术活动，引进了外来拳种。孙中山曾邀请名武师蔡桂勤到大元帅府任武术教师。1928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邀请在南京第一届武术国考中得奖的武术师万籁声、李先五到广州筹组两广国术馆，先后聘请了数位著名的北方和南方武术家任教官。两广国术馆虽然因政坛变动只存在两个月，但已播下北拳南传的种子，使罗汉门、八卦掌、太极拳、查拳、螳蝉拳等拳种在广州落地生根。其后成立了广州国术社，广州武术组织渐多，武馆林立，先后近50家，武术流行于各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群众武术健身所（前身为傳氏健身学院，1984年改名为“广州武当拳研究会”）、西山武术社、广州市武术协会、广州市太极拳研究会、广州市武术馆、广州体校武术班、南粤武术学校、广州精武体育会。武术活动长盛不衰。广东南拳五大门派流行于清初至清中叶，近代以后至当代仍在流行的只有洪家一门，刘、蔡、李则少有传者，而莫拳仅在个别地区还有流传。当代流行的南拳，除洪拳外，首推蔡李佛家，还有侠拳、咏春拳、龙形拳、白眉拳、佛家拳、练手拳等以及一些仅在某些地区流行的小拳派。较之北派拳术风格，广东南拳的特点是：重拳法较少腿法，主张“腿不过膝”：套路中基本都是技击性的实战动作而很少花巧性的动作穿插：虽然也讲究刚柔相济，但以刚劲为主，长劲为主，势雄力猛，有些甚至刚而至僵：重步桩，较沉雄，少蹿蹦纵跳：各门派均强调免象形，但均是从动物搏斗技法中模仿提炼而不似北派某些象形拳那样着重形似。广东南拳步稳、拳刚、势烈、少跳跃、多短拳、擅剽手，以声气修力，总的风格是武风粗犷、威猛、沉雄，体现了岭南自古远离中原的特有民风。较之广东音乐多婀娜宛转，岭南画派之绚丽多彩，岭南武风格外粗犷威猛，当与其岭南武风之盛是为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习武自强自卫，注重武术之实战功能有关。同时，各派高手云集岭南，诸多武馆成立，比试武艺势在必行，在残酷的竞争下，只凭花拳绣腿在广州不能立足，因此也促进了南拳的武功发展。南拳五大门派中，蔡拳、李拳被综合为一个新拳派一蔡李佛家，创始人是新会人陈享（1806～1875）。一说是由陈享与得意门徒新会人张炎（1811～1846）合创。蔡李佛拳是综合蔡家、李家、佛家三家拳械的优点熔为一炉而创设的。道光十六年（1836）正式以蔡李佛家为拳派命名。1838年，陈享回家乡新会崖西镇京梅村，在“缘福陈公祠”设武馆授徒，取名“洪圣馆”（一说雄胜武馆）。【26】咸丰元年42l（l85l）（一说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张炎在佛山创立鸿胜馆。【27】陈享、张炎创立武馆的本意，有暗含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之意，无论是鸿胜、雄胜还是洪圣，都含有“洪胜”即反清复明事业必胜之意。这与南少林洪门弟子因清兵火烧少林寺南逃之历史有关，表达了在传播南拳的同时，传播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和伸张正义的武德意识的宗旨。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清朝在新会创立的武馆，称雄胜馆的可能性应该比称洪圣馆更大些。雄胜馆除在新会京梅乡设有祖师堂外，还在广东的广州、南海、佛山、香山、番禺、东莞、开平、台山、恩平、肇庆、新会、江门等地设分馆，在新会的崖西有26个乡设有分馆，还在广西桂平设了分馆。各分馆主持人除桂平分馆外均为陈姓，门徒有数万之众。这当然与“反清复明”的政治功利有关，客观上却使蔡李佛拳以蓬勃发展之势取代原有的南派五大家而成为新兴的南拳大家了。鸿胜馆从成立到1949年闭馆，有近百年时间，在省港佛武术界中声望甚高，至1921年发展至13间，弟子超过3000人，属鸿胜系统的成员有上万人，成为中国成立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武馆，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从清朝起，鸿胜馆的众多名师分赴香港和海外设馆授徒，至今传人分布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有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有蔡李佛功夫总会。对于蔡李佛拳派究竟谁是门派始祖的问题，佛山人尊奉张炎而新会人尊奉陈享，各执一说，分别举行祭拜不同一人的祭祖活动。蔡李佛拳门派422发展甚广，但门中有门、派中有派，分成几系，论辈份流派影响之争较为激烈，有时甚至不分高下，较难形成统一的活动组织。这也是广府竞技体育一个突出的特点。广东南拳的五家门派中，洪拳是其中声名最盛、生徒最多的一家。传说中的福建南少林寺是一个反清的大本营，清兵火烧南少林寺后，俗家弟子洪熙官逃匿至广州，隐居大佛寺开设武馆，遂将洪拳传入广东，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至晚清蓬勃发展，在南粤武坛上出现了所谓“广东十虎”的诸多名家。历史上，在岭南武术中出现的传奇式人物，最为著名的铁桥三、黄飞鸿都是洪拳传人。铁桥三（1813～1886）是广东十虎”之首，原名梁坤，南海县人，从小嗜武，到处寻访名师，后在广州白云山能仁寺向洪拳巨子、少林寺觉因和尚学武七年，尽得真传，成为洪拳传人广东后的一位代表人物。据说他以双臂伸开挂起6个大汉步行数十步面不改色而出名。他创出的铁线拳，是一套适于男女老少，以运动肢干、畅通血脉为主的养生拳。黄飞鸿（1856～1925）是南海县人，自小随父在佛山、广州、顺德一带卖武，在佛山随铁桥三高徒林福成学艺近两年，学成铁线拳和飞砣等绝技。1882年受聘为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四年后辞职在广州仁安街设跌打医馆“宝芝林”。他曾治愈了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久治不愈的伤病，1888年被刘永福聘为军医官和福字军技击总教练，并曾随军抵台抗日。黄飞鸿的事迹成了香港武打影视片的热门题材，把他渲染成无往不胜的武林大师而家喻户晓。佛山市将黄飞鸿效应发展为423武术旅游观光项目的一种文化产业，在祖庙建立黄飞鸿纪念馆，并收集了大量的电影资料。2002年又举行了黄飞鸿145周年宝诞寻根拜祖仪式活动。地方在利用文化品牌创造经济效益上有较大的热情，而对于发掘传统文化，发展岭南武术上下的功夫则显然不足。珠江三角洲是水网地区，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风俗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正如广州儿歌所唱：“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但赛龙船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花样之多、竞争程度之激烈，以及观看热闹的盛况，则是其他地方所罕见。激励人心的广东音乐《赛龙夺锦》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生活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赛龙舟重视的是观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其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奋勇当先的精神，更为广府人所青睐。从农历四月初八起，就要把深埋在涌底或池塘里的龙船挖起，洗净，风干。龙舟多以柚木、坤甸木制成，木质坚韧耐腐蚀，去水快易划。小者可10人，大者80人。然后择吉日“起龙”，将船头船尾披红挂彩，擂鼓放鞭炮，请念吉利咒语，洒上净水，龙船下水，随后举行“采青”（将龙船划到村外河边或涌边，采菖蒲或谷穗等青绿植物挂在龙船头准备开赛）。龙船去采青时只能用鼓槌敲鼓边，等采青上船后，才能打明鼓、放鞭炮，把写好的“净水符”贴在船上供奉的神盒和鼓身、锣鼓上，龙船在涌边游弋一番，就算仪式完成。赛龙舟分两种形式，一是“趁景”，是指定地点集中龙424船“应景”表演，算是锦标赛前的热身。各地从五月初一开始，就天天有景。在东莞，初一万江景、初二中堂景、初三道滘景、初五槎滘景、初六潢涌景，直至二十麻涌景方告一段落。清代番茭塘司属下有五月初一新洲景，五月初二官山景，五月初三市头景，五月初四新造景等。选景一般都选江面开阔处，可以容纳会景的龙舟多达百余艘；江岸线长，观看的人群可达数万以上。珠江三角洲最负盛名的龙船景是广州郊区的增城县新塘景。趁景之后，才开始斗标。过去斗标规程相当复杂，旧时顺德龙江斗龙舟，斗之日，两船相斗，胜者交其筹于主者合筹，得一胜标。当日为初场，次日以初场获三胜标者再赛，为二场，最次日又以获五胜者斗。这样一连赛上好几天才能排出名次。较大规模的龙舟赛也有集于一处，号令一响，百舸争流的。两岸人山人海，呐喊助威，鼓声、喊声、鞭炮声，汇成一片。观看龙舟赛场面之大、人数之多，为其他文体活动所不能比拟。“文化大革命”中，龙舟被列为“四旧”遭到销毁，如番昌一地70多条龙舟，仅有3条被群众偷偷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赛龙舟活动，龙舟数量迅速增长。1998年在广州附近珠江河面参赛的龙舟近500艘，赛龙景点有49个，其中有14个竞赛景点的观众超过10万人。2004年番禺市桥河“莲花杯”、“禺山杯”龙舟赛规模盛大，参赛的有来自本地的70多条龙舟，4000多名男女运动员展开了角逐。与龙舟赛相联系的还有相应的南国节俗习惯。在南海黄竹425岐有间龙母庙，附近江面也较宽阔，五月初八是龙母诞，广州各地龙舟在初五大赛之后就到市郊黄竹岐去拜龙母，然后又在那里举行“锦龙盛会”，再赛龙舟。故广州俗谚有云：“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这是广府地区两个大的民间诞会。龙舟节是相斗比拼的竞技节，同时又是睦邻亲亲的节日。海珠区新滘龙潭乡，近年还兴起一种“吃龙舟饭”的新风俗，当龙舟鼓响之时，村民可以免费在乡政府的饭堂取龙舟饭”，菜式有豆角、猪肉、烧鹅、风爪等，吃风味饭菜，意在增强乡民团结友爱与祥和欢乐的气氛。番禺小谷围官山村到了农历五月初十“龙船还神”，要在本村的宗氏祠堂大摆龙船宴，有百多席之众，热同非常，四方亲朋好友前来庆贺一番，至此热闹快活的龙舟节才算告一段落。在广州荔湾的泮塘人，在泮塘景此日要做庄迎候南海盐步、芳村坑口、番禺植村及花都等地的10多条龙舟，“龙舟饭”筵开百席，款待上千桡手和宾客。翌日泮塘人至盐步回访叫“盐步景”。盐步与泮塘两地龙舟结亲已有近五百年历史。据说明代有一年盐步老龙与泮塘龙舟赛龙，眼见盐步老龙就要快一步夺到标旗，泮塘龙舟站龙头者一跃而起把标旗抢走，得胜而捧回烧猪，回村时被村里老人大骂一顿，老人们认为盐步老龙划得快，泮塘龙舟贏得不光彩。于是泮塘的人把烧猪送到盐步，盐步人执意不收，这样来回推让，最后是一位老人裁决说，让有须的盐步老龙作了契爷，没须的泮塘龙舟做了契仔，从此世代交好，盐步老龙在每年端午节那天出广州看契仔，由泮塘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之戴花挂红。翌日契仔去盐426步看契爷并参加盐步的龙舟节。老龙探亲，见证了广佛水乡民间的友谊。龙舟节是人山人海的狂欢节，商家及小贩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赚钱的机会。清人江仲瑜的《羊城竹枝词》写道：“买舟同日掷金钱，爆竹声中笑语传。指点五仙门外水，彩旗画鼓斗龙船。”【28】在外地入粤人士的眼中，龙舟华丽的装饰更引起他们的注目。清人王士桢的《广州竹枝》写道：“珠海石上柳荫浓，队队龙舟出浪中。一抹斜阳照金碧，齐将孔翠作船蓬。”【29】端午节与划龙舟相伴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裹粽子。广府地区的粽子有咸肉粽、碱水粽、裹蒸粽三类。咸肉粽以糯米、猪肉、绿豆、五香粉为原料，用芒草叶包裹。碱水粽以碱水或草木灰泡浸糯米制作，用芒草叶包裹，有加豆沙馅的，亦有无馅料的，食时加白糖或糖胶，金黄爽滑，别具一格。裹蒸棕为肇庆特产，用料比咸肉粽更讲究，除咸肉粽配料之外，有加粟子、咸蛋黄、香菇的。裹粽用的是当地特有的冬叶，煮熟后会留下一股清香。现代在平时都有粽子上市，到了端午节，大酒家、小商家抓住市民的过节心理，争做粽子。1998年端午节在广州上市的粽子超过l000万只，仅广州酒家就生产了16万只。星级酒店、百货商场和个体商贩、下岗职工同时上市卖粽，真个是满街粽子。市场上还出现了嘉兴、厦门、台湾的粽子。包装除了传统的形状，也有迷你型等新品种上市。427五、特殊婚俗由于长期的融合，广府地区旧时婚俗，与传统的中原婚俗没有多大区别，值得一提的特殊婚俗是“自梳女”与“不落家”。这种风俗在清代后期兴起于珠江三角洲城乡，盛行于顺德、南海、番禺、香山等县，许多自梳女和不落家在广州居住和谋生。过去，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未婚女子脑后都梳着一条长辫子，结婚时再由母亲或女长辈替其把辫子挽成发髻。自梳女即是决定不结婚的妇女，她们择定吉日，在亲友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起华丽的衫裙，在厅堂中先祭祀家神和祖先，接着跪拜父母，然后在神前对着镜子自己把辫子盘为髻形，插花行礼，燃鞭炮，派利是，筵请亲友，从此终身不嫁。但一经梳起，终生不能翻悔，父母也不能强其出嫁，然而日后如有不轨行为，则会为乡党所不容，遭受酷刑有捆入猪笼投河的下场，还不准其父母家人收尸葬殓，得由“姑婆屋”中的自梳女们以草席和门板收尸。一张草席还要撕成两半，一半盖尸首，一半遮太阳，姐妹们抬着尸体绕村巡行三周，表示感谢天、地、父母养育之恩，然后将尸体丢下河去。因此在自梳女中流传着一首歌谣：“勤力女，无棺材，死后无人抬，一只床板半张席，姐妹帮手丢落海。”听之令人心酸。有的人家对女儿独身终老痛心疾首，常作防范。而决心“梳起”的女儿则躲开父母，在姐妹辈的自梳女帮助下，先是用“香428汤”（柏叶、黄皮叶煮水）沫浴，翌日再到神庙中观音菩萨前起誓结髻，换上祭过观音菩萨的新衣服，与姐妹们互拜接受道贺，仪式之后才向父母家人宣告已经自梳。富有人家还得设席宴客，接受亲友道贺。自梳女可以接收有宗法关系的徒弟。徒弟必须是自梳女，并终身服侍师傅以尽孝道。双方一旦结成师徒关系就永不翻悔。自梳女身后遗产，除了赠其出庶子女外，由其所收徒弟或金兰姐妹继承。自梳女晚年十分孤寂，而且受着封建思想所毒害折磨。一些自梳女为了老死夫家，专找一死人出嫁，付给婆家一笔钱“买门口”，又叫守墓清”，做死者名义上的妻子，以便将来可以老死夫家。或者在男子死而未葬时，去充当死者之“妻”，披麻戴孝，守灵送葬，谓之“当尸首”。在此之后，翁姑稍有不满仍可将其赶出家门。一些自梳女还出钱为名义上的丈夫讨小老婆，以便老来有丈夫的儿子养老，死后可以进夫家的祠堂。有一些少女虽然决心终身过独身生活，但因拗不过父母逼迫，只好采取婚后“不落家”的办法来应付父母。蓄意不落家的姑娘，在出嫁前夕由知己的先辈姐妹秘密传授对付洞房花烛夜的办法，并由金兰姐妹特制一套防御的衣服，上下相连，夹口处缝固，让新郎无法扯开。还自带一把剪刀以防新郎以暴力相逼时自卫。届时还厉声呼救，好让大妗姐闻声前往救脱。不落家的妇女在夫家住满三日后，回门后就不再返回夫家。其夫可以另外娶妻，但在名分上姑娘仍是夫家的主妇，夫家如有红白喜丧之事，还得派人回去以示关照。如遇翁姑或夫婿丧事，必须亲自回去执孝。本人病危将逝要由429人抬回夫家待终。弥留期间的饮食、医药及身后费用，均由女家负责，夫家要以主妇之礼仪治丧。死后才成为这家人的祖先，所有遗产留给其夫的妾氏及庶出子女。也有不回夫家而死于“姑婆屋”或尼姑庵的。自梳女以自己的青春、爱情、家庭为代价换取自由和独立的生活。产生自梳女和不落家的原因很复杂：担心嫁出以后遭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担忧嫁人以后的各种不幸遭遇：因当时南海、顺德县蚕丝业发达，缫丝女工有能力自食其力而不想遭受婚后痛苦：贫穷人家负担不起嫁女的丰厚嫁妆：因等待兄长结婚耽搁了自身结婚年龄而不得不自梳的：决心留在家中照顾双亲：有认为结婚是可耻的事的心理。在中山，自梳女都是勤劳智慧兼备者，其决定不嫁的原因，大致因为一是长女决计辅助主持家务，二是反抗封建婚姻或情郎有变，三是家族有世代相传由亲侄女梳起接代姑婆的规矩。在这各种原因中，珠江三角洲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缫丝业兴起，乡间女子有条件自食其力是主要的原因。由此种种原因，百余年间自梳风气延绵不断。南海西樵简村在抗战前连续八年就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20世纪50年代初，据与简村为邻的杏头乡统计，全乡15232人，就有400余个自梳女。在南海西樵山下，自梳女们百余年前在官山城区建起了一座益善堂，百余年来，曾有300多名自梳女在这里“买位”安度余生，20世纪50年代最多时住过40多位自梳女，现在仍有七八个过了耄耋之年的自梳女在这里安度晚年。还有一位最年轻的是l998年买位的40岁的妇女，据说是十多430年前因工伤头部留下后遗症，因此影响了婚姻，萌发了终身不嫁的念头。在顺德均安乡，仅仓门村一个村，便有20多座姑婆屋。在广州郊区的棠下，自梳女梳起之后，不同于顺德、南海的自梳女搬出家门自立，仍住在娘家，辛苦劳作为家人，这反映了当时棠下的宗族管理管束并非太严，与当地的农耕经济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大约在清道光年间，兴起自梳女至广州、上海等地当佣工，逐渐发展至出香港、南洋各国。从l830～1942年百余年间，仅香山（今中山县）古镇、海洲、曹步三大自然村外出至香港及南洋一带充佣人者数以千计，其中80%以上是当住家工，称“妈姐”。不少人还学会外语充当了富户的管家妈姐”。顺德在海外南洋的自梳女有二三千人，均安沙头就有数百人。旅居海外的自梳女希望老时能叶落归根，195l年，她们筹款在家乡建成了第一间自己的安老院——冰玉堂，建成后入住的最高峰是l978年，当时有30多人人住，设有大食堂，极一时之盛。而今已人去堂空。这种畸形的婚俗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行消失。这与解放后万象更新，尤其是第一部婚姻法公布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也有一些自梳女后来嫁了人，社会对她们也不存偏见。现在的自梳女已经不再受到宗族陋规的威胁了。现在还存下来的是最后的一群自梳女，如广州市棠下村就有四五十人，从l988年开始棠下村实行股份制，她们和村中其他的老人们一样享受村中的股份分红，正以平和的心态安度晚年。43l432作为19世纪的一种风气，自梳女特殊的行为成为当时的婚姻制度的另类，其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封建力量的对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消亡，值得社会学家做深入的研究。注释：〔1〕《汉书·高帝纪》。〔2〕《汉书·郊祀志》。〔3〕《魏书·蛮僚传》。〔4〕《汉书·陆贾列传》。〔5〕丘濬：《广文献张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6〕《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五引《岭表录异》卷上。〔7〕《全唐文》卷575《进岭南王馆使馆图表》。〔8〕许浑：《送郑尚书出镇南海》，《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四。〔9〕〔10〕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民物志一·风俗·广州府》。〔1l〕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民物志一·风俗·广州府》，此句中之“艺”字当为衍字。〔l2〕《大清一统志》。〔13〕乾隆《广州府志》卷10《风俗》。〔14〕乾隆《番民县志》卷17《风俗》。〔15〕乾隆《广州府志》卷10《风俗）。〔16〕索正《从化县志》风俗志（上）。〔17〕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青山集》卷8。〔18〕郭祥正：《蒲涧奉呈蒋帅待制》，《青山集》卷8。〔19〕菜正《广东通志）卷51《风俗》。〔2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10《冬至》。〔21〕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11《岁时民俗》。〔22〕《全唐诗》卷385，孟效：《送侯判官赴广州》。〔23〕张心泰：《粤海小识》。〔24〕“社火”一词，《汉语大词典》解为：旧时节日村社迎神赛会所扮演的诸种杂戏。后亦演变为群众性的游艺活动。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自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25〕员更厚、刘安璋：《大营社火——民间艺术的大荟萃》，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0日。〔26〕“洪圣馆”说见《佛山鸿胜馆500周年庆典祭祖才结東新会洪圣始祖馆又落成——陈享张炎谁是“老祖宗”》，载《广州日报）2001年12月l2日。“雄胜馆”说见马志斌著《岭海武林》第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7〕鸿胜馆创立时间有不同说法。成丰元年说，见载于《佛山史志》1996年第一期的邓光民《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武馆——佛山鸿胜馆》：原称佛山蔡李佛武馆。光绪初年，由蔡李佛拳创始人陈享的得意弟子张炎按任馆主，改称鸿胜馆”；另有道光十九年（1839）说，见于新加坡鸿胜馆创办人张文经《谈蔡李佛源流历史及其门户之分设因素》，载香港《新武侠》l972年6月号，转引自马志斌著《岭海武林》第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8〕江仲始：《羊城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四）》第274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l997年版。〔29〕王士祯：《广州竹枝》，《中华竹枝词（四）》第273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433第十九章商业与海上丝路一、长盛的广州外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古代广东向北陆路不便而向南朝大海开放的格局，造成了广东经济向海外贸易倾斜的发展趋势。海外贸易可以上溯到二千多年前。《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着对外贸易的港口，是徐闻、合浦二处。【1】从文献记载可以得知，西汉时期使臣和商船所走的南海航线，是从雷州半岛乘船出海，沿海岸航行，必要时舍船上岸，步行穿过陆地再度乘船，终点是印度东南岸。广州的海外贸易活动显然早于西汉之前。《史记》已提及“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也”。【2】吕思勉认为：“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3】在广州的南越国文帝墓中出土有产自非洲的大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西南434亚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龙脑香的熏炉，是当时中外来往交流的实证。熏炉点燃的龙脑香，来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马来语称为“果布婆律”（Kapur Baurs），《史记》、《汉书》均有番禺为“果布”集聚地的记载，《梁书》则称为“婆律香”，【4】分别为“果布婆律”的简称。【5】茉莉、素馨、诃子、郁金香等花木品种也在这时从海外传入岭南。秦平南越之前，由于地理上得江海交汇之利，番禺已是珠江口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重要的居民聚居地，才能被南下秦军选定为东南三部首部之治所。因此，番禺在当时已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货物集散地，只是由于受到航海条件的限制，海舶自从番禺起航后，要沿大陆岸边行驶，在徐闻停泊补充谈水、粮食和货物，然后才离岸驶入远洋。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孙吴政权派朱应和康泰出使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是史书所载中国首次派专使出使南海诸国，就是从番禺启航的。【6】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为南北政权，岭南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促使岭南对外交往及海道贸易进一步发展。西晋太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腾（按当作膝）候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7】这是广州与大秦（东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最早的明确记载。东晋时，法显由陆路往印度取经，从海道返国，途经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转船，船上商人说：“常行时正435可五十日便到广州。”【8】广府地区与南亚、东南亚之问的往来更加密切。《梁书》记载的“南海诸国”有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大秦，展示了此时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初具规模。广州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呈现出百货集贸的繁荣景象。“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9】“一筐之物，可资数世”。【10】故而使广州这个当时的边城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商业繁荣的景象。对外贸易的繁盛，使广州的收入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多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梁）武帝叹日：‘朝廷便是更有广州'”。【11】东晋南朝时全国通用的货币是铜钱，在交广地区，由于海外贸易的影响，“全以金银为货”。【12】白银成为当地主要的流通货币，表明其贸易体系的特殊性。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隋大业年间，隋扬帝派常骏、君政携绸锻五千匹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赤土国派王子回访，礼物有金芙蓉冠、龙脑香。《隋书·地理志》称：“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13】与此同时，广州与国内荆、扬、益、越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14】唐代，广州的外贸往来益增，唐徳宗时宰相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沿岸到达亚丁港和红海地区的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大大地向西延伸。主要航线是从广州出发，经436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尼科巴群岛、锡兰岛到印度半岛西岸，由此分为两路，一路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沿东海岸到达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剌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从岭南输出中国丝绸、瓷器、纸张、葛布、药材、金属制品和工艺品，由此转运至世界商业中心之一的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另一路由印度半岛西岸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三兰国（今东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这条航线沟通亚、非两大洲，长达一万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还有许多支线，都和广州有来往。开元年间，在岭南设有押蕃舶使，处理外交事务，与节度使合称“二使”。开元二年（714）左右，唐政府在广州设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也称“广州结好使”。宴请来广州贸易的蕃舶外商，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人朝。外商返航，又在珠江河畔的“海阳馆”举行宴会饯别。城西一带专供外商居住，名日“蕃坊”。在广州“并任蕃商列肆而市”。【15】伴随着农业、手工业、交通业的发展，广州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业中心之一。从时人所记述的“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16】“第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17】可见到当时广州商业的繁盛。广州当局多次整治修拓城市，旧有的坊市结构被打破。店肆行铺林立，邸店柜坊等服务设施也颇完善，甚至还出现了夜市，体现出在当时颇为前卫的消费性城市的风貌。南汉建都广州（时称兴王府），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437外贸更加重视，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商人继续前来岭南，广州的商业仍呈现出兴旺气象。宋代，由于西夏控制了前往中亚地区的通道，东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也妨碍了东西方的陆路贸易，宋朝对外联系，只能以海路为主。北宋时，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朝廷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负责管理外国使者和商人事宜。据史籍所载，宋代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近70个。对外贸易的范围比唐代扩大，从东南亚诸国，到印度、阿拉伯，直到西部非洲索马里以及欧洲西班牙南部诸国的使节和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贸易。【18】由于有大利可图，许多外商索性带家属前来经商，“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19】。进口物品中经济价值最高的是乳香、犀角、象牙、珠贝等宝货。出口物品中，以西村瓷为代表的广瓷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元代仍很重视外贸，同样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广州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发展。据元大德《南海志》所载，其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141个，【20】占元代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220余个【21】的64%。广州港拥有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印度半岛、波斯湾、红海的六条海外贸易航线。东起菲律宾，西至西班牙、摩洛哥，南达帝汶岛，班括了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以及欧洲的一部分，把海上通商的主要国家都包罗进来。元代广州是一个“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22】皇庆初年，“豪民濒海438堤，专商舶以射利”。【23】随着海外贸易的兴旺和活跃，广州出现了“舶牙”这种专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经纪人，这可以说是明代“牙行”和清代“行商”之滥觞。明代实行朝贡贸易，只在宁波、泉州和广州三地设立市舶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24】在广州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最多。永乐元年（1403）在广州口岸建立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驿馆怀远驿”，址在广州的十八甫，有驿舍120多间，可知来华朝贡至广州者为数不少。有明一代，广州始终为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洪武初，一度“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25】。嘉靖二年（1523），因日本贡使在宁波火并，乘机掠杀，朝廷罢泉州、宁波二地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凡夷船趁贸货物，具赴货城（广州）公卖输税”。【26】内地他处商人只好将商品长途贩运来广州出口，史载：“浙人多诈，窃买丝棉、水银、生铜、药材通番之货，抵广（州）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日‘走广'。”【27】明中叶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更为兴旺。15世纪末至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贸易战略，明朝的朝贡贸易开始瓦解，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葡萄牙人强租澳门，欧人叩关索市，对广州外贸带来直接的影响。万历年间，每年夏冬两季在广州海珠岛（今长提一带）举办为期数周甚至数月的定期市，允许各国商人前来广州直接与中国商人贸易。此可视为后来的交易会。省内和国内各地的富商大439440贾，也纷纷将货物贩运到广州同外商交易。广州城市进一步扩大，人口大增，尤其是靠近海珠岛定期市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带，更成为繁华的外贸商业区，“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28】贸易的发展，也包括广州市郊乡民参与对外贸易走私活动。“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而近乡名日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物品，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29】有中国商人一时在广州与外商交易不成的，便把所余货物亲自驾船经广州、澳门出海，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国家去贸易。至于珠三角一带的本地商人从广州经澳门出海贸易者更是屡见不鲜。屈大均记载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解、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30】这种商舶贸易发展到后来出现“订货加工”的形式，就是广州的舶主、海商到海外贸易，有意识地接受外商特别是华侨商人定购中国货物的样品及订货资金，返回广州交给“缆头”（即是舶主、海商、百工之间的中介人）去同有关工场商定，按样加工，订制货物，再按时将货物贩运出海卖给定货外商。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贸易方式了。广州的海外贸易促进了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为外贸服务主要的交通线，陆路从广州出发，通过北江航道，越大庾岭至江西、苏、杭等地：海路直接与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海港城市沟通，各省商人云集广州。明人李鼎记载了这一时期物资交流的一般情况：“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31】以广州产品为代表的广东商品被称为“广货”异军突起，主要有铁器、陶瓷、蔗糖、纺织品、水果、鱼花以及其他商品，迅速推向全国市场，并进入海外市场。广州城乡商品丰富，城西、城南特别繁华、成行成市，市场上有各种各样具有批发性质的“栏”。“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小商小贩“持一二钱之货，既得握椒，辗转交易，可以自肥”【32】。清初仍沿袭明末的对外贸易政策，但不久为了切断台湾郑成功抗清势力与内地的联系，颁布了禁海令。禁海期间，由于澳门成为一处转口贸易基地，加上在广东有一批大贾藩商”【33】专门从事海上走私活动，使广东对外贸易有所延续。康熙二十三年（l684）停止海禁，翌年朝廷即设立与（广州）、江（松江）、渐（宁波）、闽（厦门）等四处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此为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之始。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清廷宣布封闭闽、浙、江三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44l易”。【34】广州始终向西方商人开放，因而粤海关不论是制度还是功能皆居全国各关之上，上缴的关税也是全国最多的。嘉庆年间，粤海关关税收入达百万两以上，超过广东省地丁银（125万两），占全国关税收入的四分之一。【35】来往于广州与世界各大洲之间的商船数量逐渐增多，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764～1765）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仅3l艘，经过一百年时间，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45～1846），至广州贸易的外舶已增至2l3艘，增加了五倍多。【36】清代前期，广州对外贸易除了在明代已经开通的印度洋、南洋、日本、欧洲和拉丁美洲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广州经好望角到北美、广州到大洋洲、广州到俄罗斯的航线。广府商人争相出洋到世界各地去贸易，外省商人经广州到海外贸易也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英国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最早在广州建立商馆，其后有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美国以及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在广州建立商馆。清政府则委托具有官商性质的广东十三行商控制和窄断广州对外贸易事务。一口通商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州周围番禺、顺德、南海、东莞、香山等十多个基-的种桑、养蚕、种茶、花卉、水果、甘蔗、养鱼等农副业户，以及织布、缫丝、剌绣、陶瓷、铁器等手工业户，分散的千家万户渐趋集中，纳入网络。珠江三角洲的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组成了种类繁多、五光十色的广货供应海内外市场，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了五个通商442口岸，此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对外开放口岸不断增加，到l917年，中国先后有104个对外开放口岸。特别是香港被割占后经济崛起，对广州在对外贸易业中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咸丰三年（1853）以后，广州长期垄断的中国对外贸易首席地位开始为上海所取代。尽管如此，广州仍是中国近代发展外贸业最早的港口城市。进口商品主要有鸦片、洋纱、棉布、粮食等，出口货物以丝类、桂皮、茶叶为大宗。在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以促进中国生产设备和技术近代化，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推动广州及全国社会生活的近代化等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光绪年间，广州的商业、手工业经营专业分细，发展到七十二行以上。在J一州形成恵爱街（今中山五路）和双门底（今北京路）、第十甫和上下九甫（今第十甫和上下九路）两个商业中心。民国时期，又形成了长堤西濠口第三个商业中心。特别要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唤起了广东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纷纷向省内投资，举办企业，华侨经营的进出口商行，在广东的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大型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先后于1914、1918年开业。先施公司还兼营游乐场、大酒店、工厂、保险业和信托银行，开创资本主义集团性经营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仍是国际知名的贸易城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多种物资的需要，寻找多创外汇的新途径，在广州先后举行过内贸、外贸443相结合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1956年冬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翌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举办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从此，成为定期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综合性展销结合的贸易大会（简称“广交会”），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一条主要的渠道。广交会一产生就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外贸活动场所，每年定期举行两届，从未间断。广交会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是由其特有的地缘优势所决定的。广交会不但促成了“四个大集中”（全国各类出口商品大集中，全国各对外贸易公司业务队伍大集中，全国采用的各种贸易方式和方法大集中，中国在世界上的新老贸易界朋友大集中）【37】从而使外贸事业得以开阔眼界，增进了解，而且加速了粤地工农业尤其是广州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尽管中国的外贸模式已趋向多元化，但在广州举行的每年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仍是最主要的外贸综合交易会，深圳、东莞等地也兴办起对外贸易大会。两千多年来，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地区外贸事业与城乡商业相辅相成，一直长盛不衰。二、商帮及会馆所谓“商帮”指的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组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帮中有总其事者，称为“纲首”。“客商之携货远行者，或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38】商帮的出现是在明中叶以后，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形成的商帮成为全国诸大商帮中之表现突出者。明代中叶，广府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对内商业的发展，已在全国前列，发达的内外商业贸易业，吸引了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承担商品交流的任务。雍正皇帝在雍正七年（1729）的一道愉令就提到：“粤东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国商人，携钱买货往来贸易者至多也。”【39】大批广东富商大贾于是应运而生。广东本地的社会经济在明中叶以后进一步发展，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居于全国前列，“一些府、州、县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农产商品化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40】顺徳、南海、番禺、东莞、香山、高鹤、增城等县的农业生产结构日益向商业化演变，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茶户、蚕户、葵户、果树户、蔬菜户、鸡鹅鸭户、鱼户等专业户：形成了大大小小种桑、香、茶、甘蔗、水果、蔬菜，养蚕、鱼的专业性商品生产基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造成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缩小，随之形成从广西、湖南等地贩米供给广东的大批长途贩运批发商。充足的原料和粮食，使广东的手工业生产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珠三角一带，有广州、445佛山、顺德、南海的丝织业、棉纺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佛山的冶铁业：佛山、东莞的陶瓷业：广州、东莞、新会的造船业：新会的制船业：广州的制茶业等等，都逐步成为专门化的手工业商品生产，进而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活跃。这些背景，呼唤着商帮的形成。广东商帮首先是在嘉靖年间形成的海商商帮。明初开始至清初在沿海地区实行海禁，尤其是明中叶以后葡人强租澳门，直接威胁和打击中国私人的海外贸易。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寻找扩大海外贸易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于是广东沿海的一些商人纷纷组织武装船队，采取武装贩运方式，形成以武力取得对外贸易权利的广东海商贸易集团，即海商商帮。嘉靖年间著名的海商，以活动于东莞县海上的老万山为盛。东莞县的何亚八，“纠同番船前来广东外洋及沿海乡村”走私贸易，【41】受明朝官兵的追赶，前往福建、浙江，与两地的海商联合成数千人的海上贸易集团。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以后，广东沿海地区的中小商人集资结帮造船出海贸易者，更是层出不穷。清代广州一口通商之后，广东海商商帮随着广州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而日益壮大。嘉靖中期以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42】广东的牙行商帮亦于隆庆、万历年间形成。嘉靖三十四年（l555）官府在广州设立的垄断贸易的广州、徽州、泉州13家商号，【43】至明末发展为广东36行【44】这已经不是早期单纯买卖的中介人，而是一种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446体，即牙行商帮。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则发展成为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商。鸦片战争以后，十三行被废止，有些行商随即转化为近代买办。尽管牙行商、行商和买办三者有种种差异，但可以笼统称之为牙行商帮。明中叶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和唯一的通商口岸，因而成为进口“洋货”和出口“土特产”的集散中心，佛山则成为“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外省商人纷纷将土特产贩运到广州并从广州贩运回洋货，而广东商人则成群结队地将洋货贩运到外地，并从各地贩运大批土特产回广州出口，因而形成和发展了国内长途贩运批发的商帮。为了维护商帮利益，沟通商业信息，在全国各大都会或要津纷纷建立会馆。会馆的建立，是这种商帮形成的标志。总而言之，广东商帮（简称“广帮”）是在明嘉靖中叶以后逐步形成起来的，是由海商、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所构成。广东商帮主要包括广州帮和潮州帮。广州帮商人主要是由珠江三角洲各县以及操粤语语系的其他县的商人所构成。其中番禺、南海、顺徳、新会等县的商人较多。广州帮商人人数众多，十分活跃。清嘉庆年间，广州府属13县居民，以商贾谋生者平均28%，其中南海、顺徳、新会、番禺、东莞五县，经商负贩者接近或超过农业生产者，南海高达60%。（4S）可见广州帮商人数目之多。当时还有一些长期定居于广州、佛山的外省商人，不仅在广州、佛山建立会馆，而且设有义庄、义山，供同省商人客死者棺梓暂厝或埋葬。这些长期居于广东的商人，从广义上说，也可列入广东商帮447的行列。广州帮与潮州帮最大的不同，是潮州帮多属于亦盗亦商，这是因为营生靠海的潮地，在海禁中约束最严却无以谋生，只有选择提而走险的海上武装走私的道路。而广州帮得一口通商之利，又具有地域文化、经济中心之优越条件，商帮呈现出一种亦官亦商的特色。所谓亦官亦商者，兼有官吏和商人双重身份。明清政府虽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却屡禁不止，官吏经商致富不乏其人。南海人霍韬，明正德年间进士，嘉靖年问任吏部左、右侍郎，迁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历官20年，位居上卿。他在吏部任官时，仍请族人在家乡经营炭铁、盐业生意。其子霍与瑕回忆说：“先父敏（韬谥文敏）尚书，当其为吏部时，气焰煊赫，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羡。”【46】霍韬之发财无疑是利用其在吏部地位显赫之威，但他确实在经营上也费了一番心机，竟然从京中致函遥控指导佛山族人的经营：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章之。年一人司客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容真家长，，以知功最。司客冶者犹兼治田，非谓只司窑冶而已。盖本可以兼末，事末不可度本故也。司木司铁亦然。【47】由此可知，.霍韬经营的商业包括窑、铁、木、盐业，家族中有3人为其司业。此外，在佛山的汾水头地，还经营有，ll8“9房地产生意，“做房与人赁住”。【48】清代广府，官吏经商者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在海禁期间，官吏仍违禁出海贸易。平南王尚之信就委托藩王府参将沈上达组织外贸集团，建立一支拥有l000艘商船的船队，直接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经商贸易，嫌取高额商业利润。“一次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其获大利也。”【49】清朝官吏从事盐业者更为普遍，上至两广总督石琳，下至道府州县官员幕客，或亲自出马，或委托家人或亲友充当盐商，运销食盐，嫌取盐利。道光以后，连一些小官吏也经商了。如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南海县主簿潘唐典、潘迪元、何佩猷等三人在佛山分别开办福裕堂、人和堂和万春堂三间资本雄厚的参茸药店，经营中药生意。由于经商致富的吸引力，更有一些人弃官从商、弃儒从商、弃农就商，乃至致仕经商。明清时期广府社会的多种社会阶层成分转为商人，说明当时商业已成为人向往之的社会热门职业，以至有“非经商不能昌业”、“无商不富”、“人务商贾，称为富庶”。【50】这种重商心态，是广府商人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又是广府民系中重商性的具体体现。随着广东商帮的不断向外发展及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日益繁荣，他们在聚集经商的全国各地重要的商埠建立起“行”、“会馆”、“公所”等组织。行”在唐代就出现了，当时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区域称为“市”，市内出售同类商品的商肆店铺集中在一起，称为“行”。同业商店的商人形成的同业组织也叫做“行”。到了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组织一般改称为会馆、同业公所，“行”即变成同行业商人买卖处所的代名词。光绪年问，仅佛山镇的商行就有77行之多，其中包括按押行、茶纸行、京布行、水草草席行、故衣行、洋货行等等。77商行中，有19行建立行业商人组织。这些组织的名称，有10行称为“堂”（如新钉行称“金玉堂”、染料行称“同福堂”），8行称为“会馆”（如银业行称“如意会馆”），1行称为“公所”（洋南染料行称“裕安公所”）。明清时期，广府商人投身于长途批发贩运，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雍正年间，东莞县商人以本地所产粮与香运往外省贸易，“度岭峤，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51】嘉庆年间，顺德龙山乡商人“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静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52】在各大商埠出现了广府商人建立的会馆。如道咸年间，南海县商人冼文清弃儒从商，航海至天津，“方是时，天津新辟商埠，粤商业最盛，旧有岭南会馆，乃是益拓大之，推公为馆长”【53】。广府人所创立的会馆建筑遗存，在北京有广州会馆、番禺会馆、东莞会馆、中山会馆、南海会馆；在天津有广东会馆；在扬州有岭南会馆；在南宁有粤东会馆；在百色有粤东会馆；在柳州有广东会馆、粤东会馆；在贵港有京津粤东会馆；在北流有粤东会馆；在融安有粤东会馆；在贵阳有两广会馆；在成都及四川省内有多处广东会馆；在重庆有广东会馆。在本省内的徐闻有广府会馆，南雄有广州会馆。在海外也出现这类组织。广府华人组织的会馆，一般称450为岭南会馆、广东会馆、广肇会馆，也有以一地一姓为名的，如顺德江美沙溪黄氏同乡会，实为同乡会馆的支派。马来西亚广州帮商人的业缘行业组织有北城行、鲁北行、姑苏慎敬堂、八和会馆、轩辕馆、晋福会馆、广州括猪肉行、广肇客栈行、广东藤器商公会、广帮熟食行等。海外华人会馆的兴起，固然是华侨社会形成的结果，会馆的兴建及运作，却是以华侨商人的实力为基础。这些组织初时是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的乡帮，由于商业经营的需要而形成，具有同乡团体和商业团体的两重性，不仅具有维护共同经济利益，扶助同业发展，仲载纠纷等职能，而且还要为同乡提供宴集场所，沟通乡情，团结乡亲以及办理祭祀丧葬和慈善福利事业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嘉庆六年至同治九年（l801～1870）这70年间广府人创立的地区会馆有13所，从嘉庆二十四年至宣统三年（1819～1911）这92年间成立的宗亲会馆有8所。【54】在日本，广东帮于同治十三年（1874）创荣远堂岭南会所，光绪十年（1884）改称为广东会所，是近代日本华侨最早成立的同乡社团之一。在泰国的广府人，于光绪四年（1878）在曼谷成立广肇别墅（l936年改名为泰国广肇会馆），除办理坟场、医院、学校外，还设有救济性质的保良局。在美国，地缘性组织最早出现于旧金山，最早有道光二十九年（l849）成立的四邑会馆（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道光三十年（1850）成立的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咸丰二年（1852）成立的阳和会馆（中山、东莞、增城）。后来分化形成六大会馆，于同治元年（1862）45l联合向市政当局登记注册，对外称为佛人六大公司，对内称为中华会馆。三藩市三邑总会馆（南海、番禺、顺德）成立于道光三十年（1850）。三邑华侨子弟多在大清书院（1888年创办，初名金山中西子堂）上学，毕业后回国深造。光绪三十一年（l905）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内阁侍读黄埔村人梁庆桂奉派赴美倡办华侨学堂。美国花县总会馆，前身是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花昌善堂。直至当代，仍有海外华人会馆的设立。泛马来亚番禺会馆联合会（设于新加坡番禺会馆内）成立于1953年，马来西亚霹雳花县会馆成立于1957年，甲柔番昌会馆成立于1965年。会馆在商帮对外发展及维系海外华人社会的生存及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侨居地经济的开发、社会繁荣，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融会，作出过并继续作出重大贡献。在海外设会馆，是岭南所独有，显示了岭南对外交流的频繁与海外关系的密切。自清末以后，随着商业的近代化，老式商人团体的会馆、公所、行会逐步让位于新式商人团体，如商会、同业公会等。后者与前者有一定联系，不少由前者发展而成，但也有新建立的，如一些新式商业的同业公会。在广州、香港等地，由城市商人组织的慈善团体、政治团体等，在地方事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广州地区以外是不多见的。三、十三行清代实行一口通商后，中国和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会集在广州，为了便于管理，清政府在广州委托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管理广州的对外贸易。由于十三行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业务，故而又称洋行，行商也叫洋商。行商的前身是牙商。所谓牙商，本来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收佣金的居间商人。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大大增加了，形成一种商人行业，称之为牙行。时人亦称从事牙行的商人为歹商。明代广东的牙商，分为“官牙”和“私牙”。官牙指官府及其官吏开设的牙店充当的牙商或领有官府颁给牙帖的民间牙商。明前期，官府实行朝贡贸易制度，由官府直接经营管理“贡舶”和“市舶”海外贸易。“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55】由于外国商人不能随便与中国商人接触贸易，故牙商的中间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但‘官牙制度极不健全，弊端百出，牙商成分也很复杂，为此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官牙制度，“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56】由牙行的纲首、经纪人去管理贡舶贸易甚至垄断贡舶贸易。“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57】关于“三十六行”的说法，学者认为只不过是十三家左右，“明朝广东的三十六行行商的数目，在十三家左右；在明代，它出现后之所以被称作‘三十六行’，是由于沿用了民间的习俗称谓，但因为它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只有十三家左右的行，所以到了明末时期人们干脆把它称为‘十三行’了”【58】。具有牙行性质的“十三家”，早在明嘉靖年间就出现了。至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以后，两广总督吴兴祚奏请清廷成立十三行经管对外贸易，就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了。十三行产生于粤海关设关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了加强税收管理，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来广省本地小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设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舍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59】。《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60】所以视清代广东十三行渊源于明代的“十三家”和“三十六行”。清代的广东十三行，是作为经营进出口贸易机构的总称。实际上，广东十三行并非只是十三家牙行商人，而是时有增减。最多时，乾隆十六年（1751）达到20家；最少时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仅有4家；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刚好是13家。十三行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因此，广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最初一批洋货商行，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陆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清初“番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十三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商等义务，是官府与外商交涉的中介；并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均须经由十三行买卖。初为牙行性质。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三行商人组成公行，专揽茶、丝及大宗贸易，虽有行会组织，彼此间仍有竞争。行商在对外贸易中获利虽多，但被官府勒索亦多。如从乾隆十年（1745）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人口税款。乾隆十九年（1754），政府令以后凡外舶船税、出口货税、贡银，采办官用品物，俱用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连带负责。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形成了“保商制度”。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8种物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贸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乾隆二十五年（1760）同文行潘振成等9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潘振成被推选为公行首领总商。而清政府利用公行的保商制度“以商制夷”，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独揽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如十三行中的伍氏家族怡和行经过伍家三代人的苦心经营，发了大财，成为世界历史上自公元1000～2\_年这一千年间的50巨富和中国6巨富之一，【61】主持怡和行行务并担任总商职责的伍绍荣向美国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亨特谈到伍家的财产时说，“他在稻田、房产、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2600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5200万元”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独揽中外贸易的特权被取消，渐趋没落。通过十三行一口通商的种种限制，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束缚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商与外商进行交易，客观上发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三行每年进出口总值在18世纪末达至1300万至1800万银元，到19世纪30年代则约值4000万元。这就促进了商品生产以及沿海城镇的发展。在广州直接或间接和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家近千户，另有茶商一千多家，手工业如丝织业技术达到很高水平。这些都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行商资本成为近代买办资本的胚胎。但是19世纪20年代后十三行进口的纺织品，对中国的棉纺织业有一定的打击，而后期外商走私鸦片，白银从流入变为流出，以及烟毒散布，十三行也有罪责。明清时期广府商人亦商亦儒的风气，在十三行行商身上同样有所体现，十三行行商在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上作出积极的贡献。他们将其商业资本投资于兴学育才，嘉庆十六年（1811）由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潘同文等订立议约，共同捐出位于西关下九甫绣衣坊12间公产房屋创办文澜书院，其中择3间为书院用房，一间为修濠公所用房，其余8间作为商铺出租，以所得租银作为书院费用。文澜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获得秀才以上功名的有268人，其中进士有29人。部分行商热心于刻印典籍，十三行商的潘、卢、伍、叶四巨室中，“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伍崇曜以收藏的古籍珍本、抄本为底本，专聘著名学者谭莹校辑，刊出四种丛书，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粤雅堂丛书》。《粤雅堂丛书》的刻制时间从道光三十年至光绪元年（1850-1875），历20余年，是一部校刻精赅、搜罗繁富的大型丛书，丛书包括从唐代至清代180种图书。其所辑多属广东地方文献及当时之不传本，为古籍的保存、流传作出了贡献。《广州府志》称：“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崇曜思刊刻书籍，以惠士林，乃延同邑谭莹与编订。首刊《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集》各种楚庭旧诗七十二卷，粤东文献略备，乃广搜秘本刻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此外零珠碎璧，集腋成裘，共成《粤雅堂丛书》二百余种……崇曜所刻，多世不传本，与同时番禺运使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并为艺林所重，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63】从上述可知，所刻印之书，在科场应试所需之外，对于倡导经世致用的文风，起了直接支持的作用。对于广州地区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伍崇曜文化素养基础甚高，喜好文学和艺术，擅画梅花，著有《茶村诗话》、《粤雅堂诗钞》，又喜赞助学者文人，在河南建有万松园园林，时常邀请诗人画家聚会其间。行商的居宅园林不但有传统的风格，而且也吸收了西方建筑装饰的成分，他们在广州所建的园林式宅园，大大充实了广府建筑文化的内容。对于广府文化的贡献，除了行商还有其他的商家，清代道咸年间广东著名盐商潘仕成曾独资捐银13500两，修葺广东贡院，新建试舍565间，院内浚井修渠排潦去秽。并大力资助将年久崩塌的学署文场维修一新。还将原在京城宣武门外自置旧宅捐为粤东邑馆（今存宣武区南横街11号），以供本邑学子上京应试或乡绅公车憩息之所。他在邑人中倡集捐银，用以修葺会馆，余银生息为日后修理会馆之用。潘仕成在泮塘辟地数百亩建“海山仙馆”园宅，园内所藏古帖及时人手迹，分类为摹古、藏真、遗芬，游廊曲榭沿壁石刻达千余石。海山仙馆内收藏的金石、帖、碑帖、古籍、古画甚丰，有“粤东第一”之称。海山仙馆自然地融入传统文化的意趣，成为岭南名园。此处成为潘氏接交显贵名士的场所，甚至成为一处重要的接待外宾的涉外场所。外国使节与清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潘仕成主持刊刻出版了《海山仙馆丛书》，丛书刻于道光二十六年0846），计56种485卷。丛书除收入经史笔记著作之外，“收入其术数、医药、调燮、种植、方外诸家者流，亦有可观不妨兼采。惟游戏无益之作，文虽精妙，多从割爱”。“诗集美不胜收仅存一格，讲武之书为当务之急，四夷记录亦足广见闻，固不嫌于人弃我取”。【64】故而丛书中还收入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勾股义》等，也有传教士编的《外国地理备考》。讲究实学，博采中外，是这套丛书鲜明的特色，也是其可贵与出色之处，体现了岭南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潮流。潘氏还汇编刊刻了《海山仙馆丛帖》68卷及楔序2卷，计《藏真初刻》至《四刻》52卷、《摹古》12卷、《尺素遗芬》4卷等，共70多册。《海山仙馆丛书》与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同样请名家谭莹校订，雕板极精，校核严谨，以善本著称，把广东的学术和出版事业推向新的水平。广府商人对西方近代科学的传播也有贡献。嘉庆年间，在澳门经商的南海县商人邱熺、谭国等在中国推广牛痘接种医术，此举得到“洋行好善诸公”相助。【65】所谓“洋行好善诸公”指的就是怡和行商伍敦元、同文行商潘有度、广利行商卢观恒以及会隆行商郑崇谦。伍、潘、卢三人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让邱、谭二人传种牛痘，救活无数婴孩。郑崇谦在行商公所开设诊所，施种牛痘，并抄录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支行的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撰写的《咭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并为之作序。大盐商潘仕成在道光八年（1828）到了北京，在宣武门外上斜街南海邑会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主办种牛痘，又邀请北京医生参观，北京医生争相到馆学习，种牛痘防天花术从此传播于中国各地。道光十四年（1834）美国传教医师伯驾到了广州，得到十三行怡和行等支持，在新豆栏丰泰行3号租借一幢商人房间开设眼科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四、广府买办所谓买办，指的是外商初入中国通商时，所雇用的采买人或管事人，后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洋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广州是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的地区。19世纪初，来粤贸易的外商增多起来。这些外商无论是贸易事务还是日常生活上的照应，都不是公行所能办得了，于是广州官府就给这些外商配备一些华人为他们服务，此即买办。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出现了买办，但那时他们还属于中国公行的雇员，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基本受官府控制和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止，外商自由贸易，可以自行雇用中国人充任买办。这时的买办不受清廷任何约束，完全受外商支配，为外商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及后，买办的队伍日益扩大，有掮客商人加入，外国商行直接培训和提升仆役人员，使买办与外商之间的雇佣关系发展为一种以契约为联系的买办制度，中国政府更无权过问。初时的买办有商馆买办和商船买办两种。商馆中的买办，是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他由行商作保，担保他的品行和能力，即要诚实能干。所有受雇于商馆的其他中国人，无论是他自己的账房，或者仆役、厨子、苦力，都是买办的‘自己人’，他们都拥护他，而他则担保他们品行良好、忠诚老实。这又是广州的侨民生活安全、秩序良好的原因之一。买办又管理这商馆的内部经济，以及行外店铺主、工匠和商馆所雇用的买卖人。他在助手的协助下，管理商馆及其成员的私人账目，他采办伙食，并伺候‘大班’及会计”。买办管理商馆的现款数目很大，“往往超过100万元，很少在15万或20万以下”。【66】商船买办亦称船上买办。按照广州官府的规定，外国商船必须先到澳门靠岸，船主在那里从左堂衙门请得一个引水，还聘任通事和买办，然后开往广州。通事为其向粤海关办理纳税和进口手续；买办则供应船上人员的伙食、代雇码头搬运工人、代购日常必须物品。同治末年以后，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急速增长，买办的职能范围也从媒介、经纪、代理等一般性职能扩大到经销与承购、包购与包销，买办本身也由此具双重身份：不仅是洋行雇来媒介生意的雇员，而且是对洋行做生意的独立商人。买办要向洋行承担全部购销的职责，洋行则承诺不轻易把购销任务许给他人的义务。二者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相辅相成而关系更趋密切。与此同时，随着买办职能的扩大，更多的华商进入买办的控制范围。大批华商从资金、货源、货运等几个方面纳入了买办的业务范围之内，更多华商也日趋买办化，买办资本扩大了。随着买办商人势力的扩大，外国商人的商品贸易范围扩大了。本来外商贸易一般都由香港到上海开设分号，直接或间接向洋行批发洽购，越来越多的内地商人卷入了外商贸易的漩涡，一个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买办购销网也形成了。与澳门、香港接壤的珠三角是最先接触外商的地区，因而也出现了一批早期的作为采买人或管事人的买办。同治末期，又有一批珠三角地区的广府人流动到当时的商业中心上海、香港，成为最早转型的独立身份的经理，拥有独立经营的商业和银钱业的资本；也有一部分依仗其从事买办职业过程中学到的现代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洋务运动中发展官办企业的骨干力量；还有一部分与民族商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广州的以经营批发业务为主的民族商业资本，有着较强的买办性，有的就是买办转为民族资本。到19世纪末全国已有买办100万人以上，买办商业资本共达白银4亿至4.9亿两。【67】买办遍及全国，形成了买办阶级，而籍贯广府的买办占了很大比例。这是因为，外商认为，广州原有的“行商对于市场将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利用“广州的行商在这种新制度下从事贸易比较一些小商人有利得多，他们的地位、影响和品格，将促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主要商品的市场”。【68】所以，在上海等口岸开放通商之时，广州的外商都带着广东籍买办和仆役前往开设分支机构。任职于美商琼记洋行（19世纪50～60年代开设于广州、香港、上海、福州、九江、汉口、日本横滨、越南西贡）、旗记洋行（19世纪30～70年代开设于广州、上海、天津、镇江、九江、汉口）、怡和洋行（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10年开设于上海、香港、福州、汉口、天津、厦门、汕头、）、宝顺洋行（19世纪30～60年代开设于广州、上海、香港、天津、烟台、镇江、芜湖、九江、汉口）这四家洋行的买办有93人，其中广东籍的有70人、天津籍4人、江苏籍4人、福建籍1人、宁波籍1人、浙江籍1人、上海籍1人，不明籍贯1人。【69】在各地任职的广东籍买办占了绝大多数，而广东籍买办基本上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买办商业资本的来源，是买办代替外商办理鸦片、丝、茶、洋布贸易和经营洋行的其他业务中，取得的残羹余润，虽然只从中赚取“二分”佣金，但“顷刻千金，易手可致”【70】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出现了许许多多大丝商、大茶商、大鸦片商、大洋货商。这些大商人大多是洋行的买办，他们成了中国社会的暴发户。买办的阶级地位及其在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作用，其实是十分复杂的。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是为外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替外商首先在各通商口岸附近建立起买办性的商业网，外商利用和依靠买办和买办商人作为在华商业上的代理人，深入内地城乡从事商业高利贷活动。然而，一旦买办解除他们和外商主雇关系的合同，就不再负有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义务。而在中国，买办阶级又是最早接触到西方经济、文化的社会成员之一，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思想认识，在经历不同时期也发生着变化。在历史上，有一些买办在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在解除买办职务以后，自行投资兴办企业，这就是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尽管他们的企业可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企业还保持着某种联系，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属于民族商业利益，从性质上说，就不能再称之为买办资产阶级了。曾经担任过买办的一些人中，后来有利用其所学到的西方近代金融、工业、科学、管理知识，在发展洋务运动及民族工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有通过与西方文化接触中开眼看世界，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抱负，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的先驱者的。因此，从事买办职业也是岭南特别是广府地区得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途径。清代香山唐家湾（属今珠海）人唐廷枢，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与容闳同学，同治二年（1863）任英国怡和洋行总买办。怡和洋行是最早在中国兴办的外国企业，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通过怡和洋行把持长江一带的航运和出口贸易。唐廷枢任总买办之后，对洋行业务拓展、财富膨胀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他善于为洋行捕捉每一个能够赚钱的机会，自己也从中分利。在他担任怡和洋行买办的10年中，除了为怡和经营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扩大上海以外通商口岸的洋行业务之外，还为洋行投资当铺，经营地产、米、盐、糖、采矿等行业。他担任过专门贩卖鸦片的洋药局董事，秘密地为怡和洋行提供海上鸦片黑市行情，参与非法的鸦片走私活动。他为洋行开辟了由上海至天津、厦门、福州、马尼拉等地的海运新航线，使洋行赚取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地扩大其私人的买办资本。他分别投资了典当、钱庄、丝茶贸易、棉业、漕米运输、保险业和船舶运输业，与同乡徐润建立起类似事务所的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同业公所。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他开始附股在华外国企业。其后，他与担任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摆脱了买办身份，分别担任了洋务运动的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此前，招商局招徕资本进展甚微，资本不足20万两，唐、徐接手后，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局面为之一新。唐廷枢重新厘定局规，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显示了与洋人分庭抗礼的决心。内部则仿西法经营，成为清朝第一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其后，他又主持筹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机器采矿企业开平矿务局（今开滦矿务局），倡议和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营铁路开平铁路。唐廷枢一生中自营、合营、入股或受别人和清政府委托兴办的企业有47家，其中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的就有6家。如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家水泥厂。而他与兄弟一起用广东方言编写了一套《英译集成》，被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在创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上，唐廷枢功不可没。与唐廷枢经历相似的徐润，由买办出身，转而成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会办，在经营实业的同时，还热心于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创办了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作担保，创办同文书局，影印出版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及出版了大量西学图书。曾担任宝顺洋行买办的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具有一定资本之后，先是投资英人创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其后又接办了和生祥茶栈，开办了荣泰驳船公司，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参与创办了太古洋行轮船公司，被聘为公司总理，在牛庄、汕头、上海等地开设有代客办货的商号及钱庄，成为一个洋行买办兼经营旧式金融、贸易业的商人。光绪八年（1882），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合同期满时，他拒绝公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至亏耗颇巨的轮船招商局任职，结束了20多年的买办生涯，开始探索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之路。他参与了盛宣怀控制的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电报局等大企业的经营筹划，并担任总办，还担任江西萍乡、安徽宣城煤矿等企业的总董，成为中国企业界颇有名气的民族资本家。郑观应对国家命运十分关心，其“救世”思想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撰写《救时揭要》一书，以后不断修订，于同治十三年（1874）辑成《易言》一书刊印。光绪十八年（1892）编著成《盛世危言》，二十六年（1900）第三次修订刊印。全面阐发了富强救国的思想，着重于大力发展经济，“商战为本，兵战为末”，倡言发展教育。《盛世危言》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中国人提供了富国强兵蓝图，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近代思想启蒙中有着重大的影响。注释：〔1〕《汉书》卷二十八（下）。〔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3〕吕思勉：《吕思勉读书札记·秦营南方上》第61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4〕《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传》。〔5〕韩槐准：《龙脑香考》，载《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6〕陈泽泓：《我国访问东南亚地区的最早专使——东吴朱应、康泰出使南洋事迹考略》，载《羊城今古》2000年第四期。〔7〕殷巨：《奇布赋》，《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帛部·布》第1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法显：《佛国记》。〔9〕《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传》。〔10〕《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11〕《南史》卷五十一《吴平侯景传附子劢传》。〔12〕《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13〕《隋书》卷三十一《南蛮传》。〔14〕（唐）杜佑：《通典》卷一七七《州郡·河南府河阴县》。〔15〕（唐）王虔体：《进岭南王馆市面上舶使院图表》，《全唐文》卷515。〔16〕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全唐文》卷827。〔17〕高彦休：《唐阙史》卷下。〔18〕陈柏坚、黄史臣编著：《广州外贸史（上）》第107、109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19〕《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20〕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诸蕃国附》。〔21〕汪前进：《〈岛夷志略〉导言》，《岛夷志略》第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2〕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23〕《元史》卷191《卜天璋传》。〔24〕《明史》卷81《食货五》。〔25〕严如煜：《海防辑要》卷15。〔26〕康熙《香山县志》卷一《舆地》。〔27〕《明经世文编》卷40《晏斯盛请设商社疏》。〔2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宫语》。〔29〕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州事宜》。〔3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31〕李鼎：《李长卿集》卷19。〔32〕嘉靖《广东通志》卷20。〔33〕李士桢：《议覆粤东增豁税饷疏》，《抚粤政略》卷10。〔34〕《军机处上谕档》，《清宮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第107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35〕吴建雍：《1757年以后的广东十三行》，《清史研究集》第三辑，转引自邓端本、章深：《广州外贸史（上）》第27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第311—31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37〕《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第2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8〕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第228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39〕乾隆《广州府志》卷首。〔40〕李华：《明清时代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载《清史研究集》第3辑第149页。〔41〕严如煜：《洋防辑要》卷15。〔42〕《霍与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皇明经世文编》卷368。〔43〕［法］裴化行著，肖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33页，转引自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214页，黄山书社1993年版。〔44〕周玄暐：《泾林续记》，《涵芬楼秘笈》第8集，第47页。〔45〕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第27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6〕霍与瑕：《寿官石屏梁公偕配安夫人何氏墓碑铭》，《霍勉斋集》卷22。〔47〕霍韬：《霍渭崖家训》，《货殖第三》。〔48〕霍韬：《家书·与郭冢山书》，《霍文敏公全集》卷七下。〔49〕李士桢：《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抚粤政略》卷一。〔50〕龙廷槐：《初与邱滋畲书》，《敬学轩文集》卷二。〔51〕宣统《东莞县志》卷九《风俗》。〔52〕嘉庆《龙山乡志》卷四《风俗》。〔53〕《鹤园冼氏家谱》卷六《十九世贯亭公传》。〔54〕《中国会馆志》第237～244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5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56〕严如煜：《洋防辑要》卷15。〔57〕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吴仁安：《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59〕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抚粤政略》卷6，《文告》第55页〔60〕《粤海关志》卷25《行商》。〔61〕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第276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62〕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18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63〕光绪《广州府志》卷129《列传十八》。〔64〕潘仕成：《海山仙馆从书·序》。〔65〕邱熺：《引痘略·自序》，嘉庆丁丑本敬业堂初刊本，道光百兰堂复刻本。〔66〕［美］威廉·C.亨特著，冯铁树译：《广州番鬼录》第39～4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7〕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十一日《申报》。〔68〕莫里逊：《中国商业指南》（广州，1848年），第197～198页。转引自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第10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69〕资料来源：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转引自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第106～1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70〕王韬：《瀛杂志》。第二十章手工艺一、广瓷岭南地区是我国最早发现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是中国陶瓷文化最早发源地之一。陶器的发明使用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已知岭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9630年±180年的桂林甑皮岩遗址，在此处遗址发现有早期陶器遗存。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咸头岭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中期沙丘遗址中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年代距今约7000年。岀土有大量陶器，陶器属灰陶系，夹砂陶占96%以上。泥质陶很少，分白陶和灰陶两种，制作均非常精细。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划纹、水波纹、纺织纹、几何压印纹等。其中釜、罐的口沿全部为侈口，表现出较原始的特征怕【1】在广东越来越多地发现史前彩陶遗址，特别是环珠江口区分布甚密，到2004年为止发现有沙丘遗址15处（深圳咸头岭、大黄沙、小梅沙、大梅沙，珠海后沙湾、下栅，中山龙穴、白水井，香港大湾、舂坎湾、蟹地湾、深湾、铜鼓洲、涌浪，澳门黑沙湾）；贝丘遗址10处（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及蠑岗，肇庆蚬壳洲，南海西樵山螺岗、鱿鱼岗、灶岗、通心岗、“NKG”地点，佛山河宕）。【2】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佛山石湾河宕遗址，出土大批夹砂陶、软陶和硬陶印纹陶片，纹饰有绳纹、曲折纹、方格纹、云雷曲折组合纹、编绳纹、叶脉纹、复线方格凸点纹、-形格纹等。其中的云雷纹比商周铜器的云雷纹还早1000多年。可见早在5000年前，石湾一带曾居住过制陶业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部落。【3】而在广州的飞鹅岭山岗遗址，同样出土夹砂粗陶和泥质印纹陶。【4】从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可初步看出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有一个明显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岭南新石器时期晚期遗址多处发现硬陶，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春秋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陶系和龙山文化黑陶陶系的独具岭南特色的一个陶系。就广东地区看，几何印纹陶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最早出现的是曲折纹陶，曲江马坝石峡遗址下文化层为代表，属新石器晚期；第二阶段是夔纹陶，深圳的小梅沙遗址是代表之一，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第三阶段是米字阶段，以增城西瓜岭为代表，相当于战国；第四阶段是以方格纹带几何戳印为特征的印纹陶，以西汉初南越国为代表。南越墓葬和遗址中，出土器物以陶器为最大宗，所有的墓葬都发现有陶器，数量以万计。南越陶器包括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各个方面，还有专门为殉葬用的明器，以及专门为建筑而烧造的砖瓦等。在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出土的印花大方砖，边长67厘米，厚10厘米；还有大型陶板瓦、筒瓦，【5】显示了西汉初广州地区制陶工艺的发展水平。南越国时期的制陶业，既继承了本地区前代几何形印纹陶的传统，又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制陶技术和工艺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隋唐时期，在北方出现了白瓷，打破了青釉瓷的一统天下，有“南青北白”之说，但唐代广州烧制的白瓷已名闻京都。唐高宗时，李勣奉旨修撰的《本草》玉石部卷五载：“白瓷屑，平无毒。广州良，余皆不及。”广州北较场唐墓出土的两个白瓷碗，色泽如新，【6】1972年增城唐墓也出土有白瓷碗，证明广州唐代有白瓷窑。佛山市高明区灵龟园内的两座唐代龙窑，出土有成千件以青釉为主的陶器，此处窑址至少有上千年历史，是广东最老的龙窑。南汉广府青瓷有可观的发展。1954年在广州东北郊石马村发现南汉昭陵，出土陶瓷近200件和大量的陶瓷碎片。其中有青瓷罐28件，有夹耳、四耳、六耳，尤以六耳盖罐数量最多。器物造型端庄优美，器内外施青绿色釉，匀净莹亮，有极细的冰裂纹片，胎质坚细，堪称五代南方青瓷的代表。【7】在番禺小谷围村北亭村青岗的南汉德陵墓道南端接封门外侧砖砌器物箱内，置有190件瓷罐、82件釉瓷罐。瓷罐有天青、淡黄等，有的釉质保存完好，烧结度高，有的见冰裂。从昭陵出土的青瓷同样显示了南汉的青瓷烧制水平。【8】考古发现的南汉窑址还有广州皇帝岗窑和南海官窑等。南海官窑窑址在南海官窑镇附近的文头岭。南海官窑所烧的划黑花青釉瓷十分精美，并打破瓷器不彩绘的传统，大批量生产彩绘瓷，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还曾发现南海官窑制作的彩绘瓷盒【9】宋代是岭南陶瓷发展的高峰，广府地区的瓷窑主要分布在佛山、南海、广州、从化、番禺、新会、中山、东莞等地，几乎遍及珠江三角洲各县。仅佛山石湾发现的北宋斜坡龙窑就有20多条。陶瓷总量十分可观，除了满足本地区广泛需要外，还大批量地远销海外。广州西村窑遗址，位于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南北长1公里多，残存废瓷堆积3处，其中以皇帝岗最大，堆积计有6069立方米。在堆积东南角发现一座龙窑残址，残存就有36.8米，窑身中部最宽4米。西村窑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以前者为主，后者属青白瓷和影青瓷。器形有日常生活用器29种及杂器、玩具14种。产品的橄榄青釉印团菊和缠枝菊纹器物是仿耀州窑器制成，还有周边刻花，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的青白釉大盆，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11】西村窑是我国北宋年间重要的外销瓷产地，产品在我国西沙群岛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在菲律宾、印尼等地也有不少传世。南海石湾窑和石湾附近的奇石窑是宋代岭南另一个生产美术陶瓷的窑口。当时的潮州窑偏重于瓷器，而石湾窑偏重于陶器。现存石湾宋代美术陶作品有兽头陶塑和陶琴。兽头陶塑是将平底罐坯胎倒复过来，因材施艺，随手捏塑而成，不拘细节，着重夸张刻划动物的富有特征的脸部表情。如两眼圆睁，高鼻张口，额布明珠，口角露出獠牙等，【12】表现出石湾艺人大胆创新的精神，从这件陶塑可见到后来名扬天下的“石湾公仔”艺术的端倪。奇石窑生产的彩绘人物陶瓶，也是一种美术瓷作品。南海官窑镇出土的堆塑陶坛，陶坛器肩上堆塑有两排人物，其中吹竖笛的道士5人、演奏的僧人26人，再现了宋代寺院宗教音乐活动的盛大场面。东莞篁村镇出土的陶坛，雕塑繁丽，器盖为葫芦形宝塔，器肩有立凤和12位乐舞人，三人一组，各组中一人双手击钹，两人挥袖起舞。【13】宋代广府美术陶瓷，在岭南美术史上有着辉煌的一页。明代，岭南陶瓷进入繁盛时期。工艺有重大进步，仿烧南北名窑名瓷成了岭南陶瓷生产的一个重要种类。以佛山石湾窑为代表。石湾自元代出现窑变釉之后，制陶艺人进一步融合南北陶瓷技艺，充分利用佛山所拥有的丰富釉料资源，例如玉石粉、铜粉等，制成多种多样的釉药，仿烧各名窑名瓷的釉色。从明至清，石湾有仿钧窑、官窑、定窑、汝窑、哥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的种种瓷器，不只是追求相似，更注重仿中有创，仿出特色。各种仿烧中，以蓝色仿钧窑尤为出色，被称为“蓝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翠毛釉”，因蓝中有葱白雨点，有如翠毛而得名。石湾仿钧器的胎骨是陶，故又称“陶钧”、“泥钧”，因陶泥必须掺砂，也称“砂钧”。石湾是“广窑”的代表，故而又叫“广钧”。广东省博物馆现存石湾窑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张春林烧制的绿釉梅瓶，天启四年（1624）苏可松烧制的蓝钧三足炉，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石湾窑在明中叶以后兴旺发展，在生产美术陶瓷的同时，还大量生产较为粗糙的日用陶瓷，包括炊煮器、饮食器、容储器、灯盏、烛台、文房用具、各种手工业生产用器、丧葬用器以及建筑用材等等。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陶瓷生产出现专业化分工，产生了行会组织。明天启《石湾陶业考》称“初分八行”。明隆庆开放海禁之后，石湾陶瓷大量出口，“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14】石湾的南风古灶、高灶陶窑，始创于明正德年间。古灶窑内平面呈船底形，长34.4米；高灶窑长32.16米。400多年来窑体经多次修补，结构基本保持旧貌，至今仍在继续使用，产品胎厚质重，釉厚而光润，具有窑变和釉变的艺术效果。此窑2001年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广府窑场，以石湾窑生产规模最大，在康熙、乾隆年间进入鼎盛阶段。陶瓷产品有日用陶瓷、美术陶瓷、园林陶瓷、迷信与丧葬用陶瓷、手工业陶瓷等五大类，1000多个品种。乾隆时石湾陶瓷业分为23行，单是“花盆行”（专制花盆、花瓶及庙宇瓦脊等）的产品就有300余种。石湾陶业全盛时期共有陶窑107座，容纳工人6万余人。光绪年间的《南海乡土志》记载，石湾“每年出口值银一百余万元，行销西、北江、钦廉一带及外洋各埠”。民国以后，石湾逐步衰落。改革开放以后，石湾陶瓷进入复兴后新的发展阶段，生产经营建筑、卫生、美术、日用、工业、园林和特种陶瓷等七大类6000多个花色品种，畅销国内各省并出口到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与提炼，形成独树一帜的石湾民间陶瓷艺术。石湾陶瓷艺术的雕塑造型方法，有贴塑、捏塑、捺塑和刀塑等。此外，用特制工具在动物陶塑身上拉出细微的毛发，谓之“胎毛”，是石湾特创的一种技法。艺术陶瓷品类主要有人物、动物、山公盆景、像生器形、仿古和仿名窑器形、园林装饰等。石湾陶瓷在巧美与实用的结合上很有特色，石湾的人物类陶瓷个头都比较小，能于掌上赏玩或置于桌上观赏，故称“石湾公仔”。人物中有现实生活中的渔人、樵夫等各色人物，有神话传说中的济公、达摩、钟馗等神佛，也有关公、苏轼等历史人物。作品注重表现艺术对象的神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器形与釉彩的配合上，巧妙地利用黄赭色的陶土不上釉表现人的肌肤颜色，与衣饰浓烈厚重的釉色形成鲜明对比。晚明时期，石湾陶瓷名家不少，较有成就的店号有祖唐居、陈粤彩，名家有杨名、杨升、陈文成、苏可松。清代更是人才济济，较著名的店号有两来正记、文如璧、大昌，名家有黄炳、黄古珍、陈祖、冯秩来、陈渭岩、刘佐朝和潘玉书等。佛山祖庙正殿瓦脊，是文如璧塑于光绪元年（1875），高1.6米，长31.6米，瓦脊每面塑有人物、动物155个。石湾的园林建筑陶瓷品种丰富，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庙堂建筑的重要材料来源。今广州陈家祠、东莞埔心村康王庙、佛山祖庙、南海西樵山云泉仙馆、三水胥江祖庙等，均可见到昔日石湾名师手艺。生于晚清的潘玉书，先学师于黄炳、陈渭岩，既而随陈渭岩和高剑父至景德镇考察，吸取佛山同外地陶瓷雕塑艺术，又学习借鉴西洋雕塑和绘画技法，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石湾陶艺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潘玉书的代表作有《贵妃醉酒》、《踏雪寻梅》、《嫦娥奔月》等。当代石湾陶瓷涌现出刘传、庄稼等一大批颇有造诣的艺人，创作甚丰，佳作累累。20世纪末，广州的陶瓷雕塑家万兆泉从业余爱好入门，将创作目光转向广州的西关市井风情，题材皆来自民间日常生活，其中有不少是逝去的日常场景，还有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生活镜头，诸如“箍盆”、“鸡公榄”、“倒泻箩蟹”、“人算不如天算”等。首批近百件作品取得轰动效应，部分作品被扩大铸铜摆置在广州雕塑公园及下九路商业步行街上。这些陶塑作品具有艺术生命，就在于其深深扎根于广府文化的生活土壤，显而易见地体现出广府文化的地域特色。二、广彩广州织金彩瓷，又称广彩、河南彩，是广州特有的釉上彩瓷工艺品。以构图细密，大面积采用传统的织锦图案，色彩富丽堂皇而著称。明代，以红、黄、绿三色绘制碗、碟、壶、杯等日用瓷器的广州三彩，俗称“饭货”，饭货是民间日用品，彩绘豪放，色调简单，富有民间装饰风味。三彩至清代发展为五彩。康熙年间，珐琅技术从国外传入，广州工匠创造了铜胎珐琅和瓷质珐琅，称为“洋瓷”、“洋彩”，这是广彩的萌芽。据行内流传的说法，雍正年间，江西人杨快、曹钧到广州候补官员，一直无缺可补，为维持生计，只好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计，在瓷器上绘画烧制出售，逐渐吸引外国商人纷纷订货，供不应求。于是购进景德镇的白胎瓷器，在广州河南设立作坊，仿西洋画法彩绘，烧制产品，这就是广彩的雏形。行内以农历八月初四为师傅诞，祭祀此两位广彩先贤。18世纪以后，西洋珐琅彩在广州逐渐盛行，珐琅彩颜料及其技艺被大量应用于白胎瓷器上，创造出广彩工艺品，渐而成行，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立广彩行会灵思堂，后又成立坊主组织承彩堂。由于广彩的生产地主要在河南一带，故又有“河南彩”之称。广彩融合了中西画法，笔工精湛，品种有贡品和来样加彩的瓶碟类客货。嘉庆、道光年间，广彩进一步发展，色彩原有麻、红、金、蓝，又增加了紫、淡青、牙白、双黄等，形成了颜色以薄、艳、亮见长的特色。并把锦缎纹用于彩瓷装饰，称为“织地”，后来发展为用乳金填地创出的“织金地”，形成了广彩独特的地方特色。广彩依托十三行出口，逐渐接受批量定货，所绘较多为中世纪的城堡、教堂、花园风景等。清末民初，广彩已形成织金重彩、金碧辉煌的风格，生产经营方式也较定型。广彩颜料达到20多种，彩绘的工艺工序有创作设计、描线、填色、织金填绿、封边斗彩、烧制等。广彩产品主要有陈列艺术瓷、日用欣赏瓷、工艺瓷三大类，产品远销欧、美、远东和东南亚。经营广彩最大的瓷庄叫德隆兴，西关地区有五常、胜玉、义顺隆等大庄家。由于广彩专供出口，在国外的大型博物馆大都有所收藏，一段时间甚至被当成中国瓷器的代表。清末，岭南著名画家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等曾在广州河南宝贤大街开设绘画和彩瓷工作室，合股建立瓷画厂，以国画笔法绘制彩瓷器。赵少昂也绘过彩瓷盘。使广彩得以在彩绘技术、颜料使用和烤花方面不断创新。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有由潘达微画竹、高剑父绘雀、陈树人作月的广彩《冷月栖篁盘》。高剑父的门生刘群兴创作的《十二王击球》瓷箭筒，在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奖。广彩名家辈出，有擅长大型花瓶上绘花卉作品的关精、何炳祥，首创“花果万字边斗鸡”花式的谢申，擅绘人物的陈卓，擅于画龙的植登等。当代著名广彩艺人，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国垣，擅于人物，画工精细传神，用色典雅和谐。还有省级工艺大师司徒宁、许恩福。广彩历来以手工作坊式生产，20世纪初才出现彩瓷厂。民国后期，广彩因社会动荡不安，一直不景气。20世纪70年代以后，广彩生产一度出现兴旺景象。80年代以后，获奖产品和珍品层出不穷。1984年，由余培创作的博古凸件宝字瓶，售出广彩有史以来的最高价2.1万元，在当时被视为“天价”。获得轻工部一级奖的黑地百花15头白兰茶具以及花篮瓶大观园、罗汉瓶百鸟争春，为省博物馆收藏。广州织金工艺厂最为辉煌时，有1200多名职工，年创汇100多万美元。然而，20世纪末，广彩逐渐衰落。广州织金工艺厂从1992年起开始亏损，现只剩下几十个职工，退休人员人数为在职人数3倍，靠出租工厂厂房度日。【15】广彩衰落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工艺上不能创新，行内的恶性竞争，手艺后继无人。同时，主要原材料之一的黄金水涨价快，近年因陶瓷颜料含铅量高，被欧美市场禁止产品进口，工厂无力研发新颜料。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广彩艺人还在努力坚守着广彩最后的阵地，尝试产品的艺术创新。2004年春交会上，已经缺席三年的广彩重返广交会。越来越稀有的广彩大师的作品在古玩市场上也呈升值之态势。三、广绣粤绣与苏绣、蜀绣、湘绣并称我国四大名绣。粤绣的两大类型包括广绣与潮州的潮绣。广绣则是广州及佛山地区民间刺绣工艺的统称，其特色是构图饱满、繁而不乱，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金银垫绣立体感强、富丽堂皇；绣制平整光滑，手感柔软；且品种繁多，应用范围较广。广绣题材广泛，其中以百鸟朝凤、龙凤、博古纹最具传统特色。一般绣品有画片、挂裙、被面、枕套、床楣、靠垫、披巾、头巾和绣服、绣鞋、绣袋、戏装、帐衽、台帷等。主要针法有直扭针、捆咬针、续插针、辅助针、索纱针等7大类70多种。广绣历史悠久。唐人苏颚的《杜阳襍编》记载：“唐永贞元年（805），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时年十四，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足见其技之精巧。宋代，刺绣品在日常已广为应用，工艺受到绘画艺术影响，日臻成熟。明代中后期，广绣形成了独特风格。“明代的刺绣分南绣、北绣两种。南绣实用性强，用披草绣，效果平、薄、细、真，色彩细润，采用套节绣，以顾绣为代表。”【16】南绣包括了苏绣、湘绣和广绣等。由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少外国商人到广州经商，釆购大批广绣产品回国。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受到国王厚赏。嘉靖三十五年（1556），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广州逗留期间，看到了彩色丝线的绣花鞋等手工艺品，称赞是“绝妙的艺术品”。广州的艺人不仅能娴熟地运用绒线绣，而且创作岀用孔雀毛、马尾作线缕和勒线，还用金线、银线刺绣。在广州东山明戴缙夫妇墓出土有用金线绣的麒麟补子、花裙及凤凰形绢巾，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广绣博古围屏8幅、官服1件，广州美术学院今存孔雀翎毛绣制的横幅，这些绣品的金翠历久未黯。清初，广绣更广泛地应用于室内装饰和日用衣饰上。英国商人把剪裁好的服饰图样拿到广州绣坊加工刺绣，图样色彩丰富，带有西洋画法的透视和光暗原理，广州的绣工相应增加了绣线种类，甚至用上头发，丰富了绣品的表现力，同时也受到西方画风的影响。康熙二十三年（1684）撤销海禁后，广绣逐步向商品生产发展，出口在清中叶进入全盛期。这一时期的一些广绣作品，用色比苏绣浓艳，布局章法饶具油画风味。粤剧形成后，广绣增加戏服一行，当时状元坊制作的“伶装”，在国内享有盛誉，连清宫戏班也到状元坊订制戏服。乾隆年间，广州成立第一个刺绣行会——锦绣行，会名绮兰堂。行会由各大绣庄轮流担任执事，其宗旨是遏制外来绣品的渗入及协调各绣坊的矛盾。每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为行会的“师傅诞”，祭祀刺绣祖师爷张骞，会友齐集，聚餐庆祝。只有男工才能入行，行会最盛时有绣工3000多人，至清末民初仍有会员1000多人。广绣店坊约50家，多在状元坊、新胜街、下九路一带。广州邻近的南海、顺德、番禺等县广大农村乡镇，从事绣花业的妇女数以十万计，形成各自的刺绣技艺及产品取向。嘉庆、道光年间，刺绣行业依然兴旺，并出现了生产经营刺绣的洋行绣庄（绣铺）、作坊，绣品源源输向欧洲各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省工艺局聘请岭南画家高剑父担任缤华艺术学校校长，校内设绘画、刺绣、雕刻等习艺班。高氏夫入宋铭黄亲自在刺绣班任教，并开设缤华绣品陈列馆陈列刺绣精品。陈列品中有一幅孔子立像，使用吐针、乱针法，以最纤细的丝线绣成，绣工精致，不见针眼。清末民初，广绣行内开始出现专业分工：上手工男工，专绣重要部位；下手工女工，专绣衬地及其他一些部位。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的刻苦钻研，加上画家的直接参与，广绣的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技艺精湛，针法独特，构图大胆、配彩鲜丽见长的名师名艺人。广绣名师余德（1880～1970），以绣牡丹见长，又始创绣金鸡、牡丹及孔雀大挂画，被誉为“绣花王”。其绣品《孔雀牡丹会景》、《瑞狮》分别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奖及英国伦敦大铁桥开幕赛会二等奖。在此期间，绒线针法、针金针法都得到改进和发展。1926年至1936年四乡开武馆、庆神诞之俗甚盛，加上港澳商人及海外华侨也来广州购买绣品，刺激了刺绣业的发展，绣品远销欧美和南洋等地。1929年，在广州举办四省市绣品展览竞赛，广绣有《孔雀牡丹》、《番狮》、《雪地风景》等作品参展，被评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日军侵占广州后，刺绣店铺纷纷歇业或迁往香港，艺人大多转业谋生。抗战胜利后，受物价飞涨和战乱的影响，刺绣业无法再起，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广州的刺绣艺人只剩下30多人，濒于艺绝人亡。新中国成立后，广绣业复苏，广绣艺人归业者达3500多人，分别成立了艺锋、黄埔、新滘和民艺钉金等刺绣社，广州郊县及佛山、南海、顺德等市县也先后成立刺绣生产社，刺绣技艺得到整理提高。1957年，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绣出不少优秀作品，研究整理出《广绣针法》一书。1982年建立的广东顺德刺绣研究所，绣制了128种图样来表现32种针法的示范绣片，并编写了500多种图册和文字说明。同年，广绣《晨曦》、《百鸟朝凤》、《黎家乐》等作品在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比中获金杯奖。现代虽然出现了机绣、珠绣的新技术，广绣产品仍供不应求。20世纪60年代初，行业人员一度达到3000多人。不仅珠江三角洲的市县，就连新会、台山都有加工点。这一行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70年代恢复了生产。但是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一笔千针”的广绣因功夫大收入低而辉煌不再。目前在广州只剩下一家绣品厂，从业人员不到30人。工艺美术研究所因编制所限后继乏人。作为单独的艺术欣赏品的广绣行业已不复存在，广绣的痕迹只存在珠绣、戏服等某些行业中。《羊城晚报》2002年有《千岁广绣，黯然抱憾而终？——作为完整行业曾盛极一时的广绣业已完全在广州消失，千年绝技面临失传》的报道。【17】2003年的专题报道，文内有《费工费时，粤绣几成绝艺》的小标题。【18】2004年又有《粤绣几成“绝艺”更显珍贵》的报道。【19】在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城乡，粤绣面临的是同样的状况。2003年的《广州日报》报道《百岁绣工后继乏人难退休——曾经辉煌一时的南海南庄刺绣濒临失传，“年轻”的绣工也已七八十岁》。在广绣艺术一片“叫绝”声中，还有一位苦苦守住广绣阵地的工艺美术师陈少芳。陈少芳是番禺人，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她从事刺绣创作多年，作品颇丰，题材有人物、花鸟，先后送赴美、德、日、法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览，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1993年，陈少芳创办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克服了缺乏资金、绣工难得等困难，一直坚持创作，并且出了一批成就极高的作品。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的工艺美术作品展上，展出了陈少芳历十年寒暑的心血之作《岭南锦绣》广绣长卷（长13.8米、宽1.12米）。长卷巧妙地利用流泉清水，将各个独立部分联系起来，从腊月寒梅开始，直到红棉盛放、花开富贵、孔雀开屏、百鸟归巢、羊城远眺。长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广绣针法与技法，表现细致。长期以来，陈少芳宣布这件作品是自己数十年艺术创作生涯的一个总结，属于非卖品。但在2004年参加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竞投会上参与拍卖，开出了2000万元的底价，标价高得出入意料，以这种引起轰动的方式显示了其特殊的价值以及作为一门濒临灭绝的千年工艺的存在。四、牙雕广州与北京、上海并称全国的象牙雕刻中心。北京牙雕以典雅、高贵、庄重风格的观赏品称雄，上海以精雕细琢的“象牙细花”小型牙器见长，广州牙雕则以玲珑剔透的镂雕技法扬名中外。牙雕在广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广州古代有野象出没，长期是外贸口岸，能大量进口优质象牙，而气候湿度较大适于象牙存放和加工（象牙吸水后会稍为变软和带有韧性，很适宜于工艺雕刻），因而成为象牙雕刻产区和出口基地。在广州附近距今4000多年的佛山河宕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原始的象牙制品环、梳形手饰和一件形似喇叭、薄如蛋壳的象牙饰物。秦始皇平岭南，其中一个原因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19】说明今广州地区在先秦时期已是一处象牙集散地。秦汉时期粤地牙雕更有所发展。在南越王赵眜墓中，发掘出5枝非洲大象牙，出土了墓主人使用的象牙篆刻印章、金扣象牙卮及象牙算筹、长方体象牙棋子等，是南越国宫廷工匠或官办手工作坊工匠所制作。《晋书》记载，晋代广州艺人已能把象牙开成细条，柔韧如线，编织成象牙席，广州刺史车永之子车溢使用的就是象牙织成的晶莹如玉的席子，“每于夏日铺陈，拥姬妾倨见宾客”。唐代，“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20】同时，广州外贸繁盛，更从印度、东南亚和非洲进口大量象牙，见于唐人诗句不乏其事，“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21】“犀象满城邑”。【22】象牙雕刻业日益兴旺，制品有笏板、文具、梳具、花瓶和各种玩赏品等。除达官贵人享用，还有一定数量出口。在广州儿童公园南越国宫殿遗址上的唐代文化层出土有胡人头像牙章。南宋以后，广州的象牙产品更加精致，并加以染色，开始形成地方特色。广州的象牙雕刻真正形成规模，是在明清时期。明代的广州牙雕，受到来自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影响，有“苏州样，广州匠”之说，牙雕技艺得到提高。广州城外靖海门开设有很多雕刻象牙神像的店铺，制作和经营象牙工艺品。入清以后，外贸的繁茂为广州牙雕提供了大量海外廉价原料，西方文化的传入为广州牙雕注入了新的造型素材，广州象牙雕刻业步人了繁荣时期。广州牙雕独特的工艺和构图，开始风靡全国。在广州形成了贡品行和洋行两个牙雕行业组织。贡品行经营雕刻艺术性较高的制品和贡品，如人物、牙塔、牙球、梳妆用品等。洋行则以内销为主，如筷子、烟嘴、图章以及较为简单的人物、牙球等艺术品。明清两代，广州的象牙雕刻技艺达到顶峰，形成鲜明的岭南风格，精细冠全国。牙雕产品从宫廷贵族制品扩展到民间用品，如象牙神像、人像、折扇骨、雕花胸针、梳、棋子、鼻烟壶、烟嘴、粉盒等。清代进皇宫的广州牙雕艺人不少，养心殿造办处档案留名的清雍正至咸丰年间调人清宫的广州牙匠就有15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广州象牙雕刻作品《镂雕葫芦式花囊》、《编织雕花团扇》、《镂空八瓣盒》、《雕花镜奁》等体现了这一时期广州牙雕的精湛技艺。雍正年间广州进贡的一张象牙席，长2米多，宽近1.4米，全由薄如竹蔑、宽不足0.3厘米的扁平象牙条编织而成，整张可卷成筒状，开合自如。雍正帝有感于其耗费巨大，劳民伤财，下旨禁止牙丝制品的生产。比象牙席更为精细的还有现藏于故宫的以象牙细蔑片织成的团扇。可惜象牙蔑编技术已失传。镶嵌工艺源于明末清初的“周制百宝嵌”，是以象牙雕为主，辅以金、银、珠宝、玉、石等材料的镶嵌工艺。清代牙雕《三羊开泰》插屏，屏心图样以牙雕三羊三童子，背衬染色牙松、竹、梅、水仙、栅栏，并嵌石装饰。屏的四周包镶红木框架。多种工艺的综合使用，使广州牙雕呈现出独树一帜多姿多彩的艺术效果。道光年间，广州牙雕业出现行会，鸦片战争后又分出贡行和洋行。贡行称“慎玉堂”，主管雕工和贡品生产，贡品之外可自销。洋行称“怀远堂”，产品以外销为主。清末，自学成才并自立门户的大牙行代替了贡行，被称为“象牙会馆”，生产经营集中于今大新路一带。广州的牙雕业成为名闻国内外的行业。广州牙雕称南派牙雕，注重雕工、牙料的漂白和色彩装饰，作品多以质白莹润、精雕细镂见长。从总体上说可分为雕刻、镶嵌、编织三大类。广州牙雕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精细，镂雕象牙球最具代表性。象牙球又称“鬼功球”，是以一整块象牙用镂空工艺雕出层层相套、转动自如、玲珑剔透的薄壳牙球，图像交错隐现，奇巧异常。清乾隆时期翁五章创作的11层牙球，层层转动自如，是广式牙球开山作之一。随着技艺的提高，象牙球层数不断增加，民国4年（1915），由翁昭、梁雄创作的25层象牙球在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获一等奖。翁昭之子翁荣标在1978年创制了45层牙球《举杯邀明月》。翁荣标的徒弟陈易更将牙球镂刻发展到53层。与牙球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牙塔、牙船，工艺充分发挥了镂空雕刻的特长。1987年，15层的“双凤朝阳”大花船由中国工艺美术珍宝馆收藏。广州精细牙雕的另一代表作是象牙微雕。冯公侠与冯少侠父子先后在米粒大小的牙粒上雕刻154字的《总理遗嘱》与551字的《前赤壁赋》，名噪一时。民国时期广州牙雕业从业人员曾达到1300人左右。曰军占领广州期间，全行业基本歇业。抗战胜利后牙雕业得到恢复。新中国将牙雕业组织为合作社，后来转为大新象牙工艺厂、艺光象牙工艺厂，产品主要供应旅游出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恢复实行多种所有制政策，大新、艺光两厂出现人才流失、生产经营逐步下降的情况。同时，由于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公约组织对象牙贸易逐步施加限制，1989年8月1日，大新象牙工艺厂宣布停产象牙制品。是年秋季广交会对象牙工艺品作最后一次陈列和成交。由于工厂库存象牙所剩无几，象牙雕刻行业人员多数待工，有的转产其他工艺品。大新象牙厂鼎盛时有职工610人，年创汇超过100万美元，是广州十大创汇企业之一。现只有职工50多人，由于原材料缺乏，无法正常生产，要靠出租厂房以租养艺。牙雕艺人为延续工艺另辟蹊径，在2004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牙雕艺人植炳光以牙雕工艺试雕紫檀木刻成的《三蚌通雕山水人物图》获得金奖。也有牙雕艺人以牛骨代替象牙，以牙雕技术转向骨雕创作，并且打开了向欧、美、日的销售市场。2004年，由10余位艺人历时5年完成的巨型骨雕《四海同心盼统一》，共耗用千头东北牛的小腿骨，近3000块牛骨，采用平刻、立雕、浮雕、包镶和拼接等传统技艺制成，为骨雕开辟了新的路子。象牙雕在退出交易会15年后，事情有了转机。由于非洲象的繁衍，2001年，国际组织对象牙贸易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解禁，与此同时，在西伯利亚不断出土大量的史前猛犸象牙，不在禁止加工贸易之列。2003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大新象牙工艺厂可进口猛犸象牙。大新厂还通过合法定点企业拍卖中获得200多公斤象牙，经国家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向联合国推荐，大新厂成为唯一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参观企业。2005年，大新厂精心准备了近百件牙雕精品复出春交会，古老的牙雕工艺在国际市场上重现风采。五、玉雕广州的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广州飞鹅岭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文物就有玉环。南越王国墓葬出土有一批玉器。西汉南越王赵眜墓出土玉器达244件（套），数量之多，为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所仅见。此墓出土玉器包括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和器用之玉，其中不少以高浮雕和镂空双面雕的动物纹为主，做工精绝，堪称汉代玉雕之佳作。珍品如重环龙凤纹玉佩和青白玉角杯。玉佩构思奇特，龙凤生动活泼，线条流畅，充满美的韵律。角杯是首次发现的西汉角形玉杯，由整块青白玉雕成，外壁运用了圆雕镂空、高浮雕、浅浮雕、线雕等多种技法，文饰层次分明，重叠穿绕，布局巧妙，是汉代玉器中的稀世珍宝，被定为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南越国的琢玉技巧是高超的。唐宋时期，广州玉器业继续发展，主要用于祭祀神器、宫廷装潢、玩物珍宝配饰，多为王室、贵族所有，属珍贵工艺品。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藏的唐代白玉凤首觽，广州博物馆所藏的宋代玉狮，做工精细，是这一时期广州玉雕工艺水平的代表。明末清初，玉雕工艺逐渐流向民间，广州作为外贸商埠，民间玉雕作坊日趋昌盛。清初废除“匠籍”管理制度后，各地的能工巧匠集中到广州经营，至清道光年间，发展为成行成市，并按生产制作经营方式，相继建立了成章堂、镇宝堂、诚福堂、崇礼堂、裕兴堂、昆裕堂等6个行会，分别雕制玉器花件、光身碎件、玉镯及玉石料等。20世纪30年代是广州玉器行业鼎盛时期。由于广州社会较安定、经济较发达，人们对金玉装饰需求增加，缅甸的翡翠玉源源不绝进口，原料充足，使玉雕业迅速发展。极盛时，玉雕业有大小商户4000余家，中小生产者达3000多户，从业人员万余人。玉雕业工商户主要分布在大新路、文德路、长寿路、文昌路、带河路一带。长寿路和带河路的祥胜玉器墟和崇德玉器墟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珠宝玉器商场。广州玉雕所用材料有翡翠、白玉、碧玉、青玉、岫玉等，部分采用本省南玉，玉质滋润，斑斓多彩，玉雕艺人又善于利用其色泽、纹理因材施艺，将传统“巧色玉”方法发展为“留色”的工艺特色，巧妙地利用原玉的天然颜色，刻成花鸟鱼虫和各种人物，精美异常。广州玉雕产品主要有座件、首饰两大类。座件最能体现广州玉雕特色，如花鸟、人物、兽口、炉熏、花瓶等，还有蟹篓、鱼萎、花塔、仿古兵器、车船等。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玉雕座件佳作迭出，镂空18层玉球、通雕鲤鱼名扬海内外。首创于20世纪70年代的花车、楼船、宝塔等大型组合镶嵌座件，在国际市场备受欢迎。当代著名的玉雕艺人，有擅长鸟兽的吴桐、精工人物的吴贵、花卉能手潘华、“金鱼状元”欧钊等。1997年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议为中国十大民间艺术家之一的高兆华，其作品构思独特、技艺精湛，多次获奖。近年来，玉雕工艺界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使玉雕陷入了鱼龙混杂的状况。成立于1956年的南方玉器厂，现名广州市南方玉器珠宝实业公司，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玉器生产厂家，目前退休人员接近在职人员的四倍，企业负担过重，加上国际市场、汇率、税制改革的变化，公司的竞争力不断下降，生产不断萎缩。另一方面，个体私营工艺美术企业迅速崛起，展现出新的生机活力。从1986年起，有关部门在长寿路新胜街、下九路西来正街开办了玉器街，使从事玉器生产的个体户和玉器营销摊档扩大了营业规模。六、木雕广式木雕一般指红木家具上的雕饰及红木雕刻艺术品。所谓红木，指的是紫檀木、酸枝木、花梨木、菠萝格木、坤甸木等木色带红的硬木木材，主要来自泰国。这些木材质地坚硬，制成的家具耐用，坐卧清爽。产品造型古朴高雅，雕工精细流畅，艺术与实用并重，受到宫廷和民间的喜爱，在华南地区及华侨侨居国尤其是在东南亚、港澳一带流行。广式木雕起始于建筑物上硬木构件的雕饰。红木雕刻工艺品以中式厅堂陈设的红木家具（俗称“酸枝家私”）为大宗，还有红木小件、宫灯，雕刻樟木箱。又因为广东地处沿海，贝壳资源丰富，因此酸枝镶螺钿家具较为流行。广式红木雕刻工艺品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广州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国家的酸枝、花梨木等木材经广州进口，有利于广州的红木家具业发展。明代，广州与苏州、扬州同为中国有名的家具制造中心，红木家具生产形成行业。明中叶，广州在家具的产品造型、花纹装饰上已形成独特的工艺风格。隆庆充年（1567）成立酸枝花梨行会，并按工艺分为专事雕花的广兰堂、专事装料的务本堂、专事刮磨的光远堂，从业人员有5300人，多分布在小新街、走木巷、西华里、濠畔街、南胜里、西来初地、河南尾等地，这些街道相连起来长数十里。清代，西式建筑风格及西式家具传入，对广式家具影响很大，变肃穆为流畅，化简素为雍贵，促成其注重雕工、崇尚繁复豪华的风格。同治至清末，广州家具行业鼎盛，作坊达百余家。广式家具不但在出口贸易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内家具的创新上也领先潮流。这一时期广式家具名工辈出，清宫内府也召集了许多巧匠名师为其制造用具，宫廷设立“广木作”，以区别于较多保留中国家具传统形式的京式与苏式家具。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年间广东硬木家具名匠罗元、林彬、贺五、梁义、林志通等奉召人宫廷造办处供职。南海县石碁村（今属佛山顺德区）人梁埠等曾进京为光绪帝雕造结婚的龙床，受到册封。故宫内现藏有丰富的广式木雕家具，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六件双鼎紫檀大柜，即出自乾隆年间广州匠师的精心之作。这一时期的广式酸枝家具，无论是卯榫驳接、纹样雕刻和刮磨修饰，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除出口和上贡品之外，还有不少是豪富人家招聘名匠加工制造的。十三行的潘、卢、伍、叶四大行商，都招有名工能匠，不惜工本地为他们制造优良家具。传世家具造型考究、刀法浑圆齐整、刮磨精工细致，技艺令人赞叹。晚清，广（州）佛（山）三友堂是有名的木雕店号。三友堂成了广派木雕杰出代表之一，其雕工雄浑粗矿、生动流畅，刀法冼练，刚劲有力，装饰性很强。清末，东南亚各国的酸枝、花梨木大量进口，广州工商界抓住木材充裕之机大批生产红木家具，扩大出口，出现了好些酸枝家具商行和作坊。较具规模的家具商行如“五常”酸枝家具商行和“万全”酸枝家具商行，都印行了印刷精美的家具图样以招徕国内外客户订货。广州联盛号因呈献紫檀木雕刻的双龙双凤朝牡丹首饰盒，获清廷农工商司部颁给九品顶戴衔。在佛山，咸丰初年木雕手工作坊大部分集中于承龙街（今高基街中段），工匠不下千人。从清末至民初，广州的酸枝花梨行业长盛不衰，并有行市分布规律：濠畔街是洋庄货，西来初地为内销货，西门口是便宜货。樟木能防虫蚁蛀蚀，适宜存放高级衣料，樟木箱成为实用的木雕工艺品。鸦片战争后，浙江东阳一些木雕艺人到广州从事木雕，雕刻樟木箱发展成广州木雕一大品种。当时，酸枝花梨家具生产分为酸枝红木家具（即大花梨行）、红木小件（即小花梨行）、宫灯、樟木箱等4个自然行业。民国时期，广州红木家具的品种增加了不少，如书柜、酒柜、大床、衣架、西式柜、梳妆台及圆台等。1930年广州的红木家具业从业人员达5300余人。日军侵占广州期间，家具行业濒临绝境，行会自行解散。抗战胜利后，家具行业逐步复苏。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木雕业成立了生产合作社，以后改组为工厂，生产场地集中在广州海珠区南村、纺织路和越秀区大南路。“文化大革命”中雕龙刻凤的家具受到批判，生产受到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红木套装家具发展最盛，广州木雕家具厂创作的十件一套的“宝鼎床”、“九龙床”畅销国内外市场。宝鼎床别出心载地将宝鼎形轮廓线演化成床及椅靠背上的主体图案雕饰，上方雕饰数只大小雄狮，颇具古朴雄风。90年代初，该厂创制的“龙狮燕会”大型套装餐桌，在长1.7米，宽1.3米的红木桌面上镶嵌4块大理石，配坐椅12张，桌椅的围边、靠背共雕出形态多变、动静交错的54只雄狮、40条金龙、12只飞燕，工艺精致。此外，产品还有红木雕刻小件，品种较多，造型精巧，有摆设、古玩、工艺品、石山盆景的依托；与玻璃刻画相结合的酒楼、宾馆的装饰工艺；红木宫灯；雕刻樟木箱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营木雕家具厂经营倍感吃力的时候，民营红木家具厂不断增多，粤中地区的家具行业迅速发展，增城、中山、顺德、佛山及肇庆的家具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广州从事木雕行业的有几千人，市场销路尚呈上升趋势。广州的木雕艺人坦言，这一行当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后继无人，而是恶性竞争；令人担心的是工艺水平大多不高，还有掺假，影响了广东木雕的声誉。面对这种恶性竞争，或者只有市场经济的选择能够制止只顾眼前利益的工艺水平滑坡。注释：〔1〕深圳市文管会编：《深圳文物志》第41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第21～2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3〕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第17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4〕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志》第17页，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5〕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第19、20页。〔6〕胡根天：《广州北郊发掘出唐代瓷器》，载《南方日报》1954年3月23日。〔7〕曾广亿、宋良璧：《广东陶瓷的历史》，《中国陶瓷全集》，（日）美乃美出版社1984年。〔8〕广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考古发掘成果汇编》，2004年5月印。〔9〕曾广亿：《阿曼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载《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辑。〔10〕申家仁：《岭南陶瓷史》第90-91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1〕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志》第21页，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12〕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第235页，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13〕朱非素：《浅析广东古代陶坛》，《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1989年香港刊本。〔14〕屈大均：《广东新语》。〔15〕《孤灯陋室描岀亮丽广彩——度辉煌的广彩日渐衰落，老艺人慨叹传人难一》，载《羊城晚报》2004年10月24日。〔16〕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第2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7〕《千岁广绣，黯然抱憾而终？——作为完整行业曾盛极一时的广绣业已完全在广州消失，千年绝技面临失传》，载《羊城晚报》2002年7月6日。〔18〕《精美粤绣，收藏越久越值钱》，载《羊城晚报》2003年12月3曰。〔19〕《淮南子·人间训》。〔20〕（唐）刘恂《岭表录异》。〔21〕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全唐诗》卷299。〔22〕殷尧藩：《寄岭南张明甫》，《全唐诗》卷492。第二十一章食在广州一、粤菜流变广州地处亚热带，依山面海，河网交织，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及蔬菜水果繁多，为饮食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东莞万福庵贝丘遗址堆积有大量的蚬、螺、蚝壳体；新会罗山咀遗址堆积有大量的牡蛎、蚶、蚌、螺壳及鱼骨、鳖遗骸：佛山河宕、南海鱿鱼岗贝丘遗址出土有大量贝壳；广州北郊龙眼洞飞鹅岭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有鹿、野猪、豪猪等动物残骨；广州新市葵涌遗址出土有大量贝壳，大部分是淡水蚬，也有咸淡水交汇处生殖的螺、蚶，还有鹿、猪、豪猪、鳖等动物残骨；增城金兰寺新石器贝丘遗址出土有蚬壳及鹿、牛、鱼、龟的遗骨。由此看来，广府地区先民的食物已有用料广博，食用野味、海鲜以及驯养家畜的特点。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中后期南越族遗址出土了许多陶釜、陶鼎等炊煮器具，可见早在五六千年前，越人已进入熟食阶段。同时，由于历史的积习，又长期保留着喜食鱼生、虾生的食俗。南越国时期，汉越民族融合，广府地区的饮食文化进一步发展。南越王赵眛墓中出土炊具有鍪、鼎、甑、、烤炉等，还有磨姜取汁的姜礤，可见烹饪方式多种多样。炊具或陶罐中的动物遗骸，主要有青蚶、河蚬、耳螺、笋光螺、楔形斧蛤、竹鼠、鸡蛋壳、大黄鱼、广东鲂、鲤鱼、笠藤壶、石砺、花龟、中华鳖、虾、禾花雀、家鸡、猪、黄牛、山羊等，可见食物品种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禾花雀均斩头去爪放人陶罐中，与今时流行的不吃头爪的食法相同；猪牛肋骨剁成一段段，出土骨骼色泽呈黄白色与其他出土骨骼不同，可能经过特殊加工；墓中出土烤乳猪的长铁叉及乳猪骨骸，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一组烤乳猪实物史料。迄今广府人的喜庆宴会少不了烤乳猪，清明扫墓以烤乳猪祭拜祖先。当然，南越王墓出土文物只反映南越国上层社会的饮食情况，南越族与中原人的食俗不同，喜欢吃江河湖海的各种水产、贝类，还把蛇、禾虫、鼠等视为美食。《淮南子》载：“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1】晋代《博物志》载：“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2】《太平广记》引《南楚新闻》说：“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3】皆反映出古南越人喜吃蛤虫蛇蛙的食俗。珠三角多处贝丘遗址发现的大量食用后被遗弃的贝壳堆就是实证。延至今时，海鲜食物仍被广东人视为佳肴。粤人无所不食的杂食之俗是一直沿袭下来的传统。唐代广府饮食已天下闻名，时称“南烹”、“南食”，以用料博杂为特点。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其时越人食物中有象鼻、蜈蚣、蜂子、蚁卵、孔雀等。蜈蚣之大者，取其皮以蒙鼓面，肉则晒制成干，据说美味胜于牛肉；蜂子是以盐炒之，暴干，装人纸袋以为馈赠；蚁卵是收集淘净后卤成酱，味道酷似肉酱；孔雀则腊成干肉备用。而烹法因物而异，别出心载：食乌贼鱼，“炸熟，以姜醋食之，极脆美。或人盐浑腌为干，捶如脯，亦美”；食虾生，“多买虾之细者，生切趕菜兰香寥等，用浓酱酷醋先泼活虾，盖以生菜，以热釜覆其上，就口跑岀，亦有跳出醋碟者，谓之虾生。鄙俚重之，以为异馔也”；水母“好食之”，“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晶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脍食之，最宜”；食“蛇肉，大者腌为炙，小者炒食”；食鲳鱼，“治之以姜葱，魚之粳米。其骨自软，食者无所弃。”这种食法与今时广人家庭的“饭面鱼”做法一致。当时的广州人烹饪技艺已有煮、炙、炸、炮蒸、甑、炒、脍、烧、煎、煱、拌等多种方法。【4】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说到粤人食俗：“物无不堪啖，唯火候，善均五味。”在选料博杂的基础上，将火候与调味作为关键，讲究美味。所有这些，说明了唐代的广府饮食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今日仍有深远影响。南越人喜吃蟀蛹、烤蝉、烤“龙虱”（水甲虫）的习俗，其实来自中原。先秦文献记载，周王把“范”（蜂蛹）、“蜩”（蝉）视为桌上珍馐。周王室的佐膳佳品，就有“蜗醢”（螺酱）、“蜓醢”（蚁酱）和鱼卵酱。周代八珍中的“熬”即烘肉脯。后来的这些食品在中原渐而消失，广府人却传承下来了，经过改良的广州烘肉脯（牛肉脯和猪肉脯）行销全国并传至港、台、江苏等地。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成为全国的富庶地区，崛起一批城镇圩市，广州更是兴旺的商业城、港口贸易城，成为“讲饮讲食”的消费地区。来自国内各地及外来的饮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广府饮食文化。在广州，以粤菜为主体，京都名食、姑苏风味、凤城食品、西餐洋食，各立旗帜，各有“招牌”食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市场。清道光年间温训的《记西关火》一文中写到“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是见其饮食之盛。至于河南海幢寺西面的漱珠桥一带，又是一番景色，清人冯询《珠江消夏竹枝词》云：行乐催人是酒杯，漱珠桥畔酒楼开。海鲜艇到争时刻，怕落尝新第二回。在运用海外烹调特长和食料方面，南洋的胡椒和咖喱，欧美的咭汁和沙律酱等，成了粤菜常用的调味品；南洋的燕窝和鱼翅，日本的干贝，墨西哥和澳洲的鲍鱼等，成了粤菜高档菜肴的重要原料。国内各地的食物原料，外国的舶来品大量汇聚广州，国内风格各异的饮食流派和西餐馆在广州颂颂出现，使粤菜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容南北、合璧中西的风格，增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菜点、小食新品种，确立了粤菜在全国的名菜地位。珠江三角洲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美食，如佛山的柱侯食品、顺德的凤城菜式、东莞的荷包饭、新塘的鱼包、新会的潮莲烧鹅、清远的白斩鸡等。广府菜的内容得到大大充实，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民国初期，广州市内较大的饮食店就有200多家，至二三十年代更趋繁荣。大中型饮食店装饰华丽，食具精致；全天24小时内，有不同经营项目、不同营业时间的饮食店开门营业；烹调技术从原先的近10种发展到20多种。能烹制“满汉全席”的有贵联、一品升、南阳堂、福来居、玉醪春、聚丰园、英斋等酒楼菜馆。名菜有红烧大群翅、千烧鱼翅、龙虎烩、盐煱鸡、太爷鸡、江南百花鸡、红烧鲍片、满坛春、化皮乳猪、鼎湖上素、挂炉鸭、玻璃虾仁、香糟鲈鱼球、清汤鱼肚、鱼云羹等等。广州菜烹饪技艺日臻完美，“食在广州”的说法也在此时传扬开来。粤菜成为当时国内发展势头较猛的菜系。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举办了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名菜名点展览，检阅和推动了粤菜的发展。饮食市场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萎缩之后，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粤菜的发展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影响居于国内各大菜系之首位。珠三角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及流动人口剧增，各大菜系及各国菜式汇集广州及珠三角各城镇并展开竞争，形成了以粤菜为主、多种饮食风格共处的繁荣局面。例如经济发展迅速、消费水平高、南来北往交流大的水乡佛山顺德区，被誉为粤菜发源地之一，2004年获“中国厨师之乡”的称号。全区百来万人口，有专业厨师2万余名，其中有中国烹饪大师3名、中国烹饪名师21名、广东烹饪大师14名。2004年注册登记的餐饮企业接近5000家，全年餐饮业营业额超过30亿元。二、特色饮食食在广州，不仅仅因为广州的饮食丰富及美味，更因为广府的饮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饮食文化上可以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广府文化的主要特点。保留传统底蕴的饮食项目。广州菜的鲜明特色，与地理气候有密切关系。地处亚热带、毗邻热带，适宜于品种繁多的动植物生长，故而广府人从古代就养成杂食之俗，将众多的动植物都化为食用。在外地人眼中，“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一个“敢”字，尽显广府人博采食物大胆探索的饮食观。除了家禽家畜、鱼虾龟鳖蛤蚶、瓜果蔬菜等平常之类，更有大量匪夷所思的动物进入食品之列。鸟类如鹧鸪、鸽子、孔雀、禾花雀、猫头鹰，兽类如果子狸、豹狸、黄琼、穿山甲，蛇类如眼镜蛇、水蛇、白花蛇，昆虫如禾虫、蝎子，长期以来都是广府人餐桌上喜爱的菜式。粤菜的特色菜三蛇羹、龙虎会（炖蛇猫）、炖禾虫、坟田鼠、味龙虱（水生甲虫）、桂花蝉等，就是百越族嗜食蛇虫鼠蚁的遗存。吃蛇之名令许多对粤菜不了解者闻名心惊，但是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即使经历过“非典”的冲击，广府吃蛇的风气并未稍敛。吃蛇在广州家庭是习以为常，蛇也是肉菜市场上销售的平常之物。今时许多人吃蛇，不仅因为其鲜美，还因为蛇肉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生吞蛇胆、生饮蛇血，说是有清热除痰、强筋健骨之功效。广州的蛇餐馆，原名蛇王满，位于桨栏路，创始人吴满原来以采药捕蛇为生，光绪十一年（1885）在广州新基正中约开设了广州第一间专营蛇类制品的店号“蛇王满”，经营自制蛇胆陈皮米酒、蛇胆川贝米酒、三蛇酒和蛇汤。这家蛇餐馆1938年被焚后在浆栏路复业，从创业初期的20个座位发展到四层楼500多个座位，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特色餐馆，每年用蛇数十万条，著名蛇类菜肴有龙虎凤、双龙争明珠、煎酿鲜蛇脯、烧凤肝蛇片、龙虎凤大翅等。在广府厨师的巧手烹制下，以蛇为肴的菜式不下百种，制法有将蛇肉分成段、块、丝、丁，烹饪有坟、煎、炒、煱、炖，花样层出不穷。在星级宾馆的菜谱上，有龙虎凤大烩（即蛇、猫、鸡共烩）、野味佛跳墙等以蛇为肴的高档菜式，在大排档更常见椒盐水蛇碌这样的大众菜式。传统的名菜式有淮杞炖蛇盅、菊花三蛇羹、煎酿蛇脯、椒盐鲜蛇碌、七彩炒蛇丝、龙虎凤大烩、凤肝炒龙片，而今又创新了三杯蛇、香橙蛇脯、荷香蛇碌等令食客回味无穷的菜式。1994年广州美食节评选出的119款金牌菜式中，以蛇为肴的就占了7款，诸如海蛇煲、三杯蛇、荷香蛇碌、龙凤呈祥等。粤菜的人菜种类多，更主要的是针对不同的人菜对象，乃至同一原料的不同部位，都要讲究不同的用途食法，不同的刀法、烹法。就拿吃蛇来说，蛇肉烹调出各款美味佳肴之外，下脚料蛇皮被炮制出凉拌蛇皮，蛇脑合中药材炖蛇脑，用蛇信（舌头）、蛇生肠（子宫）、蛇肝炒出各式菜式。至于用蛇子（睾丸）和雄鸡子炒出的“龙凤子”，都被视为壮阳佳品的席上奇珍。甚至连蛇肠中的蛇脂油也熬炼出油来用以“扒四蔬”，炒制的菜蔬清香爽嫩。广州的饮食市场如同车轮转叫人眼花缭乱，就像时装发布会般一时一局，一会儿时兴吃驴肉，一会儿时兴吃羊肉，一会儿又时兴吃猪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海鲜始终是食肆的宠儿，鱼是变化的重头戏。单单一种水库鱼，就可以做出三十味菜式。水库鱼是在无污染的水库中长大的，生存环境决定其肉质鲜美爽脆，做菜用的水也是经过滤的泉水，用这种水蒸出来的鱼自然更加鲜美。而菜式做法较之其他菜系的什么整条备清蒸、红坟、油炸之类就复杂得多了，将鱼头、鱼身和鱼尾分开来做菜：鱼头，可以做出红烧鲍汁鱼头；鱼身，可以做出炸鱼件、椰汁红枣丝煮鱼、高汤浸鱼面；鱼尾，碧绿火腿蒸鱼件。又有什么天麻炖鱼头、鲍汁鱼头拼蒜香鱼片、西芹百合炒鱼丁、铜盘煱鱼肠、美极鱼骨腩、鱼蓉粥等多款菜式，光是这些名目就足以令食客心动。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市镇也各有其饮食业优长。早就以开发基围而商业活跃、物产丰富的顺德，外出经商、做官的人多，不断传入外地的饮食烹饪经验，以烹调制作精巧驰名，向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凤城是顺德县城大良镇别称）之说，广州、港澳乃至海外粤人聚居地的酒楼餐馆，多喜标榜“凤城（大良）名厨’’以广招徕。顺德酒家特别擅长清蒸河海鲜鱼。传统的名特菜式，有清蒸大鲩、豉汁蒸鱼嘴、六味烩长鱼（黄鳝）、乌醋浸扁鱼、乐从鱼腐、裉骨大鳝、勒流水蛇片、大良煎虾饼、炒芙蓉虾、水鱼三味（清炖甲裙，红烧头、尾、脚爪，生炒肉）、均安煎鱼饼、两龙鱼生、菊花鱼球、煎酿鲮鱼、鱼生火锅等。尤以淡水鱼的烹饪地方特色鲜明又大众化，有全食、块食、片食、拆食、剁食、酿食、生食、腌食等八种食法，各种食法实际上又有不止一种做法，因鱼而异，适合不同口味的需要。顺德厨师对传统菜式不断改进，《顺德菜精选》一书中，仅鱼头的做法就有250多种。鸡是传统广州菜的主角，“无鸡不成宴”。而鸡为家禽中最为普遍之种类，当然是粤菜厨师大显身手的对象。从精明的家庭主妇到高明的酒家厨师手下，以鸡为菜有着万般变化，一鸡多味，适应市场，让食客胃口大开。广府人把鸡昵称为凤，凤乃呈祥之物，更是喜庆席上必不可少之菜式。广府地区食肆特多，竞争激烈，在食鸡花样上尽显厨师匠心。最为出名的是白斩鸡，以澄黄油亮、皮爽、肉滑、骨软、原汁原味、鲜美甘香见长。但这还远远不够，又有了以选料与配制各出奇招的清平鸡、广州文昌鸡、北园花雕鸡、大同脆皮鸡、九记路边鸡、太爷鸡、惠爱鸡、泮溪桶子油鸡、东江盐煱鸡、市师鸡、豉油鸡、沙律脆皮鸡、凤沙鸡、美极鸡、洪寿鸡、牡丹鸡、金华玉树鸡、太阳鸡、灵芝鸡、葵花鸡等等，更不要说以鸡人菜可以创造出万花筒般的变化，诸如栗子坟鸡、冬菇云耳蒸鸡、炒鸡球、啫啫鸡、荷叶蒸鸡等等。每一种有名的鸡菜式都有着一个创意，显示出广府菜式的兼容善变的特性。以东江盐煱鸡来说，本是客家一道名菜，首创于东江流域的惠阳一带而得名，以皮爽、味浓、骨香脍炙人口，但传统制法较为费时，难以适应客人云集的需求。据说1946年在广州的宁昌饭店（后来之东江饭店）为了应急创制出水浸盐煱鸡，制作时间大为缩短，味道不减于旧法，鸡皮更为爽滑，鲜嫩也胜一筹，从此风靡。沙律脆皮鸡则是白天鹅宾馆的中餐厨师谭虾结合中西制法所创制，使用西菜配料，被称为“新派粤菜”，与传统鸡肴相比颇有新颖感，大受食客欢迎，曾列入“广东十大名鸡”。广府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曾评选出十大名鸡，其中仅清平鸡每日可卖出上千只，最高达到近万只。凭借清平鸡的名气，清平饭店快速扩张，1996年中秋节，清平饭店4家分店共卖出清平鸡17200只，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时隔十年，十大名鸡大多已盛名不再，代之而起的是“百鸡争鸣”的新局面，美味鸡的数量和花样远远超过当年的十大名鸡，可见广府餐饮业的竞争和创意紧相联系。三、百变粤菜广府菜式顾及各种层面，既有高消费高档次的，更有面向平民大众化的，适应性极强。总的趋势是从崇尚奢华向丰俭有度、讲求实际转变，从食制相对庞杂向基本定型转变。民国初期，最为名贵的酒席首推满汉全筵。相传全筵创始于清乾隆年间，原来是宫廷中为显示“威加海内，富甲天下”而赐宴群臣的华筵，后流传至民间。清末，在广州盛极一时的满汉全筵是显示达官贵人身份排场的高级筵席，其品种之多、用料之精、制作之精巧，非一般筵席可相比拟。据说其用料山珍海味、动植飞禽，无所不包，有象拔（象鼻子）、猩唇、豹胎、猴脑、驼峰、雀舌、熊掌、鱼翅等稀奇古怪的珍品。鼎盛时全筵的菜式美点多达200多种，以后很多原材料确实难以罗致，逐渐由其他品种代替。粤菜的满汉全筵，菜式、食品有108种，说是取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数，即含有天上地下无所不包的意思。其中包括冷菜、热菜，荤菜、素菜，有咸有甜的，甚至中看不中吃的。全筵分早、午、晚、夜宵四次即全日享用，也有分两日或数日食用的。据说清朝要二品以上官员才能订办全筵，后来只要有钱便可以享用了。民初改名为大汉全筵，菜肴减至72款，但奢华依旧。现时招待外宾则以“满汉全筵精选”推出。满汉全筵极尽奢侈的铺排，非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故而同时也流行起“八大八小”、“六大六小”、“十大件”、“九大件”等筵席，当时流行的筵席还有“六大四小”、“四大四小”等等。其中较为平民化的是九大件，又称“九大簋”，菜肴仍然十分丰盛，包括鸡蓉粟米、菜胆肥鸡、滑生鱼球、草菇鸭片、火腩坟蚝、炒芙蓉蛋、脍鳝鱼羹、发菜猪手、榄肉虾仁，还有二京果、二生瓜、饭面等。高级筵席的生意由于渐不如前而改为“八大件、两热荤”，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筵席菜式还根据应时物料供应情况及客人需求更换一些好意头的菜肴，诸如“带子成群”（带子羹）、“早子肥鸡”（红枣切鸡）、“白发齐眉”（粉丝虾米）、“百年好合”（莲子百合）、“海屋添寿”（鸡茸冬笋螺片）、“长寿仙翁”（伊面）、“勤心上学”（芹菜猪心）、“开卷生香”（腰肝卷）、“独占鳌头”（鲤鱼，或称“鱼跃龙门”）、“大展鸿图翅”（红烧大裙翅）、“当红烧乳猪”、“发财好市”（发菜蚝豉）、“金银满掌”（蟹黄百花酿鸭掌）、“满地金钱”（扒冬菇）等。所谓的好意头，反映了广府社会毫不掩饰的商业气味和平民意识，广州菜的命名很少如北方的“鸡蛋炒西红柿”、“猪肉炖粉条”那么一目了然的直观，而是通过命名巧妙地给普通菜式注入了诗情画意，鸡谓之凤、蛇喻为龙、猫称成虎、冬菇叫金钱，于是有了“龙虎凤大会”、“玉树挂金钱”、“罗汉仙掌”、“万里鹏程”、“琴鱼影凤”、“乌龙吐珠”、“雪积银钟”、“月映红梅”，使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增添了几分想像的享受和期望。广府人尽心尽意尽善尽美地经营着饮食，包括在为菜式起名上费尽了心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饮食充分发挥其功利作用。2000年，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宴请出席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洋顾问，上菜菜式以粤菜为主，菜名寄予主办方的态度和期望。也体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礼仪内涵。这里不妨展示一下这次宴会菜单的名与实，以见粤菜命名文化之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筵席由于用时过长、分量过大、菜肴品种无新意等问题，已不适合新的消费需求，于是进行了改革：一是选料改革：接受“新派粤菜”的做法，将一些普通物料、“下脚料”都用于筵宴，从前不上大雅之堂的田螺、鸡爪等也上了筵席；二是烹饪工艺改革：有的菜肴改为席前加温，既保持了食品温度，又加快了供应速度；三是餐具器皿改革：推出个人边炉（火锅）、玻璃器皿；四是分量改革：减少配菜标准，减少肉量，增加菜蔬；五是热菜、主菜的改革：从过去的每席八至九款主菜改为六款。改革后的筵席菜肴分量适中、精致，用餐时间更为紧凑，气氛轻松融洽，从而得到推广。在具体的菜式和用料上，则有很大的余地，每当节假日时，酒店推出多种组合、丰俭由人的菜单以供食客选择，近期发展到厨师按食客所点菜烹制，使粤菜不断革新和切合不同食客的实际需求。粤菜在持续不断的兼容变化中不失本色，充实自身。市场的多样化与多变化，体现岀广府文化善变的主流特色。为了在美食云集的西关地段争得食客，同样是食蟹，厨师便有了所谓食蟹十八招的菜式，如花雕凤脂蒸裔蟹、蟹皇煲、南瓜汁蒜子浸蟹、陈醋姜汁侷蟹、七味盐煱蟹、台湾糯米蒸蟹、苏姜糖醋煽蟹、紫苏榄汁炒蟹等等。总之，日本的、台湾的、浙江的；还有本地传统的，不问出处，融于一炉，为我所用，创出新意，又让顾客体会到这就是粤菜。粤菜中的“拿来主义”体现了广府人敢于将外来文化化为己用，融为一体的气量，是有容乃大的典型。粤菜总是根据本地原料广博、人们喜欢清鲜的饮食习惯，不断吸收内地和西餐的烹饪技艺，灵活善变，扩充自我。粤菜中“八珍扒大鸭”的名菜，就是从北菜中学来的。粤菜本无扒。北方菜的扒，通常是将原料调味后，烤至酥烂再堆芡打明油上碟，称为清扒。粤菜的扒，却是将原料或煲或蒸至腻，然后推阔芡扒上，多为有料扒。又如京都骨、炸溜黄鱼、虾爆鳝背等，也是吸取京菜口味创制的。铁板牛肉、鱼香鸡球、宫爆鸡丁等，则是借鉴浙菜口味。著名的太爷鸡，是徽菜口味。而西汁猪扒、茄汁牛排等则是从西菜移植来的。还有人说，粤菜的革命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开放之初，香港厨师大量进入，港式美食品种和烹调特色跻身广府食肆，美其名曰“新派粤菜”，为食家们接受。所谓“新派”，一般是指新材料、新制作和新口味，比如象拔蚌、冰淇淋、“肥牛”、啫喱的引入，芝士、X0酱、鱼露、洋酒等调料的广泛使用，“铁板”、“镬仔”带来的新菜式、新口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粤菜。这对传统粤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使粤菜在烹调和口味上奇招迭出，有一种全新的变化。比如吃鲈鱼，新的制法就有锡纸烧汁鲈鱼、五星酱蒸鲈鱼、泰式鲈鱼、美极烧鲈鱼、芙蓉鲈鱼、七彩鲈鱼、功夫鲈鱼、潮式明炉鲈鱼、干烧鲈鱼等等。对于粤菜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不同的看法，引发出两种具代表性的说法。一是断言粤菜正遭遇大规模的蚕食，与外地菜区別日渐模糊，传统的地方特色将逐渐丧失。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看到粤菜正进入了一个更大范围、更丰富多样的发展时期，无论形式和内涵，其进步为以往任何时期所不及。后一种看法更符合实际，广府人在这方面的兼容性的能量是无法估量的。经营川菜的谭老板把“谭鱼头”带入广州，“谭鱼”本来是江汉平原的鲜活花鲢，头肉肥而刺少，脑部特大，唇口细嫩幼滑，肉质不韧不“削”。在广州上市，取川菜惯常的火锅吃法，汤底配料却不同于川地做法，辣味不辣心，辣口不上火。酱料则杂香菜、黄豆、葱花、芝麻、芹菜、韭菜和豆瓣菜等诸味之大成，鲜香而惹味。吃鱼头之前，先喝肉汤，以使舌下生津，以蘸料配鱼头，然后按鱼唇、鱼脑、头皮、鱼肠和时蔬，任由选择。这样的材料和吃法，名为川菜而无异粤菜了。尤其是酱料，酷似粤菜涮羊肉所用。于是在不知不觉中，粤菜又消化了一种川菜，川菜又为粤菜增添了一种粤菜菜式。在川菜、湘菜、东北菜、江西菜、云南菜、贵州菜、台湾菜、山东菜、新疆菜、上海菜、湖北菜、海南菜乃至日菜、韩菜、泰菜、越南菜汹涌而人羊城之时，处乱不惊，粤菜以一种十足自信的姿态，以不动声色的对应万变的本领，“拿来主义”的结果，是在创新中保持和发展了自身。这正是粤菜长盛不衰的奥秘，也正是在某些固定宗旨基本不变的外地菜系心目中，粤菜的可怕之处。粤菜顺应潮流不断调适变化，即使是广州人家宴上的菜式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家里来了客人是“斩番几味”，上的是烧鹅、鱼肉，很快代之以虾、蟹行时，之后，蛇、龟、水鱼、鹧鸪等经常在餐桌上亮相，如今又口味趋于平淡了。四、滋补饮食粤菜并不单纯地追求味美，更是多方面地体现出务实，突出的表现就是注重食物的兼助滋补强身。不仅精选新鲜幼嫩的物料，巧手烹调以保持食物可口，还懂得根据身体状况、季节气候变化来择物进食。广府人讲究的重点不是什么能吃，而是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怎样吃的问题。根据不同的时令、物产，调换变化，灵活运用。常见的四时菜谱，其实就包容进了许多地方菜系的菜式：春季：蟹黄生翅、鲍鱼鸡丝、燕窝羹、蒸银边、盐鋦鸡、烧乳鵠、烧羊肉、响螺片、玉树鸡、炖花菇、竹笙鸽蛋、蒸挞沙。夏季：清汤生翅、冬瓜盅、白云猪手、瓜皮虾、鲜莲鸭羹、百花鸡、姜芽鸭、凉瓜田鸡、冬笋火腿、夜合香虾仁、虾子鲜菇、清汤鱼肚、蒸三黎鱼、夏荷米沙肉。秋季：滑鸡生翅、煱禾花雀、片皮鸭、西菜鲜陈肾汤、三蛇奠、屈海鲤、炖蚬鸭、烧水鱼、酿椒子、鲈鱼球、凤果田鸡、骨香鸡。冬季：红烧包翅、御寒生窝、栗子鸡、腊味饭、炖鹧鸪、绍菜扒鸭、油泡、红烧虾子豆腐、蒸嘉鱼、杏元炖水鱼。煲汤、吃粥就是这种注重滋补饮食背景下的食俗。广州人对“老火靓汤”情有独钟且颇有研究，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身体条件，同为滋补，还要分别强身、美容、进补、保健，均有不同讲究。酒席上第一道上席的必是汤。汤多是用肉类熬制，熬成的汤人体容易吸收。常见的家庭用汤，四季都有讲究。南方春天潮湿恹闷，脾胃常有所阻滞，体内多余的水分无法全部排清，就形成了所谓的“湿重”，去湿困的汤方就有扁豆苡米炖鸡脚、鸡骨草炖横利、五指毛桃瘦肉汤等；夏天有冬瓜煲排骨加扁豆、赤小豆降火，大病初愈或体虚燥热时，要喝气血双补、润肺去燥的霸王花煲猪骨或花旗参煲生鱼；天气转凉时，则换上一煲海底椰川贝母炖冰糖；冬天以花旗参煲鸡祛寒。作为汤料的海味干货是逢年过节互相馈赠的礼品。各大酒家饭店也把拿手的靓汤名式放在菜谱最显目位置。用料名贵的有海马炖鸡翅、杏圆炖水鱼、虫草炖鹧鸪等。据专家分析，广州人所喜爱的汤品中含有不同分量的含氮浸出物和水溶性蛋白质、矿物质及有机物质，有利于调理肠胃、增进食欲和营养的吸收，此即所谓的滋养。粥品就具有一定的食疗功效。根据不同需要，用不同的火候做成各种各样的粥。如明火煮的白粥，加进白果和百合，能清热降火。用猛火生滚的各类肉粥，低油低脂、原汁原味，口感清新。粥水内加些鲜豆浆，可以烫鱼片、猪肝片、牛肉片、滑鸡、螺片、肉丸、蚝仔……总之是变化多端，这样做出来的粥都非常鲜香爽口。有这么一首《南粤粥疗歌》，具体描述了广府粥品的保健作用：“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加桂圃肉。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食肆里的粥品更是名目繁多，有什么及第粥、艇仔粥、皮蛋瘦肉粥、鱼片粥、鲜虾蚝仔粥、鸡皇粥……所谓艇仔粥，是旧时在西关荔枝湾畔艇上所售的，是用鱼片、海蜇、炸花生、叉烧、浮皮、虾米、姜、葱、菜丝等为原料做成的粥品，用料较多，风味独特，坐在小艇上一边观赏水乡风光一边品尝粥品美味，别有情调。近年，善于钻研的顺德师傅又推出了粥水火锅、粥水浸菜等烹法，将吃粥的精妙推向新境界，此种食法，在广府地区上至五星级酒店，下至街边大排档大为普及。粥水烹法的奥妙在于米种的选择、米水的比例、所用的器皿和控制火候，都有一番讲究，才有美味的保证。例如粥火锅，选用的是泰国金象米，黏稠适度，煲出来的粥水香滑软糯。选用的下配料讲究新鲜，连猪杂都要求是当天的出品。由于黏稠的粥锅底温度极高，火锅料一放进去很快就熟了，绵滑的粥底如芡汁般对火锅料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使食物不易烫老，保持新鲜。人材料的顺序是先放贝类海鲜，再涮鱼片，然后才人其他肉类，粥底也渐变得浓稠美味起来。吃到最后，店家免费提供粥渣和西洋菜粒或菜心粒，倒人粥水重新再煮鲜美的米粥。灵活变化，让人得到清鲜的美味享受。在菜肴中采用有食疗功效的食物，同样起到保健药膳的作用。例如，淮山玉竹蒸鸽子，具有滋补气血、解除湿毒、调精气益肝肾的作用，对烦渴饮多、气短乏力等症有良好疗效；山楂炒肉片，具有健脾消积滞、活血散瘀、化痰行气的功效，对高血压、高血脂等症也有疗效；当归党参鳝鱼羹，能除湿健脾、补益气血、滋养强壮，对久病体虚疲倦乏力、身体消瘦等症有疗效。类似美味药膳不胜枚举，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注重保健的今天，药膳为百变粤菜注入了生命力。五、饮茶粤海在广府饮食文化中，引人瞩目的还有广府人的喝茶。广府人灵活的商业头脑不仅将饮食做成魅力无穷的艺术享受，而且将喝茶这种本来是十分文雅的消闲行为，变成了几乎是全社会各阶层都能投入的日常饮食的一种几乎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潮州人喝工夫茶意在品茶谈天，而广府人喝茶，茶客之意不在茶，在乎以喝茶为名的进食以及伴随着喝茶的各种消闲的、商业的、交际的活动，故而称为“茶市”。将品茶转化为商业化、大众化的茶市，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因此，不像潮汕人那样随处可喝工夫茶，于居室内、庭院中，三个老友，一付茶具，足可以津津有味地消磨半天，而广府人说的饮茶，必定是上茶楼，不论是谈生意会客人，还是亲朋好友相聚，皆是请上茶楼酒家饮茶。茶楼、酒家的服务，从午前的早茶发展到下午茶、夜茶。饮茶场所讲究氛围，或富丽堂皇，或高雅得趣，或庭院园林，加上曲艺表演、菜式美名，让食客得到身心的享受。经营者并非着眼于传播文化，而是一种高明的营销策略而已。而在客观上，也为广府文化创造了一个可资展现的园地，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一个宜于寄情的场所。20世纪上半叶一些知名人士到广州，大都有过上茶楼的经历，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饮茶粤海未许忘”的诗句，更是脍炙人口。广府的茶楼是从酒馆中分化出来的。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广佛一带的二厘馆，是最早的公众茶肆，多数开设于码头、墟市路边的平房或搭寮盖篷，摆些桌凳，供过往劳力者及街坊歇脚饮茶聊天。茶价二厘，供应清茶、廉价的糕点。糕点摆在木台上，客人自选取食，食毕结账。光绪中期，开始出现姑苏籍人开设的一些略为高档的茶居。茶居是较矮小.的楼屋。二厘馆逐步发展成广州三大饼食行业之一的粉面茶点业，茶居则发展为现代的茶楼饼饵业。不管哪种行业，名字都离不开茶，实际上都和饮食有关，而不是单纯的品茶喝茶。在郊外又设有茶寮，以小炒为主，因有茶水供应得名。最早是开设于清同治末年的宝汉茶寮，因其在小北门外下塘村掘得南汉墓买地券得名。又有茶寮陆续设立，遂成行成市。茶寮以竹木葵叶松皮搭建，初时只是供过路人歇脚饮水，以后开辟菜园，饲养肥鸡，蔬菜即摘即炒，肥鸡即宰即烹，乡村风味浓郁，丰富了饮茶的内涵，融人了情调和商业味。广州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后，佛山逐渐衰落，商业资金转移到广州。佛山七堡乡（今石湾地区）人纷纷到广州经营茶楼业，创设有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茶楼，以后又发展到用“如”字号命名的十多家茶楼，包括今存老字号惠如楼。茶楼一般为三层，在当时属较高楼屋，设在商业旺区或交通要道，占地较广，地方通爽，座位舒适，于是“上高楼”成了市民的时尚。清末民初时，在广州西关还出现介乎茶楼与酒楼的茶室业，如宝华大街的山泉茶室、宝华中约的翩翩茶室等。茶室逐渐增多，竞争渐而激烈，各以精美点心作招徕，推出不少著名食品，如茶香室的娥姐粉旱、半鸥的灌汤包、龙泉的奶皮猪油包、仙泉的笼仔包等。茶居、茶楼供应的点心，最有代表性的是称为“南蛮”四品的虾饺、粉果、烧卖、叉烧包。茶室事先印好点心谱，由茶客在谱上划出若干款，点心师按单当即制作，或蒸或煎或炸，乘热供应。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地方有喝茶摆龙门阵的商业场所，茶点的供应办法却没有可与广州比高的了。民国初年，工商各业日趋兴旺，交往频繁，茶楼成为各行各业谈买卖、通信息的地方。茶楼发展至开有早、午、晚茶市，早市供应各种点心，午、晚市除点心还有炒粉、炒面、云吞等。广州的茶楼原先讲究“较茶”，较茶师得调制出有色香味而耐泡的面市茶叶，既降低成本，又能适应顾客要求，在泡茶的开水水温乃至水质上刻意用心，点心师则在产品求新求精上用心。茶楼、酒楼的经营界限逐渐打破，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所有的酒楼都开设茶市，成为茶市、饭市、筵席兼备的综合体，装修也竞相趋于时尚。茶室业便与茶楼业无异了。广州的饮食业中，与茶楼文化相联系的西餐业、.粉面小食业、甜品业、饼饵业等也各有特色。广州的茶楼，在计划经济时期因物质供应紧张而衰退，更因“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服务方式的破坏而萧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恢复发展。饮食业网点随着城区扩展而延伸分布，高、中、低档次并举，从五星级酒店到大排档，都有经营茶市。点心、小食品种不断推陈出新，品种多至数不清，单一种马蹄糕品种就增加了生磨马蹄糕、芝麻马蹄糕、五彩马蹄糕、七彩马蹄糕等。风味也多样化，调味料在使用传统酱汁的同时，广泛采用了广州饮食市场过去少用或未用过的沙律汁、泰汁、葡汁、千岛汁、椒盐怪味、鱼香味、酸辣、麻辣等。广州的饮茶配套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饮茶给广府饮食文化带出了两样特色，一是老字号文化，二是广式点心与小食。广州著名的老字号茶楼、酒家、西餐馆，最早出现于清末民初。新建的茶楼、酒家以环境引人，讲究装修，厅堂陈设酸枝、紫檀桌椅，间隔用满洲窗、彩色玻璃、木雕通花。在闹市区的茶楼，讲究内部布局开阔通敞，又有适当的间隔，不让人一览无遗。各厅堂内悬挂名人字画，以示风雅及招徕茶客。建于城郊的酒家则讲究园林布局。各家在水靓茶香、服务周到上下足了功夫，还各自创设出特色点心饼食，涌现出一枇著名老字号，有代表性的是成珠楼、惠如楼、陶陶居、莲香楼，后起之秀有泮溪酒家、广州酒家、北园酒家、南园酒家等。成珠楼位于南华中路，原名成珠馆，创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在光绪年间发展起来，是广州市至今尚存的最早的茶楼。成珠楼以小凤饼（又名鸡仔饼）驰名。关于这种饼饵的形成，有几种传说，形成的时间约在晚清咸丰五年（1855）。饼馅原料包括净肥猪肉、白芝麻、瓜子、榄仁、熟梅菜等，烤制后甘香酥脆。乡亲和国内外远道而来的客人把成珠楼小凤饼作为送礼佳品。成珠楼历久不衰，1990年易名成珠酒家，招牌名点仍是小凤饼。惠如楼地处中山五路，始创于清光绪元年（1875）。惠如楼除水靓茶香、服务周到之外，更以点心精美为特色。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所谓“星期美点”，每周转换点心花式品种，周一将16款8咸8甜的新颖点心张榜贴在门前显眼处招徕顾客。点心花式品种层出不穷，名称标新立异，如鸳鸯鸡蛋挞、玉液叉烧包、瑞士鸡粒角、玻璃马蹄糕、像生天津梨。制作也是追求新奇，例如“冰冻奶雪蛋”甜点，是将鸡蛋挖一小孔，倒出蛋白、蛋黄，再注入用奶油、鸡蛋、糖拌和的蛋糕料，置人冰箱冰冻，去壳上桌。再如“惠如裹蒸皇”，号称裹蒸粽之冠，用料和烹制方面十分讲究，用料精选，有上好糯米、去衣绿豆、火腩、五香肥肉、百合、金钩虾、北菇、咸蛋黄等，用明火煲6小时，火候充足，吃起来软滑可口，香味特别浓郁。本来粽子只在端午节应节上市，惠如裹蒸皇则全年天天都有供应。星期美点的做法后来推广到全市各茶室酒家，分别以每周10咸10甜或12咸12甜，配合时令，以煎、蒸、炸、烘等方法制作，有包、饺、角、条、卷、片、糕、饼、盒、筒、盏、挞、酥、脯等形式，命名也别出心载。惠如楼饼食也较出名，如嫁女饼、莲蓉酥、爽糖酥、红菱、白菱、老婆饼、冬蓉酥、年宵品等。月饼以蛋黄莲茸月、凤凰贡品月、惠如上月著名，其中凤凰贡品月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广式月饼的创意，用新鲜绿豆、龙芽百合等原料加入人参汤制作月饼馅料，甘香清甜。惠如楼开业后，在此饼馅料中加进蛋黄，其味更佳，取名凤凰贡品月，为惠如楼独家所有，百余年来历久不衰。陶陶居坐落在广州第十甫，创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原址在广州老城清风桥（今中山五路广大路右侧），1926年倒闭停业，后由五间茶楼的老板重新招股集资买下今址，重新开业。陶陶居外观正面楼檐雕刻精细，饰以金箔，顶层建有古色古香的可观亭。楼梯全部镶以铜片，墙边都镶上瓷片，店内首层正中为花园假山，厅房雅致，均用酸枝家私，壁挂名人字画。西关一带文人雅士、粤剧中人常到此聚会。陶陶居司理人陈伯绮性爱风雅，结交一班文人雅士为陶陶居撰写诗词、对联及文章，如以“陶陶”两字鹤顶格征联，引起宣传效应。陶陶居每天用人力大板车接载白云山九龙泉水，拉入市区后改用数十人以红色扁担、红色木桶，列队肩膀挑，招摇过市，桶上均漆上“陶陶居”、“九龙泉水”字样。又以小火炉烧乌榄核煲茶，茶价虽高，仍然座客常满。鲁迅的日记提到1927年3月“18日，雨。午后，同季市（许寿裳）、广平往陶陶居品茗”。陶陶居经营名菜名点，依时别物，秋冬制作腊味、端午粽市、中秋月饼，无不精心策划。“陶陶居上月”用烤鸭肉、冬菇、虾仁、叉烧、咸蛋黄、榄仁、果子料等20多种配料配制，咸甜适中，宜茶宜酒；“可观月”是为达官贵人特制，附送月华宴一席；“七星伴月”的配套，至今广为沿用。“九子连环”盒装粽子，每盒有一大粽、八子粽，咸甜枧水各式俱备，送礼雅观大方。陶陶居能烹制多种广式风味菜，如“南朝金粉”、“越国公煎碎金饭”、“玉液粉”，不仅用料求精，而且名称雅致，颇显出文人治店的特色。莲香楼位于广州第十甫，前身是一间糕酥馆，清光绪十五年（1889）创立，光绪中叶改称连香楼，集股414份，在香港、九龙开设三家分店。宣统二年（1910）改名莲香楼。店铺首层高7米，显得轩昂高敞。二、三楼厅堂全用满洲窗间隔，古雅大方。莲香楼以饼家、茶楼、酒家为一体，点心饼食以莲蓉制品最为闻名。“莲蓉家家有，莲香占鳌头”，其原因一是选料严格，甘愿冒成本高、售价高的风险，坚持采用优质莲子、白糖、花生油；二是制作一丝不苟，例如去芯逐粒用竹签褪出莲芯，总之是不惜工本确保质量。百年来，莲香楼制作的莲蓉食品进入千家万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莲香食品特别是莲香月饼岀口至东南亚。1987年首次出口至美、英、法等国，1996年又相继出口德国、瑞典、荷兰、南非等国家。泮溪酒家坐落在广州荔湾湖畔，于1947年开业。开始是一间只有400平方米200个座位的竹木杉皮搭构的棚寮，销售主要是以当地特产“泮塘五秀”（莲藕、菱角、茨菇、荸荠、茭笋）为原料的地方风味菜式、点心。1960年改建为占地面积1.2万多平方米、2200多个座位的全国最大的园林式酒家。泮溪酒家具两大特色，一是园林之美，整个酒家由假山鱼池、曲廊、湖心泮岛餐厅、海鲜鲂组成，布局错落有致，兼有荔湾湖景色衬托，园林如画，前苏联建筑师代表团称赞它是完整的“东方建筑艺术交响诗”。泮溪酒家扩建时还收集了数十套清代套色满洲花窗及珍贵木雕、家具，又是一座艺术殿堂。二是泮溪酒家拥有以全国最佳点心师罗坤、全国优秀点心师刘惠端为代表的技术队伍。20世纪60年代，有了闻名遐迩的八大名菜（金牌烧乳猪、八宝冬瓜盅、像生大拼盘、泮溪茭笋皇、脆皮炸蟹钳、牡丹鲜虾仁、园林香液鸡、瓦撑煱水鱼），八大名点（绿茵白兔饺、像生雪梨果、鹌鹑千层酥、蜂巢蛋黄角、生炸灌汤包、晶莹明虾脯、泮塘马蹄糕、清香苹叶角）。创新发展了点心筵席，运用食品拼盘的方法，使点心登上筵席，在大城市得到推广。泮溪酒家由于优雅的环境和特殊的风味，成为来华访问的外国首脑、政府代表团、国际知名人士的重要接待场所。接待过英国首相希思、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科尔、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越南总书记胡志明、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等重要人物。郭沫若在泮溪酒家饮宴之余写下了“盘中粒粒皆辛苦，槛外亭亭人画图。齐国易牙当稽颡，隋园食谱待耙疏。隔窗堆就南天雪，人齿回旋北地酥。声味色香都俱备，得来真个费工夫。”组合方便、丰俭由人、省时快捷的点心，成为广州著名的大酒家各出奇招的特色食品。如北园酒家以制作宴席点心著名，如琵琶虾扇、鸳鸯千层酥、月中丹桂盖、奶皮猪油包、菠萝雪花杯，1997年12月被认定为首届“中华名小吃”的有玉液叉烧包、鸡丝炸春卷；大三元酒家名点有蜂巢芋角、玉液叉烧包、冰肉奶皮猪油包、海南椰丝挞、布鸡蛋卷、软皮双色块等；大同酒家制作有娥姐粉果、薄皮鲜虾饺、玫瑰马蹄糕、酥皮鸡蛋挞、蟹黄干蒸烧卖、香橙马拉卷等名牌点心。六、广东凉茶岭南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喝凉茶与饮汤同样成为广州饮食文化的标志。俗话说：“广州有三宝：荔枝、烧鹅、凉茶铺。”这三宝中，荔枝是岭南四大佳果之首，烧鹅是可以向北京烤鸭叫板的自成一格的著名特色菜，凉茶竟可以与此两者相提并论，是因为广州地区天气炎热潮湿，按中医五行学说，“南方生热，热生火”，加上疠瘅多雨，饮食习惯多吃煎炒食物，人易上火，先民为除湿去热，采用一些能清热解毒、清暑去湿的草药，经过医生配方，形成各种各样的凉茶，知名的有王老吉、廿四味、五花茶、红萝卜、竹蔗水、沙溪凉茶等。最老牌子的凉茶是王老吉，其配方是王泽帮（乳名阿吉）于道光八年（1828）所创。阿吉的祖辈、阿吉及其子都以上山釆药，医治奇难杂症为生。阿吉不断搜集民间验方、总结临床经验，配成王老吉凉茶，在广州开设凉茶铺。王老吉的配方，对四时感冒、发烧发热都可以医治，还具有消暑解毒、去湿消滞、生津止渴等功效。传说林则徐曾因人推荐服用了一剂王老吉凉茶，口中生津，咽喉消肿。他派了—名下属前往致谢并建议做成药包，广行于世当茶饮。王老吉凉茶铺在十三行路开张时，林则徐特派人送来一个大铜葫芦，王老吉从此名扬海内。当时，在长堤一带的码头工、黄包车夫等苦力每天总要饮碗王老吉。包装的王老吉远销到内地和东南亚、美洲一带谋生的广东人中。王老吉历久不衰，而今更制成易拉罐装远销各地，成为酒家餐馆的畅销饮料。沙溪凉茶的创始人是香山（今中山）沙溪塔园村人黄汇，他出身贫穷，喜收集民间中草药，外出四乡打工，同时自采草药为贫苦人家治病。清光绪十年（1884），他总结整理出专医四时感冒劳倦伤寒的一条验方，自行采药加工成凉茶，用纸袋包装，袋上写有“沙溪伤寒圣药，黄汇创制”字样，时人称为黄汇凉茶，后人称为沙溪凉茶。与北方的喝大碗茶有点相似的是广州街头的喝凉茶。在广州街头的凉茶铺，可以见到五花八门的凉茶牌子，什么五花茶、水翁花、罗汉果甜茶、茅根竹蔗马蹄水、“一葫春”、“大只威凉茶”、“黄振龙癍痧凉茶”、“三虎堂”、“廿四味凉茶铺”、“常炯堂”、“慈济轩”，林林总总。各家称为秘方，但常用的草药不外是夏枯草、冬桑叶、野菊花、茵陈、木棉花、崩大海、岗梅、车前草、地胆头、板蓝根、水翁花、紫苏、藻荷、布渣叶、火炭毛、鸡蛋花、蛇舌草、淡竹叶、半边莲等等。也有将生鱼葛菜汤、鲫鱼粉葛汤都归入另类凉茶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凉茶经营方式向来是在街头巷口设一小档、摆上几个碗。顾客站着喝茶，等于做了一次快速的自我保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凉茶业的产品也有了改进。先是有了干品半成品，顾客买回家备用，随要随煲，又有以药料加工成茶叶碎末状，用时拿开水即冲即服。抗战前最出名的是甘露茶、榄菊茶、午时茶、甘和茶。抗战后又出现有“快应茶”与“神农茶”这类要煎服的草药茶。各家药店开展商战，各出宣传奇招。如常炯堂让人扮青面雷公，一手拿凿一手举锤追赶扮发冷鬼者，一边唱着：“常炯堂，一声雷；发冷病，尽驱除。”雷公还给追看热闹的孩子们散发糖果，让他们追着唱。“神农茶”药店则让人扮成神农氏，披头散发，腰围树叶，边走边唱：“神农茶，神农茶，发热发烧有揸拿（有把握之意）。”电台的广告也反复播放此语，传诵一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州的凉茶铺装修也上了档次，门面装饰得古色古香，店里有几个座位，凉茶品种也有所增加，釆用的是一次性茶杯，可以打包带走，有的还摆上了制冷机，兼制冷冻果汁豆浆、竹蔗水、椰子汁、酸梅汤等等，还有电饭煲煮茶叶蛋，也有卖龟苓膏的。还有附带经营牛腩牛杂、鲜奶白粥、蒸饭蒸菜的。1997年初开始经营的一家凉茶店，到了2002年在广东省内的连锁店已达250余家，还用上了机器蒸煮。而广州市内的凉茶店总数不低于700家。凉茶业以其快节奏、低消费、广适用的特征，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得到发展。注释：〔1〕《淮南子》卷七《精神训》。〔2〕张华：《博物志·五方人民》。〔3〕李昉：《太平广记》卷483引《南楚新闻》。〔4〕刘恂：《岭表录异》卷下。第二十二章建筑园林一、沿革流变广府建筑属于中国建筑体系，其结构形式以土木结构为主，其建筑风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一面，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一面，既折射出广府文明开发的历史轨迹，又积淀着广府的人文思想、民情风俗，是民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主要的特点是务实多变。广东先民的生活区域是从粤西、粤北的山地扩大至江海之滨以及平原、丘陵，居处由岩洞演变为人工建筑。新石器时期岭南居住建筑，大体建于江河湖海边的一级台地上和一级台地的山岗上，在珠江两岸和沿海海岸一级台地上发现大量贝丘、沙丘遗址。广府地区从新石器时期到先秦时期的先民，其居住方式主要是从巢居发展而成的干栏式建筑和从半地穴式到地面式的木骨泥墙茅屋。在增城金兰寺遗址下层、东莞村头、三水银洲等贝丘遗址和香港的大屿山东湾、赤腊角虎地湾以及深圳咸头岭等沙丘遗址，都发现有先民居住的房屋遗址。东莞村头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四分之一面积中已发现了大小9条壕沟，是当时聚居村落的防御设施，屋内地面铺垫一层纯净黏土，用火烧烤，是萌芽期的建筑工艺。在高要茅岗发现数万平方米的木构房屋遗址，是高架于水面或滨水靠岸的干栏式建筑，屋顶可能是树皮板。与浙江河姆渡遗址的房屋相比，经碳14测定年代相近，构筑的基本方法相似，而规模较大，木构件较为复杂。今中山大学校园内海拔一二十米的红砂岩山岗、佛山河宕遗址，都曾是岭南原始部族村落，其建筑是以竹木为主的地面式建筑，主要是干栏式建筑，此即古籍上所谓“栅居”、“巢居”，对以后的岭南建筑发生着深远的影响。秦汉六朝时期，是广府建筑的开发时期。在粤北的仁化、始兴、乐昌、英德等地发现秦平定南越时期的军事工程遗址，大量釆用了夯土、石筑技术，显然有中原工匠带入的技术，结合岭南本土的环境有所创造。在南越国都城番禺，发掘出南越国宫苑遗址以及南越王赵眜墓，反映出这一都会当年建筑的壮观。宫殿遗址出土有大型铺地砖、“万岁”瓦当。南越王墓开凿岩穴深20米，开挖及回填约4000个土石方，吊装近三吨重的石板，设置了自动顶门石。南越宫苑中有大面积铺砌冰裂纹石板的水池和铺砌卵石的曲渠，出土的八棱石柱、石渠、石板平桥及构筑石室的两列高近2米的大石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在广州、香港等地汉墓中出土不少陶屋模型，反映出当时的民居、井亭、仓库、作坊、城堡等不同类型建筑的式样。房屋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用木框架结构，尤以穿斗式结构为普遍。平面有长方形、曲尺形、日字形或三合院式。立面有平房、干栏式高脚屋和组合复杂富于变化的楼阁，反映岀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的设计思想。楼阁构建技术的进步，为岭南古代高层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广州东汉墓葬出土的庄院、城堡、碉楼明器，较之长沙东汉墓葬出土物规模更大、形制更复杂，反映了当时广府地区封建经济包括建筑的发展超过了长沙。但与同期中原地区的都市相比，番禺城市及墓葬建筑的规模、工艺、排水设施设计要逊色得多。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佛教大盛，在广州建起的王园朝延寺（今光孝寺前身）五开间大殿，宝庄严寺（今六榕寺前身）木构舍利塔，都是这一时期之佼佼者，显示了广府建筑的高超技术，建筑的主要形制来自中原。除砖、瓦、石外，也使用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建筑材料。唐人《岭表录异》记载，卢循“余党奔如海岛野居，唯食蚝蛎，叠壳为墙壁。”【1】这种蚝壳为墙体构筑的房屋，直至近代仍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隋唐南汉时期，是广府建筑的发展时期。隋唐时期岭南建筑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砖、瓦、石等建筑构件的推广。广州城内唐代建筑遗址出土的兽头砖制作精致，近似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物。光孝寺石经幢是现存罕见的唐代石经幢。唐代广州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率先呈现出一种自觉的对外开放的形态。以广州都督宋璟为代表的数任地方大吏，大力倡导广州居民修筑瓦房，广州城内一再扩街道、列店肆，构成沿河布市与临街设市的格局。在城西设立蕃坊，建成伊斯兰教怀圣寺和塔。唐末，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凿禺山建新南城，扩展城区。南汉时期，在国都兴王府（广州改称）城内大兴土木，建宫殿“凡数百，不可悉数”【2】见于《南汉书》之宫名即有十多处。宫殿极尽奢华。南薰殿以沉香木通雕龙柱，柱础镂刻置炉燃香。昭阳、秀华诸殿以金为仰阳，以银为地面，榱、桷皆饰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造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刘晟建乾和殿，铸造了12根铁柱。刘鋹建万政殿，一柱之饰费白金三千锭，以银为殿衣，间以云母。所居殿宇梁栋、帘箔率以珠杂玳瑁为饰。今见出土的南汉柱础高59公分，宽113公分，饰以波斯风格的覆莲及16蹲狮，圆柱直径达60公分，南汉宫殿之宏大可见一斑。2004年在南越国宫苑遗址发掘二区东面发现南汉国1号宫殿台基，从磉墩分析为面阔与进深各5间，东西33.2米，南北28.5米。在发掘二区西面发现另一座大型南汉国宫殿建筑，当时清理出东西残长18.6米，台基南侧、东侧均用巨型青石板包砌，南侧石板残高最大1.56米、宽0.94～0.96米，厚0.18米，石板之间以榫卯连接，制作精湛，气势雄伟。台基南侧以边长40厘米素面方砖铺地。台基南侧东部和东侧南部各发现一处登临台基的台阶。该建筑尚未全部揭露，很可能是南汉国宫城内主要的宫殿建筑。其东侧与一南北向屋廊连接。屋廊东西宽14米左右，南北现长120米左右，在发掘区内南北两端未清理到头。屋廊西侧应为一大型殿前广场。另外发掘出多层、多组南汉国建筑，表明南汉国宫城内建筑规模宏大，建筑活动频繁，较多使用青石。地面石板错缝铺砌，加工精细，打磨光滑，构筑考究。出土大量南汉国青釉莲花纹瓦当、谪水、黄釉花纹方砖等高火候带釉建筑材料，反映南汉国时期建筑外观比较富丽奢华。【3】南汉的园林营建可谓登峰造极，南汉朝设宫苑使管理园林建设，园林建设规模之大为十国之罕见。“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4】兴王府成为一座花园城。南汉宫苑重视花、石特色，早于北宋皇家的花石纲，对以后的岭南园林风格有深远影响。宋元时期，广府加快开发，掀起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高潮，建筑工程技术产生了又一次飞跃发展。广州城始筑砖城，大小修缮工程达20余次，最重要的四次有三次集中于北宋中期，面积为唐城4倍以上，奠定了延续至明清的城墙基本格局。环绕广州城兴起了8座卫星城镇。城内规划设施更为完善。中、东城皆以官署为中心，西城为商业市舶区。西城地势低平，修城取土不易，其建成得力于知州程师孟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修通了城市的供、排水系统——六脉渠，至民国仍起着重要作用。宋城城墙十分坚固，中城城门双门“规模宏壮，中州未见其比。”【5】砖石塔的构建，宋代达到顶峰。重建于北宋的广州千佛塔（今六榕花塔），采用相当先进的穿壁绕平座式结构，对广府地区以后建成的楼阁式塔影响深远。六榕花塔不仅外观典雅华丽，其通高67米的高度在近千年中也一直居于广州地区建筑之最。宋代在广州城建有接待外商的海山楼、观景的粤楼（南宋称“共乐楼”，元代改名“远华楼”）。明清时期的广府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建筑布局趋向于大型化，建筑装饰达到高超水平，出现了宏伟壮观的城市景观建筑。明代广州城将老城三城合一，其北端扩展至观音山（今越秀山）上，建立起望海楼（今镇海楼）。城内主要街道可容10至15人并马而行。沿街铺面接连，有鞋业、饭馆等专业街。街上建有过街牌楼，两侧人行道带遮顶。晚清时期，建成或重修了大量的书院、祠堂、庙宇，以广州的陈氏书院、仁威庙和佛山祖庙等为代表，屋顶脊饰的石湾琉璃饰件和灰饰，墙上的彩画和砖雕，梁架和隔扇的木雕，柱子和栏杆上的石刻，都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明清时期大行风水之道，在珠江三角洲各地建有一批风水塔，有华丽的“花塔”式和较为朴素的文塔，在广州如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泮溪文塔、长洲文塔。清代广州城城垣只向南扩展，在江边建了东、西鸡翼城。清中叶以后，城区突破原有城垣的局限，不断向城垣外的东、西、南方向扩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河南、西关、东山居住区。在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以佛山为代表，呈现出以工商业功能为主，交通发达的繁盛面貌。富商巨贾、回乡绅士则建起了名门大族聚族而居的村落，在番禺、南海、三水、顺德、佛山、东莞等地，建成以祠堂为中心，以格式一致的镬耳风火墙为特征的村落，最为普遍的屋宇格局是三间两廊式民居。在水滨，较多是以竹木杉皮为材料的干栏式棚寮。晚清时期，西关大屋也风行起来。近代广府建筑吸收了西方建筑风格，出现了一批西方建筑风格或中西合璧的新型建筑，同时采用了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西关的十三夷馆商馆，是在广州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在东山，由传教士兴办起一批教堂、书局、学校，其后又有外国人和华侨富商在此兴建住宅，形成了西式风格住宅区。在沙面，从咸丰九年（1859）英法两国强租为租界之后，开始了统一规划的开发，俨然一个近代城市的缩影。沙面租界的住宅和公共建筑，建筑风格包括早期的英法亚洲殖民地风格、中期的欧洲流行的仿古折中主义风格和中后期的早期现代主义风格。【6】靠近沙面的沿江一带，华侨投资建起了西堤、长堤等西式高层商务用途的建筑。1878年建成通高58.5米的哥特式石室教堂；1916年建成仿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粤海关大楼；1937年建成的爱群大厦，是美国现代主义风格，高15层共64米，被誉称为“南中国建筑之冠”。这些建筑成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西式建筑。民国时期，广州在进行大规模的拆城建马路的同时，建起了一批西式及中西合璧的“民族固有形式”的学校（如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机关单位（如市府合署办公大楼、中山图书馆、陆军总医院）、纪念性建筑（如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公共交通（如海珠桥）等建筑物。市区新辟的马路两旁兴建了骑楼，这种适合于南方气候条件下城市居民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建筑迅速在南方城市推广开来，成为南国城镇的一大特色景观。广州近代建筑的百花齐放，反映了这一时期广州在开放中领风气之先，熔中西方文化为一炉的文化特色。在深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同时，本土的岭南建筑文化和中原传统建筑文化仍根深蒂固。可以说，广州的近代建筑风格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折中主义风格。二、工艺特色人类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上有很强的因地制宜的能力，从而显示出其地方特色，广府建筑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在建筑材料上，广府地区地近江海，贝壳是先民取食软体动物之后的弃物，堆积甚丰，被广为采用作传统建筑材料。广州的怀圣寺光塔，是以蚬壳灰批荡，虽经风雨冲刷而通体银白，素雅美观。贝灰粘合力强，肇庆的城墙以贝灰砌缝，杂草不生。历史上，在粤中早就盛行过以蚝壳垒墙。唐代在广州“垒蚝壳为墙壁”。【7】明人王临亨《粤剑篇》提到“广城多砌蚝壳为墙垣，园亭间用之亦颇雅”。【8】此风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王士祯的《广州竹枝词》有“曲院深深牡蛎墙”句视牡蛎墙为广州特色风物。蚝壳墙今已不多见，在珠海斗门的绿漪堂、番禺沙湾留耕堂、中山的乡间及番禺乡间（如小谷围岛上的祠堂），偶尔可见。蚝壳墙历数百年而完好如新，经久弥坚。这种墙体的房子，冬暖夏凉。以蚝壳砌墙，先用铁线把蚝壳穿起串连接成整体，然后用石灰浆或蚬壳灰浆粘结，此法用于次要墙体或附属房间。以蚝壳砌建高大的承重山墙，则须事先在中间竖以木框架。用蚝壳砌筑水井，利于疏水，又起过滤作用。大的蚬母磨成薄片，镶嵌到窗户和天窗，既透光又有屏蔽作用。还有利用别的特殊材料的，如佛山冼氏家祠后殿山墙及后墙上部，以片状铸铁泥模叠砌，是宋代原物，是当时佛山铸铁业发展和建筑工匠就地取材的反映。岭南建筑工艺注重装饰。广州西汉后期墓出土的干栏式陶屋明器，下屋镂空有舞人形支撑框架类似希腊神庙以人体雕像直接作为柱体的“卡里亚蒂德式”。南汉宫中，以金、银、水晶、珍珠、云母、琥珀、鸟毛、沉香、玳瑁为装饰材料，富丽堂皇。明清以后的广府建筑进入了成熟的时期，建筑装饰手法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其一，是实用与艺术结合，结构与审美结合。对关系建筑结构又是立面上最显眼的重要部位，诸如屋脊、墙头、墙面转角处，细部收口等部位，通过装饰手法使之不至于单调而更加坚固。南方多雨，对屋脊防漏要求很高，特别粗大的屋脊，成为展示装饰工艺的理想之地，尤以正脊更为突出，饰以陶、灰塑，不怕日晒雨淋，历久而鲜艳如新。修筑得特别高大的风火墙，形如镬耳，不仅起了防火作用，而且能够遮阳而使屋面减少日晒，还大大地丰富了建筑的侧立面。对于直接起承重作用的大面积的墙体，嵌以透雕的砖雕通风透气，有利于建筑物的散热、排气。墙头饰以彩画，避免了单调的直觉，充实了建筑的文化功能。柱础采用石构，明显比北方的柱础更高，起了保护木柱的防潮、防洪水浸蚀和防白蚁的作用。高高的柱础刻成复杂的几何形状，造型饰样不下近百种，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在室内，为追求通风采光的良好状态，采用雕刻精致、通透的屏风、隔扇子、门罩以及挂落，也成为集中展现艺术造诣之处。其二，装饰题材上不仅广泛采用传统题材，更突出了广府地方特色。广府建筑装饰所釆用的题材，几乎囊括了传统的民间装饰题材，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渔耕樵读的日常图景、戏曲小说场面、吉祥如意图案、虫鱼鳞甲、飞禽走兽、奇花异草、龙凤麒麟、山水胜境、亭台楼阁，甚至名人诗句、名家书法。而广府工匠更善于采用表现地方特色的题材，通常较多表现的是岭南佳果：洋桃、番石榴、香蕉、荔枝、芭蕉、桃、李；岭南花木：红棉、茉莉、榕树、兰、桂、芷、芙蓉、素馨花；还有广府风光。如从化钱岗西楼“江城图”封檐木雕，长8.7米，刻画出清代广州珠江沿江景象，各种行船、码头、城楼、江防、商馆、铺号、民居、人物，尽收入图，被称作“广州江城图”。明嘉靖间建造的琶洲塔，塔基托塔力士为洋人衣着形象。晚清以后，在建筑装饰上更多出现西式图案，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背景。其三，是建筑装饰工艺丰富多彩。主要有三雕（石雕、木雕、砖雕）、二塑（陶塑、灰塑）、琉璃、壁画，还有金属（铸铁、铸铜）、玻璃蚀画等手艺。石雕工艺在广东历史悠久。在珠江口的香港、澳门、珠海发现多处早期岩刻。在南越国宫苑遗址中，铺砌冰裂纹石板的水池，蜿蜒曲折的石渠，巨大的石板架设的石室以及多种石构件，为全国秦汉遗址所首见。出土的多根四方基座八棱柱石栏杆，是中国建筑史上已知最早的石栏杆构件。南越王赵眜墓，是迄今所知岭南最大的石室墓，最大的墓石重达2.6吨。墓中出土244件（套）玉器，包括精美绝伦的浮雕云纹青白玉雕角杯，反映了高超的玉石加工水平。在广府建筑中，石材及雕刻被广泛地应用于建筑构件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梁枋、井圈及石狮、石像生。光孝寺大殿后廊平台勾栏有13处望柱头为宋代石雕狮子。镇海楼前存有广州明代最大的红砂岩石狮，原置于双门底前，高2.24米，体态肥大，形象古拙。华林寺前的星岩白石塔，是清代石雕精品，其基座雕刻线条流畅精细。广州的仁威庙前、南海神庙内、黄花岗烈士墓道，均置有深雕石华表，盘龙腾云喷水，是近代石雕精品。广州陈家祠的石刻栏板，更是清代岭南石刻艺术的代表作。木雕工艺品始现于广州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和划船俑。划船俑以圆木加工，着以寥寥数刀，即能传神地勾勒出划船人弯腰用力之态势。1950年在广州光孝寺三宝佛腹内发现唐代木雕罗汉像，体形肥硕，微笑和蔼，刻工传神。同时发现的唐代木雕信士像，线条简练而富有生活气息。现存于曲江南华寺的360尊北宋木雕罗汉像，从像上铭文可见是雕造于广州，其艺术成就十分卓越。木料多用柏木，也有楠木、樟木或檀香木的，每尊造像连底座都是用整块木坯雕成，高度约在50～58厘米之间，直径二十几厘米。刻画出形象各异、姿态不同、生动传神的罗汉。明清以后，广派木雕向建筑装饰和家具陈设上发展。广州木雕与潮州木雕构成广东木雕的两大流派。广州木雕以实用为主，主要用于建筑饰件和红木家具，主要产地是以广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一带。祠堂、会馆、庙宇及府邸的梁架、封檐板，是木雕装饰重点部位。广州陈家祠头门梁架承檩黑漆雕花，头门后柱间4扇柚木屏门、主体建筑聚贤堂内12扇柚木屏门均双面雕镂历史故事，后进中堂和两侧厅堂均有大型花罩，雕刻均十分精美。佛山祖庙庆真楼荔枝挂落，果实累累，悬挂在翠叶丛中，宛若置身荔枝园中。广州城隍庙、仁威庙、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的木雕亦各有特色。砖雕在广州附近及西江、北江流域中游较为常见，多用于门额、墀头、墙头、栏杆、神龛楣边、天井照壁及通花漏窗。砖雕按技法分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按规模分组合砖雕和单块砖雕。组合砖雕大面积的需数百块砖雕组成。番禺石楼镇善世堂大堂两侧墙上，各有一个砖砌镂空大花窗，四边镶有人物、花卉图案砖雕，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砖雕组合。现置佛山祖庙内的郡马梁祠牌坊，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所建的4柱3楼牌坊，正楼、次楼为砖雕砌建，刻有花鸟、人物、花卉，刀法生动，已达到较高水平。岭南砖雕以陈家祠正面墙上6幅大型砖雕最为著称，每幅高2米、宽约4米，主要内容是聚义厅、刘义庆伏龙驹，也有瓜果藤蔓、书法条幅。佛山祖庙砖雕规模也较大，分别置于钟楼和鼓楼北侧墙壁，都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作，内容为牛皋守房州和海公大红袍。较之北方砖雕的粗犷、浑厚，广府砖雕显出纤巧、玲珑的特点，采用精制水磨青砖为材料，多以阴刻、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穿插进行，精细者可达七八层，画面富于起伏变化，细部往往雕镂得精细如丝，称为“挂线砖雕”。从1995年开始，番禺沙湾镇年仅26岁的何世良挑起了传承的重担，无师自通做砖雕，他细心观摩传统砖雕并耐心摸索，用3年时间完成了宝墨园照壁的大型砖雕《吐艳和鸣壁》，全壁采用3万多块古旧青砖，长22.38米、高5.83米、厚1.08米。前后两面总面积达260平方米。正面以一对凤凰为中心，以百花吐艳、百鸟朝凤、鸟语花香为内容，雕出神采各异的鸟类600多只、花草100多种。背面雕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笔意、神韵跃然砖上。这幅砖雕被大世界基尼斯确认为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而砖雕镂空度之大、面积之广、雕工之细、变化之奇，更使传统的砖雕得到创新。目前，何世良已带有40多个徒弟，原本渐渐失传的砖雕艺术复活了。陶塑在广府地区历史更为悠久。增城西瓜岭战国早、中期遗址出土有陶鸡和陶马。在香港、深圳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陶塑动物残件。广州西汉墓出土有大量陶制屋、井、仓、灶、动物模型。东汉陶井模型在井亭攒尖顶置有张翅昂首之鸟，是最早附饰于建筑物的装饰性陶塑。广州光孝寺出土的南朝莲花瓦当，花瓣莲蓬丰满、规整而不失韵气生动。广州中山五路出土的唐代兽头砖，造型可与唐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兽头砖媲美。这些都是屋顶构件，有很强的装饰性。从一开始，陶塑对建筑物的装饰部位就在屋脊上，与陶制件不怕雨淋日晒的特性有关。陶塑瓦脊主要流行于粤中地区的庙堂屋上，清代至盛。佛山祖庙共6条陶塑瓦脊，分别在三门、前殿、前殿两廊、大殿和庆真楼的屋顶上。以三门屋顶石湾文如壁造的陶塑瓦脊最长，长30米、高1.8米，正面各段内容分别为舌战群儒、姜子牙封神、甘露寺，塑有145个人物；背面为郭子仪祝寿，塑有149个人物。岭南最长的陶塑瓦脊是陈家祠聚贤堂上之陶塑，长27米、高3米多，各进厅堂的瓦脊两边巨大的鳌鱼、狻猊、凤鸟令人注目。陈家祠陶塑也是石湾文如璧店所造。文如璧是顺德人，康熙年间石湾陶塑名工，其子孙沿用老字号设店，光绪年间广东各地不少建筑屋脊、瓦脊都有文如璧店标记。现存有德庆悦城龙母祖庙、三水胥江祖庙、东莞埔心村康王庙、顺德大良西山庙等处陶塑。粤中陶塑瓦脊特点，一是突出人物的主体地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楼台也简化至似戏曲中的背景；人物头部比例较大，动作较大，上部一般上倾，脸部用不上釉的黄赤色土塑成，喜怒表情明显。二是色彩鲜艳，在太阳底下或雨水冲淋之后，更加鲜丽。比陶塑更为高级的有琉璃脊。广州沙贝名贤陈大夫祠的牡丹花琉璃花脊，花枝惟妙惟肖，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华店造，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琉璃瓦脊之一。灰塑在民间又称灰批，是用石灰、麻刀、纸浆和铁丝等塑制而成的饰件，常用于脊饰和檐下、门楣窗框等部位以及亭台牌坊构件。灰塑可作成多层次的图像、浮雕和单体圆雕，涂上鲜艳夺目的色彩后，艺术效果接近陶塑，而制作更为方便，因而在明代广东各地的建筑物已多有运用。佛山祖庙褒宠牌坊建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上有现存灰塑的较早期作品。始建于明代的顺德大良西山庙饰有大量造型生动的灰塑。清代灰塑更为普遍流行，除了人物、花卉图案造型之外，常见的还有几何纹样饰以屋脊、檐下等处，广州陈家祠、佛山祖庙、三水胥江祖庙、悦城龙母庙等处的灰塑很出色。陈家祠屋脊灰塑累计总长225米，高度平均为0.9米，规模之大为岭南地区之冠。陈家祠建筑还采用了铸铁饰件，在主体建筑聚贤堂前露台石雕栏杆中，嵌有大小共16块铸铁饰件，每块长2.1米，题材有“三阳（羊）启泰”、“九如（鱼）图”、“威凤祥麟”、“云龙吐珠”等。后进连廊共有32根铸铁廊柱，每根高近4米，直径为12厘米，铸工精湛，使连廊显得轻巧通透，显示出受西方建筑所影响的风格。三、广府民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居建筑，反映了广府人注重实际，以及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融人外来文化多元变化的特性。广府民居最有特色的是三间两廊式居屋、西关大屋、竹筒屋、骑楼以及碉楼。在珠江三角洲封建文明高度发达地区的广府民系，其居住模式常常是聚族而居，正如屈大均所说：“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11】广府民系往往聚族而居，由于地居平原，常常建成独立成片的建筑群。广府民居最为普遍的基本单元是三间两廊。东莞虎门村头发掘的明末清初民居遗址，其中就有三间两廊式格局。正面为一列三间悬山顶主座房屋，明间是厅堂，次间为居室。屋前天井，天井两旁为两廊。天井内通常打一水井，天井下方以围墙封闭。厅后墙不开窗，厅向院的一面或设门或全开敞。两廊中，右廊幵门与街道相通，一般为门房；左廊多作厨房。也有将大门设于正面人口，由总体布局和道路系统决定。有的在三间后面加建神楼，一般为卷棚顶两层建筑，楼上靠厅一面有神龛，用以安放祖宗牌位。以墙体承杉檩条，民房很少用梁架结构。砌墙材料有三合土、卵石、蚝壳、砖等，佛山还有以铸铁坭模为墙体。明代以前用砖较少，清代则多用青砖。四合院式的居住组合方式，符合中国宗法制度家庭生活的要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从考古发掘的陕西扶风凤雏村的周原四合院落遗址来看，早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已有完整的四合院式建筑。三间两廊是四合院传统的延续，只是因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而有所变化。以三间两廊为基本格局，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处理增删。屋地狭窄，可舍去一廊一间；占地广阔，可以数座三间两廊联成建筑群。现存典型的三间两廊组合建筑群，有从明代就开始营建的佛山石湾建国街廖家围、清代佛山街道住宅东华里以及三水大旗头村。大旗头村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三间两廊屋的组合，一种是横联成为多开间形式，平面呈不对称形式，比较实用，较为普遍；还有一种是向纵深发展，如三间两廊加前屋成为四合院中重叠，形成了非常紧凑的住宅类型。西关大屋的“西关”指的是广州荔湾区一带，清末民国时期，这里多是商贾巨富聚居之地。它是适应西关商业繁荣、民居密集的环境条件，在三间两廊式民居基础上，吸取苏州等地中、大宅的主要厅堂布局，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风格的民居。实际上，西关大屋并不仅限于西关地区，在广州老城区、珠江三角洲城镇都有这种类型的居屋。西关大屋正面三开间，称为“三边过”，明间为“正间”，次间叫“书偏”，取其为书房、偏房之意。相邻的西关大屋之间以青云巷相毗连。西关大屋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从临街凹人的门廊——门官厅——轿厅——正厅（神厅）——头房（长辈房）——二房（饭厅）——尾房。门官厅、轿厅、正厅各为金字顶，厅与厅间隔于小天井，天井上方有小屋盖，靠高侧窗（水窗）釆光通风。后墙通常不开窗，避免“散气”、“漏财”，实际上起到挡北风和屏蔽作用。右边“书偏”是偏厅，是家属休闲与接待客人处。偏厅前临街的倒朝房，通常是宾客临时用房。倒朝房露台，俗称“平天台”，是平时晾衣、放盆景、赏月的地方，很有实用价值。书房和偏厅之后是卧室和楼梯间，最后是厨房。厅房都是单屋，部分卧房却利用空间成为两层的木楼阁。全屋以正厅居中，为最高大的厅堂，作为供奉祖先、接待重要客人、全家聚集之处。卧房全用屏门、满洲窗灵活间隔，房间可大可小。青云巷则起着交通、通风、采光的作用。西关大屋保留了以传统中轴线为基准，突出重点，左右对称，层次分明，长卑有序的布局原则，又对空间布局进行了浓缩。典型的西关大屋占地面积500～900平方米。西关大屋正立面以明间檐下雕花封檐板（花荏）、正门“三件头”（脚门、趟拢和大门）、水磨青砖与墙面以及花岗石墙脚，构成独特的外表风貌。脚门可遮掩视线，又可通风，趟拢可防范外人闯入，是适应南方炎热气候而出现的建筑构件。正面墙壁采用东莞大青砖和花岗石贴脚，开创了广州地区建筑采用饰面砖的先河。其室内装修应用了木、石、砖雕，陶、灰塑，壁画，石景，还采用了玻璃花、铁漏花、蚀刻彩色玻璃等新工艺，反映了当时广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及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时代背景。竹筒屋民居是纵深组合的单开间民居，有的地方称之为“直头屋”。进深视地形长短而定，短则7～8米，长则12～20米。形成竹筒屋的原因是广府地区的城镇人多地少，地价昂贵，临街方向尤为值钱，故而向纵深发展。天气炎热，进深长带来通风、采光等问题，只能利用内天井、敞厅和廊道来解决。此外，为了节约用地，充分利用空间，有的还加盖楼房。组合则相当灵活，有厨一天井一厅一卧房、厅一房一厨、厅一房而厨设在外等多种形式。骑楼则代表了广州街景的主要特色。不少人认为骑楼是盛行于南欧、地中海一带的西方建筑，自西方传入广州。其实，从骑楼的形式，可以见到干栏式建筑上实下虚的痕迹，传统的吊脚楼和连廊商铺，都可视为骑楼的雏形，在现今的浙江水乡还可以见到。在此基础上，揉合西方建筑特点（材料、装饰）而建成骑楼。骑楼是楼房前上部跨过人行道的建筑物，马路两侧的骑楼各自连成长廊，既便于行人来往遮阳挡雨，商店也可敞开铺面广招顾客，还可以扩大上层建筑利用面积，极具实用价值。20世纪初广州城区改造旧城拆毁城墙扩建马路时，采用这种方式，既解决了道路扩充而建筑物退缩位有限的矛盾，又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骑楼的门面、柱状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更使人耳目一新。广州的骑楼集中分布在荔湾区，在其他老城区越秀区、东山区、海珠区的商业街也都是骑楼街。西濠口（今人民南与沿江路附近）一带，抗战前是广州商贸最发达地区，骑楼上部的建筑动辄高至十多层，骑楼底部空间高达七八米，颇有气魄。骑楼建筑立面多为三段式，从上至下分为楼顶、楼身、骑楼底三部分：楼顶有山花和女儿墙，是重点装饰部分，通常雕塑着各种西式图案或商铺商号；中部有西式窗套、中式满洲窗、阳台；骑楼底有支撑柱柱饰，构成了骑楼建筑的特色。一些大型的酒店如新亚酒店、新华酒店、爱群大厦等也设计成骑楼式建筑物。骑楼是室内环境与室外环境的一种过渡，也是交通的缓冲空间，商店可以敞开店面经营，行人可以避雨防晒。利用了空间，方便了行人和顾客，又大大节约了城市用地，这一特色的建筑最早在广州出现，20世纪在广州风行一时，主要的商业街道几乎无一不采用这一建筑形式，荔湾区内骑楼总长度达8公里。其后在岭南的城镇及国内其他大城市如上海、武汉等成为“广东街”的标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骑楼景观在旧城区改造中成为逐渐消失的风景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了拓马路拆旧楼的速度，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呼吁。为了保护这一越来越少的文化遗产，使之更好地为商业旅游服务，广州市政府决定将荔湾区长达2.6公里的骑楼街装饰一新。据称这是世界上连接最长最完整的骑楼街。其后越秀区对北京路、东山区对文明路骑楼也进行修复翻新。可惜这一行为的商业动机显然大于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骑楼已再现不出当年的风采。碉楼是广府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一般认为，碉楼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为防洪所建造。作为乡土建筑中以防御为主要功能的高层建筑物，碉楼的雏形其实早就出现于岭南大地。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屋中有坞壁一类，坞壁四角的角楼，其作用在瞭望与防守，是碉楼的滥觞。清代，碉楼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各乡。《广东新语》记载：“村落多筑高楼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楼，或于水中央为之。楼多则为名乡。遥望木棉榕树之间，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皆高楼也。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内分三重，每重开三四小牖以瞭望。顶为战棚，积兵炮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具。”【12】可见明末清初在平原地区高耸的碉楼已相当普遍。外观方形，楼内三重，开有小窗以作瞭望，其作用也在瞭望和防御。其形制及功能与后来的碉楼并没有什么区别。据文献记载，明末清初，在开平出现了碉楼。开平现存最早的碉楼是赤坎镇三门里关氏家族兴建于明嘉靖年间的“迓龙楼”，距今已有400多年。是一座砖木结构单体建筑，楼高三层约11.4米，该楼主体为带正脊的硬山顶，四角设落地式塔楼。这座楼的建筑造型与开平其他碉楼颇不相同，代表了开平碉楼的早期形态。鸦片战争后外出的海外移民，在海外经过艰苦创业，有的人有了积蓄，20世纪的20年代或汇钱回乡或回乡置地建房娶老婆，这些归侨、侨眷成了土匪猎取的目标。防卫功能的碉楼应运而生。这时所建的碉楼，不仅墙身厚实，设有枪眼，顶层设瞭望台，而且以归侨在侨居国的审美观，主动吸取了由华侨带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有古罗马式、德国式、英格兰式、意大利式、法兰西式、土耳其伊斯兰教堂式等，也有中国传统的硬山顶、中西合璧式。富于独创，几乎无一雷同。五邑地区现存尚有2400多座碉楼，其中开平一地有1800多座，以平面方形为主，高度一般为6层左右，一个村子多则几十座，少则三四座。星罗棋布，蔚为大观。粤中地区的其他侨乡，如广州的花都、番禺、增城，深圳、佛山、中山以及东莞等地也有碉楼。总之，广府建筑的风格特点，主要是风格复杂多变，融合外来文化的中西合璧风格在近代十分普遍；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注重通风散热防潮；注重建筑装饰，夸饰富丽；注重实用，如商务、防卫等功能。较之客家、潮汕民系的建筑，广府民系的建筑对风水并不很强调，体现出开放、务实、多变的基本格调。四、广府园林岭南园林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三大流派之一。岭南的造园艺术，可以追溯到南越国时期。秦汉时期，在中原是大造园林的时期，其特点是将帝王宫殿与园苑结合一起，宫苑范围广袤，建筑豪华。这对南越国的园林建筑有着直接的影响。南越王赵佗建四台，其中的越王台、朝汉台就建在番禺城附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述朝汉台：“因岗作台，北面朝汉，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亩，复道回环，逶迤曲折。【13】越王台形制不详，只记载其“台据北山，南临小溪。横浦、之水，辐辏于其下。”【14】经过持续发掘，发现在南越王宫苑区东北有太液蓬莱区，南部有曲溪沙洲区。前者仿汉朝宫苑的太液池，后者仿袁广汉宅园的“积沙为洲屿，积水为波澜”。石渠长达150米，水池底铺装石板为冰裂纹，渠底有错落的砾石以及一定距离设拱起的石背，激水起波，在大池、曲水、沙洲之间发现有殿阁、亭、廊之类的建筑遗迹。【15】可以想见南越国的王家园林有很大的建设规模，其主要的创意来自中原的园林文化，具体建造上又根据岭南气候、材料特点有所创新，如在园苑中突出石构建筑，临江有干栏式的水上台阁。这是广府也是岭南造园之肇始。南汉国时期是岭南园林史上皇家园林的另一高峰。刘汉王朝在广州（时称兴王府）内外进行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宫苑园林建设。刘汉政权设有宫苑使专司建苑之事。刘汉王朝“作离宫千余间，以便游猎”。【16】在兴王府，宫苑园林多集中于越秀、白云两山及城西、城南，大体分为四区：南宫区、昌华苑区、西御苑区、甘泉苑区。南宫区在城南，利用天然谷地凿成西湖，亦称仙湖，其水北接文溪、东接沙澳，长百余丈，周围五百余丈。湖中有洲称药洲。此园林主景为湖、洲，配景为花石，药洲之石以九曜石为主，以其布列像天上星宿取名。这种园林特色，后来为北宋所承袭，成为“花石纲”制度。昌华苑区在河南官洲北亭（今番禺新造镇仍有“昌华市”之称），此处盛产荔枝，周围五十里，冬夏不凋，当时称荔枝洲。西御苑区在今泮塘，刘氏在此建华林园。甘泉苑区在今小北门外，将原甘泉疏导其源，筑甘泉宫，建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夹溪南北三四里，皆刺桐、木棉，旁侧平坦大道【17】在城北还有流花桥、芳华园、芳秀园等胜景。刘汉皇家园林的成就在岭南园林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岭南私家园林在吸收、融会中原造园文化的同时，逐渐发展了自己的风格，从肇始就显示出以岭南花木果树取胜的特色。三国时，虞翻谪徙广州，居南越王子赵建德居址，辟为苑圃，多植苹婆诃子，时人称为虞苑，又称诃林。此可视为广府私家园林之滥觞。唐代，在广州西郊有荔园，诗人曹松赋有《南海陪郑司空游荔园》诗，道出当时此园以荔枝取胜，且是达官贵人游赏之处。南汉时，兴王府城中有苏氏园，“幽胜第一”，【18】以蕉林为一大特色。南汉以花石为重的岭南造园传统，为后代所传衍。北宋名臣余靖《题寄田侍制广州西园诗》有“石有群星象，花多外国名”句，是广州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反映。清代佛山之梁园，即以石胜，亦称十二石斋。我国的园林建筑艺术，至明、清为集大成时期，尤其是私家园林追求以小见大、平中求趣、拙间取华的意境，更显诗情画意。岭南园林作为后起之秀，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鼎立比肩，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三大类型之一。在岭南园林中，私家庭园之造诣和影响位居其上。岭南园林的造园理论落后于苏杭，始学扬州，后学苏州，有不少仿效江南园林风格之痕迹，其自身特色渐起于明后期，突出显示热带风光特色，如“朱氏园，在会城东北，倚山为之。松竹交荫，花草争妍，驯禽飞舞于轩墀，图史高拥于左右，曲径闲亭，高堂密室，在在足娱心目，盖幽居之最胜者也。”【19】陈子壮在大东门外元运里的洛墅，“广筑精舍，浚池为湖十余里，斜跨弓桥，置画舫其中”。陈子履在城东（今中山三路东皋大道）有东皋别业，“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回，小汊穿桥，若连若断。自挹清堂以往，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岩洞之类，与花林相错，其花不杂植，各为曹族，以五色区分。林中亭榭则以其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各肖其花形象为之。”“登其台，珠海前环，白云后抱，蒲涧文溪诸水，曲曲交流，悉贯玉带桥而出。有彩舟四，……湖尽，万松谡谡，直接赤冈山径而止。桂丛藤蔓，缭绕不穷，行者辄回环迷路。”【20】城西吴光禄筑有西畴，梅花最盛。城西南花棣，“居人以艺花为业，士大夫园林亦多在焉，楼台绣错，卉木绮交。”【21】在白云山南麓廉泉坑一带还有陈子壮依山建筑的云淙别墅。环绕面积百余亩的宝象湖，布楼馆十余所，园内大量种植松、梅、竹、柳和荔枝。在越秀山南麓，有在李时行小云林基础上建成的继园，在小北门内有寄园，在河南有郭家园、天山书院。可见当时广州城内外园林之盛。佛山明清时期有三大名园东林园、鹤园、梁园。其中东林园为宋代冼姓冶铁巨商创建，经历代经营至明代，占地1平方公里，“东林拥翠”为佛山八景之首。清前期珠江三角洲的庭园园主多有北上经历，园林呈现出受江南园林较多影响的痕迹，渐而在花木种植、建筑形制以及装饰上显示出地方特色。这些庭园多以小见大、精巧玲珑著称，如清晖园、余荫山房、可园和梁园等清代粤中四大名园，皆于尺土寸地之上精心经营。清晖园在顺德大良镇，旧址为晚明大学士黄士俊花园，清乾隆年间邑人龙廷槐辞官归乡后筑园，原面积1000多平方米，布局以聚散参错、雅淡自然取胜。南部为池景区，有六角亭、澄漪亭、水榭、碧溪草堂；中部为全园精华，有船厅、惜阴书屋、花亭等，并有采种自苏州的玉棠春、百年龙眼和百年白木棉等奇树异木；北部是园中园，由竹苑、归寄庐、梦笔生花馆等小院组成，楼屋鱗毗，假山阻隔，巷院兼通，修篁夹道，巧用空间而使人不感到闭塞。余荫山房在番禺南村镇，由举人邬燕天建于清同治年间，占地1598平方米，以池桥和临水建筑取胜。园内以“浣红跨绿”廊桥为界划为东西景区。东区中央有一八角形水池，池中建玲珑水榭八角亭，以曲桥接岸，东南为沿墙假山，东北有孔雀亭、来薰亭。西区辟一荷池，深柳堂与临池别馆隔水相望，深柳堂前植白山茶、红春梅、紫薇、丹桂等花木。可园在东莞莞城，是回乡官僚张敬修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占地2200平方米。园中有1楼、5亭、5池、6阁、6台、3桥、19厅、15房，通过近百个大小门房和游廊通道连成一体，回环曲折，把客厅、别墅、庭院、住房、花圃和书斋艺术地连结起来。突出主体建筑高4层的可楼，层楼起伏，轮廓优美。梁园在佛山城区，由佛山富族梁氏营造，包括十二石斋、寒香馆、汾江草庐、群星草堂等四组园林以及宅第、家庙毗连成片的建筑群，为粤中四大名园中规模最大者，仅群星草堂和汾江草庐占地就达200余亩。以十二石斋中立有12块异石、寒香馆遍植梅花及所集法帖刻石藏于馆中闻名。晚明广州地区私家园林之盛，主要是仕宦人家的园宅，清代除了仕宦人家之外，更有富商所建的私家园林，园林更为兴旺，风格更臻成熟。清代广州的西关、东关、河南都得到开发，在新城区出现一批有田园风光的别墅式园林，如伍家花园、南墅、陈氏花园、洛墅、感日园、翰海故宅、邓园、龚氏园、听松园、杏林庄、小田联园等，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晚清时期，广州豪富建了一批豪华富丽的宅园，如十三行商中四巨富之首的潘家，在河南乌龙岗之西开村立祠，建有家园，称“能敬堂”。园林占地甚广，有亭台水榭、奇花异卉、宝木珍禽，极其豪华。潘氏子孙在河南龙溪一带各自建的庭院、别墅、书斋极多，主要有：潘有为的六松园、南雪巢、橘绿橙黄山馆、看篆楼；潘有度的漱石山房、义松堂、南墅；潘正兴的万松山房、风月琴樽舫；潘正衡的晚春阁、黎斋、船屋山庄、菜根园；潘定桂的三十六草堂；潘飞声的花语楼；潘正炜的清华池馆、听颿楼及其孙所建之养志园等。清代，广州的园林向市郊扩展，花埭（今芳村花地）一带，曾经有过连成一片的园林区。以今芳村公路为界，北有醉观、醉红、翠林、纫香、群芳、留香、新长春、余香圃、评红等种植花果盆景的经营性园林；南有诗人张维屏经营的听松园，画家邓大林经营的杏林庄，康有为经营的康园，富商潘氏经营的东园、六松园，何氏经营的恒春园、馥荫园等。在西关有君子矶、小田园、小画舫斋，名园荟萃，极一时之盛。番禺石楼镇大岭村，有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前的陈永思堂花园，现残存面积尚有3058平方米。晚清广州地区富商所建园林，以潘仕成所建的海山仙馆规模宏大、巧设地形、精心设计而最为出名。园中大池面积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足以泛舟，更有珠江之烟波浩渺为借景。又相度地势，积土取石以造山，山上建有雪阁。临池建堂，左右廊庑回缭，雕镂藻饰，无不工致。又在水中建一戏台，音出水面，清响悦耳。小桥凉榭，轩窗四开，一望碧空。池中有白塔，高五层。西北一带，高楼层阁，复有十余处曲房密室。海山仙馆有不少设景有意仿效江南园林，但总体又有岭南特色，主要是返璞归真，追求自然意韵。园内遍植荔枝，荷花如海，曲房密室掩映于绿树丛中，仿若世外桃源。游廊曲榭沿壁遍嵌石刻，皆晋唐以来名迹，提高了名园的文化品位。海山仙馆的室内陈设有中西合璧的特色。清末民初一些宅园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色。广州荔湾的环翠园，是清末曾任云南大理知县的蔡廷蕙致仕回乡所建，占地23000多平方米。园南部建有仿意大利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两层楼“玻璃厅”，相邻建有中式的望云草堂。东莞虎门南珊村的蒋光鼐故居——荫园，是一座西式别墅式园林，园内栽种有各种岭南果木。在香山的拱北、金鼎、唐家、前山镇（今均属珠海）等地，官僚、富商所建的私家园林均具较大规模，且有中西合璧的时代特色。大买办、实业家徐润在家乡北岭村营造1.7万平方米的“竹石山房”（又称“愚园”），内部布局仿上海豫园。建于前山镇的归侨陈芳花园，面积7.2万平方米，园内建有4座大型石牌坊，还建有西式舞厅。在金鼎镇的栖霞仙馆，是富商莫泳如为其侍女阿霞等建造的念佛场所，面积1.5万平方米，主体建筑斋堂仿上海太古洋行样式建造，门前有一对西洋石狮，园内有喷泉，花木繁盛。民国时期广州的私人宅园较发达，有荔香园、息耕园、钟家花园、十香园、息园等。钟家花园以名石时花分隔成景色各异的厅房。十香园在今海珠区，是名画家居廉、居巢居住、授徒之处，因园内种有素馨、茉莉等十种香花得名。1932年，曾任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将其在唐家镇的私家园林捐岀为公园，取名“共乐园”，写有“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一联挂于园内。该园面积3.2万平方米，依山面海，种有名贵花木和荔枝。主要建筑物有观星阁（天文台）、田园别墅（办公室）、暖房（花卉温室）、网球场、信鸽巢、石门坊和六角亭等，有很浓烈的西方现代风格。开平旅美华侨谢维立于1926年回家乡塘口镇建造立园，历时十年，占地1万多平方米，以桥亭或回廊将别墅区、大花园区和小花园区连成一体，别墅建筑结合中西特色，每层室内都有壁炉，置红木家具和屏风。园中的花藤亭最有特色，下方上圆，四面为通透的花墙，形如鸟笼，亭内有养金鱼的水池。公共园林的起源，大体包括寺观园林、风景区园林。前者如广州的海幢寺，寺内除佛教建筑外，还配置花园，形成花田春晓、古寺参云、石蹬丛兰、竹韵幽钟等八景，在清代成为对在穗外国人定期开放参观的场所。后者如越秀山、白云山、西樵山等处，经历代文人、官吏的开发，修建亭、阁、楼、台，移植花木，成为公共游览之场所。光绪十九年（1893），两广总督李翰章将黄埔船局撤归黄埔鱼雷局照料，不久即在船坞附近修建了公园，此为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公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指定将越秀山辟为公园。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一批纪念性园林，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1912年，孙中山在黄花岗亲手种下4株马尾松，倡导植树造林。1918年，孙中山倡建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前身）。在广州相继出现9座公园，数目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总面积达32.6平方公里。这些公园，或利用风景名胜区，或利用原有衙署园林而建。如第一公园所在地，清初是平南王府；康熙年间改为巡抚衙门；乾隆初年在衙门后面建起5座楼台，四面疏浚小溪引水，命名“菜根香轩”；嘉庆年间辟勤志馆于古榕下，建屋4间，称“眠琴庼”；道光初年，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阮元修葺题名“万竹园”；光绪十一年（1885）两广总督张之洞建“园中渔樵耕读四景”；孙中山倡议在此建第一公园，“与众乐乐”。这是广州第一座城市公园，后称中央公园。孙中山逝世后，在佛山、东莞石龙等地建成中山公园。江门在1920年建成纪念陈白沙的白沙公园。民国时期兴起的还有酒家园林。民国时期的茶楼室内布置有园林式庭园。园林酒家则直接将建筑置于园林环境之中，建筑简朴，多为竹篱茅屋，讲究意境，著名的有下塘宝汉酒家。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酒家才逐渐改建成砖瓦建筑。出现了北园、泮溪、南园、麓湖这样以园林布局取胜、以湖光为依托的园林酒家。综上所述，由于优美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气候条件，广府园林具有分布广泛、花木繁盛、重视观赏性与实用性结合等特色，同样体现出广府文化的开放性、商业性、平民性等特点以及务实、善变的表现形式。五、广州建筑园林的现代化广州建筑的独特风貌，至现代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较多引进西方建筑文化、广辟实用功能的建筑种类以及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上领风气之先。广州城市建筑现代化的标志，首先体现在为适应商业发展需要，以钢筋混凝土构建的高层建筑物的出现。由澳洲华侨蔡昌、蔡兴兄弟投资在西堤兴建的城外大新公司大楼，落成于1922年，12层50米高，是广州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建筑。天津第一幢高层建筑7层高的劝业场、上海第一幢10层大楼沙逊大厦分别建成于1928、1929年，因此，广州城外大新公司大楼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建筑。1937年，由美国华侨陈卓平集资建成的爱群大厦，采用当时刚兴起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广州第一座钢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15层64米高，被誉为“南中国建筑高度之冠”，直至今日，其突出高耸效果的立面设计，仍是许多高度后来居上的新建筑物所难以比拟的。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高层建筑兴建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68年，为了解决广交会外宾住房紧张事关“国誉”的问题，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在广州海珠广场矗立起27层87米高的广州宾馆，创下了当时国内最高建筑物的纪录。这座900多床位的宾馆当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宾馆。8年后的1976年，同样为了解决广交会外宾住宿问题，在广州环市路建成白云宾馆，34层121米高，又一次刷新了全国建筑高度纪录。改革开放之后，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92年在广州环市路建起63层200.6米高的广东国际大厦，再创国内建筑高度之最。施工采用了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和多种新材料，施工进度为每月完成三层半，标志着广州的建筑施工达到世界水平。1994年动工的80层中天广场（今中信广场），总高度401.9米，又创新了全国最高层建筑的纪录；施工釆用国际水平新工艺，创下月上8层楼的高速度。改革开放后，广州创造了在市区跨江大桥数目之多为全国大城市之最的纪录。2000年竣工的丫髻沙大桥，全长1084米，在建设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和新工艺，创下四项全国乃至于世界第一：主跨360米为世界同类型桥梁中主跨度最长；平转体每侧重13680吨，为世界上第一座万吨转体桥梁；竖转加平转相结合的施工工艺世界领先；大桥的极限承载力和抗风力国内领先。1964年在广州诞生了全国第一座城市道路立交桥。1983年建成的区庄立交桥是国内第一座4层双环式多功能立交桥。1980年建成的人民南路天桥，是全国第一座人行天桥。建成于1987年的全长7000米的人民路、六二三路高架路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高架路。1993年建成了全国第一条环市高速公路。诸如此类的全国纪录，是广州建筑在全国建筑行业现代化进程中领先的标志。广州的城市地铁建设，从速度到技术，也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的纪录。广州的园林，在现代有较大规模的建设，主要是公共园林。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公园，包括越秀三湖、流花湖、荔湾湖、东山湖、麓湖等一批人工湖开辟而成或扩建的公园。这些大型人工湖公园，不仅化腐朽为神奇，将蚊蝇孳生的沼泽地改造为树木葱茏、山青水绿的公众休憩、娱乐场所，还为广州在以后的城市发展浪潮中保留了难得的几块净土，对减少污染、净化环境、蓄洪与调节气候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成的纪念公园和专业公园，有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州文化公园、广州动物园、华南植物园，规模较小而颇有特色的花卉公园有兰圃、西苑。这些园林，大都有较大水面，林木蓊郁，配以亭、阁、桥、榭等建筑，格调清新，装饰富有岭南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在白云山风景区建成广州碑林、云台花园和复建了能仁寺，实施了林相改造计划。1993年建成的云台公园，占地12公顷，是我国最大的园林式花园。园内有：喷泉广场、大型玻璃外墙温室。1995年建成的雕塑公园，是融雕塑、园林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公园。民营的番禺长隆野生动物园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大型动物园。90年代广州园林建设的重大突破，就是引进了生态园林的观念。1997年以后建成的公园中，有各具特色的生态公园。这批果树成林、山泉汩流、鸡犬相闻、小桥流水风光的田园式、山野式公园，分布在广州的天河、白云、番禺、海珠、黄埔、芳村各区，把广州环抱起来。其中最具纯粹的生态公园形态的有橄榄公园、杨桃公园、瀛洲公园，以及利用林业科研基地建成的广东树木公园。经过2003年的非典肆虐，人们已深深意识到保持无污染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广州郊区的帽峰山被辟为生态公园，吸引市民前往假日休闲活动。番禺宝墨园，建于清末民初，毁于20世纪50年代，1995年重建，面积由原来的2000平方米扩至10万平方米。园中有大面积的水景区，汇集岭南古建筑、美术工艺、园艺于一园。1999年，由广东省政府委托广州市园林艺术规划设计院负责设计的粤晖园，参加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比赛和展览。全园面积1518平方米，布局以水池和船厅为构图中心，建有亭台水榭；在780平方米的草坪上，共种植各类亚热带植物123种；又以3名沐浴嬉水的裸体少女，象征东江、西江、北江三江，表达“人与自然”主题。既別具岭南园林独特景观，又具时代气息。粤晖园代表了当代广府园林的最高水平，在此次世博会上共获得奖项40个，其中以总分第一名（中国赛区）的成绩获得“室外庭园综合类竞赛”最佳展出奖，还获得3项专项大奖、7项金奖、10项银奖和19项铜奖。天河区政府投资500万元在天河公园内复制了粤晖园为永久性景点。对于“岭南园林”到底算不算中国园林中的一个独立的流派的问题，历来就有争论，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所谓“岭南园林”不过是一个因地域而生的概念，建园手法是承袭苏州园林，造园成果也未有大成之作。广东的园林研究者则认为，“岭南园林”对传统私家园林的造园技法作了发展，并引入了西洋园林的有关手法，在中国园林中确系独树一帜。提出“岭南园林”的特点是“求实兼蓄、精巧秀丽”。【22】“岭南庭园有它的特点和地方风格，如果人们以‘稳重雄伟’来形容北方园林，‘明秀典雅’形容江南，那么岭南庭园该称得上‘畅朗轻盈’了”【23】。粤晖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和清雅晖盈的造园意境。全局以水池和船厅为中心，以亚热带花木造景，巧用地形高差凿池叠山，辅以高低错落的水体组景。临池溪涧和英石假山“琴韵”有岭南庭园特色，主景建筑“枕碧”船厅采用镬耳山墙、西关趟门，融入石、木、砖雕及陶塑等精美的民间工艺，水池石坝中“情溢珠江”的主题雕塑，表现人体健美的现代气息和南粤儿女热爱自然嬉戏水间的生活情趣，充分展示了岭南成熟的造园艺术风格，使岭南园林得到了心悦诚服的认可。粤晖园的展出成功，进一步确立了岭南园林在中国园林艺术上的地位。城市建筑不仅是一种生产建设，更应该是一种艺术创造。广府建筑园林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令人忧虑的问题。在重视采用现代技术和材料，及时引进外来建筑形式时，却未能重视建筑艺术风格的地方特色和总体形象，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概而言之是小气、杂乱。一些原先适合地方气候和生活的特色建筑传统‘并没有发扬下去，如骑楼在不断消失，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同样未能摆脱这一时期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的千城一面的通病，林立的高楼随心所欲地各呈辉煌，其排列分布和外观没有什么规律和本地特色。标榜为标志性建筑的建筑物，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城市综合治理中付出不少力气的“穿衣戴帽”，只是让在路边破旧的老房子换上一个光鲜一时的外表，却改变不了房子的建筑风格。即使是那些领先全国建筑高度纪录的建筑物，其造型平淡，大都乏美可陈。全城制高建筑中信广场，恰似一座光溜溜的冲天碉楼。得水滨之利的二沙岛新建筑群，体量相当而距离相等，天际线缺乏美感。一些园林建筑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如建于荔湾湖水面上的新海山仙馆大而无当，风格与主题格格不入。新建成的一批文博机构馆所，除了南越王博物馆的大门设计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之外，相当多的馆所在设计思想上缺乏创意，不少采用了红砂岩为材料或饰以红砂岩颜色，以此象征岭南地区特色，其实颜色与材料只是建筑的表现因素，关键在于造型与组合上，不注重建筑物的气质与整体特征，同样不能说是成功之作。与上海、青岛等大城市比较，广州在建筑艺术上的弱点显而易见。广府地区的建筑技术水平、采用材料都比较先进，而建筑艺术水平却不高。在特别注重个性的园林设计方面，类似粤晖园这样的佳作凤毛麟角，即使宝墨园这样经营比较成功的园林式景点，园林布局及建筑造型也缺乏韵味，除专门创作的砖雕之外，大部分建筑饰件的艺术性并不高，而且不是岭南地方工艺。强烈的商业性影响到建筑造园创意之品位。商业操作使一些园林中的项目没有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缺少文化品位和艺术内涵，只图大而不求精，只求新奇而不重内涵，难以经受历史的考验，如番禺的飞龙世界、文化公园的汉城、越秀公园的西游记宫，都是喧闹一时逐步渗淡，终于关闭。园林中重视景物布置，却缺少独具匠心的创意，缺少富于诗情画意的联想力和文学修养的润色，因而缺少神韵。今之景区大多亭台楼阁不能巧为命名，缀以楹联匾额，从而纯为建筑而未具中国园林意境。风景区布局规划大同小异，营造大型神佛像招徕游客，也为相同之招数。新时期复建或新建的宗教建筑，从建筑艺术的角度说，有不少俗不可耐的败笔。深圳的弘法寺，规模宏大，而建筑构件却极为粗糙。广州的寺观（括白云山上复建的寺庙）及黄大仙祠，都是追求宏大堂皇，并不顾及场所及周边环境，建筑及装饰风格表现出一种生吞活剥的任意性。海幢寺的石雕佛塔工艺粗糙，与羊城大丛林的身份并不相称。番禺飞龙世界建的塔是江浙风格的，花都圆玄道观的大殿是京派风格的，荔湾湖“新海山仙馆”是东南亚式的异化。“人们普遍认为，能体现广州地域特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现代建筑精品，迄今为止并不多见”。【24】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小城市乃至乡镇并不足怪，但在岭南建筑文化中心的广州，出现这种现象值得深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上出现这种现象，是一个地方文化艺术水平下降的表现。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和呼吁，报刊上也有过数次的讨论，然而情况不见得有改善，如何做到务实而不平淡，典雅而不小气，兼容而不杂乱，值得广州建筑界及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去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广州，期待出现一批超越了其使用功能，能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大作品；期待氤氳的文化气息从都市建筑的丛林中弥漫出来，沁入市民的心头。”【25】注释：〔1〕刘恂：《岭表录异》卷上。〔2〕《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3〕《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新发现南越国宫殿，同时清理岀南汉国宫殿建筑》，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8日。〔4〕屈大均：《广东新语》。〔5〕《永乐大典》卷11960《广州府·城池》。〔6〕汤国华：《广州沙面近代建筑群》第8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刘恂：《岭表录异》〔8〕王临亨：《粤剑编》卷二。〔9〕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广州竹枝》，《中华竹枝词》第273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0〕《广州汉墓（1）》第28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1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祖祠》。〔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13〕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泿水》。〔14〕祝穆编，祝洙补订：《方舆胜览》卷三十四引唐《子西记》。〔15〕杨鸿勋：《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澜——南越王宫苑的认定兼答船台说者冯永驱、陈伟汉、全洪》，载《中国文场2000年7月26日。〔16〕梁廷枏：《南汉书》卷四《本纪第四·中宗纪》。〔17〕《南海百咏》。〔18〕陶毂：《清异录》。〔19〕王临亭：《粤剑篇》卷一。〔2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名园》。〔21〕民国《番禺国续志》卷四十一《古迹志二》。〔22〕李敏：《论岭南的造园艺术》，转引自《让岭南园林走向世界》，载《南方日报》1999年11月23日。〔23〕夏昌世、莫伯治：《漫谈岭南庭园》，载《建筑学报》1963年第三期。〔24〕〔25〕周洪威、刘晓璐、李建宏：《岭南建筑呼唤文化品格——广州能体现地域特征和个性的现代城市建筑精品太少……》，载《南方日报》1999年5月7日。结语：广府文化的走向广府文化在新时代的走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珠江三角洲，城乡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外来人口剧增，现代化进程加快，然而，民系文化不是一天之中形成，民系群体的特点也不会在瞬间变化。广府人灵活，潮汕人精细，客家人刻苦，这些特点至今仍渗透在三大民系人群的行动和思维表现中。在三大民系中，相对于不同的特质而言，广府人更容易与世界潮流接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正是由于开放、务实、善变的特质，使广府文化在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后来居上。据毗邻港澳及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之地利，得改革开放先行之天时，积擅长于外经外贸之人和等有利条件，广府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广府文化的优越性，在时代大潮中如鱼得水。广府文化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腾飞相辅相成，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势的地域文化。作为广府文化特点的开放、务实、善变，其核心是务实，谋实事，讲实效，求实利，这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完全符合。务实为的就是发展。务实，就能大胆开放；务实，就能度时善变。进入新世纪以后，尽管在全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中，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然而，开放、务实与善变，仍然是广府人迎接新挑战，再创新优势的特种武器。在全国29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广州开发区经过20年的拼搏，实力不断增长，2004年，在引进外资、总产值及创收利税各项数字上均拔得头筹，这一殊荣并非偶然。广州的GDP连续保持在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名，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仅居于北京、上海之后。取得这些公认的成就，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开放、务实、灵活的思路和姿态，还是取胜的重要因素。有人说，广东人有两句口头禅：“钱系揾唔晒嘅”（钱是赚不完的），“钱系揾黎使嘅”（钱赚回来是用来花的），其实这是广府人的口头禅，用时下的话说，就是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经营，而赚了钱则要懂得生活享受。这种经营观、生活观是积极向上的。因此，在新时代仍有其积极意义与存在价值。粤语的使用以及广府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的民俗表现，如注重饮食享受而不刻意追求穿戴，还将会在广府地区长期保留下去。在珠三角城镇的食肆里，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都市乡镇，常常是座无虚席，香味四溢。喝早茶在广州风气不减，延及融入广州的外来人，而茶楼文化正推向省内乃至省外各地，方兴未艾。除夕花市、元宵舞狮、波罗庙会、端午赛龙舟、七夕乞巧、中秋飘色、重阳登高，只要是有利于商机、有益于身心的民俗活动，在珠三角地区也越来越红火。一些流传多年而一度沉寂的习俗重新兴起，如观音开库生菜会、祖庙北帝出游、黄飞鸿武术馆表演、黄大仙祠、三元宫与仁威庙重开香火，热烈火爆不亚当年。更有传统事物在新条件下的创新，如评选西关小姐之类的活动，让源于清末民初的“西关小姐”一词，一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西关还有旧式嫁女的民俗表演。不过，这些活动虽有一时一处之效应，终究未能复旧。在文化艺术方面，岭南画派是否该画句号成为报纸上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在活跃在广东画坛上的画家们，实际上大多数已不再标榜传承岭南画派先师的笔法了。落后于时代节奏的粤剧、曲艺，为了守住城市舞台而不遗余力地变脸，以求取悦于城市和大学生受众，而在乡镇和里巷间，私伙局的热火正说明这种本来就属于民间娱乐的戏剧，其生命力就在于扎根民间。作为民系文化组成部分的手工工艺，受市场经济的变化和应用范围所左右，命运各异。木雕家具遍地开花，象牙雕刻一波三折，广瓷、广彩、粤绣的大师们却在慨叹后继无人。有识人士正大声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抢救传统手工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万兆泉创作了充满生活情趣和乡土风味的雕塑，被誉为“为寻常百姓树碑立传”，颇受好评，雕塑艺术在民俗风情中得到了艺术生命，无疑是一种启示。广府文化的优势在发展中得到表现，广府文化的弱点也在发展中暴露出来。城市发展得很快，规划的品位与管理的水平却未能相应提高，高楼大厦见缝插针地拔地而起，高架路从艺术博物院擦身而过。花大力气办的音乐活动，还未能把更多的在忙忙碌碌营生中的大众的眼光吸引向高雅的享受。关公、财神以及负有各种使命的神佛，受崇祀的势头有增无减，现代都市中的寺庙香烟越燃越旺，一些游子的寻根活动也正转化为规模越来越大的宗族复苏联谊活动。出现这些情况，丝毫不奇怪，因为民系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民系文化的发展也受着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民系文化的短处，对地区的发展正产生负面作用。2004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国城市批判》的畅销书直言：“广州人不喜欢争论，喜欢实干，在他们看来，北京人喜爱对任何事评头品足实在有些无聊，北京人特别看重做事的动机，而广州人特别看重结果。事实上，在重建社会的道德风尚越来越显得重要的今天，做事的动机常常比结果更重要。”“广州城正在变得越来越豪华气派，但广州也同时变得越来越拥挤和污浊。广州人务实求新，城市规划非常细致又爱不断调整，好像怎么整都不满意，所以就出现了拆了建、建了拆、填了挖、挖了填的混乱局面。”“许多年来，广州的精力一直放在城市建设拼命地扩张上，而没有冷静地去考虑它是否合理和科学的管理，这是广州未来需要付出巨额学费才能补上的一课。”“说广州是一片文化沙漠虽有些过分，但却特别形象。一个缺乏思考的城市，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城市，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是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能够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文化。广州的文坛、诗坛、画坛、流行乐坛都呈现出散兵游勇的状态，铁打的广州流水的兵，永远难成气候。”“广州人讲究迷信和暗示，这是广州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广州人对数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敏感。手机号、呼机号、车牌号非6非8不要，带4的号再低的价格都无人问津。……在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激烈的竞争带来的道德缺席和信誉危机，从而引起的精神压力和内心恐慌，人的工具性增强，安全感降低，故而人们把对未来的把握就建立在一种虚无的迷信之上。”【1】这些评议或许有其站在角度不同的立场看问题的偏激与夸大之处，但从大的方面说，却有其冷静客观之处，不失为一种中肯的意见。广州的领导人曾经说过“大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当广州在经济上的发展为人所公认的时候，舆论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广州的文化品位不如北方，说岀来就是所谓“广东没文化”。“大城市以文化论输赢”这个命题绝对是正确的，无论是广东的领导人还是珠三角各地的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在努力地做着提升地方文化品位的工作。然而这一努力在外地人眼中看来还有差距。2005年出版的《广州的性格》一书评说：“广州要追求的已经不止于生活在中等水平，而是一种地位，是一种不被取代的地位，是要保持国内一线城市，将来跻身国际化城市的地位。成就这种地位，就要在城市文化、城市标签上一个档次，这才是广州的追求。但现在广州似乎还很缺乏现代城市文化气息。”【2】因此，对广府文化的注重和研究，已经不是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意义的现实问题了。广府文化在新时代的走向，应当为当局的导向所关注，也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关注。如何认识广府文化的优点与劣势，如何区别传统文化中的良莠，如何认识民系文化对现时社会生活发生的影响，保护和发掘广府文化中的健康因素，正确对待民系特质的短处并加以克服。学术界应该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提出积极的意见，引导广府文化在新时代消除历史上形成的积习，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不断地扬长弃短，那么，在近现代曾经创造了辉煌亮点的广府文化，必将在岭南的未来发展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创造出更为光明的明天。注释：〔1〕海默：《中国城市批判》第43～4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2〕中国城市活力研究小组主编：《广州的性格》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